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时殷弘 主编

★〔美〕爱德华·勒特韦克 著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PDG

商务印书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本书对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依照其发展演变的三大阶段作了详尽的考察和阐释。

作者论证并强调：罗马帝国“历史性成功”主要归因于帝国初期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大战略目标具备优秀的战略性素质，以及其手段的高度多样化。罗马帝国初期大战略的精髓在于“每个成分的设计都反映总体的逻辑”。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5694-6

9 787100 056946 >

定价：30.00 元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美〕爱德华·勒特韦克　著
时殷弘　惠黎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美)勒特韦克著;时殷弘,惠黎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ISBN 978-7-100-05694-6

Ⅰ.罗… Ⅱ.①勒…②时…③惠… Ⅲ.罗马帝国-历史-研究-1世纪~3世纪 Ⅳ.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711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美〕爱德华·勒特韦克 著

时殷弘 惠黎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5694-6

2008年7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8

定价:30.00元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战争是历史最悠久、往往也最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最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国家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最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优秀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如此的探究总是深入到具体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表层下面，探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战

争和战略,考察它们的统一构造和内在动力,揭示它们与它们以外的整个社会/政治存在的联系。这就是实际上由克劳塞维茨首次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的总体视野和总体分析。它们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创造性发展,也在一些非常优秀的西方战争史和战略史著作中得到了杰出的体现。

正如第一流的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历史考察得到,而纯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就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比战略更广泛、更基本的范畴而言同样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考察不同于一般的史事叙说,它以理论性思考之始终不渝的主导作用和战略主题之首尾一贯的"聚焦"效应为特征,其很大部分目的就在于揭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

作为有机整体的统一运动,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类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和平、战争和战略三者形成并展示其动能和机理:这就是本套译丛的主题,一个以活生生的历史来展现和说明的主题。本译丛由皆可称为经典或至少准经典的当代名著组成。它们的作者皆为战争史、战略史、战略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理论思想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有的人甚至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当代头号泰斗。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们的最重要代表作。可以相信,在当今中国,由于显而易见和非同小可的政治、社会和学术需要,翻译出版本套译丛既具有不应低估的学理意义,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价值。

时殷弘

200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 1

前言 …… 3

导言 …… 5

第一章　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

附庸国和机动军：从奥古斯都到尼禄 …… 10

一　体系概述 …… 17

二　附庸国 …… 23

三　操控附庸 …… 33

四　军队的战术组织 …… 43

五　兵力的战略部署 …… 50

六　结论 …… 53

第二章　从弗拉维王朝到塞维鲁王朝

“科学”边境与阻绝性防御：从韦斯巴芗到马库斯·奥雷柳斯 …… 55

一　体系概述 …… 60

二　边防：战术层面 …… 65

三　边防：战略层面 …… 84

四　附庸国体系的衰落 …… 116

五 军队 …… 122
六 结论 …… 131

第三章 纵深防御
三世纪的大危机与新战略 …… 132
一 体系概述 …… 135
二 变化着的威胁 …… 149
三 帝国的新边界 …… 159
四 墙围市镇与硬点防御 …… 164
五 边境部队 …… 175
六 行省部队 …… 178
七 中央野战军 …… 187
八 结论 …… 193

结语
对三种体系的评价 …… 196

附录
权势和武力：定义和内涵 …… 200

注释 …… 205

本书所引著作目录 …… 252

索引 …… 266

序 ix

本书作者是一位战略分析和当代国际关系专家。由于系统地分析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大战略，他为罗马史学家做了他们自己一直未做的事情。诚然，不乏论述罗马军事主题的书籍和文章；本书作者开列的丰厚的参考书目只是一个文献选录。有着对于一个或另一个时期内各不同部分的帝国战略和政策的敏锐和富有启发的分析，而且它们依然非常可贵。然而，一代或更久以前的手册和通论正在变得过时和不足。在某些著作里见到的"克劳塞维茨式"路径可能是不正确的，有如勒特韦克博士提出的那样。无论如何，在过去数十年里，巨量饶有成果的著作已经问世，大多基于考古发掘和新发现的文献，特别是铭文。地方考古学家们的标准已变得更细致，他们的技术更丰富，他们积累了的知识更准确。许多学者集中于勒特韦克博士未直接关注的种种重要问题，例如军队作为罗马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中的一个因素，它的内部结构和征召方式等等。通常，他们研究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期或地区。就我所知，没有可与本书比拟的研究存在。

本书与众不同的贡献首先在于它的全面和长时性，如它做的那样涵盖了帝国全部和长达几个世纪的一个时代，在此期间发生了种种基本变化；第二在于它集中论说"大战略"；第三在于作者的当代战略分析知识， x
对此极少古代史学家有所知悉；最后在于他就特定问题做的明智和富有见识的判断。他对专著和文章的使用始终保持分辨能力，那是在一位学者冒险步入一个并非他本行的领域时不能被想当然地认作必定做到的。

希望本书不会仅仅由那些已经对罗马帝国感兴趣的人阅读。几个世纪里，甚至在我国开初的几十年里，理论家和卓越的指挥官们一直认为罗

马的军事体制和实践值得研究。这不只是厚古情怀。在其前言里,勒特韦克博士强调战略困境方面我们与罗马人之间的种种相似。它们至少是引发论辩和激励思考的。

没有人会设想有如本书这样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不管多成功——将取消予以被考虑的问题进一步注意的必要。专家们无疑会发现错误,或者对论断持有异议。新资料和新研究将继续面世。亦属自然的是,历史学家们指出复杂性和矛盾,以此对抽象模式做出反应。然而,如果他们决定修改或拒绝在此见到的某些模式,那么他们至少会发觉自己关注在此被清澈地展示了的种种重要问题。

J. F. 吉列姆

于高级研究院

前　　言 xi

要对罗马帝国的战略性治国方略作一番考察，几乎完全不需要申辩其正当性。在我们的文明史册上，罗马人在大战略领域的成就依然完全未被超越，甚至两千年的技术变迁也未颠覆它的教益。无论如何，罗马史研究是它本身的酬赏。

对一个习惯于国际关系文献的混乱复制、唯科学语言和狭隘地方主义的人来说，罗马历史编纂学那累积的规范、严峻的雅致和世界主义的特性令其耳目一新。而且，这些优点在关于罗马军队和帝国军事史的专门文献中尤其显著。尽管如此，我自己的著作系由对这同一文献的一种尖锐的不满激发起来：考古学家、碑铭研究家、古钱币学家和文本考证学者们以其竭诚劳作揭示了我们的知识依据的信息，但他们往往将大为失当的战略观念应用于自己的证据重构。并非这些学者对最新的系统分析方法茫然无知，或者不明白现代战略思想的内涵；确实，他们的短处不在于陈旧过时，而在于过分现代。

从19世纪开初直至广岛被毁，战略思维由拿破仑后的“克劳塞维茨式”观念支配，而且这些观念广泛地渗透了主要兴趣远离军事问题的许多人士的思想。在其粗糙的、大众化了的形态上，这些观念强调战争的一 xii
种特殊形式，即民族间冲突；它们强调在追求决定性结果方面进攻战的首要意义和可取性（从而激发了一种对防御战的反感）；它们还蕴含了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之间的一种截然区分。最后，这些观念将首要地位赋予武力之积极使用，那与为外交强制目的而使用武力意象相反。

只是1945年往后，由于新的大规模毁伤技术的浮现，大战略的克劳塞维茨式路径的基本假设才被推翻。我们像罗马人那样，面对的前景不

是决定性冲突,而是一种虽然有限、但经久常在的战争状态。我们像罗马人那样,必须积极保护一个发达社会应对种种不同威胁,而非集中于在战斗中摧毁我们敌人的武力。最重要的是,现代武器的性质要求我们避免使用它们,同时却仍力争开发利用它们充分的外交潜能。这些基本变化的革命性含义迄今还只被朦胧地理解到。因而并不奇怪,即使当代的罗马军事史研究也仍然浸透了一种陈旧过时的战略观。

现代战争性质的革命性变更的自相矛盾效应在于,它使我们自己的战略困境变得与罗马人的相近得多。因而就有从现代战略分析观点出发对历史证据的这一重新考察。

致　谢

感谢我的教师、同事和朋友沃尔特·拉克乌尔、罗伯特·塔克、戴维·阿布沙伊尔、詹姆斯·金、乔治·里斯卡、罗伯特·奥斯古德、弗朗西斯·韦斯特和詹姆斯·施莱辛格——*non tamen adeo virtutum sterile saeculum ut non et bona exempla prodidit*。迈克尔·阿隆森、约安·古廷和肖姆·埃德蒙都以不同方式对本书贡献了他们的努力,获得我的感谢和尊敬。我还感谢约瑟夫·斯通斯特里特依据粗略的勾勒画了地图和图表,W. 塞思·卡勒斯编纂了索引,凯瑟琳·格罗弗很仔细地用打字机录写了一部难录的文本。

导　言 1

在我们这个紊乱的时代，回溯罗马的帝国治国方略经验以求安慰和教益实属自然。在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不可能有任何类比，但战略领域存在富有教益的相似之处。帝国时代罗马战略的本质并非植根于一类现今业已陈旧的技术，而是植根于我们也有的一种困境。对罗马人如同对我们自己来说，一个正在演化的文明有两大根本需要，即健全的物质基础与充足的安全。对罗马人如同对我们自己来说，战略性治国方略的易被忘怀的目的是为这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罗马帝国由其独特的长寿显现的历史性成功，反映了这些互相冲突的必需得到调和所达到的高度。那么长久地保证了巨大领土——此后一直动乱不止的地域——的安宁的肯定不只是战场成就。

假如罗马帝国的力量出自战场上的战术优势，出自优越的指挥才能，或出自较先进的武器技术，那就几乎全无要解释的，虽然有许多要描述。可是它并非如此。罗马的战术差不多总是明智的，但并非与众不同地优越，帝国时代的罗马士兵则并非以其热忱著称。他不是一名立意证明其 2
男子汉气概的武士，而是一名长期服役、追求升迁的职业军人；他的目的和酬赏不是英雄之死，而是在退役时的一笔解雇授予。罗马的武器远非普遍更为先进，而是经常劣于帝国那么频繁地击败了的敌人们使用的那些。帝国的世纪性长存也不可能是由幸运的一连串杰出将才保证的：罗马军队拥有大量称职的士兵和某些伟大的将军，但它的力量出自方法，而非出自偶尔的英才。

帝国的优势——巨大优势——属于全然更为精致的一等：它出自观

念和传统构成的整个复合体,那提供了罗马军力组织的灵魂,并且使帝国的武装权势契合政治目的。战术优先、尚武理想和好战本能之坚定地从属于政治目的是帝国战略性成功的根本条件。少有例外,那些控制罗马命运的人们避不为追求纯战术目的误用武力,也不为无谓的胜利的心理报偿而这么做。至少在帝国时代,武力被清楚地认作它确实是的那样,即一种本质上有限的权势工具,代价高昂,且易损坏。最好是保存武力和间接使用军事权势,将其当作政治战工具。

与金钱和操纵性外交一起,显然随时可战、但是备而不发的武力能够在那些可能协同威胁帝国的人中间促发不和,阻止那些不如此就将进攻的人,并且通过恫吓来控制领土和人民——最好甚至达到能取得足够安全甚或有效统治而全不使用任何武力的地步。经过在早先的共和时代学会如何以十足的战术实力击败邻人,然后经过与迦太基人打仗期间掌握大规模战争的复杂战略,罗马人最终懂得了军事力量的最合意使用根本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确实,他们以极少战役和大量强制性外交征服了整个希腊化世界。

同样的保存武力的努力在战争中也显而易见——见于战术层次。理想的罗马将军不是一个英雄样式的人物,率领其部队不计后果地冲锋陷阵,直至胜利或死亡。相反,他会以一种缓慢和经过细致准备的进军向前推进,每夜修筑在他身后的供给道路和有工事设防的兵营军寨,以免敌人突袭的难以预测的风险。他宁愿让敌人撤入设防阵地,而不愿接受正面大打的必不可免的损失,并且会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战中等待饿垮敌
3 人,而不遭受在以猛攻夺占要塞时的巨大伤亡。克服了一种仍然含有希腊尚武理想的文化精神(那最鲁莽妄动的人亚历山大大帝实际上是许多罗马家族的崇拜对象),罗马的伟大将领以其极端审慎著称。

恰恰是罗马战术的这个方面(除了大为倚赖工程战之外)解释了行进中的罗马大军的严酷不懈性质,连同他们在逆境中的坚韧不屈:罗马人得胜缓慢,但击败他们难上加难。

正如罗马人分明无需一个克劳塞维茨将其军事精力从属于政治目的

的规范，看来他们也无需现代分析技艺。罗马人尽管全然不知新的“系统分析”科学，但设计和造就了巨大复杂的安全体系，它将部队部署、固定防御、道路网络和信号联系成功地整合进一个内在连贯的整体。在更抽象的战略领域，显然不管是由于智力还是由于传统本能，罗马人理解威慑的所有精致玄妙，也懂得它的种种局限。最重要的是，罗马人清楚地认识到，权势的主宰方面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的：是他人关于罗马力量的意念的产物，而非使用这力量的结果。只有这一认识，才能解释罗马战略在其最佳形态上的精致性。

公元 70 年至 73 年对马萨达的围困透露了一种基于威慑的长远安全政策的极精致运作。面对几百个犹太人的抵抗——在位于全无战略或经济重要性的犹地亚沙漠的一座山丘上，罗马人本可部署几百人看守造反者，以此将他们隔绝起来。驻扎在附近的艾因吉蒂泉，一支罗马骑兵分队本可耐心等待那些犹太人耗尽其饮水补充。不然的话，罗马人还可以猛攻山上要塞。犹太战争已经被根本打赢，只有马萨达仍在坚持抵挡；然而，这一抵抗火星可能随时重燃造反大火。马萨达山坡面陡峭，而且犹太人是可怕的战士，但是有几千人从四面八方进逼，防御者本不可能长时间挡住进攻者，虽然他们可以杀死许多人。

罗马人未做所有这些事。他们没有去饿垮那些犹太人，他们也没有
猛攻山丘。相反，在全部罗马军队总共仅有 29 个军团去驻防帝国全境之
际，一个军团被部署围困马萨达，在那里依靠庞大的工程劳作制服要塞，
包括堆造一个巨型斜坡直达山顶。这是一番巨大的、似乎非理性的紧缺 4
军事人力投入——果真如此？这整个三年的行动，连同其目标的无关紧
要，必定给东方所有那些可能非如此便禁不住要想造反的人造成了一个
不祥的印象：马萨达的教训是罗马人会穷追叛乱，甚至追到位于远远沙漠
的山顶，以摧毁其最后残余，而不管代价如何。而且，犹如确保这一信息
被充分聆听，并且被充分记牢，约瑟夫斯被安顿在罗马，在那里他写下了
关于这场围困的详细记述，那以希腊文——约瑟夫斯学会了的语言——
和东罗马的语言发表。

马萨达行动是一场深谋远虑的心理战行动:这一提法当然是猜测。然而,其他的解释不可置信,因为在实施围困方面的纯粹盲顽完全不符我们就战争当事者所知的一切,其中特别是韦斯巴芗——最讲求实际的人,其首要美德为精明的寻常意识的皇帝。

我们不需依靠猜测来相当详细地重现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罗马帝国治国方略的基本特色,那是本项研究的主题。对理解政策的详细操作及其动机必不可少的叙事资料来源可惜不完全,而且有时可疑。然而,一代代学者的劳作已经产生了巨量详细证据,那是关于帝国战略之物质要素即军队兵力结构、边防格局和各要塞分布的。与此同时,就罗马外交的突出事件和一般性质已知的够多,能组成一幅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的整个帝国治国方略图景。

纵贯这一时代,三个不同的帝国安全体系可以被辨识出来。我们可以合适地谈论*体系*,因为它们每个都整合了外交、军事力量、道路网络和防御工事,以服务于一个单独的目的。不仅如此,每一要素的设计都反映了整体的逻辑。每个体系意在满足一套不同的轻重缓急次序,而后者本身又反映变化中的帝国观念:对第一个体系来说优先的是霸权扩张主义;对第二个来说是领土安全;最后,在收缩了的环境里,优先的是帝国权势本身的绝对生存。每个体系基于外交、直接武力和固定的基础设施的一种不同的结合,每个还包含不同的操作方法;然而更基本的是,每个体系
5 反映一种不同的罗马世界观和自我意象。

以非常粗糙的简单方式,或许可以说依凭第一个体系,共和时代的罗马人征服多多,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那些生活在罗马城里的人的利益,而且事实上是更少数人,即那些处于最佳的地位去控制政策的人。公元一世纪期间,罗马思想向一种广泛得多、而且全然较仁慈的帝国概念演进。在第二个体系的庇护下,出身于远离罗马的地方的人们可以自称为罗马人,而且使自己的权利要求被充分准许;边境得到有效的防御,以保护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特权者的愈益兴旺。结果是公元二世纪的帝国,它服务于几百万人而非几千人的利益。

在随公元三世纪的大危机而被组织起来的第三个体系之下，提供安全成了对社会的一种愈益沉重的索取，一种被不均衡地分配的索取，那可以令富人更富和令穷人潦倒毁灭。帝国机器现在变得越来越自益自利，其收税者、行政管理者和军人对各自互相的用处比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用处大得多。即使那时，帝国仍保有许多人的忠诚，因为否则就是混乱。当这种情况不再继续下去，当被组织起来、能够提供一定程度安全的蛮族国家开始出现在曾是罗马人的土地上的时候，这最后一个帝国安全体系丧失了它的最后支持，即人对未知物的恐惧。

7 # 第一章 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

附庸国和机动军：从奥古斯都到尼禄

第一个帝国安全体系本质上是共和国晚期的体系，虽然它在以“元首政治”（*principate*）为我们所知的那种特殊专制形态之下，延续进了公元一世纪。由本人系政体含混大师的屋大维一派创立，“元首政治”形为共和，实乃专制。行政长官一如先前任职，以监督公共生活，元老院也一如先前就座，似乎掌管罗马城和帝国。然而，真正的控制权现今握在屋大维一家和他的个人协从手里，而屋大维是朱利乌斯·凯撒的亲戚和继承人，也是以凯撒被刺开始、以公元前30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终告失败结束的内战的最后胜利者。

独裁者朱利乌斯·凯撒推翻了虚弱的共和国体制。他的在亚克兴战役后全权在握的继承人恢复并随即颠覆了共和国。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取名奥古斯都，带有半宗教权威的意味；罗马有了一位新主人。理论上，奥古斯都只是“首席公民”（*princeps*），但这是一位控制所有行政长官人选
8 和所有军队指挥权的公民。既非东方专制君主，亦非身为活人的神，“首席公民”在理论上仍受法律约束，服从元老院的意志。然而由奥古斯都控制的直接权力，即他的军团权力，远甚于元老院的权威，元老们则以其急切的服从承认这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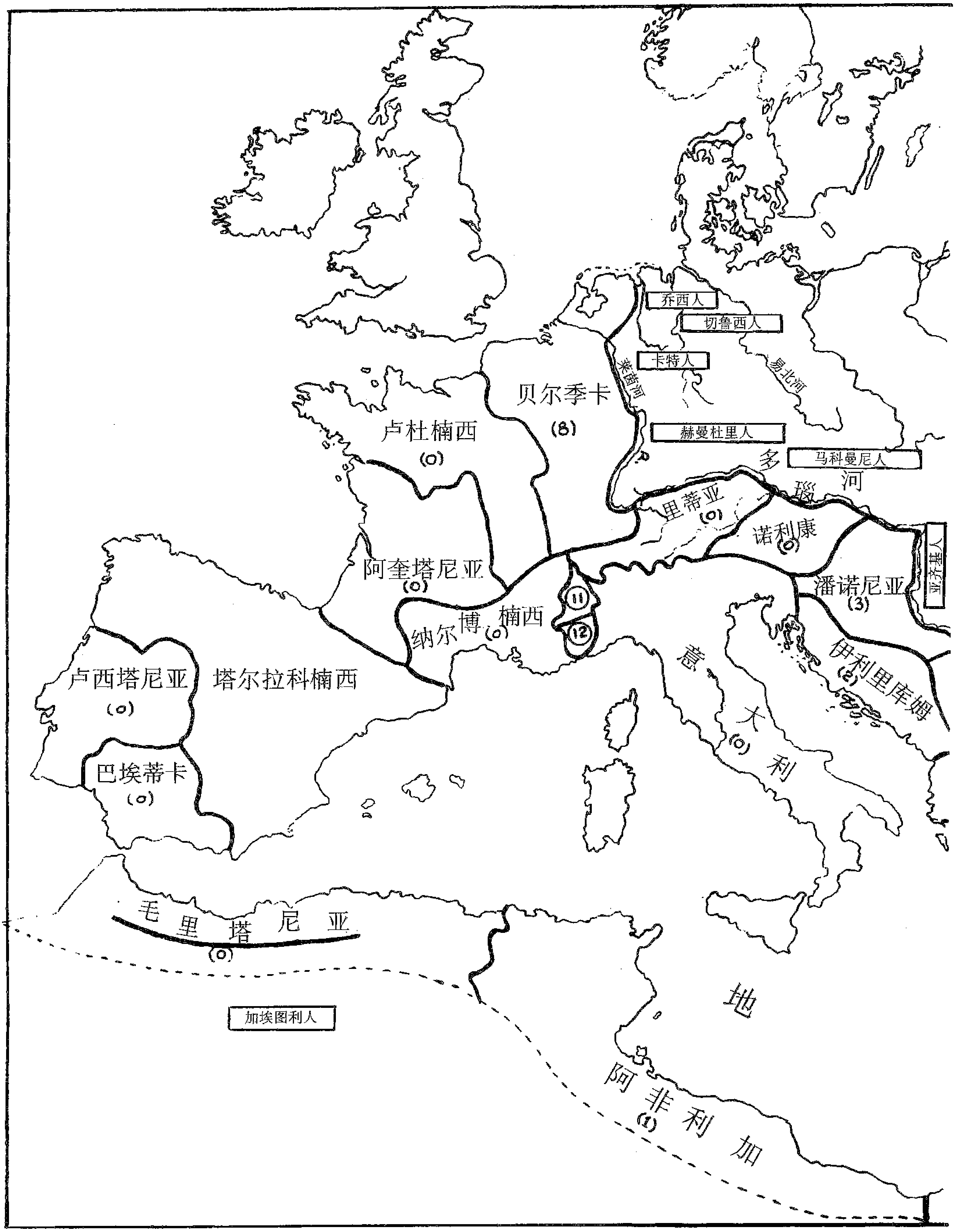
在奥古斯都治下，仅仅一代人时间里，共和国扩张主义两个世纪的巨大但分散的征服便被圆满完成，并且得到巩固。到公元前25年，西班牙已被充分占领，三个行省（巴埃蒂卡、卢西塔尼亚和塔尔拉科楠西）被组建起来，虽然最后的当地人造反直至公元前19年为止没有被镇压下去。由凯撒征服但未为征税而予以组织的高卢内地被构建为三个新行省——

阿奎塔尼亚、卢杜楠西和贝尔季卡。在高卢南部，公元前121年组建的老行省外高卢未予改组，只是改名为纳尔博楠西；那是一个已经大为罗马化了的地方，早已变得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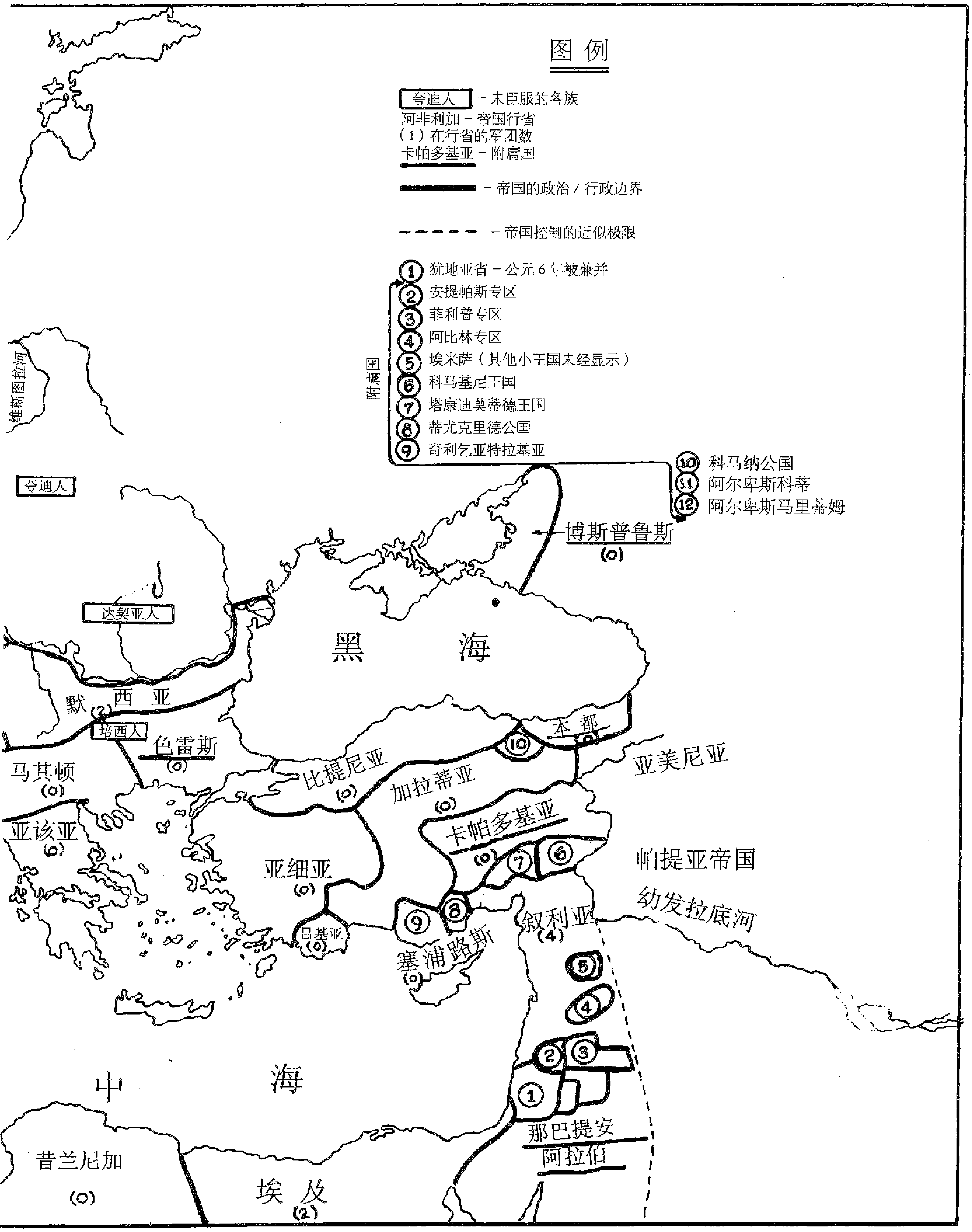
日耳曼是另一回事。直到约公元前12年为止，罗马的侵入始终未达到易北河。罗马军人和商人在建立一种存在，但要建立一个日耳曼行省，就必须消灭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所有独立的权力。这就是罗马人自公元6年开始以一场大规模钳形作战行动着手去做的，那从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出发，意在包围现今的波希米亚，令日耳曼南部最强悍的马科曼尼人陷入四面受敌的危境。与此同时，P. 昆蒂利乌斯·瓦鲁斯带三个军团和辅助部队在日耳曼西北部，不是为打仗，而是为在已被算作征服了的土地上征税。

然而，对马科曼尼人的大进攻恰在行将发动之际不得不取消：在钳形行动南部附近的伊利里库姆爆发了一场大叛乱。公元9年，这场叛乱被最终镇压下去，但恰逢此时，瓦鲁斯的三个军团和辅助部队遭到阿米尼乌斯手下的日耳曼人伏击并被歼灭，此人是先前替罗马效劳的附庸，切鲁西人的首领。瓦鲁斯之灾导致奥古斯都对日耳曼的征服夭折。罗马人撤出莱茵河以东地区，两个分别为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而设的军区被建立起来，仅为控制莱茵河以西地区。

在南方，罗马的政策大获成功。到公元前15年，从北意大利山麓延伸至多瑙河上游的阿尔卑斯地区已被制服，一部分将并入意大利，一部分将组建为两个行省，即雷蒂亚和诺利康（大致为当今的巴伐利亚、瑞士和西部奥地利）。在诺利康以东，已处于罗马控制下的次多瑙河地区（sub－Danubian lands）囊括了沿海岸的伊利里库姆、马其顿和附庸王国色雷斯。在奥古斯都治下，罗马权势征服了多瑙河流域的所有其余地方，在现代地图上从克罗地亚到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公元6年，在对马科曼尼人的包围行将开始之际，罗马权势仍然太新，以致无法平定这些甚至在我们 9
今天也未充分安宁的地方。一旦叛乱来临，其规模甚大；实际上以伊利里库姆的无路山区为中心的所谓潘诺尼亚叛乱，是至此各场奥古斯都战争



地图 1.1　公元 23 年时的帝国



图例
夸迪人 - 未臣服的各族
阿非利加 - 帝国行省
（1）在行省的军团数
卡帕多基亚 - 附庸国
- 帝国的政治 / 行政边界
- 帝国控制的近似极限
1 犹地亚省 - 公元 6 年被兼并
2 安提帕斯专区
3 菲利普专区
4 阿比林专区
5 埃米萨（其他小王国未经显示）
6 科马基尼王国
7 塔康迪莫蒂德王国
8 蒂尤克里德公国
9 奇利乞亚特拉基亚
附庸国
10 科马纳公国
11 阿尔卑斯科蒂
12 阿尔卑斯马里蒂姆
维斯图拉河
夸迪人
达契亚人
博斯普鲁斯
(0)
黑 海
默 西 亚
(2)
培西人
色雷斯
(0)
马其顿
(0)
亚该亚
(0)
本 都
比提尼亚
(0)
加拉蒂亚
(0)
亚美尼亚
卡帕多基亚
(0)
帕提亚帝国
亚细亚
(0)
吕基亚
(0)
塞浦路斯
(0)
叙利亚
(4)
幼发拉底河
中 海
那巴提安
阿拉伯
昔兰尼加
(0)
埃 及
(2)

中代价最高昂的一场。用了三年艰苦作战时间,依凭帝国能够聚集的所有部队(甚至征召了奴隶和由奴隶转变而来的自由民),才制服了伊利里库姆。瓦鲁斯之灾差不多紧随公元9年的造反结束而来,在多瑙河流域之外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计划不再能予设想。伊利里库姆的沿海地区被组建为达尔马提亚行省,其内地则成为潘诺尼亚行省。多瑙河下游直至三角洲(在1945年后的苏联-罗马利亚边境上)由巨大的默西亚军区充当前卫,但附庸王国色雷斯占有了很大部分内地,位于今保加利亚。

在东方,奥古斯都全无征服。安纳托利亚西半部长久以来就是行省领土(亚细亚行省[土耳其西南部]上溯到公元前133年)。附庸王国加拉蒂亚于公元前25年被兼并,构成一个行省;越过加拉蒂亚,臣服于罗马的诸王国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叙利亚行省,其中最大的是卡帕多基亚王国。在东面是巨大、原始和多山的亚美尼亚,几乎全无用处但仍至关重要,因为越过亚美尼亚和在它南面,有阿萨息斯家族统治的文明的帕提亚——地平线上能够对帝国展现严重的战略性威胁的唯一强国。

奥古斯都并未试图报复公元前53年帕提亚人在卡雷之大败由克拉苏统帅的罗马大军。相反,他在公元前20年达成了一项妥协性解决,据此亚美尼亚将由阿萨息斯家族的一位国王统治,他将从罗马获得委任状。在圆通无瑕的形式背后有战略,因为帕提亚部队将由此被经久地挡在一个中立化了的亚美尼亚之外,同时远离未设防的安纳托利亚和宝贵的叙利亚。还有政治——国内政治。在卡雷丧失的军旗被归还罗马,以盛大的典礼予以接收。奥古斯都发行一种钱币,谎称"夺占"了亚美尼亚。

南面紧邻东安纳托利亚诸附庸王国的是叙利亚,它在公元前63年被组建为一个纳税的行省。再南面为犹地亚,直到公元6年为止的一个附庸王国,而越过西奈便是埃及。自公元前30年往后的一个行省,埃及由奥古斯都通过一名不能是元老级别的长官极为直接地控制。一名元老可能总是梦想成为皇帝,而控制埃及谷物的供应对一名叛乱者来说能值许多军团。

北非的其余部分为行省领土:昔兰尼加(利比亚东部)自公元前74

年往后已被组建，阿非利加行省（利比亚西部和突尼斯）甚至更为久远，始于公元前146年毁灭迦太基。但是，属地之环并非完整，而奥古斯都不 12
求圆满：在阿非利加行省之外，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地方，罗马的控制是间接的，通过附庸王国毛里塔尼亚行使。

到公元9年，奥古斯都扩张主义的精力已被用完，耗尽于伊利里库姆苦战和日耳曼灾变。事实无法隐瞒，但必需可以被展示成美德。但奥古斯都在公元14年去世时，他的继子、克劳狄家族的提比略（奥古斯都自认为属于朱利乌斯家族）接受了一个对其征服他本人贡献良多的巨型帝国，但也接受了其边境不得被进一步扩展的训诫。

提比略既能干，又（据说）凶狠；他统治到公元37年为止。他不得不为制服内部叛乱而战，但从未打过征服战争。提比略取得政权很简单：一个被慑服了的元老院急切和惧怕地宣布他为统治者，且无任何军队司令官率军团莅临罗马与之争位。另一人以同样的手段步提比略之后尘，那就是盖乌斯，绰号卡利古拉。盖乌斯性情失衡，或者依据我们的史料也许十足邪恶，于公元41年被刺杀。有议论要恢复共和国，但被杀皇帝的叔父克劳狄旋被宣告为皇帝，不是由元老院，却是由禁卫军，而且并非没有利益算计：4 500名禁卫军人个个被支付3 750迪纳里厄斯，作为现金赠礼，超过在军团服役的一名小兵16年得的饷金。

外貌怪诞，蠢于和女人打交道，克劳狄主持一个以其对外省人的愈益仁慈而著称的政权；而且，该政权不久就在37年的间歇期后重新登上了帝国扩张道路。公元43年，不列颠遭到入侵，此后将被仅仅部分地征服，通过逐步的各个阶段：160多年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仍在苏格兰征战。

元老们可能依然试图用他们的匕首去恢复共和国，但克劳狄却是被毒杀，大概在公元54年，而且是由于较卑微的动机。他的继子尼禄此后登上元首权位，是为克劳狄王朝最后一人。尼禄以元首政治下第一次帕提亚战争开始其统治。阿萨息斯家族的蒂里德泰斯被立为亚美尼亚国王而无罗马委任状支持；同时，亚美尼亚被担心可能从缓冲国转变为帕提亚

大军的作战基地，据以向未予设防的安纳托利亚和掌控薄弱的叙利亚推进。

尼禄以穷奢极欲和肆意杀人著称，然而他的政权不无智慧：帕提亚战争的操作是有节制和成功的，其结局则是又一次有益的妥协。公元 66 年，在 11 年或续或断的战争和差不多持久不息的外交之后，蒂里德泰斯再次加冕为亚美尼亚国王，但这次是在罗马。

这项解决来得恰逢其时。公元 66 年，犹太人造反爆发，不久就成为一场重大战争。它将延续到公元 73 年为止，如果马萨达的孤立抵抗被算
13 进去的话。尼禄没有活着看到它的结束，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这位最后一人于公元 68 年自杀；厄运或无度使他在他的权位遭到争夺时既无禁卫军的支持，又无元老院的襄助。

C. 朱利乌斯·温德克斯，一位新秀、高卢人和在高卢的卢杜楠西省督，跻身于许多慑于尼禄的随意恐怖、但未完全被它吓垮的人士之列。他宣布尼禄不适于元首权位，提议年高望重、出身显贵、严守操行和非常富有的 S. 苏尔皮西乌斯·加尔巴为"首席公民"。加尔巴能够指望元老院的贵族情绪，但作为塔尔拉科楠西省督，他只掌握一个军团。他开始征集另一个，却无法在上日耳曼省督率其军团兵临高卢时拯救温德克斯。

摧毁一位高卢新贵麾下的高卢兵员是一回事，积极捍卫尼禄的权力、使之免遭一位罗马大贵族加尔巴毁坏却是大不相同的另一回事。于是，尼禄的事业赢了，尼禄的命却丢了。他在罗马全无支持，或者如他可能在恼怒和恐慌之中设想的那样全无支持。他没有向处于边境的军团呼吁，在那里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威望本可能遮盖他极端的个人缺陷。相反，他计划逃往埃及，或者据说如此。在途中，他被护行的禁卫军抛弃，在一名前奴隶的家里避难。在那里他听说元老院宣布他为公敌，要按照古老的习俗被鞭打至死。在别人帮助下，他于公元 68 年 6 月 9 日设法自杀身亡。

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统治由此结束。

一　体系概述

朱利乌斯－克劳狄帝国安全体系的最突出特性在于节省武力。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处于帝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领土包括：全部地中海沿岸地区，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为止的欧洲大陆内地，还有更松弛地控制的黑海北岸博斯普兰王国。对这巨型领土的控制由一支小型军队有效地予以保障，其规模在元首政治肇始时被最初确定，此后仅略有增大。

瓦鲁斯与其三个军团于公元9年被歼后，还有25个军团，而且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公元14年至37年）始终如此。[1] 从盖乌斯－卡利古拉于公元37年即位，到公元69至70年的内战，共组建了8个新的军团，但4个被撤销了，因而在韦斯巴芗治下，有29个成建制的军团，只比奥古斯都 16
起初确定的数目多一个。[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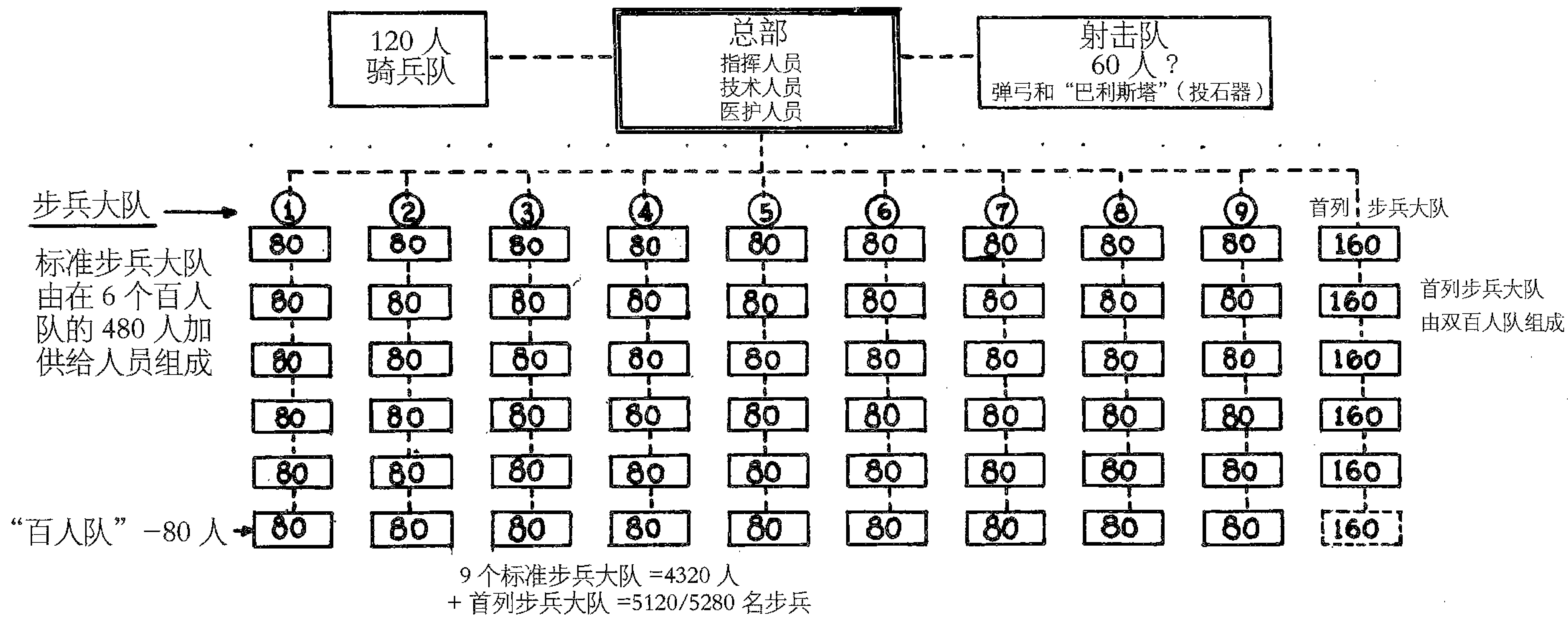
关于军团的确切兵员，存在某种小范围的不确定性，但权威们一致认为每个军团由大约6 000人构成，包括5 120或5 280名步兵、一支120人的骑兵队和军团总部的杂色部队。[3]在此基础上，军团兵员数目的上限将是到公元9年为止的大约168 000人，此后为159 000人，公元70年后不多于174 000人。

在当时仍大多以长期服役的公民志愿者为兵员的重装步兵军团之外，还有辅助部队（*auxilia*），它们在这一时期里一般以非公民为兵员。[4] 辅助部队被组织为骑兵“侧翼”（*alae*）、轻装步兵大队或骑步兵混成单位（*cohortes equitatae*），在功能上补充军团兵力。

关于整个帝国的辅助部队总规模，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但权威们接受塔西佗史书内一项陈述[5] 的总的正确性，据此在公元23年，辅助部队兵员总数大致与“罗马的”或军团的兵员总数相同。[6]

为了我们的目的，知道辅助部队总数并不大大超过军团兵力总数就足够了，而文献中没有任何地方提示有如此超过的可能性。将1∶1当作一

军团 （约 6 000 人）



武器 进攻性的 —“皮鲁姆”（重投长矛）、“格拉底厄”（短剑）
防御性的 — 头盔、护甲、大盾

辅助部队

骑兵单位	骑步兵混合单位	步兵单位
骑兵五百人团 512 名骑兵	**骑步兵混合单位（五百人团）** 380 名步兵 120 名骑兵	**步兵（五百人团）** 约 500 人
骑兵翼 约 1000 名骑兵 + 总部部队	**骑步兵混合单位** 760 名步兵 240 名骑兵 + 总部部队	**步兵翼** 约 1000 人
		“努梅里” （非正规单位） 约 300 人？

进攻性武器：弓、投石器、投枪、长剑、矛和骑兵重矛

图示 1.1　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时的罗马军队单位建制

个正确的近似接受下来,罗马部队总兵力在公元 23 年将为大约300 000 人左右,而在公元 70 年为止的那个时期的其余时间里,理论上的最大数目为 350 000 人。[7]

奥古斯都曾声称亲自以土地或金钱偿付解雇了 300 000 退役者,[8] 因而地面兵员总数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似乎不特别大。然而,众所周知的征召公民入伍的困难此时已经尖锐,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人口问题,即普林尼说的“青年短缺”(*iuventutis penuria*):在意大利的适龄入伍的男性人口总数很可能少于 100 万。[9]

给军队发饷比征兵容易。一名经过训练的军团现役士兵每年的年饷和维持费用达 225 德纳里;退役授予在公元 5 年被定为 3 000 德纳里,其总成本是个不轻于军饷和维持费用的负担,此外还有间或的赠金。[10]尽管如此,仍有人提出,军队的年度总成本不超过早期元首政治期间帝国岁入的一半。[11]

有鉴于此,没有理由相信亚克兴战役后军队的改组缘于财政制约甚
17 或人力制约所迫。看来更可能的是军团数目被定为 28 个,少于内战期间双方部署的总共大约 60 个(有些只是残部),[12]所依据的是一个关于兵力部署的合理计划,在其中可取的兵力水平确定成本,而非相反。

在《年代记》的一个著名的段落里,塔西佗提供了叙事史料中尚存的关于军团部署的唯一全面概览。[13]其准确性被权威们普遍认可。[14]根据塔西佗,在公元 23 年,即提比略元首政治第九年,有八个军团在莱茵,三个在西班牙,两个在阿非利加行省,两个在埃及,四个在叙利亚,两个在默西亚和两个在潘诺尼亚(即沿多瑙河共有四个),最后两个在达尔马提亚,总共 25 个军团。此外还有辅助部队,就此塔西佗没有给出详细的分布。

从这叙述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军团兵力和随同的辅助部队被分布组成为一个单薄的周边环线。由此缺乏一支被保持在大后方而不予投入的战略后备兵力,这经常被人指出并遭到批评。[15]诚然,在意大利的兵力,即九个禁卫军步兵大队和四个城市步兵大队,数量不大;后者主要是一支警察力量,而前者能够提供的不过是罗马统治者在出发亲征时为其护驾的

一支强有力护卫部队。另一方面，塔西佗将两个达尔马提亚军团称为战略后备，能够在原地位置抵挡从东北突入意大利的入侵兵锋，同时也可供部署在其他地方，因为达尔马提亚不是一个边境行省。

事实上，周边环线部署的印象是误导性的。原因之一正如已被指出的那样，在于军团分布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内部安全而非外部安全。[16]因此，三个军团在西班牙，那并非边境领土，却处于一种长期绥靖努力的最后阶段，而两个军团在达尔马提亚，它位于控制潘诺尼亚的兵力的后方。有如塔西佗指出，达尔马提亚是一个供部署战略后备兵力的方便位置，然而该行省也是公元 6 年至 9 年危险的潘诺尼亚反叛的作乱场所，这场反叛据苏埃托尼乌斯所言，乃"迦太基战争以来我们所有各场对外战争中最危险的"(*gravissimum omnium externorum bellorum post Punica*)。[17]

与此相似，在埃及的两个军团分明不是为提防外部威胁，即游牧族入侵所需。为抗击或威慑此等不易捉摸的敌人，辅助部队，特别如果是骑兵要比军团的密集的大兵力有效得多。另一方面，后者很适合于维持内部 18
安全任务。

当时尚无被划定的帝国边境，军团也并非像它们将来那样，被置于经久性的石垒要塞之内。相反，部队在皮制帐篷或木制冬季兵营("黑贝尔纳")(*hiberna*)中就寝，其营地的周边防御不比进军营寨的更精致，后者是行进中的军团部队会在每日下午当一天行军结束时修建的。[18]这样的军团营地也未被设置为战术据点。[19]确实，它们根本就不是防御阵地。

各军团被部署在既通往前方未征服地区，又通往后方有时未定居行省的主要道路的两旁，它们不是在那里防守邻近地区，而是担任机动打击兵力。为种种实际目的，它们的部署是野战军部署，诚然分布在高威胁地区，但不被拘于领土防守。从公元 6 年至 43 年(不列颠)未卷入重大的征服战争，军队的突出功能必然是防御性的，即提供安全，防备未经预见的威胁突然兴起。

这些威胁主要是内部的。除了日耳曼人、达契亚人以及后来萨尔马西亚人的偶尔入侵，加上就亚美尼亚的国王委任与帕提亚的冲突，罗马的

主要安全问题出自帝国内部的本地人造反。别有特色的是,在起初的征服与造反爆发之间,会横有一段有时长达几代人的滞后期:本土权力结构和“本土主义氛围”依然大致如故(伴有罗马本身已通过在当地征召辅助部队引入领导和凝聚概念),但与此同时,对帝国税收和强制征兵的重大影响的抵抗往往暴烈,有时暴烈得超过对最初征服的抵抗。[20]于是有公元 6 年至 9 年在伊利里库姆的造反,连同公元 14 年至 24 年在阿非利加的断断续续的塔克法里纳斯造反;还有更多的地方性叛乱,例如公元 21 年在高卢的弗洛鲁斯和萨克罗弗叛乱,连同作为一个边界实例的犹太战争。

由于西北日耳曼已被算作是征服了的地区,“一名没有任何军事素质的一流法学家”[21] P. 昆蒂利乌斯 · 瓦鲁斯在那里组织而非征服一个行省,因而公元 9 年的瓦鲁斯之灾也必须被算作是一场“内部”战争。[22]整个这一时期里,控制内部叛乱始终是个比维持外部安全,即针对帕提亚的安全难得多的难题——帕提亚权势是对罗马的唯一“体系性”威胁,而且那
19 时只是区域规模的。

殖民地是战略控制的第二个工具。朱利乌斯 · 凯撒惯常使他的老兵定居在意大利之外,奥古斯都则为从军团退伍的老兵建立了 28 个殖民地。并非主要意在作为罗马化的载体,[23]各殖民地是在一个仍部分地是霸权性的帝国境内由罗马直接控制的飞地;如此,它们在像安纳托利亚那样的地区特别重要,那里起初没有部署军团。无论是位于行省领土还是位于附庸国领土之内,殖民地都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观察和控制基地。其公民实际上是一种前军人或军人之子构成的现成的民兵,可以在遭遇攻击时捍卫他们的家乡城镇,坚持到帝国部队能够开到现场为止。

不管是部署在散布广泛的基地中的各军团和辅助部队,还是意大利之外事实上分散的各殖民地,都无法提供任何像全面周边防御那样的屏障。没有哨兵和巡逻兵去阻止对 4 000 英里长的帝国陆上周边的渗透;没有分布广泛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阻截袭击者或抵挡地方性攻击;没有周边环线防御。换言之,没有“设防边界”(*limes*)——后来意义上的筑有工事和驻兵防守的边界。此时,这个词仍然保持其先前的(但显然并非

其原始的）含义，亦即与安全的帝国领土的边界相垂直的一条通路；[24]因此，此时的 *limes* 指的是一条插入敌方领土的渗透路径，并非一条“水平的”边境，而且肯定不是筑有工事的外围防御环线。

这一时期整个罗马帝国安全体系的关键，正是在于没有周边环线防御。既不存在边界防守，也不存在地方部队去抗击小渗透、跨界侵犯或局部攻击等“低烈度威胁”以护卫帝国领土。如后所述，这样的保护得到了提供，然而是靠间接的和非军事的手段。通过实际上消除维持常在不息的边境防御这一负担，帝国军队产生的“可调配的”净军事力量被最大化了。因此，其他的人能设想为可供罗马进攻性使用（以及因而能靠外交手段被投去追求政治裨益）的总的军事力量也被最大化了。于是，帝国的潜在军事权势能以一种高兑换率被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控制。

实现这一转换的外交工具是附庸国家和附庸部族，其服从既反映了它们对罗马军事权势的认识，也反映了它们对遭到报复的恐惧。由于附庸们会费劲阻止对行省领土的攻击，它们的服从减小了在帝国周边抗击低烈度威胁以提供地方安全的需要，从而增大了帝国的可调配的净军事 20
力量……因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二 附庸国

公元 14 年，当提比略继承奥古斯都任元首时，帝国领土的相当大部分由附庸国构成，它们肯定隶属于帝国，即使也许不完全处于帝国之内。[25]在西方，未开化的毛里塔尼亚由朱巴二世统治，此人乃罗马产物，最初于公元前 25 年被安置在他的王位上。在黎凡特，犹地亚现在是一个行省，但在希律的前王国的某些部分，菲利普和安提帕斯这两个专区（tetrarchy）仍然自主自治。在叙利亚，小王国埃米萨和专区阿比林是被相对明确界定了的实体，所处地区杂乱无章地囊括了众多小附庸国和小附庸部族——普林尼说的 17 个“冠以野蛮人名称的专区”（*praeter tetrachias in regna descriptas barbaris nominibus*）。[26]

犹地亚以东是商人国家那巴提安阿拉伯。它的稀少的人口住在沙漠小城,或游荡于沙漠,而它的界定不明的领土横跨西奈和阿拉伯北部。西安纳托利亚被组建为一些行省,唯吕基亚的“自由联盟”除外,但更东面还有两个大的附庸国卡帕多基亚和本都,连同较小的蒂尤克里德公国、塔康迪莫蒂德王国、科马纳和重要的科马基尼王国,其领土包括前往被争夺的亚美尼亚——去帕提亚的关键性战略后门——的南部通路。

跨过黑海是博斯普兰国(克里米亚以东),不与帝国领土接壤,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罗马控制,其常年不息的动乱显然在罗马人眼里被其商业价值抵消了。在巴尔干,色雷斯到公元46年为止一直是个附庸国。甚至在意大利半岛北端,重要交通枢纽科蒂安阿尔卑斯也由一位地方首领统治,虽然在罗马人眼里他不过是一名被任命的官员。

作为一个依然部分地是霸权性的帝国的成员,这些附庸国并未穷尽附庸体系的全部。罗马外交,特别在提比略元首政治期间,还确立了一条与莱茵河和多瑙河对面较不开化民族的附庸关系的“无形边境”。[27]这些附庸缺乏一种文化基础,那是较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希腊观念在东方提供的,因而不像安纳托利亚或黎凡特的附庸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外交关
21 系不那么稳定,部分地缘于那些与罗马打交道者的权势本身不那么稳定;不仅如此,这些即使并非游牧也是迁徙性的附庸拥有东方的领土性附庸国从未拥有的一种最后手段:迁徙到罗马权势鞭长莫及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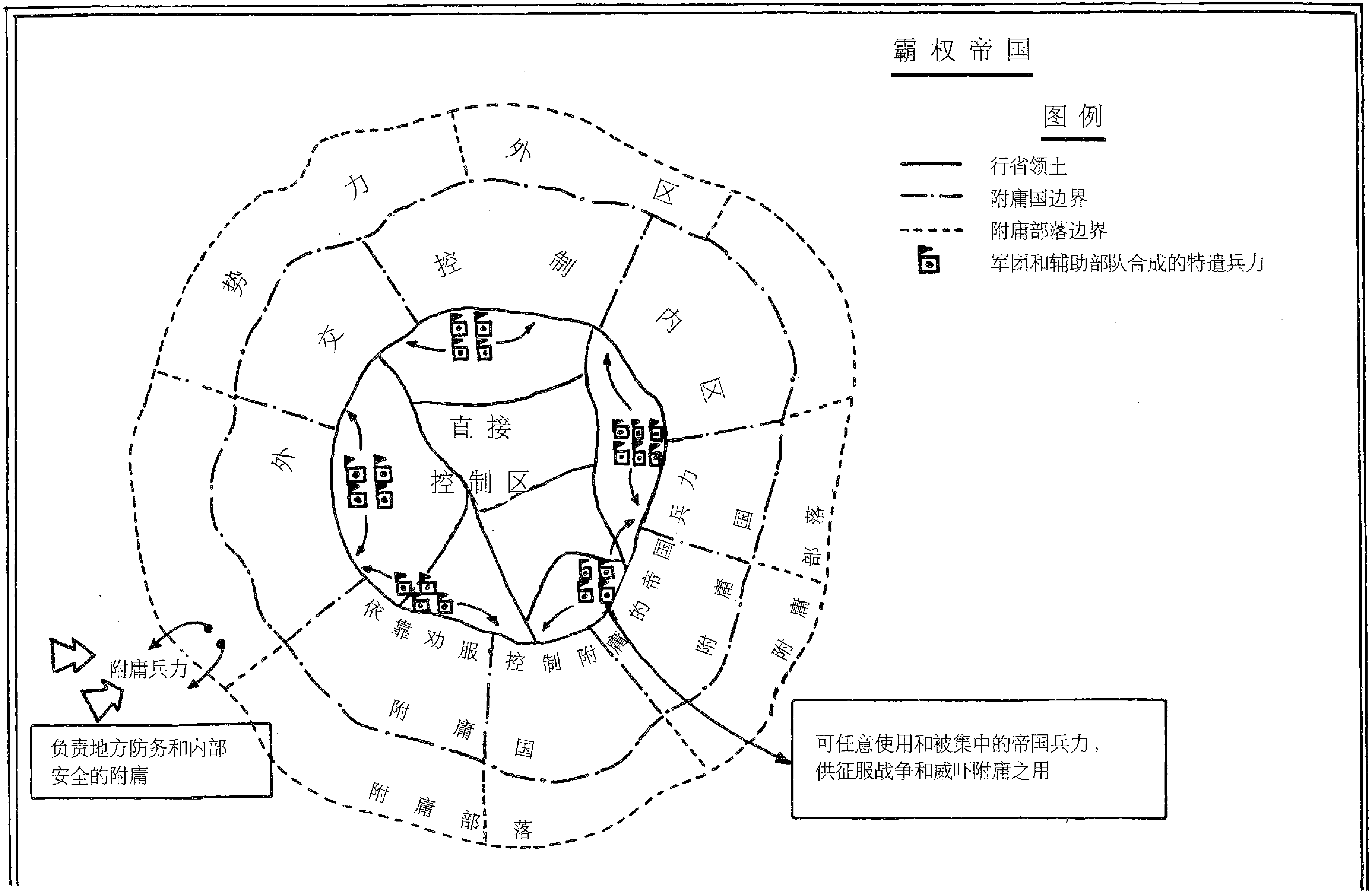
情势因而不利,但罗马人坚持不懈。公元16年,提比略停止了对莱茵河以东日耳曼人的一系列报复性攻势,那是随瓦鲁斯麾下三个军团被歼而发动的。罗马威胁乍消,在日耳曼留存的两股最强大的力量——阿米尼乌斯手下的切鲁西人和马罗博杜乌斯的马科曼尼人王国——自然立即开始彼此厮杀,从而为罗马的外交攻势开辟了途径。[28]在提比略元首政治的所余岁月里,这导致创设了一条从下日耳曼到多瑙河中段的附庸链。弗里西人、巴达维人、赫曼杜里人、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萨尔马希亚的亚齐基人(他们在齐扎与多瑙河之间的定居地已被罗马人获取)统统成了附庸部族。[29]甚至在不列颠,附庸关系也随凯撒的“武力侦察”(*reconna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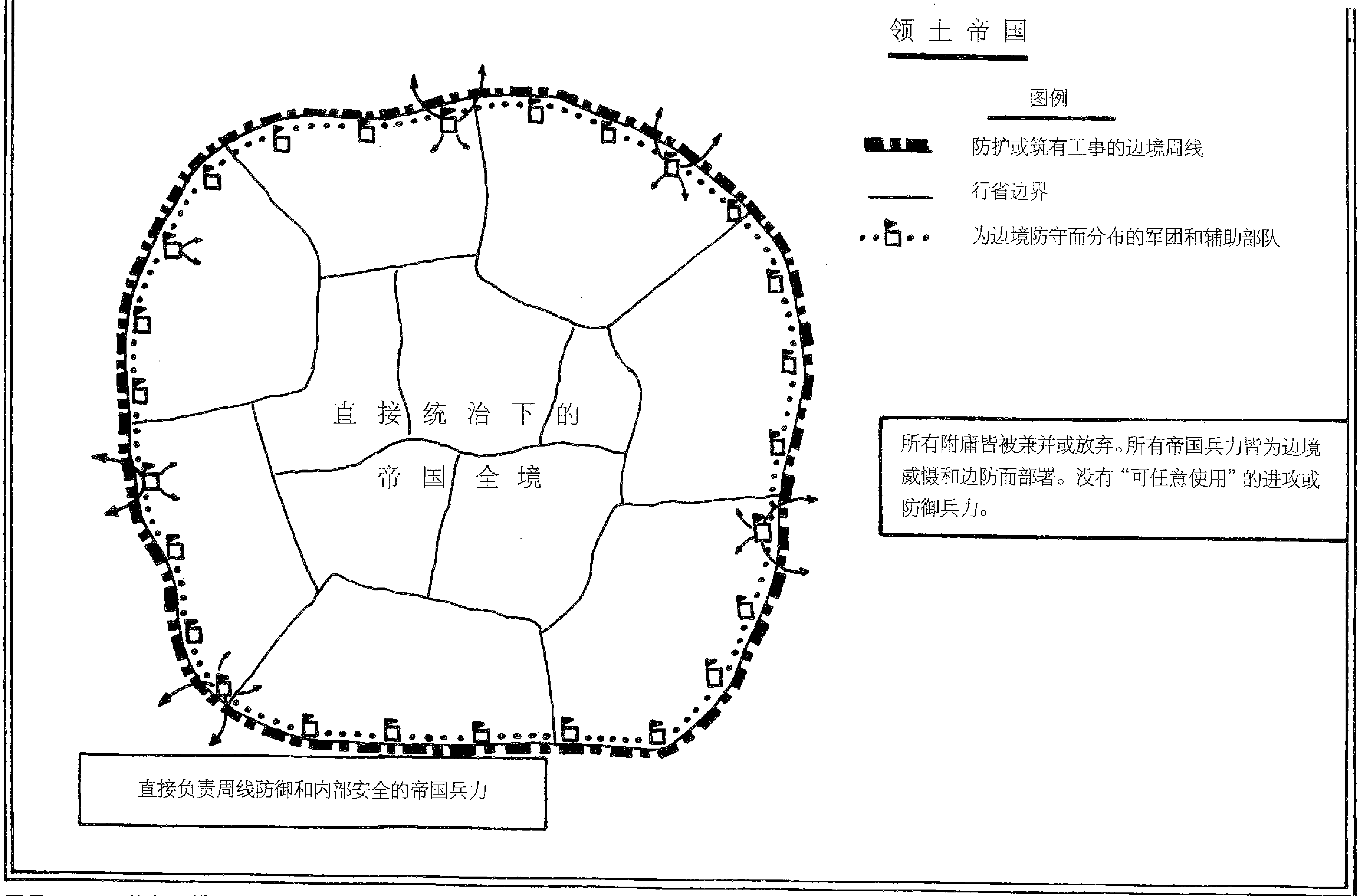
sance en force）[30]之后被建立起来，虽然斯特拉博的描述（“亲密联盟”[31]）无疑是一项奥古斯都式公关表演：不列颠依然未被征服，仅仅非常局部地服从罗马的意愿。

这些重要的外交工具被提比略的后继者们保持下来，正如其中某些在他之前得以形成。这些附庸部族的领土不能被认为是在帝国安全的周边环线以内；它们也不像东部的附庸国那样注定要被兼并。各附庸部族和附庸王国有时依附因而服从，有时却与罗马敌对，需要以罗马的全系列外交技能——从津贴资助到惩戒性战争——不断操控。

罗马的外部附庸政体观念，连同罗马人对帝国与附庸之间关系的看法，植根于罗马市政生活中的庇护－依附关系传统模式。[32]这些不平等关系包含的根本交易，在于用庇护人给予的酬赏（*beneficia*）换取附庸从事的服务（*officia*）。帝国与附庸之间不平等的各分立等级得到了承认，虽然随罗马权势的不断增长，往往形成了名义关系与实际关系的两相歧异。到这过程的各后期阶段，虽然一位附庸国王的正式地位是“罗马人民之友”（*amicus populi Romani*）——暗示承认那“怀着一种对未来所得庇护之强烈意识”而提供的服务、但无卑躬屈膝之意的一个称号，[33]但他总的来 24
说已不过是罗马行使控制的一个工具。不仅在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上如此，而且在王朝问题和内政问题上也是如此。事实上，没有任何清晰的权力范围被留作附庸统治者的特权。[34]

俗常将附庸王国说成“缓冲国”，并未正确地界定它们在帝国安全体系中的复杂作用。只有亚美尼亚才是一个真正的缓冲国，充当两大强国即罗马和帕提亚之间一个有形的中立区，为它们提供一个会有助于避免冲突的装置，只要它们希望避免冲突。然而亚美尼亚独一无二，只是断断续续地作为一个真正的附庸国行事。[35]附庸国提供的安全“服务”远不止是一个真正的附庸国的消极无为。还有积极的作为（包括提供作为罗马大军辅助部队的地方兵力，并且为纯粹的罗马目的效劳[36]），但附庸国在帝国安全体系中的最重要功能根本未被正式承认为一项“服务”，那就是因其存在本身，附庸国承担了提供周边安全、对付边境渗透和其他低烈度


霸权帝国
图例
行省领土
附庸国边界
附庸部落边界
军团和辅助部队合成的特遣兵力
直接控制区
外交控制区
外势力区
内区
依靠劝服控制附庸的帝国兵力
附庸国
附庸部落
附庸兵力
负责地方防务和内部安全的附庸
可任意使用和被集中的帝国兵力，供征服战争和威吓附庸之用


领土帝国
图例
防护或筑有工事的边境周线
行省边界
为边境防守而分布的军团和辅助部队
直接统治下的
帝国全境
所有附庸皆被兼并或放弃。所有帝国兵力皆为边境威慑和边防而部署。没有“可任意使用”的进攻或防御兵力。
直接负责周线防御和内部安全的帝国兵力

图示 1.2　两种帝国模型

威胁的负担。

这个时期里不存在真正的全帝国范围威胁,虽然某些较小的威胁可能被视为如此:例如在公元 9 年,人们一度害怕在瓦鲁斯的惨败之后,日耳曼人会入侵高卢甚至意大利。[37]唯一算得上数的强国是帕提亚。一向被视为潜在的可怕对手,帕提亚在阿萨息斯家族统治下常年遭内争削弱,未显得已被认为是个威胁。按照塔西佗的后来看法,无论如何"自由的"日耳曼人被认作更可怕的敌手,甚于阿萨息斯诸专制君主。[38]

部分地缘于罗马面对的威胁的性质本身,附庸国在整个安全体系内的价值远超过它们的实际军事努力,因为它们的贡献并非只在给罗马军力做点添加,而是功能补充性的。高效的附庸国可以保证它们自身的内部安全,并且提供它们自身对付低烈度威胁的周边防御,使帝国免担此责。于是,在希律政权延续期间,无须向犹地亚投入任何军团。相反,在希律之后,这个动乱的行省需要驻扎至少一个军团(弗雷滕西斯十军团),有时更多:从公元 67 年直至犹太人造反在三年后被最终镇压下去为止,有三个军团(马其顿五军团、弗雷滕西斯十军团、阿波利纳里斯十
25 五军团),此后仅弗雷滕西斯十军团;随公元 132 年巴克布哈叛乱爆发,驻扎两个军团(费拉塔六军团、弗雷滕西斯十军团),此后它们留驻。[39]

提供内部安全当然是附庸国的最明显功能,也是被最通常地认识到的功能。[40]然而,高效的附庸国此外还会遮护邻近行省领土,使之免遭出自它们本身领土或出自该附庸国周边远侧的低烈度威胁。[41]这一效率水平往往被接近,但即使是最成功的附庸国也并非总是达到,它需要强弱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例如据称由加拉太附庸国王狄奥塔鲁斯(公元前 25 年卒)达到的,他在西塞罗的专门辩辞中被描述为强得足以保卫他的边界,但未强得足以威胁罗马利益。[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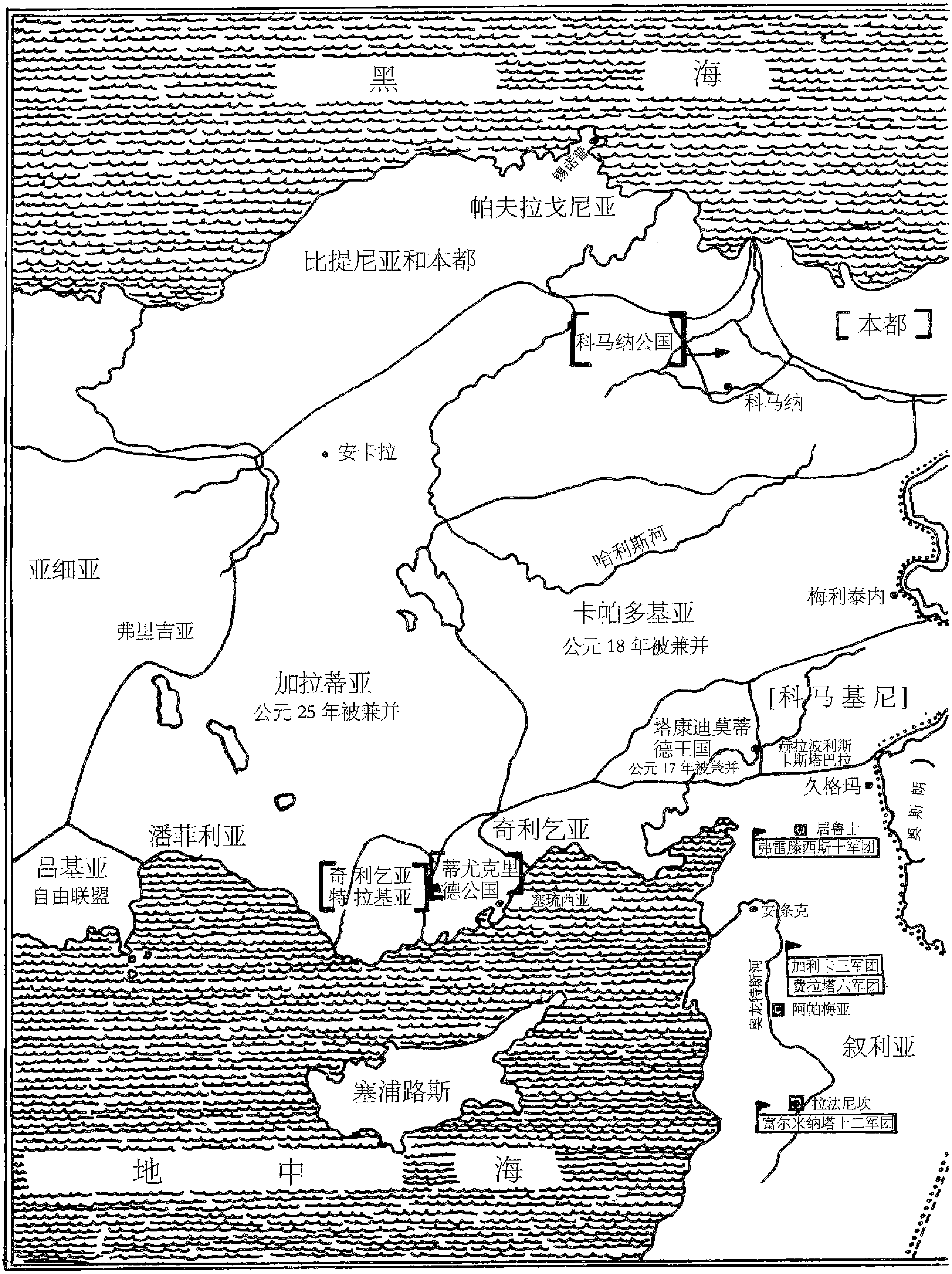
或许更常有的是,附庸国不能保证与行省领土相比的内部和周边安全高标准。有时存在威胁邻近行省土地或重要战略通道的重大混乱,从而需要帝国部队直接干涉。例如,在朱巴国王的毛里塔尼亚,要制服加埃图利人,就需 30 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仗一直打到公元 6 年为止。此后不

久，塔克法里纳斯的造反在北非爆发，直至公元24年才被最终镇压下去，靠的是到头来投入两个军团——奥古斯塔三军团和西班牙九军团。[43]（造反中心为阿非利加行省，但朱巴的毛里塔尼亚与其常年无法无天的各部落也被卷了进去。）另一个有严重内外安全问题的附庸国是色雷斯，其统治者罗梅托西斯一世（以及后来他的争斗不息的后继者们）必须反复被给予援助，以抗击培西人。[44]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场合，所涉领土的地位也事关重大。如果罗马的直接干涉确实成为必需的，那么它的目的能被局限在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即保护当地的罗马资产和使附庸统治者保有对其人民的控制，与通常为彻底镇压叛乱，使受影响地区够得上行省安宁标准所需要的大得多的军事努力相反。换言之，罗马直接干涉附庸国事务并不意味着穷追叛寇，追入森林深处或遥远的沙漠，有如罗马威慑体系和罗马威望在行省领土上要求的那样。[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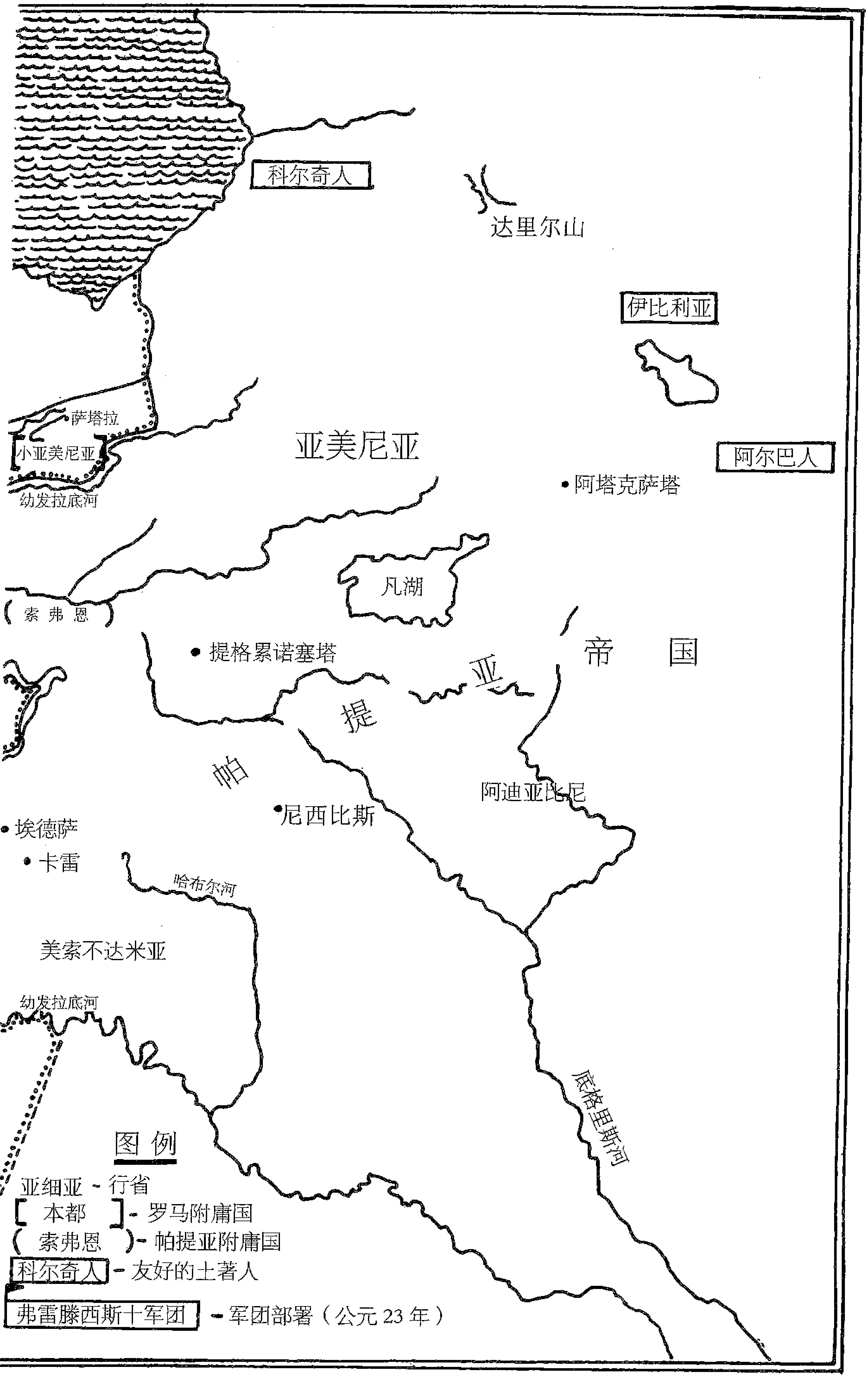
于是，在附庸兵力不足的场合，当地人至少能承受由此而来的不安全，罗马人则满足于让他们如此。[46]就此态度谴责罗马人，像莫姆森在评论附庸国"既无和平又无独立"时做的那样，透露出缺乏历史眼界。[47]如后 26
所述，只是在晚得多的时候，帝国的体系性目的才改变，要求基本战略方面有一种变化，即趋于即使在帝国周边也提供高标准安全。

针对高烈度威胁，例如在行省甚或区域规模上的入侵，附庸国家和附庸部族既能贡献它们自身的被置于中间的兵力，也能贡献它们承受威胁的能力——亦即它们能提供地理纵深。任何能取得高程度兵力节省的军队部署体系所以能如此，都是靠避免沿防御周线全程布兵造成实力分散。因此，如果高烈度威胁确实出现，那么通常只是在事发后才能对付之。在发生入侵的情况下，只是在兵力已被重新部署到现场后，才能抗击和打退敌人的突入；按照罗马人的战略机动速度，这可能是在损害已被造成后许久。[48]

该体制节省兵力，但不能随时捍卫所有边境地段：鉴于这两者间的关系，入侵在被击退以前所能造成的损害是个关键变量。如果损害巨大，那么这种突入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依靠集中部署兵力获得的裨益。附庸国



地图 1.2　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治下的东方



科尔奇人
达里尔山
伊比利亚
萨塔拉
小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
阿尔巴人
阿塔克萨塔
幼发拉底河
凡湖
索 弗 恩
提格累诺塞塔
帝 国
帕 提 亚
阿迪亚比尼
尼西比斯
埃德萨
卡雷
哈布尔河
美索不达米亚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图 例
亚细亚 - 行省
本都 - 罗马附庸国
索弗恩 - 帕提亚附庸国
科尔奇人 - 友好的土著人
弗雷滕西斯十军团 - 军团部署（公元 23 年）

在减小这些损失方面非常重要:即使它们自己的兵力不能在帝国部队抵达现场以前维持防守,由此而来的损害也不会落在罗马身上,而是落在其他土地上,它们尚非十足意义的罗马领土。这将大大减小敌人入侵给罗马统治者带来的威望损失和国内政治代价。于是,在这个时期里,通常没有任何罗马兵力被部署去保卫整个安纳托利亚区域(从叙利亚东北的久格玛到黑海),它面对亚美尼亚和来自安息的主要入侵兵锋。提比略于公元 14 年登上元首之位时,是本都、卡帕多基亚和科马基尼的附庸统治者自己以自己的兵力保卫该区域,是他们的领土将首当其冲地承受一场入侵。在一则典型地未能认识奥古斯都式安排的战略意义(其本质在于避免周边部署)的议论中,缺乏罗马常设驻防军被说成是一个“严重的军事缺陷”。[49]到公元 72 年,韦斯巴芗元首政治期间,所有这三个国家都被兼并了,而兼并需要一支由两个军团构成的常设驻防军(驻扎在被改组
27 了的卡帕多基亚行省内)部署于安纳托利亚 - 亚美尼亚边界。[50]因而,不是有一条由其他人守卫而对罗马无直接代价的“无形”边界,而是一个新的设防地段不得不予以创设,同时一套支持性的道路基础设施不得不被建造出来。当“缺陷”被充分纠正时,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防御便永久地减少了帝国可调配的军事力量,从而减少了体系对兵力的节省。

附庸国家和附庸部族对罗马安全的另一项显著贡献,在于提供地方部队去增强投身战役的罗马野战军。自然,这些部队属于罗马的辅助部队范畴,亦即骑兵和轻装步兵,而非军团的重装步兵。(虽然有一个军团即狄奥塔里纳二十二军团如其名所示,源于加拉太的狄奥塔鲁斯组建的一支部队,那以军团方式作为重装步兵被训练和装备。)[51]事实上,许多构成帝国大军有机组成部分的辅助部队起初是部落所征兵员,然后被吸收进正规建制,或者被吸收进附庸国部队,它们在其祖国被兼并时合并到罗马军队中去。[52]附庸们贡献的辅助部队在共和国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并非最次要地是因为它们能提供正规罗马武库缺少的军事专才,例如弓箭手,特别是马上弓箭手。[53]

辅助部队与军团武力之间的互补是罗马军事机器的一个重要特色;

不仅如此，附庸国维持的兵力非同小可。甚至在公元67年，当东方的附庸已因兼并而大为减少后，韦斯巴芗治下为镇压犹太人造反而被部署的三个军团据约瑟夫斯所述增加了15 000人，那是由科马基尼的安提奥库斯四世、阿格里帕二世、埃米萨的苏希穆斯和阿拉伯统治者马尔库斯贡献的。[54]附庸君主或附庸部族供应的兵力缓释了对可得的公民人力后备的压力（正规的非公民辅助部队亦如此），减轻了罗马军事财库（*aerarium militare*）的财政负担。即使得到饷金和维持费（如部落所征兵员必须的那样），辅助部队也无须被支付军团部队应得的很慷慨的退役授予。

然而，与这些裨益对照来衡量，附庸体系造成相应的财政收入损失：一旦被正式兼并为行省，附庸国当然会肩负帝国赋税的充分负担。（附庸部族——据想象它们本将无论如何不易纳税——似乎已经给帝国贡献 30
了作战人力，以代贡金，就像巴达维人肯定做了的那样。）[55]

三　操控附庸

附庸国和附庸部族在帝国安全体系中的价值乃是罗马治国方略的一项常识。[56]在他对帝国兵力部署的概述中，塔西佗将附庸王国毛里塔尼亚和色雷斯列入他的军团一览，连同高加索的伊比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族国王，这显然是将附庸与罗马部队等量齐观。[57]在同一节里，塔西佗仔细地区分他述及的各不同附庸的地位等级：毛里塔尼亚被说成是“出自罗马人民的一件礼物”，赠予朱巴二世，而高加索各附庸被多少视为被保护国，“我们的伟大在于保护它们免遭任何外部强权侵害。”色雷斯事实上由服从罗马但并非罗马任命的本土附庸统治，被简单地说成是由罗马人“控制”。[58]

塔西佗之类当代观察家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附庸不仅是罗马军事力量的添加，还补充其功能，而这补充对于罗马节省武力是关键性的。事实上，该体系以一种霸权性而非领土性的帝国结构为前提，正如共和时代的帝国一直如此，而元首政治最终予以改变。[59]屋大维显然非常赏识该体

系的价值,[60]以致他在亚克兴得胜后,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六个先前忠实地为其对手安东尼效劳的大附庸的统治。[61]只是对小附庸,屋大维才让自己有惩罚敌方朋友和奖赏己方伙伴的奢侈;例如,他搬掉了赫拉波利斯-卡斯塔巴拉(位于奇利乞亚)的塔康迪莫蒂德家族统治者,他们对安东尼忠实到底。然而,即使在那里,他最后也改弦易辙,于亚克兴战役十年后重立塔康迪莫蒂德家的菲罗巴托,其父在该战役中为安东尼一方丢了性命。[62]屋大维显然发现(而且奥古斯都回想起)有效和可靠的附庸统治者乃是非常可贵的工具,并非每个值得酬赏的协力者都能掌握附庸治国的精湛技艺。

附庸国家和附庸部族内在的变动和不稳,需要一种专门外交的不息操控:罗马的控制和监督不得不持续不断。在东方,那些实行附庸体制的
31 君王足够明白他们自己的虚弱(连同罗马报复的必不可免性),以致始终十足忠诚。即使如此,王朝内部竞争和王朝间家族关系纠葛也能威胁体制的稳定。于是,希律与其儿子的争执(或他的老年偏执狂)倾覆了他自己那重要的附庸国的内部平衡。更糟的是,这些因素对卡帕多基亚有影响,因为卡帕多基亚统治者阿基劳斯之女格拉菲拉嫁给了希律的被处死的儿子之一。[63]

王朝格局中不可避免的个性莫测极为重要。例如,攸里克利斯从谨慎精明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小国斯巴达,但到头来证明是个顽固不化和危险的阴谋家;在离开了他那卑陋的故土后,攸里克利斯为自己的私利在卡多帕基亚与犹地亚之间挑拨离间,而且看来还引发了亚该亚的动乱。虽然重要国家的重要统治者,例如希律和阿基劳斯,得到了奥古斯都以大机智和大耐心给予的引导,但攸里克利斯——并无战略重要性的一个乡村国家的卑微统治者——干脆被撵下其位。[64]

奥古斯都就个性而言非常适于控制附庸这一任务,而他本人那坚定但文雅的父权作风表现得非常明显。然而,罗马对附庸国的处理方式早已聚合为一种传统和一套规则,它们无疑起了引导政策的作用。例如,人们懂得,任何附庸都不得在未经罗马明确准许的情况下,以损害另一个附

庸去壮大他自己。[65]当希律派兵进入处于动乱的毗邻附庸国那巴提安阿拉伯，从而违背了这条根本规则时，奥古斯都立即命令他住手。为示惩罚，奥古斯都致函希律，说从此往后他不再能够视他为朋友，而不得不将他当作臣民对待；鉴于此人的作风，这等于一番严厉的叱责。[66]

为了驳斥不可避免的反诘，即旨在为自己的侵略辩护而声称进攻者可以打击其受害者（当时如同现今国际体系的一个特征），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确立了规则，规定一个附庸只能以严格的自卫措施去回应攻击，直至罗马裁断解决问题为止。[67]

人们懂得，维持邻近附庸互相间的地方均势最有助于罗马的利益，因为体系可得以保持自身平衡而不依靠罗马的直接干涉。不幸的是，有如统治者和环境与时俱迁，地方层次的均势亦如此。附庸统治者有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自己的野心和他们自己的诱惑。不仅如此，那些在东 32
方的还可以不时乞灵于帕提亚的抗衡性权势，就像卡帕多基亚的阿基劳斯（在公元 17 年）和科马基尼的安提奥库斯四世（在公元 72 年）被指控做了的那样。[68]

忠诚和高效的附庸统治者被赏予个人荣誉，通常得到罗马公民权（奥古斯都的非常限制性的公民权政策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特权）；然而，在一个罗马权势天下无双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荣誉或头衔能够赋予真正的平等。[69]更有形的酬赏也在给予之列，主要是领土酬赏。那位模范附庸、本都国王波利摩一世从安东尼那里得到了小亚美尼亚，而当奥古斯都将这块领土从本都割出时，作为替代，波利摩获得了重要的（但到头来证明无法治理的）博斯普兰国。[70]与此相似，当希律——一位确实非常高效的附庸统治者——仍然大受奥古斯都恩宠时，他于公元前 24 年至前 23 年被授予高原国度伊都里亚（戈兰－豪兰），为此另一位附庸、未能控制其臣民游牧袭击的芝诺多鲁斯付出了代价。[71]

与附庸部族和欧陆蛮族王国的关系属于一个不同的范畴。首先，这些族民至少是潜在地迁徙性的，即使全非游牧性。他们能逃往遥远的内地，就像马罗博杜乌斯将其马科曼尼人带往波希米亚，以便逃避罗马军事

权势对莱茵河上游的压力那样。[72]此种选择有其代价，那就是放弃沃土良田，以换取一种不定的前景，即可能的贫乡瘠壤，而且或许还丧失与罗马商人的可贵的商业接触。迁出罗马权势范围的族民仍可希望留在罗马商业范围内，但他们不再能起一种有利可图的中介作用。[73]

这两类群体的主要差别是文化上的。作为通则，东方的附庸统治者及其臣民足够精致复杂，懂得抽象形态上的罗马军事权势的充分潜能，欧陆族民则往往并非如此。东方的附庸统治者及其臣民实际上并非定要看见向其城市进军的罗马军团才应对罗马的命令，因为他们能够想象不服从会有什么后果。（或许出于这个原因，罗马人促进欧洲部落酋长之子的教育。）[74]再者，东方的附庸统治者通常享有对其臣民的稳固的政治控制。只有这才保证他们自己对罗马权势的认识（连同这认识施加的制约）会同样由其臣民持有。相反，在构建不足的欧洲政治实体内，知情者（例如马罗博杜乌斯在公元9年）的审慎不一定会制约所有那些能以反对罗马利益的方式行事的人们。[75]

33

由于罗马军事权势的有力说服只能通过他人的认识（以及通过其他政治实体的决策和控制的内部过程）起作用，因而欧陆族民的未开化性质能够使这样的说服无效，或至少削弱它的效应。[76]说服过程由于其对象不能或拒绝给予罗马权势它应有的敬畏，帝国军事实力产生的实际政治控制便依其程度相应地减小。因而，作为一个冒险的一般结论（因为有众多例外），可以说相对于精致复杂的东方政治实体，罗马军事权势通畅无阻地转化为政治权势，然而在被针对欧洲未开化族民使用时，它的主要用途是武力的直接应用。这区分当然颇为根本。因为，出自潜在武力的权势在被使用时并不耗费掉，它也不是一个限定的量。武力却相反：如果被指向一个目的，它就不能同时被指向另一个，而且如果被使用，那么它因为这事实本身就被消耗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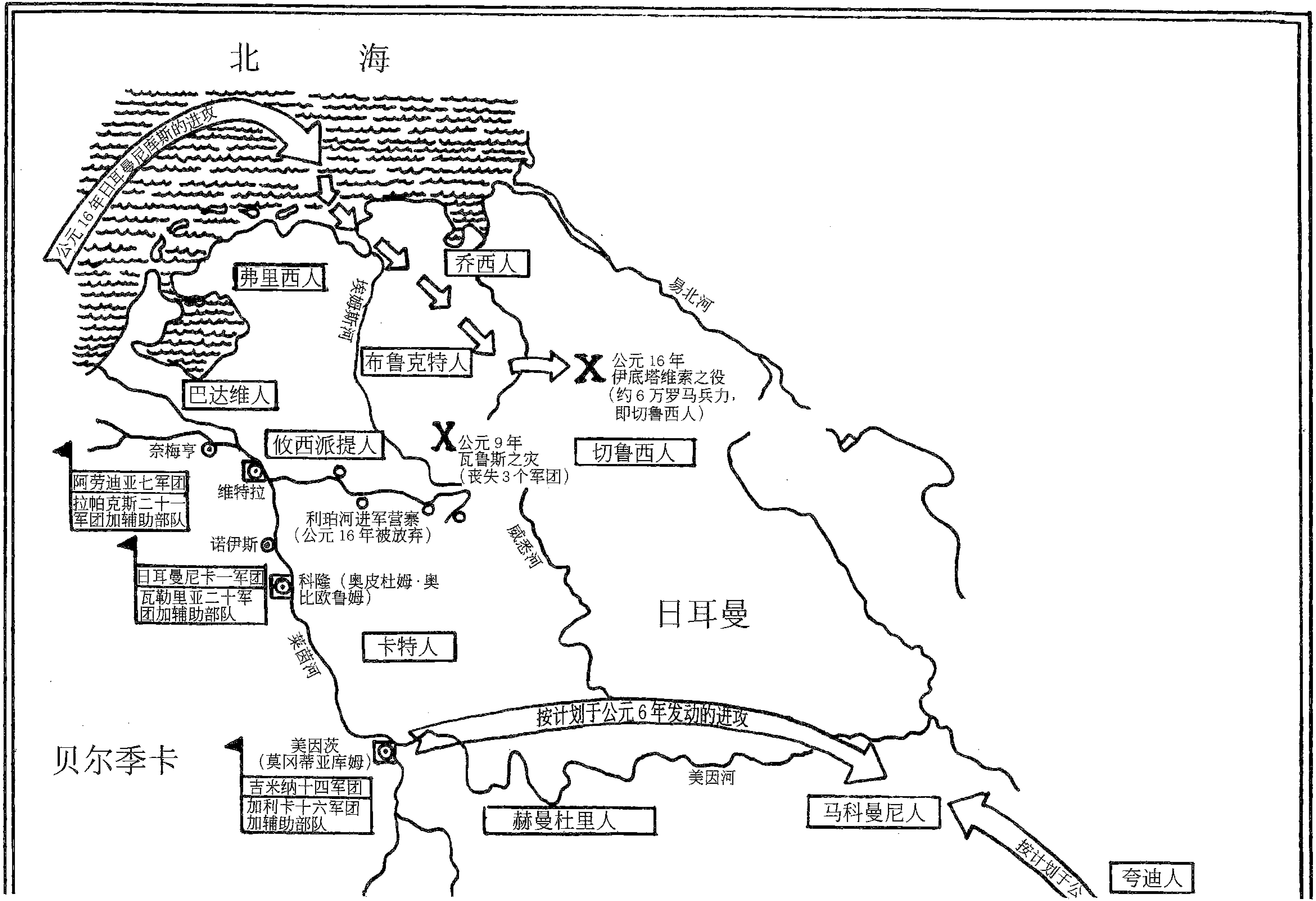
诚然，罗马的报复将很快教育被害者，使得这一群体在未来将更有可能应对罗马的命令。然而实际上，此种经诱导的应对潜在武力的倾向将只应用于直接威胁；不仅如此，它们能够由于部落迁徙而遭抗拒；它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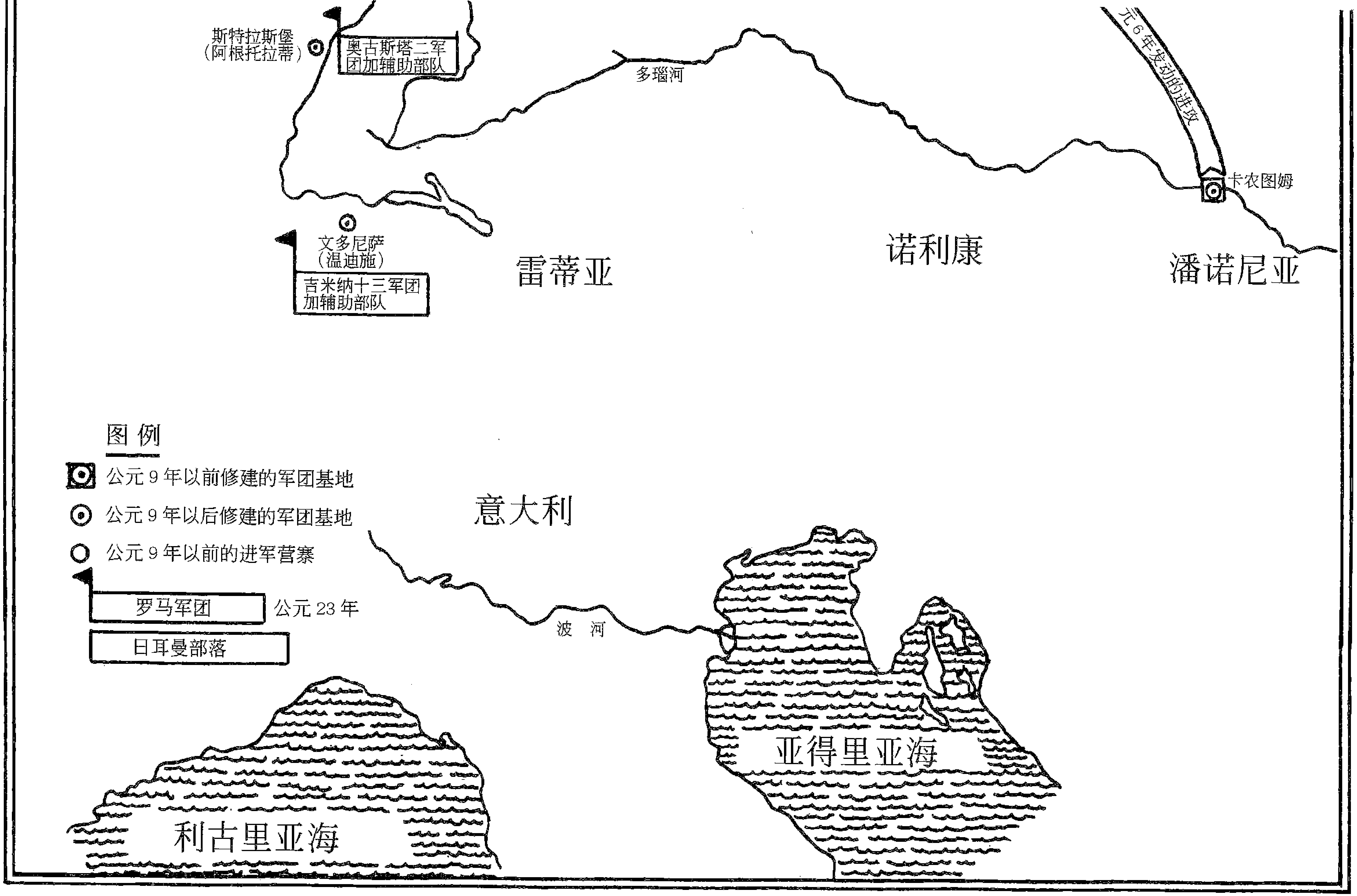
影响还可以因为松散的内部控制结构而被弱化。在切鲁西日耳曼人对P. 昆蒂利乌斯·瓦鲁斯麾下服役于莱茵河以东的三个倒霉军团的战略性伏击中，这三个负面因素都分明可见。[77]

尽管如此，罗马外交坚持不懈地试图将北方边境族民转变为附庸，并且不无成功。依靠系统的政策，帝国与经过选择的酋长之间的直接政治纽带被培育起来。[78]如前所述，公民权是给酋长们的一种通常酬赏；某些酋长得到了骑士衔。在制裁无效的场合，一种较有形的积极刺激可以取而代之。按照俗常看法，给边境族民的津贴支付往往被联系到罗马衰落时代，但即使在元首政治以前，它已是一种确立了的政策。[79]然而，在一个混乱和未开化的世界里，即使以金钱和荣誉凝合成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瓦鲁斯的背叛者和摧毁者阿米尼乌斯本人被授予了公民权，并且担任了一支切鲁西人辅助部队的指挥官。他的岳父塞吉斯特和他的兄弟弗拉乌 36
斯始终忠于罗马（塞吉斯特据称试图警告瓦鲁斯有伏击），或者史料这么说。[80]这并未有助于拯救瓦鲁斯及其部下；该事件表明，在一个在罗马压力下瓦解着的本地社会中，权威结构太弱，无法支撑一种令人满意的附庸关系。塞吉斯特显然是个自身权利合法的酋长，但他对他的切鲁西人缺乏任何自尊的东方君主会有的那种程度的控制。

尽管有瓦鲁斯之灾的可怕经历，罗马人仍未对有关政策，甚至有关家族绝望：在克劳狄元首政治期间，切鲁西人要求为他们任命一位国王，而他们得到了弗拉乌斯的一个儿子即阿米尼乌斯的侄子作为他们的统治者，那是一名在罗马受过教育的罗马公民，名叫意大利库斯。[81]到那时，附庸体系已在整整一代经久不息的努力之后站住了脚跟。当提比略在公元16年决定将日耳曼尼库斯及其远征军撤出莱茵河对岸，从而中止随公元9年的危机而来的报复行动时，新的外交政策得以发动。即使这些土地不被打算征服，罗马人也不能干脆漠视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各族。这大小各族代表着一股太强大的力量，不能任其不受控制地处于漫长和易受伤害的帝国周边，那里仍然未设边防。

因而，到公元16年，一种内在连贯的外交控制政策首次浮现，虽然它


北 海
公元16年日耳曼尼库斯的进攻
弗里西人
乔西人
埃姆斯河
易北河
布鲁克特人
巴达维人
公元16年
伊底塔维索之役
（约6万罗马兵力，
即切鲁西人）
攸西派提人
公元9年
瓦鲁斯之灾
（丧失3个军团）
切鲁西人
奈梅亨
维特拉
阿劳迪亚七军团
拉帕克斯二十一军团加辅助部队
利珀河进军营寨
（公元16年被放弃）
威悉河
诺伊斯
日耳曼尼卡一军团
瓦勒里亚二十军团加辅助部队
科隆（奥皮杜姆·奥比欧鲁姆）
日耳曼
莱茵河
卡特人
按计划于公元6年发动的进攻
贝尔季卡
美因茨
（莫冈蒂亚库姆）
吉米纳十四军团
加利卡十六军团加辅助部队
美因河
赫曼杜里人
马科曼尼人
按计划于公
夸迪人



地图 1.3　日耳曼问题（公元 6 年至 16 年）

的大多数要素早已存在。该政策的第一工具是一种操控性和分化性外交，意在保持日耳曼各族分立，并且——可能的话——忙于互相交战。[82]然而，罗马人需要干比这更多的事。一旦他们开始明白日耳曼人代表的威胁有多大，他们就不能满足于企图通过外交诡计去削弱之。虽然喜欢设想野蛮人互相残杀，[83]但罗马人同样清楚地认识到，切实得多的是通过创设一条附庸部族之链去积极使用日耳曼人的能量，那将构成一道积极的屏障，将更深内陆的可能更危险的蛮族远远挡在帝国周边之外。

操控机制复杂。必须通过其酋长操纵各部落，同时依靠个人威胁和个人引诱手段控制酋长；对整个部落的潜在武力威胁经久常在。由于通过被选中的附庸酋长们输送金钱和宠惠，罗马人就帮助了后者获得对其臣民的权势，与此同时罗马人获得对他们的权势。[84]有些酋长由罗马任命，另一些则依靠自己崛起；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外交的任务都是以行
37 之有效的程序去维持两条控制线：对内和对外的控制线。这必定需要大量微型的边界外交，就此我们所知极少。肯定无疑的是，这种政策在一个长时期里卓有成效：塔西佗讲到一度强大可怕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将它们都说成由附庸统治者主宰，而这附庸统治者依靠间或武力援助与财政支持的结合被维持在权位上。[85]

在欧陆未开化各族中间，操控附庸的主要积极工具是一种系统的津贴政策。[86]另一方面，消极工具是潜在的罗马报复威胁。导致塔西佗叙述的那种局面的事态顺序可被重现如下：首先，当潘诺尼亚叛乱在公元 6 年的爆发迫使罗马取消计划中对波希米亚的入侵时，达成了一项与马罗博杜乌斯及其马科曼尼人的和解；不管他们是干脆被收买的还是靠条约抚慰的，他们都肯定在三年叛乱期间保持平和，安分守己。公元 9 年，瓦鲁斯之灾过后，马罗博杜乌斯拒不与阿米尼乌斯合作协同攻击帝国。[87]随着罗马撤军，公元 17 年在这两位最大的日耳曼酋长之间爆发了战争。马罗博杜乌斯败北，其求援呼吁被罗马人拒绝，虽然他依据一项同盟互惠权利要求帮助。[88]公元 18 年，马罗博杜乌斯被推翻并被驱逐，仅获在帝国避难，在拉韦纳的舒适的流亡生活中消磨了他一生最后 18 年。[89]不久后，赫

曼杜里人与通过罗马的阴谋而接替马罗博杜乌斯的卡图尔达交战，并且将其击败。提比略最后出面，指定夸迪人首领万尼乌斯兼任马科曼尼人的统治者（“苏埃维”［“Suevi”］乃是这两个族群的属名），从而在多瑙河流域中段创设了一个完备的附庸国。[90]万尼乌斯自然得到了定期津贴，[91]但照例没有受护保障。当转而遭到赫曼杜里人攻击时，他被留下听任命运摆布，虽然也被给予了个人避难。[92]

提比略的继承者盖乌斯（卡利古拉）可能以他自己那怪诞的方式，打算复兴征服日耳曼的企图；公元39年，兵力似乎为此目的被集结在莱茵河畔。苏埃托尼乌斯关于这插曲的分人心神的叙述饶有趣味，但不可置信；无论如何全未进军。[93]继承盖乌斯的克劳狄显然回到了提比略的政策：公元47年，伟大的将领Cn.多米蒂乌斯·科布洛（他将在尼禄之下赢得盛名）奉命停止攻击日耳曼北部的乔西人。依照帝国扩张的永恒模式，这攻击源于对海上袭击者坎宁法特人的一场反攻，但它显然发展成了 38
一场对日耳曼北部的大入侵。根据来自克劳狄的命令，军团从莱茵河右岸撤出。[94]某些边界小战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例如公元50年对卡特人之战），然而这分明是防御性质的，亦即对越界袭击的惩罚性回应。有如在提比略治下，克劳狄和尼禄治下罗马在日耳曼的战略是依靠附庸——依靠这些可能不稳定的附庸。[95]

关于罗马在东方的附庸操控所知较多。公元17年，提比略急剧缩减在东安纳托利亚的附庸结构：以逆通帕提亚为由，卡帕多基亚的阿基劳斯（他的女婿已被处死）遭到审判并被废黜；大约同时，科马基尼的安提奥库斯三世和赫拉波利斯－卡斯塔巴拉的菲罗巴托俱告身亡。[96]提比略决定兼并这三国。卡帕多基亚幅员最大，但科马基尼也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其领土包含流向帕提亚领土的幼发拉底河中段的三渡口之一。[97]提比略将卡帕多基亚组建为一个新行省，将科马基尼附属于叙利亚，并将被割出奇利乞亚特拉基亚和利考尼亚的领土划给被废黜的卡帕多基亚统治者之子阿基劳斯二世。（这些举动被解释成对于公元16年亚美尼亚定居地瓦解的一种战略性回应，当时罗马附庸国王沃诺尼斯被逐出亚美

尼亚。[98])

盖乌斯实质性地扭转了提比略的兼并政策。安提奥库斯四世被复还科马基尼王位,该国再次成为一个附庸国,还添加了奇利乞亚特拉基亚。被杀害的色雷斯国王科蒂的几个儿子已在罗马作为盖乌斯的游戏伙伴被抚养大,现在全都得到了各自的王国:波利摩二世被给予本都和——名义上——博斯普兰国(其实际统治者为米特拉达梯);科蒂三世被给予小亚美尼亚;罗梅托西斯被给予色雷斯的半壁河山(另半壁处于另一个罗梅托西斯的统治之下,那是杀害科蒂的莱斯库波瑞斯的儿子);还有一个产物是苏希穆斯,被任命为位于伊都里亚(豪兰)的一个专区的长官。[99]

盖乌斯的慷慨有个更重要的受惠者,那就是 C. 朱利乌斯·阿格里帕一世:"一位东方冒险者",希律大王的侄子。身为提比略的阶下囚,阿格里帕被盖乌斯释放,并赐丰厚酬赏:公元 37 年,他被给予约旦以东的一个小公国;一年后,他进一步被授予伊都里亚的某些部分,那实际上是从
39 叙利亚行省领土中割出去的;公元 40 年,他还得到了阿比林,最后还有加利利和佩里阿,从而实际上简直将希律王国的北半部重构于他的统治下。[100]

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家都将盖乌斯的慷慨归因于他的个人野心和疯狂。他们也以此说明他为何在公元 40 年废黜和处决毛里塔尼亚国王托勒密——随后便是兼并该国。[101]然而盖乌斯的后继者、既不疯狂也不挥霍帝国资源的克劳狄并未取消盖乌斯的所为。相反,他的政策显然意在稳定盖乌斯留下的安排:米特拉达梯被承认为波利摩二世控制不了的博斯普兰国的统治者,后者则在奇利乞亚得到补偿;科马基尼的安提奥库斯四世被盖乌斯于公元 40 年自逆前行废掉,现在则被复还他在科马基尼的王位;朱利乌斯·阿格里帕(盖乌斯的宠幸)得到了犹地亚和撒马利亚,作为他的王国的进一步添加。应当指出,自公元 6 年推倒希律之子阿基劳斯往后,这些领土一直处于帝国直接统治之下。[102]

附庸国需要不断的操控:必须更换不得人心的统治者(例如斯巴达的攸里克利斯),必须为死去的统治者找到继承人。然而间接统治方法

经久延绵。如果说有进一步的兼并(犹地亚于公元 44 年再度被兼并,色雷斯于公元 46 年和本都在尼禄治下于公元 64 年同样如此),那么也有归还,例如逐渐增大了 C. 朱利乌斯·阿格里帕二世——他的父亲的更好的追随者和同名者——的领土的那些归还。[103](有证据显示,克劳狄实际上指定了专门的外交代理人,负责在原地操控附庸关系。)[104]在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外交部的情况下,这工作必定造成了皇帝职位的一个颇重的负担;然而,这是个朱利乌斯 – 克劳狄王朝诸帝显然愿意承受的一个负担,连同附庸体系的一切含混和复杂。附庸统治者是谁大为紧要。本都的波利摩一世和 C. 朱利乌斯·阿格里帕二世(他到公元 93 年为止一直掌权)那样的人分明是间接统治技艺专家,既可靠又高效。

在西方的较简单国度里,为帝国效劳的现实没有被遮掩在虚假独立的屏幕后面。据一项铭文解读,塔西佗讲到的一位不列颠酋长克吉达布努斯自称为“皇帝在不列颠的王和使者”(*Rex et Legatus Augusti in Britannia*)。[105]唐纳斯之子科提乌斯也处于这种地位:他对罗马人来说是科蒂安 40
阿尔卑斯的地方长官,对当地人来说是国王。[106]有人提出,这样的双重地位是一种克劳狄式发明;[107]如果是,那就会证实一个印象:克劳狄或其决策者们深谙间接统治的好处。

四　军队的战术组织

波里比阿讲述的公元前二世纪的军团[108]是结构均衡的复杂构造:除了重装步兵这个核心,它们还包括一支重要的骑兵队和相当大比例的轻装步兵。[109]有三类重装步兵:“哈斯塔蒂”(*hastati*)、“普林西皮”(*principes*)和“特里阿里”(*triarii*);各由 1 200 人组成的前两类配备椭圆盾、剑和“派勒姆”(*pilum*)(一种九英尺长的重投枪,那将浮现为军团步兵的特色投掷武器)。[110] 600 人左右的“特里阿里”仍以“哈斯塔”(*hasta*)即一种长标枪武装自己。

这些军团所以与元首政治时代的军团相反而成为结构均衡的兵力,

是因为它们有 1 200 人的轻装步兵(*velites*),配备剑、小盾(*parmae*)和“哈斯塔镖”(*hasta velitaris*)(一种短的轻标枪),还有 10 个骑兵小分队,总共 300 匹马。[111]诚然,这些既无弓箭手、亦无投石器的军团在投掷武器方面显然是弱的;与此同时,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骑兵队也相当弱,因规模太小而无法被独立地使用。

然而,当盖乌斯·马略(公元前 157 年至前 86 年)改革军团时,他使之变得比先前不均衡得多。轻装步兵被废除,骑兵队则显然被逐渐撤销:没有地方提到在朱利乌斯·凯撒的战争中有作为军团有机组成部分的骑兵。[112]“特里阿里”也在转变为一种新的战术组织的过程中被取消(虽然它们的武器未如此),此种组织基于 480 人的标准步兵队,其兵士配备两英尺长的双刃短剑(“西班牙剑”)和“派勒姆”。[113]

元首政治时代的军团在结构方面与先前基本上相似,除了一支小骑兵队(120 匹马)显然被重新引入。[114]这意味着军团成了狭窄地专一化了的重装步兵兵力。事实上,正如已被指出的那样,军团部队实际上是双重目的的步兵兼战斗工兵。[115]每个军团都有工程专家在其总部,他们能勘查运河,设计竞技场,规划道路,并且(最重要的)建造或拆除墙垣和防御工事。[116]兵士必定被训练为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他们的个人用具包里有基
41 本的建筑工具,特别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多用途鹤嘴镐(“多拉布拉”)(*dolabra*)。(克劳狄时期的头号罗马大将 Cn. 多米蒂乌斯·科布洛喜欢说胜利要靠使用“多拉布拉”赢得。)[117]元首政治时代的军团还包括另一“重要”因素: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射击手,使用投石器“巴利斯塔”(*ballistae*)和射出轻箭或弩箭的石弩。这些武器在围困战记述中显得很突出,但也被用于战场上的火焰支持。

在合适的情势下,这不均衡的结构在罗马军队的最可靠成分即军团那里产生了最高程度的战术效率。然而,“合适的情势”乃是高烈度战争情势:旨在守住遭攻击阵地的近距战斗,或者针对集中的敌方兵力,包括驻守精致的防御工事的兵力去夺取阵地的近距战斗。同理,行进相对缓慢的军团步兵不适于游击战(或反游击战),而且确实也不适于一切针对

不易捉摸之敌，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骑兵军队的运动战。纯军团兵力在这样的低烈度战争中会表现得相当糟糕，因为此类战争需要小规模和可分散的部队、远甚于突击力的投射力以及尽可能多的骑兵，唯在茂密的森林和高山地形除外。不仅如此，此类战争通常不需要军团里那么高度发达的工程技能。

军团被训练为一种紧密集中的大规模兵团去作战；它拥有的投射力微乎其微，因为极少有“派勒姆”，而用手投掷的“派勒姆”的射程通常不超过 100 英尺。[118]不仅如此，军团骑兵只能提供侦察员和警戒哨；它不足以适当地抵挡敌方骑兵，更完全不足以独立地用作重型“突击”骑兵，或以东方马上弓手那种方式从事对敌方步兵的骚扰战术。轻装的或以其他方式更为机动的兵力能对军团部队发动打了就跑的袭击，军团部队却只能朝敌方力量中心缓慢但不懈地推进，以围困或强击攻陷之。

鉴于军团部队的专门化程度与其战术局限，辅助部队显然不仅是军团的添加物，而且与其互补，就像很久以前就被指出的那样。[119]多亏了辅助部队，罗马人能够避免将其公民人力稀释进它不适合的各个兵种，例如骑兵[120]和投射部队、弓箭手和投石器操作手。[121]与此同时，军团部队的特殊能力赋予它们对敌人和不可靠盟友的“升级支配”，因为说到底，它们总是能在高烈度战争中压倒辅助部队。军团部队无法阻止辅助部队逃遁，但它们能十拿九稳地在野外战役或围困战中击败之，除非条件极为不利。在西 42
维利造反（公元 69 年至 70 年）期间，不利条件确实占了上风，当时两个军团（阿劳迪五军团和普里米吉尼阿十五军团）兵员减损，食物短缺，被怀有贰心的巴达维辅助部队围困在位于下日耳曼的选址不当的维特拉营寨，并且遭其屠杀；四个军团（日耳曼尼卡一军团、加利卡十六军团、马其顿四军团和普里米吉尼阿十五军团）后来被迫向造反者投降或投诚。[122]

西维利造反具有军团与辅助部队之间战争的一般特征：八个巴达维辅助步兵大队造反，而西维利本人既是辅助部队军官，又是一位部落酋长（另两位著名的造反者阿米尼乌斯和塔克法里纳斯亦如此）。辅助部队在压力情势下怀有贰心并非独特事件，尽管随后而来的罗马军团的背叛

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在叙事史料中,辅助部队固有的不可靠性反复出现,帝国和共和国之下皆如此:按照弗龙蒂努斯的说法,苏拉关注维持它们的忠诚,[123]普鲁塔克则记载了克拉苏麾下的辅助骑兵在卡雷的不可靠行为。[124]公元70年,当Q.佩蒂利乌斯·瑟里亚利斯在镇压西维利造反期间抵达战区时,他认为出于审慎在进入战斗之前须将他的高卢辅助部队遣回家乡,传话曰单靠军团足以恢复秩序。[125]

在罗马军队的两层结构中,由公民组成的军团部队一般非常守纪,高度可靠,默然起着对辅助部队保持控制的作用,必要时依靠它们在高烈度战争中的战术优势。此乃军团的一项潜在功能,然而是一项显然重要的功能。一旦辅助部队的可靠性得到确保(而且后来的改革将更充分地予以确保[126]),军团步兵/战斗工兵与辅助部队骑兵、轻装步兵和投射部队的结合便给了罗马人在大多数地形上和对大多数敌人的战术优势,也给了他们对实际上一切敌人的"升级支配"。

塔西佗记载说,日耳曼尼库斯渡过莱茵河,以寻找被歼的瓦鲁斯诸军团的残余,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旨在恢复罗马军队威慑能力的报复行动去重树罗马威望,而他用以这么做的兵力为两个军团、8翼(*alae*)辅助骑兵和不少于26个辅助步兵大队。[127]显然,并无标准的辅助部队配备方式:瓦鲁斯只带了3翼(*alae*)骑兵和6个辅助步兵大队随同他的三个军团。[128]

罗马武力的最大不足在于骑兵。早在公元前202年,罗马人就已依
43 靠雇佣的努米底亚骑兵助战,与汉尼拔的骑兵大军较量;[129]虽然确实存在一支罗马公民骑兵(如同直到"社会战争"为止存在意大利各邦的骑兵[130]),但对非公民骑兵的依赖模式被经久维持下去。在元首政治时代的军队里,辅助骑兵以两种外貌呈现:作为骑兵本身的"翼"(*alae*)和作为骑步兵混合单位的骑步兵大队(*cohortes equitatae*)。这两者都像一般的辅助步兵大队,有两类阵式:拥有512人的五百人翼(*ala quingenaria*)和人数大致为其两倍的千人翼(*ala milliaria*)。骑步兵混合部队(*cohortes equitatae*)显然有两类单位的380或760名步兵以及120或240名骑兵。[131](然

而，直到弗拉维时期为止，诸 *milliaria* 单位并未变得重要。[132]）

由于古代骑兵没有马镫（或者无论如何罗马人可用的骑兵没有马镫），人们有时就设想所有罗马骑兵部队事实上都是“轻”骑兵，亦即被训练和武装以箭和标枪从远处攻击、或者以矛或剑近距离骚扰敌人的骑马人——与“重装”但不一定身披铠甲的骑兵相反，后者用长矛武装起来，被训练为一支意在对准要害发动冲锋的突击兵力。[133]人们争辩说，没有马镫，骑兵就不能冲击密集的步兵，因为没有任何骑马人能在一旦发生接触时保持自身平衡。无疑，密集阵列步兵战术自斯巴达往后大有发展，使得对训练有素、严守军纪的步兵发动的简单骑兵冲锋实际上过时了，因为甚至是最好的突击骑兵也会被组成密集阵列的步兵击败，后者针对攻击树起一道盾牌和矛尖之墙。事实上，罗马人既使用轻骑兵，也使用重装（虽不披甲）骑兵，因为针对训练和军纪差的步兵，骑兵冲锋依然能非常有效。[134]不仅如此，缺乏马镫不会阻止对敌方骑兵、特别是不披铠甲的“轻”骑马人的骑兵冲锋。

此外，实际上可以肯定，一种能击败即使训练有素的步兵的骑兵战术事实上已被发明出来，那就是装备长矛的重装骑兵与马上弓箭手（即轻骑兵）之结合使用。帕提亚骑兵军队曾使用这个办法，歼灭了公元前53年克拉苏带到卡雷战场上去的七个军团。[135]作为火焰与突击的经典结合，这一战术运用马上弓箭手射出的大量箭火，攻击罗马人的阵列，与此同时长矛骑兵以冲锋威胁（或实际攻击）迫使他们保持密集阵型，从而确保他们易受箭火杀伤。如此，步兵既不能上前对付弓箭手，又不能离阵前往躲避处，哪怕合适的地形近在身旁。一旦认识到即使没有马镫，骑马人仍然 44
能够，并且确实发动了冲锋，辅助骑兵队（*alae*）的价值就能够以正确的视野被见到：它们不仅给军团增添了一种侦察和反侦察以及追击兵力，而且增添了一种突击成分，那在击破轻骑兵集结方面非常有用，并且对训练和军纪差的徒步武士大有杀伤力。

罗马人倚靠辅助骑兵，只是在以此弥补他们的公民骑兵（是否还有马匹）的可怜素质。另一方面，他们对辅助投射步兵（弓箭手、投石手和

标枪投掷者)的依赖有助于达到一个积极目的:它维持了罗马人在重装步兵这优越武力方面享有的比较优势。鉴于他们常年不断的人力短缺,势将低效的是将其作为轻装步兵——在意大利之外易得的一种商品——使用,从而稀释了紧缺的公民人力。就此也有很古老的先例:李维记述公元前217年从叙拉古征募了一千名弓箭手和投石手,[136]而在凯撒的高卢战争期间,“古典三杰”即克里特弓手、巴利里克投石手和努米底亚步兵(投枪手?)已经出现,并且持续为元首政治时代的一种辅助部队构造。[137]

根据拿破仑三世主持的一项19世纪的实验,在一个强壮和受过训练的人手里,罗马重投枪(“派勒姆”)的最大实际射程为100英尺。[138]根据同一项实验,由木质实心、外在肌腱和内在骨角元构成的合成弓[139]的最大有效射程在175至190码之间。[140](长得多的射程被援引过,但那些大概涉及特殊的弓、特殊的弓手和特殊的[即轻的]箭。)然而事实上,古代合成弓的最大准确和有效射程接近55至65码。[141]因此,弓超过“派勒姆”的最重要好处在于它的更大射火量,而不是它的更远射程:进军中的士兵只能携带几杆“派勒姆”(两杆大概是标准),弓箭手却会有很多箭。

投石手和弓箭手行使同样的功能,即以其投射的火焰去掩护和支持行进(或撤退)中的步兵。在围困战以及(如果条件允许)运动战中,轻型投射火焰得到掷弹的补充。由于修筑良好的防御工事经受得住一切射击,唯出自最大投石器“巴利斯塔”(*ballistae*)的除外,因而在围困战中,
45 掷弹器的更常见使命必定是为撞墙锤和其他突击器械提供掩护火焰。

掷弹器也足够机动以便野战使用,至少在坚硬和平坦的地面上:公元14年,日耳曼尼库斯在其部队强行渡河时,使用燃火箭(“托尔门塔”)(*tormenta*)将卡特人逐离对岸;在两年后的另一个事件里,他使用掷弹器掩护罗马部队进攻切鲁西武士据守的一个工事,迫使切鲁西人不敢抬头并中止其火焰投射。[142]

我们不知道作为军团有机组成部分的掷弹武器的标准数量,但很可能每个大队有6件(即每个军团至少60件),大多是射箭的石弩,其余是更重的投石器“巴利斯塔”。辅助部队起初没有掷弹器或攻城器械。[143]原

因首先在于,允许它们有这样的武器违背"升级支配"原则。(举一个相似的现代例子:印度兵大哗变之后,在印英国人采取的主要戒备之一就是不让大多数印度团拥有火炮。)

虽然辅助部队的技能补充了军团的技能,因而混成的军团/辅助部队特遣兵力事实上是"均衡的"多目的野战军,但是罗马军队总的比较优势仍在高烈度战争:缓慢但不懈地在战略上纵深突入敌方领土,由道路的修筑和途中的防御工事予以确保;针对稠密的兵力集中发动大规模战役;还有——这最重要——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围困战。[144]兵力集中程度和战斗烈度越高,罗马人的战术优势就越大。[145]

这一战术/结构因素具有重大的战略含义:罗马军队显然最适于作为用以打击有固定资产要保护的敌人的战争工具,这固定资产主要是城市,但也包括可耕土地甚或灌溉系统之类。反过来,在与资产和实力资源并非固定,或无论如何并不集中的敌人作战时,罗马的能力不那么有用。对罗马人来说,开拓一条穿过森林和沼泽的道路以抵达未开化的日耳曼乡镇毫无意义,因为日耳曼人实力的真正资源是农村性的和分散的:即使他们的所有乡镇统统丧失,也不会构成严重打击。同理,罗马的能力也不适于打击东方的帕提亚人(或后来萨桑尼德人),因为虽然这些伊朗人确有重要的大城市,但他们的主要实力资源分散在遥远伊朗高原上的众多半游牧小定居地。即使罗马人征服并洗劫了包括首都泰西封在内的帕提亚各城市,像他们在图拉真治下首次做的那样,阿萨息斯家族的权力也并未 46
被击碎。

与达契亚人、萨尔马西亚人以及阿拉伯和北非的游牧族的较量也是如此:没有哪个能抗住罗马人侵纵队的不懈推进,但罗马人也无法有效地应用自己的实力去打击那些尚武民族的广为分散的乡村基地,其生活和实力并不依赖一种基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生存。因此,如果罗马人坚持自己的努力,那么他们仅有的真正替代性选择是在一种灭绝性战争中攻击人口基地本身。在缺乏军队能够控制和罗马统治下能够重组的定居生活模式的情况下,和平要求首先制造出一片荒漠。于是,在图密善

对北非纳萨莫尼人的战役结束时,他向元老院报告说战争业已打赢,纳萨莫尼人不再存在了。[146]

如果对罗马军事能力的这一分析正确,那么帝国扩张之地理限度的一个技术/军事原因便不说自明。这些限度并非单纯的空间、距离甚或人口分布使然,而是有一种质的秉性,并且——这最重要——既应用于战争,也应用于强制性外交。限定了罗马军队作为战争工具之有效性的环境因素也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外交控制工具的功用。针对有种种固定资产要保护的政治实体,罗马军事权势产生的"武装说服"有效,因为这些是罗马军事权势威胁的价值,即使只是隐含地威胁。由于罗马人能够摧毁或没收这些资产,因而他们也能够在不这么做的情况下制服其所有者,从而将其转变为附庸。

令罗马军队的训练、武器和技术无论是对战争,还是在没有战争时对外交强制都极为有效的种种条件不见于某些地方:北非的半沙漠地区、中欧的未开垦林地、今日的乌克兰平原、伊朗的干旱高地和阿拉伯的沙漠荒原。罗马权势仍能渗透这些地区,但须付出大得不成比例的代价。

五　兵力的战略部署

直到图密善禁止这做法为止,[147]事实上围绕各个大约 6 000 人的军团组织起来的罗马军队的大单位结构还进一步被一个习惯强化,那就是在多军团营寨里部署兵力,例如在莱茵边境的莫冈蒂亚库姆(美因茨)、
47 维特拉(克桑滕)和奥皮杜姆·奥比欧鲁姆(科隆)。由于辅助部队伴随军团,因而罗马军队兵力被集中在围绕帝国周边的几个点上,为内地所留极少甚或全无,同时在周边本身的分布也很不均衡。

例如,在公元 6 年,总共 28 个军团中 4 个在西班牙,5 个在莱茵河畔或其对面,2 个在雷蒂亚,5 个在伊利里库姆,3 个在默西亚,还有 9 个在整个北非、埃及和叙利亚。[148]瓦鲁斯的军团于公元 9 年遭伏击后,西班牙驻防军被减至 3 个军团,日耳曼驻防军增至 8 个,雷蒂亚驻防军取消,伊

利里库姆驻防军不变，默西亚驻防军减至2个。1个军团留驻北非，2个留驻埃及，4个留驻叙利亚。[149]这一分布被维持到公元43年入侵不列颠为止。[150]

因而，东西两方的附庸国的不平衡发展有其军事含义：在附庸国高度发展（而且公元前20年的亚美尼亚定居地在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留下了一个纵深缓冲区）的东方，罗马的安全由几个素质平平的军团保障，得到附庸的顺从的强有力补充，这些附庸明白罗马在其他地方的兵力有大得多的潜能。另一方面，在西方，帝国周边的日常安全只能由眼前可见的军团存在去保障。文明东方精致老练的居民和首领们能够随时想象到的，日耳曼人和达契亚人必须亲眼目睹才信。

由于承受了提供内外安全的负担，东方的附庸国使罗马人能将自己的打击力保持集中——当然正是这集中的实力产生了首先令附庸国保持顺从的"武装说服"。规模虽小，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的驻防军仍有这力量集中性质，它——自相矛盾地——本来会由于对巨大的小亚细亚领土保有军事控制的企图而被分散掉。不仅如此，鉴于东面的帕提亚仍是罗马地平线上的唯一强国，力量分散本来会包含严重危险。这个时期的兵力部署政策必须据此予以看待。中央后备兵力的缺乏和军团经选择的周边部署都必须在如下安全结构视野中予以观察：一种仍然依凭复杂、易碎但最为有效的附庸体系的安全结构。曾有一支战略后备，但它部署在边界。驻在据料的威胁或机会（即征服机会）区域附近，军团不像后来的情况那样被实际投入它们所在周边地段的领土防守。如果在任何地段一项威胁变为现实，兵力就通常能够从其他地段撤出；不存在日耳曼人、达契 48
亚人和帕提亚人会协同攻击帝国的真正危险。[151]

在这些政治情势下，帝国的防御战略必须对付两类威胁："常在"威胁，即在漫长的时期里烈度始终多少稳定的威胁（例如从公元9年开始到公元69年至70年危机为止的日耳曼人威胁）；"零散威胁"，它们本质上难以预料（例如本地人造反）。因此，将大量兵力保持为战略后备本会是浪费。这样的后备只有在它能被及时重新部署以增援遭攻击地段时，

才优于使用从边界抽调的临时专门兵力，但在罗马帝国难得能够做到迅速重新部署。在威胁常在并保持稳定的地方，需要的不是战略后备之可得，而是经久部署之兵力；在威胁零散和难以预料的地方，后备很难能够指望及时抵达现场，所行损害很可能无论如何很早就被施加。远为高效的是将所有兵力保持在周边，那里它们的存在无论就军事还是就外交而言都一贯有用，而不是保持为一支内地后备。

帝国的特殊地理状况——围绕地中海的一个空环——使罗马人得不到通常的防守者之利，即较短的交通内线，唯海上运输可行时除外。在就浮现中的威胁缺乏早期预警的情况下，罗马部队只能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朝业已开始进攻的敌人迈进。这意味着战略后备起不了大作用，因为敌人在帝国领土之内的侵犯延续一个月而非两个月无甚区别；不管有没有战略后备，罗马人的回应难得能足够迅速，以增援一个仍然正在成功地抵挡敌人进攻的地段。

然而，这个体系确实包含另外的风险。首先，总是存在几项重大威胁（即使未经协同）会在周边的不同部分同时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还有一种不止是偶然情况的危险：当军团从一个地段撤出以对付另一个地段上的威胁（或者集结进攻兵力）时，未被制服的行省人口和边境外的敌人倾向于趁机反叛罗马统治或袭击帝国领土。这不止是一种偶然情况，因为在罗马部队撤出一个既定地段与先前潜在威胁实际浮现之间，显
49 然有一种因果关系。而且，还有进一步的连锁反应风险，就像公元 6 年里变为现实的那样。那年，潘诺尼亚叛乱爆发，当时正值军团撤出伊利里库姆，以增强旨在对马罗博杜乌斯发动双头攻势和对波希米亚实行战略包围的兵力集结。提比略——执掌 5 个军团——在其起自卡农图姆的西北推进线上实际已渡过多瑙河，[152]值此之际叛乱在他后方爆发。[153]留在锡斯西阿（今克罗地亚的锡萨克）基地的罗马小部队被看来已控制该省大部分的叛乱者围困。默西亚行省长官 A. 凯基纳 · 塞维鲁当时正带领他的部队北上，以便为计划中对马罗博杜乌斯的进攻而加入提比略大军，结果转去着手镇压这场叛乱。可是，他自己的行省的多瑙河边境现已失去两

个军团，达契亚袭击者渡河突入默西亚。正如提比略被迫取消对波希米亚的入侵，以便回过身来在伊利里库姆作战，塞维鲁也不得不中止自己的援救努力，以便返回默西亚。到头来，用了三年时间和罗马人所能集合的全部兵力才制服伊利里库姆。[154]

就罗马人不得不面对的零碎不一、广为分散的威胁环境来看，计划中对马罗博杜乌斯的进攻招致的连锁反应只是一个例外，即使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外。早期元首政治的通常经历是在一个非常狭窄、非常节省的军事权势基础上成功地维持帝国安全。

六　结论

在共和时代，罗马人总的来说依靠进一步扩张解决了他们那愈益成长的帝国的安全问题，然而这扩张大多是霸权性而非领土性的。罗马战争和罗马胜利的通常结果，在于最小程度的领土扩增和全然更广大的、以附庸体系为手段的罗马外交控制延伸。然而，在共和国后期，罗马政治生活中的新力量形成了新政策，领土扩张的韵律显著加速，在奥古斯都治下达到了顶点。

奥古斯都在他本人的一生里，分明没有实践他那由塔西佗记述下来（并且强烈反对的）著名遗训，即反对再作征服。[155]在他指令下，征服战争遍及四面八方，导致了巨大的领土兼并，即未来诸行省默西亚、潘诺尼亚、诺利康、雷蒂亚以及阿尔卑斯科蒂和马里蒂姆。这最后几项兼并是早就 50
该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对付萨拉西人劫掠跨阿尔卑斯山脉的交通运输，然而在其他场合安全动机不那么紧迫。不过，兼并可操控和有效的附庸国并非奥古斯都的政策，除非作为最后手段：犹地亚于公元 6 年被兼并，但只是因为在希律家族内将找不到他的合适的继承人——何况犹地亚不是一个要被轻易付托给承包统治的小亚细亚附庸君主之一的行省。

多亏了该体系对武力的节省，奥古斯都军事机器不仅足以捍卫帝国，而且足以支撑扩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为征服战争做到大兵力集

结，办法是抽取平常部署在边界的兵力，尽管冒某种风险。例如公元6年，在只有28个军团的总的军团构造当中，不少于12个能被集中起来，准备从事突入波希米亚的进攻，那会将罗马权势带到易北河。[156]诚然，这个比例证明太高了，包含严重风险，但体系无疑大有弹性。

公认的观点是甚至在公元6年至9年伊利里库姆和日耳曼的大危机以前，奥古斯都的目的也限于在易北河畔建立一条"科学的"边界——"汉堡—布拉格—维也纳"边界。[157]晚近，已有另一种令人信服的论辩，那就是奥古斯都没有对自己设定这一限制，而是依然全面追求亚历山大（和罗马）的世界征服梦想。有人还指出，罗马人的地理（和人口学）知识仍然那么不发达，以致征服中国能够看似可信。[158]

无论如何，该体系很适合支撑进一步的扩张，而且它被克劳狄如此运用于征服不列颠。只要存在如下的族民和文化，即能够接受罗马军事权势辐射的"武装说服"，从而转变为本身会承受出自往昔扩张的安全负担的可靠附庸，进一步的扩张就依然是可能的。

第二章　从弗拉维王朝到塞维鲁王朝 51

“科学”边境与阻绝性防御：从韦斯巴芗到马库斯·奥雷柳斯

尼禄在公元 68 年死去时，另一个人已经宣称据有其位。可是，这加尔巴皇帝直到 10 月才抵达罗马，而且没有活过公元 69 年 1 月。卢西塔尼亚前省督 M. 萨尔维乌斯·奥托虽然在罗马是加尔巴的随从，却借禁卫军之手杀害了他，转而被拥立为皇帝。到那时，已有另一人崛起要求帝位，那就是下日耳曼军区长官和其四个军团的主宰奥卢斯·维特利乌斯。至此，帝位争夺以自杀和他杀解决；现在还要有内战。

在上下两日耳曼总共有七个军团：4 000 人加上至少同样多的辅助兵力。维特利乌斯能够指望其中的大多数，足以夺取罗马和帝国大权。奥托并非独自有权掌控此种势力；没有哪个军团依附于他个人，因为他先前的卢西塔尼亚行省全无军团。在罗马有禁卫军，至多 4 500 人，还有新近由尼禄征召的一个前海员军团（阿蒂厄特里克斯一军团），加上来自多瑙河边境大军的某些分队以及某些辅助部队。这些兵力不够；奥托还付钱给两千名角斗士，使之为他效力。

他的真正希望在于多瑙河大军的五个军团和近在达尔马提亚的两个军团。这些人愿意。如果说莱茵河畔各军团以维特利乌斯为候选人，那么多瑙河畔各军团就宁愿要奥托。维特利乌斯的帝业正在削弱日耳曼边 52
境防御，因为士兵们被调往意大利为帝国权力而战。现在，奥托的帝业也会削弱多瑙河边境防御。然而，奥托的计划慢，奥托的人也慢。在意大利北部克雷莫纳附近的贝德利阿库姆，两支集结中的大军相遇；兵员更多的

维特利乌斯获胜。到公元 69 年 4 月，罗马有了它在这年里的第三个皇帝，依据史料乃粗俗之徒，凶残嗜血，然而成功，或者看似成功。

维特利乌斯靠大胆和快速迂回打败了奥托。他反过来将败于审慎和广泛的用兵准备。当他在公元 69 年 7 月进入罗马时，驻埃及的两个军团在行政长官鼓动下，业已拥立另一位皇帝——T. 弗拉菲乌斯·韦斯巴芗。

韦斯巴芗一直在成功地打犹太战争，统率一支由三个军团组成、得到辅助部队和附庸国部队襄助的大军。他拥有埃及、叙利亚和所有东方附庸君主的支持——其金钱与其部队一样有用。不存在他的后方会被颠覆的危险，像他自己的代理人在颠覆西方那样。他的儿子提图斯留在犹地亚指挥，那里仍是作战场所和弗拉维帝业的权势基础:在犹地亚的作战军团总是能慑服叙利亚和埃及，使之保持忠诚不变。

韦斯巴芗留在埃及，让别人去操劳血腥的内战。他的代理人在莱茵河畔的巴达维辅助部队中间煽动骚乱，以便吸引和牵制维特利乌斯的军团部队;而且，出自埃及的谷物供应被切断——也许仅此就会迫使维特利乌斯投降。与此同时，两万名军人从叙利亚出发，迈上通往罗马之路。到公元 69 年 10 月，维特利乌斯手下与弗拉维大军已兵戎相见，还是在贝德利阿库姆。叙利亚部队尚未抵达意大利，韦斯巴芗则仍在埃及;然而，多瑙河大军已失其奥托，不可能期望维特利乌斯的青睐，遂投奔弗拉维帝业。是来自潘诺尼亚的部队打赢了第二次贝德利阿库姆战役。恐怖接踵而来。那些以韦斯巴芗名义战斗的部队不受他控制。战场附近的克雷莫纳惨遭洗劫，犹如它是个外国城市，而且随出自蛮荒之地潘诺尼亚的蛮荒之人向罗马挺进，其所到之处无不被留下一片混乱。公元 69 年 12 月，维特利乌斯在罗马被杀，元老院表决帝国大权归于韦斯巴芗。直到公元 70 年 10 月，他才进罗马城。

内战还将造成又一项损伤。为了使下日耳曼的维特利乌斯部队无法抽身，由其酋长西维利率领的强悍的巴达维人已被煽动造反，以弗拉维帝业之名造反。身为附庸部族的附庸酋长，西维利能够指靠八个辅助步兵

大队，其成员是他手下为罗马服役的部落民；而且，他还以日耳曼自由民增强它们的兵力。到公元69年年底，维特利乌斯身亡，罗马人不再需要外人帮助去自相拼杀。然而，西维利现在为他自己的事业依旧打下去，并 53
且将某些高卢人召唤到他一边：造反者谈论创建一个高卢帝国。

兵员减损，饥肠辘辘，士气消沉，莱茵河畔的四个军团垮于围困或颠覆。西维利赢得了对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控制。然而，该河一侧的行省高卢人未遗弃对罗马的忠诚，另一侧的日耳曼自由民则未群起入侵丧失防御的帝国。这两者的自我节制乃明智之举。九个健全的军团在健全的弗拉维指挥官统率下前来打击叛变的军团和辅助部队，将它们自己的辅助部队审慎地留在旁边。如此的武力势不可挡。西维利造反被镇压下去，但莱茵边境土崩瓦解：其部队不是撤出就是被歼，其冬季兵营遭焚毁，罗马的威望——还有罗马的威慑——严重受损。

韦斯巴芗的王朝野心昭然若揭。他有两个儿子，决意帝国须由一位弗拉维家族的人统治，否则根本不要帝国。他的长子提图斯在他于公元79年去世时及时继位，但公元81年提图斯去世。次子图密善继其帝位。史料记述对于头两个弗拉维客气和蔼，但对第三个不是如此。图密善自身权力受到威胁，以镇压相回应。但是，古代专制君主缺乏现代独裁者的科学伎俩，而且镇压在激发怨怒的同时，不可能完全可靠。公元96年，图密善被杀。

从内战于公元70年结束，到26年后图密善丧命，一直未有壮观的征服战争。在不列颠，罗马控制地区被推到了北方，然而这个海岛未被充分征服；也未建立一条跨越野蛮的苏格兰以下的窄颈地带的稳固边界。在日耳曼，一条莱茵边界被全面地重建起来，并且随罗马控制扩展到河对岸而被同样全面地遗弃。在一长串边界校正战役中，道路、营寨和要塞被建于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以逐退敌对族民并圈围河流间的肥沃的突出部。由于不被认作那种宏伟壮观的征服战争，弗拉维王朝的操纵战役未能激起寓于罗马固有的尚武精神中的热情。图密善公元83年与日耳曼卡特人打的边境战争非常有用，但遭到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们讥笑。

多瑙河中游地区的达契亚人组织有素,由一位在我们的史料中强悍可怕的人物戴凯巴路斯统治,于公元85年越境进攻默西亚。图密善随后与达契亚人的战争以不胜不荣、亦不输不耻告终。有战术性的输赢,但在公元89年,达契亚上游日耳曼人和萨尔马西亚人的入侵威胁,连同上日耳曼军区长官L. 安东尼乌斯·萨特尼努兹的篡位企图,使得图密善无
54 心再继续打一场对戴凯巴路斯的决胜战争,如果确曾计划决胜的话。

图密善于公元96年被杀导致帝位虚空,然而并无内战随后。禁卫军与军团之间的势力平衡(我们可以推导但无法证明之),或者可能是对内战的惨痛记忆,使得元老院能够自由挑选下一位皇帝。它的选择确立了一个模式。M. 科齐乌斯·内尔瓦年事已高,不从军旅,广受尊敬,出身显贵,然而首要是年老。此后,每逢难得的情势导致皇帝由元老院挑选,年迈的贵族就会被选上,似乎元老们想保证挑选特权不久就能再次得到行使。

面对有军团听其召唤的现役军队司令官,老迈的文职贵族一般毫无自卫之力,因而元老院此后的被提名者们很快丢了帝位和性命。然而,内尔瓦及其幕僚是聪明人。在兵变消息传到罗马,无法无天的禁卫军公然羞辱新皇帝后,内尔瓦决定将M. 乌尔皮乌斯·图拉真——一位著名的军人和上日耳曼军区长官——收为养子和继承人。甚至在内尔瓦于公元98年去世以前,图拉真就是帝国的新统治者。收为养子造就了家族继承和权力顺当移交的有用神话,那是头脑简单的军人和怀抱王朝意识的外省人能乐意接受的;这蓄意谋划的行动比自然继承之遗传赌博保险,而且结果会是元老院可接受的。

图拉真是个军人,并且是个优秀的军人;人们狂热地巴望征服战争,这次他们没有失望。公元101年至102年对达契亚人的有限战争导致了一项妥协性解决,但它标志了胜利:达契亚将是一个附庸国,戴凯巴路斯为附庸国王。然而,这位主要演员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公元105年至106年,战火必得重燃。因为戴凯巴路斯不驯顺,图拉真耐心耗尽。战斗激烈,随后大胜。多瑙河对面一个巨大的达契亚新行省被添入帝国。

然而，罗马征服者的天然舞台是东方。亚美尼亚定居地已再次被击破：一位阿萨息斯家族成员再次占有亚美尼亚王位而无罗马认可。安纳托利亚现在有了一条安排有序的边界，但因为只有两个军团在卡帕多基亚，而且只有三个在叙利亚本身，它就不可能是一条安全的边界。如果帕提亚部队能随意在亚美尼亚集结，它们就可能以更大的兵力按自己的选择要么打击正西，要么打击正南，而在南面的是帝国的一个关键行省叙利亚。战略必需和个人野心都要求战争。从公元 114 年到 117 年，图拉真的军队不仅征服了亚美尼亚，还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很大部分，直至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图拉真征服之广甚于奥古斯都往后的任何罗马统治 55
者。接着，灾难降临。后方叛乱和帕提亚从伊朗内地发动的一场反攻迫使罗马人迅速撤出全部被征服领土。图拉真没有活过他最终的失败。公元 117 年，他病倒并死在回罗马途中的奇利乞亚。

P. 埃利乌斯·哈德良——图拉真的据称被收养的继承人——随之采取一种巩固而非征服政策。达契亚被保留下来，但所有在东方的征服被放弃。哈德良延续了收养之链，将安东尼·庇护（138 – 161）收为养子，后者则收养了两个儿子作为双人皇帝（co – emperors），即卢修斯·韦鲁斯（161 – 169）和马库斯·奥雷柳斯（161 – 180）。后来被称为安东尼时代的那个时期是个稳定和巩固时期、安全边境和系统化防御时期；它是帝国成功的顶点，先后几位长寿的好皇帝和有利环境的结果。在经受了公元 69 年的大危机（当时帝国似乎已处于解体边缘）之后，弗拉维诸帝、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诸帝的帝国似乎成就了一种经久的安全体系，一个永恒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然而，到伟大的斯多葛学派皇帝马库斯·奥雷柳斯晚年，战争、入侵和瘟疫已破坏了安东尼和平。从那时到终结，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间或喘息期外，帝国的生存将始终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一 体系概述

在共和国和早期元首政治下,罗马战争艺术最具特征的手段是行军营寨。一天行军结束时,行进的军团部队集合在一个经事先仔细挑选的地点,那里他们被投入三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劳作,[1] 以挖掘一条外围障碍壕沟,竖起一道防御墙垒,装配一座带有预制构件的木栅栏(*pila muralia*)[2],并且搭起帐篷。虽然考古证据表明,留存下来的各处营寨遗址中有多种多样的外围,[3] 但是内部布局显然遵循一种标准格式:各帐篷所在整齐地按照各单位聚集,后者环绕一条处于营寨中心、面对总部区域的 T 字形宽阔道路,而在防御墙垒内缘与第一行帐篷之间,留有一道宽阔的间距。[4]

现代评论者往往指出,营寨的防御力够不上一天行军之后为修建它们所需的精心努力。[5] 无疑,罗马部队的战略机动性由于这累人费时的例行营寨修建劳作而减小了。[6] 可是,虽然对抵挡重大袭击而言,由可携带的
56 两头尖形木桩搭建的薄弱栅栏、三罗马尺深的浅型壕沟和仅有六尺高的防御墙垒[7] 不大管用,然而低估标准行军营寨防御的战术功用是错误的。

即使相当有限的土筑工事(以及尖头木桩)也会足以挫垮骑兵的突击势头;确实,通常没有任何骑兵会试图对此类障碍发起冲锋。不仅如此,外围与内部首行帐篷之间的 60 罗马尺间距[8] 将提供非同小可的保护,以防箭矢和投矛。还有,倘若营寨遭到攻击,宽阔的道路将保证部队能有条不紊地被集合起来,以免众人在一个遍布辎重的狭小空间内疾奔乱跑,那很容易造成必然的混乱和可能的恐慌。

尽管如此,现代评论者之强调营寨防御的战术弱点无疑是对的。以要塞方式在一个遭围困的营寨驻兵肯定不是罗马人的做法:一旦被集合起来,部队就会冲出去,在野外与敌厮杀,那里由训练有素的步兵构成的突击兵力能够得到全效使用。(只有用投射武器武装的辅助部队能够多少有用地从营寨栅栏后面战斗。)然而,是非战术功能,使得罗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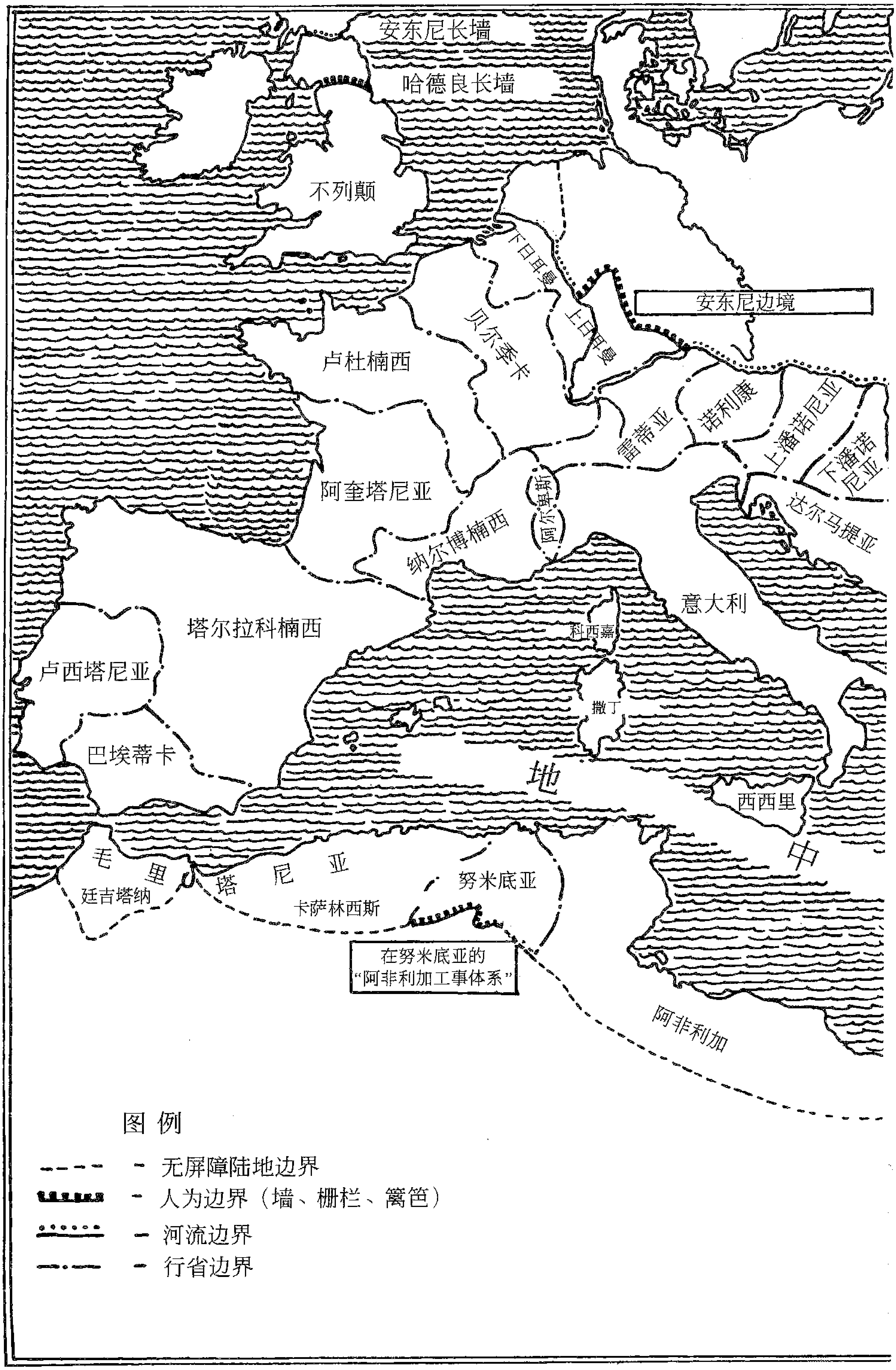
军营寨远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环形防线，并且赋予它“一种在现代战争中全无类似的重要程度”。[9] 实际上，行军营寨乃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手段。[10]

对冒险进入敌方领土和可能怪异的周围境况的部队来说，营寨防御的熟悉环境将提供合意的安全感。由于游荡的本地人和野兽被壕沟、土墙和栅栏严隔在士兵近身之外，部队就能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中洗漱沐浴、照管装备、互相交谈和游戏娱乐。这同一种安全感将使他们能够安眠，从而适于下一天的行军或战斗。于是，生活在野外条件下的部队经受的自然折磨和累积疲惫将依靠一个夜晚身心复原机会得到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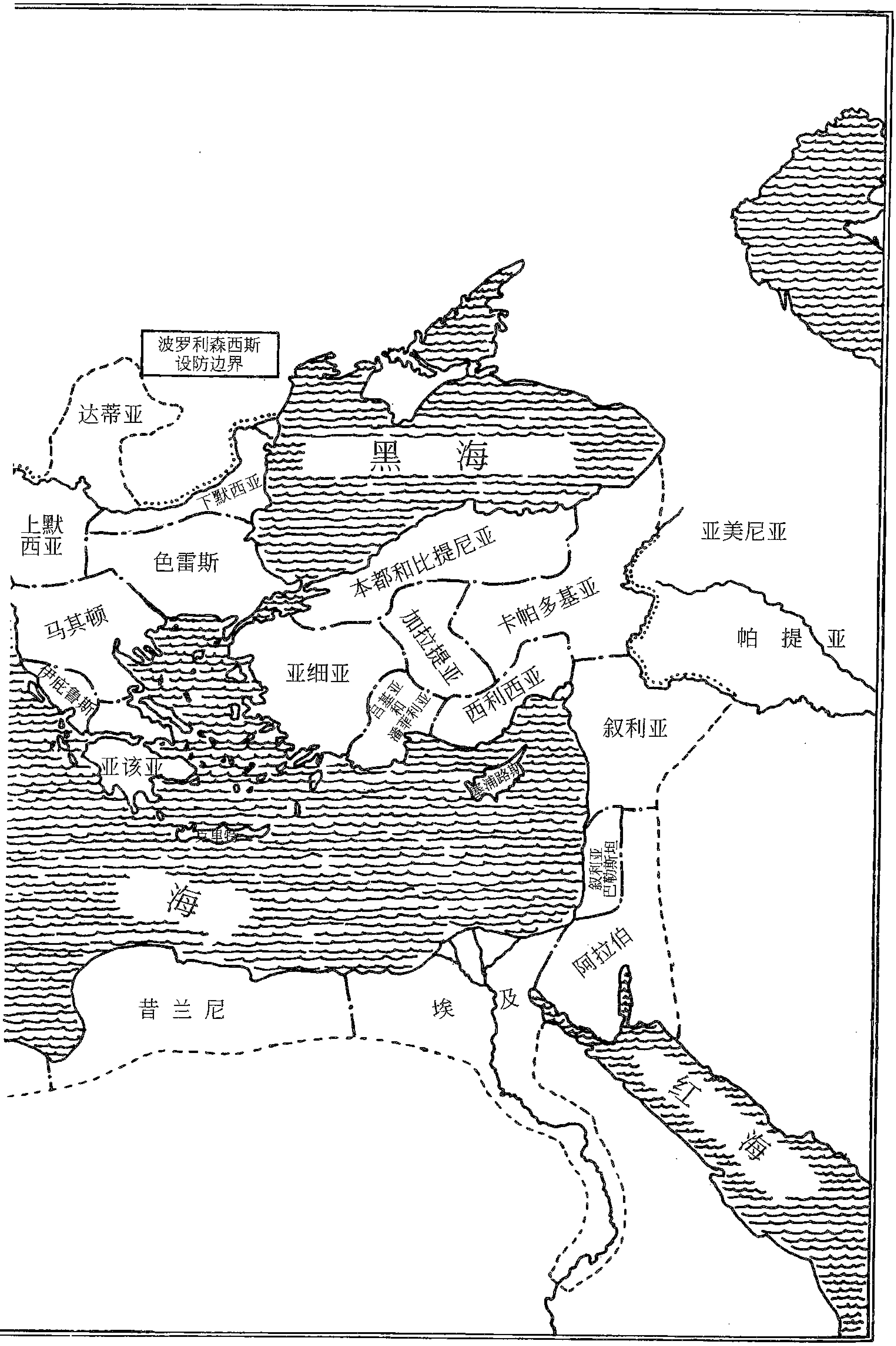
行军营寨还是个节省劳力的手段。诚然，修建营寨需要大量劳力，但营寨一经建妥可供宿夜，设防外围便将允许只用最少的人就可有合适的警戒。夜间行动的惯常目的在于不让敌人睡觉；即使没有造成什么损伤，夜复一夜喧嚷刺耳的打了就跑式的袭击也能导致遭袭部队身心状况逐步 57
恶化，部分地是通过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被派去承担警卫职责而牺牲掉睡眠。在此情况下，行军营寨就保持部队精力而言同样大有价值，因为（如果我们的史料可靠的话）在每个有 80 人的军团百人队里，为任何一个时候的夜间警戒，仅有 16 人被派执行警卫和放哨任务。[11]

有时据称行军营寨还提供一种战术保险因素，因为倘若罗马部队在野外被击败，它们就能在营寨里避难，准备他日再战。[12]然而，只有在败北部队有个完整无缺的行军营寨可以很方便地就近抵达的情况下才能够如此，而这不大可能：标准的做法是一旦营地被留下就藐视防御。然而，在一种较微妙的意义上，这看法有道理。困难之大莫过于将败北转变为有序撤退和避免溃逃。营地可以提供一个天然的集合点，一个现成的重新部署框架。

因此，罗马的行军营寨将野外露营的战术好处与部队宿舍的便利结合起来，[13]而且还有一项额外裨益，即设防外围总是能被转变为严加防守的土石工事，只要有更多时间和投入更多劳力。富有特征的罗马行军营寨体制是这么一支军队的一项关键性实力要素：它的特殊素质一向在于



地图 2.1　二世纪时的边界



波罗利森西斯
设防边界
达蒂亚
黑 海
下默西亚
上默
西亚
色雷斯
本都和比提尼亚
亚美尼亚
马其顿
加拉提亚
卡帕多基亚
帕 提 亚
伊庇鲁斯
亚细亚
吕基亚
和
潘菲利亚
西利西亚
叙利亚
亚该亚
塞浦路斯
叙利亚
巴勒斯坦
海
阿拉伯
昔 兰 尼
埃 及
红 海

压力之下的复原力。

韦斯巴芗及其后继者的安全政策在哈德良及其后继者治下达到了逻辑的顶点,它们可被视为将帝国本身转变为一种巨型行军营寨的尝试。这个类比完全适用:在这些政策下造就的帝国边防网络犹如行军营寨网络,不是意在充当总体屏障,而是充当帝国防御之机动战略中的一个固定要素。

第一个步骤在于划定帝国边界。虽然在某些场合,重大的自然屏障为朱利乌斯—克劳狄帝国提供了清晰度过得去的边界,但在许多地方,它的边界难以被起码精确地确定。直接管区和行省组织让位于各政治控制区域,后者则并入势力递减的各势力范围区域。

凡在没有大洋或大沙漠可见地界定帝国极限的地方,只有做主观的政治判断,才能确定帝国的政治控制范围最后究竟终于何处。靠着声称
60 对罗马并未真正控制的遥远族裔拥有某种含糊的宗主权,能够得到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满足,而且这些空洞的权利声称并非总是容易与那么大地扩展了帝国权势真实范围的真正附庸关系区别开来。在有关印度(或许还有西徐亚人)的场合,可以轻易撇开奥古斯都式的吹嘘,[14]但与这些虚假的宗主权声称并行,有着非常相似却全然更为有理的权利声称,例如对于朱巴的毛里塔尼亚或希律的犹地亚的。

所有这一切到哈德良的时候都改变了。帝国的限界到那时已在陆上被精确划定,以致人人都能确切地说出什么是罗马的和什么不是。确立已久的附庸国被兼并了,而且除了解释其余之目的的若干重要例外,设防外围加上河流和海洋这些自然屏障共同守护帝国的陆上边界。帝国权势的无形边界已让位于有形边防:在不列颠,按泰恩–索尔韦线,“哈德良长墙”这工事防御复合体从海到海界定了罗马的领土;在日耳曼,一道远不那么精心的、由堑壕和栅栏或篱笆构成的屏障被竖立起来,它穿越莱茵与多瑙两河互相汇合的上游水流形成的突出部基地;在北非,一个堑壕/土墙体系——“阿非利加工事体系”(*Fossatum Africae*)——的各个部分已见于750公里长的地段,沿着位于现今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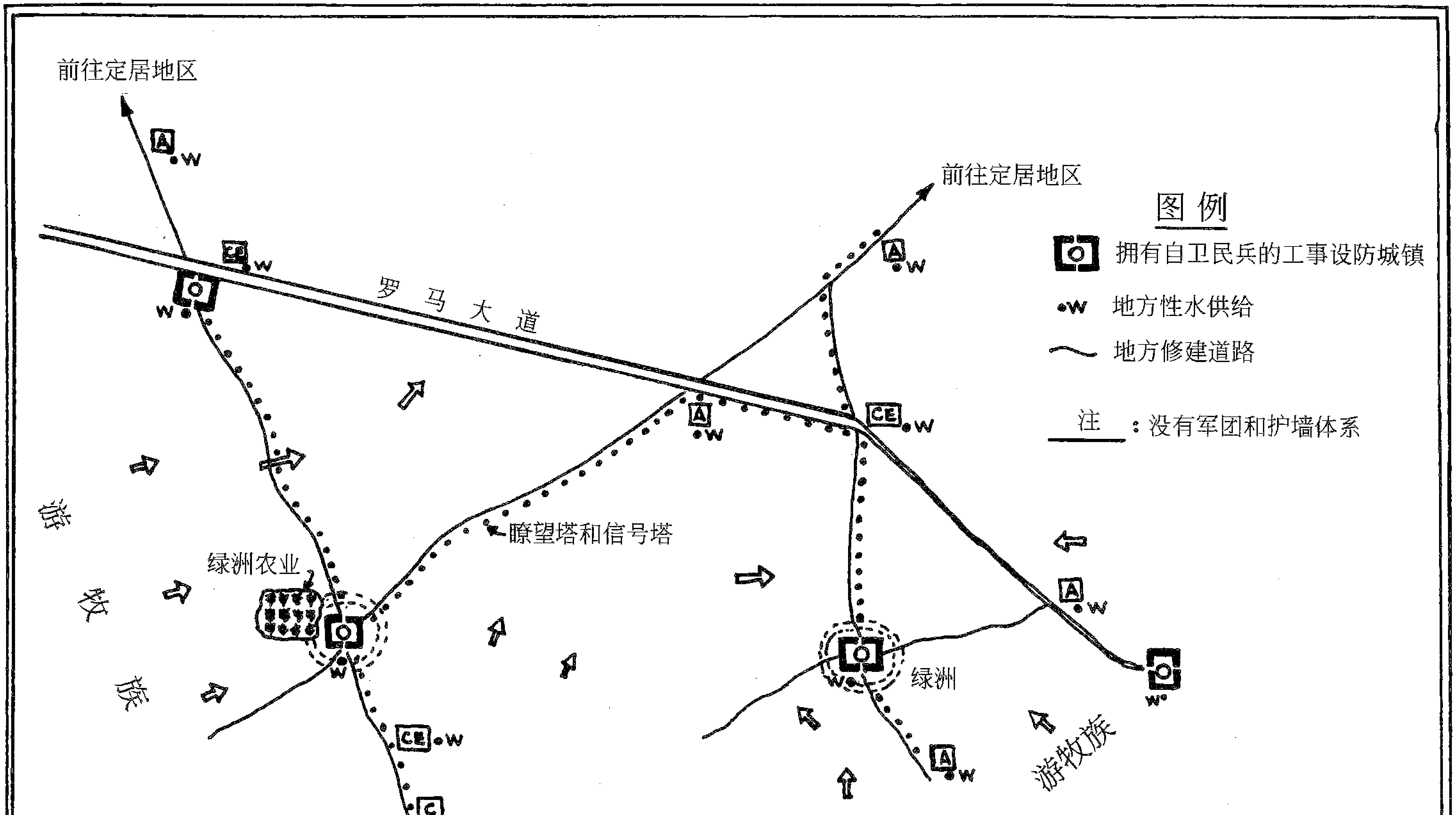
在多布罗加(位于今罗马尼亚),一道延续不断和起因不那么明确的墙构成了一个不长的外环,起自多瑙河畔的阿克西波利斯(拉索瓦),终于托米斯(科斯坦塔附近)海岸。这是一条典型的“科学”边界,可能是帝国时代第一条连续的周边线——如果它确实建于图密善治下。[15]

如此连续不断的长墙体系不见于帝国在亚细亚的漫长东界,那从黑海到红海,除了一个有趣的例外;[16]也未有表明努米底亚的“阿非利加工事体系”向东延入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或埃及(或向西延入毛里塔尼亚)的证据出现。如后所述,“设防边界”(*limes*)上依旧“敞开”的地段解释了那些被配备不间断外围屏障的地段的真正军事目的。因为,此等屏障的缺乏并不意味着没有线性周边意义上的“设防边界”:[17]“设防边界”的本质要素不是墙、栅栏或篱笆,而是道路网络,它将边境驻防军互相联结起来,也将整个边境区与内地联结起来。[18]

二　边防:战术层面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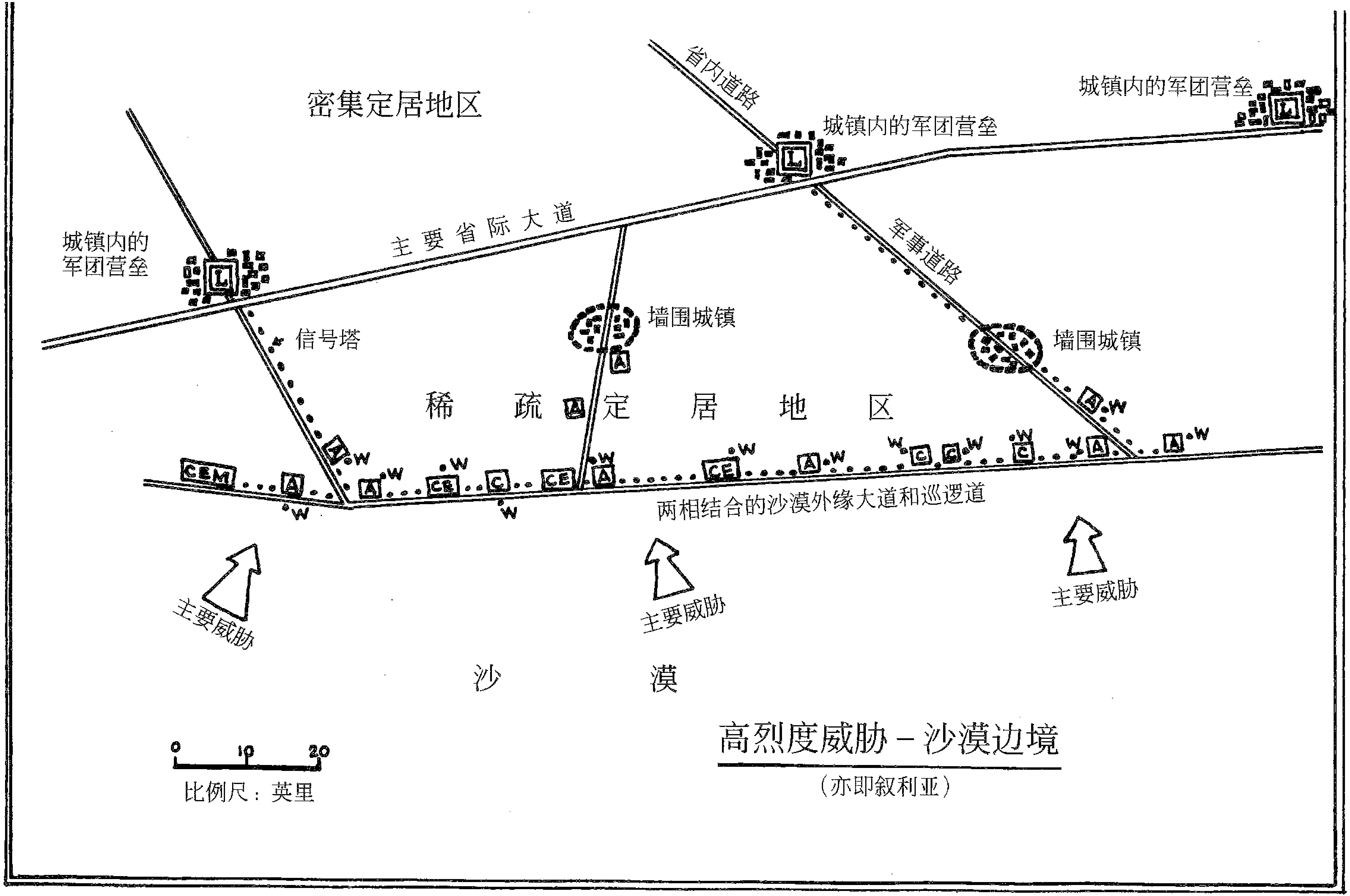
弗拉维诸帝开启的新的周边防御战略需要历时三个世纪的巨大投资:在“设防边界”的每个地段,不管是否提供延续不断的屏障,道路网络、大小壁垒以及观察塔和信号塔都被建造起来,并且根据变化中的防御计划和相应于威胁性质的变动反复予以重建。多亏了一代代学者专心致志的努力,罗马边境政策的物质要素已经以一种即使不完全但仍内在连贯的方式被揭示出来。可是,虽然由于这些努力,考古、铭文、古钱币和文献等方面的证据业已增加,并且得到了刻苦的校对整理,但帝国的这一阶段里罗马边境防御的含义和目的仍然大有争议。

罗马人在其他方面未被认为缺乏理性或胆魄,然而他们修建的固定防御却往往被说成是既无效用,[19]又败坏士气,原因在于这些固定防御的存在本身据称产生了被设想为致命的“马其诺防线”心理。[20]这些评判不仅反映现代人了解罗马防御体系在三世纪的崩解,也反映了一种似乎消除不了的、对防御战略和防御工事建造的克劳塞维茨式偏见:一种像在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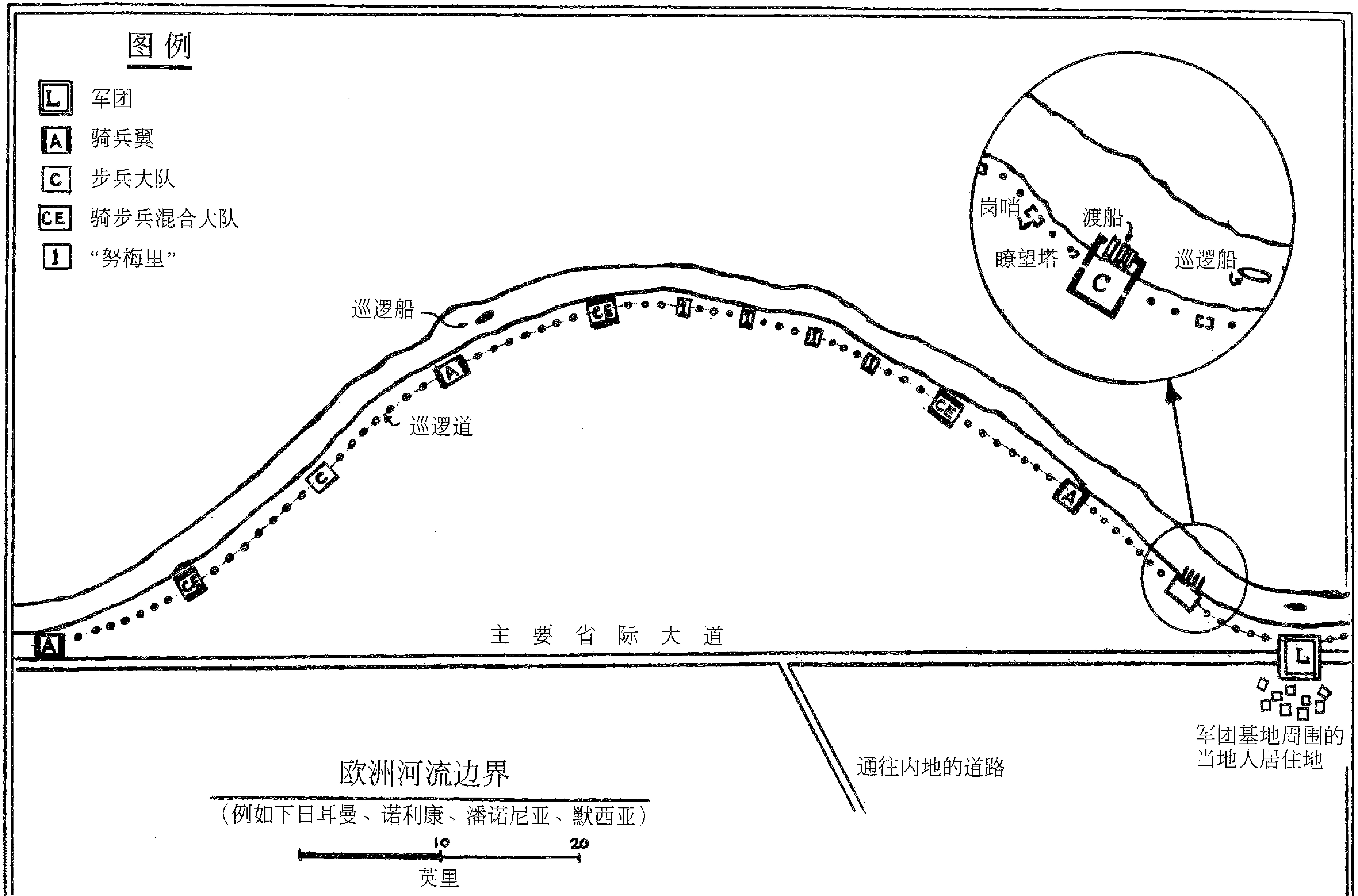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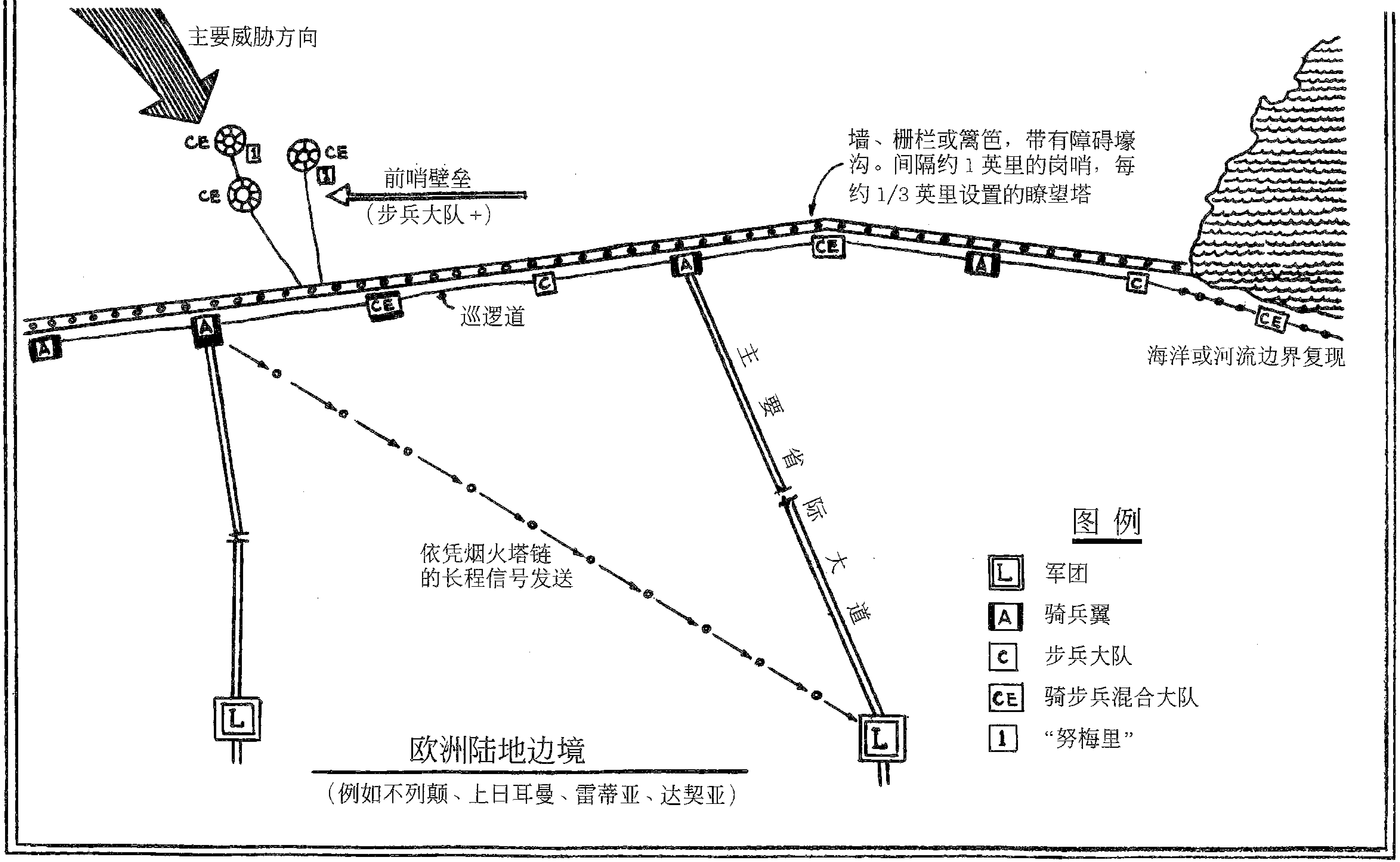
低烈度威胁

（例如内盖夫、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阿非利加、毛里塔尼亚）



图示 2.1　边境组织模型（一）


图例
L 军团
A 骑兵翼
C 步兵大队
CE 骑步兵混合大队
1 “努梅里”
巡逻船
巡逻道
岗哨
渡船
瞭望塔
巡逻船
主 要 省 际 大 道
军团基地周围的
当地人居住地
通往内地的道路
欧洲河流边界
（例如下日耳曼、诺利康、潘诺尼亚、默西亚）
10
20
英里



图示 2.2　边境组织模型（二）

论当今弹道导弹防御的当代军事分析家中间那样,广泛流行于论述哈德良与其政策的历史学家们中间的偏见。

此类分析的最常见弊端,是倾向于用绝对方式评价防御体系。如果一种防御可被突入,它就被说成“无用”;只有固若金汤的防御才被承认为有价值。这种评价是非常误导性的:它的就进攻而言的等同物,是将任何不能压倒所有情况下所有抵抗形态的进攻体系视为无用。相反,防御体系应当以相对方式得到评价:它们的资源成本应当被拿来比较它们的军事“产出”。不仅如此,防御体系的价值必须按照它们打算抗击的威胁的类型来评估。一种体系可能对抗击“低烈度威胁”(渗透、打了就跑的袭击等等)最为有效,另一种可能对抗击最大程度的入侵威胁是如此。每一种应当据此得到评价,因为防御体系通常意在仅仅针对一类特定的威胁提供有限的屏障,与此同时吸收、消减或至少过滤其他威胁,它们在烈度上大于或小于体系被设计来对付的那些威胁。

在配备线形屏障(无论是墙、栅栏和篱笆还是土石工事)的地段上,
66 罗马边防事实上被设计来抗击低烈度威胁,主要是越界渗透和边缘侵犯。这些屏障并非意在提供针对大规模进攻的总体防御。相反,不管是“敞开的”还是“关闭的”(即配备连续不断的屏障的),这两类“设防边界”都是充当机动打击力量的基线,而这力量以一种战术上的进攻性方式抗击大规模进攻,但是在防御战略的框架之内。小的、常在的威胁依靠固定防御和最小限度人力(一般守卫部队)去抗击,与此同时更严重的威胁则依靠集中的机动兵力去对付,它们被派遣前去阻截或“破坏”进攻。

在帝国的这个阶段里,针对高烈度威胁的边防运作方式是机动和进攻性的,而非静态的:战斗要发生在边界以外而非其内。换言之,沿“设防边界”修建的固定防御复合体只是充当一种支持性基础设施,支持在遭到重大攻击情况下实施进攻性作战,而且它应当被如此评价。此时,不存在使用边防基础设施去掩护在该地段服役的驻防军的问题。要证实这些论断,我们就必须将屏障要素(墙、栅栏、篱笆和土石工事)置于种种其他防御成分的环境内,它们存在于每段“设防边界”,不管是敞开的还是

关闭的。

瞭望塔和前哨壁垒。它们的功能在于提供反渗透监察和对即将来临的大规模攻击的早期预警。瞭望塔通常被直接建入屏障要素，如果有这要素的话，例如沿在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墙每间隔540英尺分布的塔楼；它们提供稠密的监察覆盖，但几乎全无早期预警作用。[21]另一方面，前哨壁垒被设于远在边界之外。此等壁垒见于哈德良长墙以北的主要道路上，其中三个（比伦、内瑟比和比尤卡斯尔）已被牢靠地断定为哈德良时所建。[22]就位于今阿尔及利亚的"阿非利加工事体系"而言，体系内各成分的建造时间不那么肯定，然而一个外在的监视和积极防御区已被以多少合理的确认度辨识出来，它深入边界线之外60公里至80公里。[23]

联络。这第二个功能要素（部分地基于同一些物质构造）是一套简单的双向信号系统，它将前哨壁垒和瞭望塔与后方辅助部队联结起来，也 67
将它们与所在地段的军团要塞联结起来，后者有时位于纵深后方。联络依靠原始烟火信号，因而需要外围壁垒或塔楼能够清楚地为后方所见，虽然不一定对双方都如此。[24]（已被注意到，在苏格兰的安东尼长墙，地面的崎岖有时使得视线无法贯通，墙的半圆延伸便显得起了信号塔基底的作用。）[25]甚至在全无周边屏障踪迹的地方，也存在联络网：图拉真圆柱上的一个场景显示，沿着并无长墙或其他屏障的多瑙河，也存有一套有规则的信号站格局。[26]在不列颠，那里两个军团要塞（约克－埃尔布拉库姆和切斯特－德瓦）分别留存于哈德良长墙背后100英里和140英里处，有一行呈垂直轴线的信号塔已得到辨识，它们将哈德良长墙的卡莱尔段与在约克的维克特里克斯六军团联结起来。[27]

部队驻地。体系的第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卫兵、巡逻单位、辅助部队和（虽然并非总有）军团，它们住在一列递升的等级驻地即警卫据点、辅助壁垒和军团要塞之中。后一用语俗常被用来说军团基地，但在帝国

的这一阶段里，还未建有围绕兵营及服务建筑复合体（它构成每个军团“要塞”）的精致的防御设施。

道路。道路是体系的根本要素：每个设防地段都有一套“水平”道和“垂直”道构成的网络为之服务，后一类道路既提供突入边界之外的轴线，也提供通往后方的联络、增援、部队周转和供应路线。凡在“设防边界”没有线性屏障护卫的地方（例如——极重要——在叙利亚边境[28]），水平的周边道路还充当对付渗透和小规模侵犯的巡逻路线。如果周边外线短于内线，例如就雷蒂亚的跨多瑙河“设防边界”而言，水平的边境道路还充当省际大道。事实上基于机动兵力的迅速集中，帝国这一阶段的边境防御关键性地依赖于道路网络的密度和质量。富有特征的是，弗拉维王朝重组东安纳托利亚边境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造东西向“垂直”大道，将前往边境区的各条道路与西安纳托利亚联结起来。[29]

罗马“设防边界”的物质要素仅是该体系的骨架；它们没有限定它的规模，这规模宁可说由下述因素规定，那就是“巡逻、交通和外交构成的整个移动的复合体，它们围绕这些结构性线条发展起来，并且……延展到远超过它们覆盖的地区。……”[30]它们的布局很清楚地表明，在帝国该阶段构成位于欧洲和努米底亚的线性屏障的墙、栅栏、篱笆或土石工事并非意在提供像中世纪城堡墙那般的战斗平台。首先，它们的形体设计本来就排除了这样的用途。例如，就哈德良长墙而言，防御墙垒走道不过宽六英尺，太窄，无法成为一个满意的战斗平台。[31]就上日耳曼和雷蒂亚的栅栏、篱笆和墙以及“阿非利加工事体系”的“幕墙”（“curtain”）要素而言，那里当然根本没有防御墙垒或胸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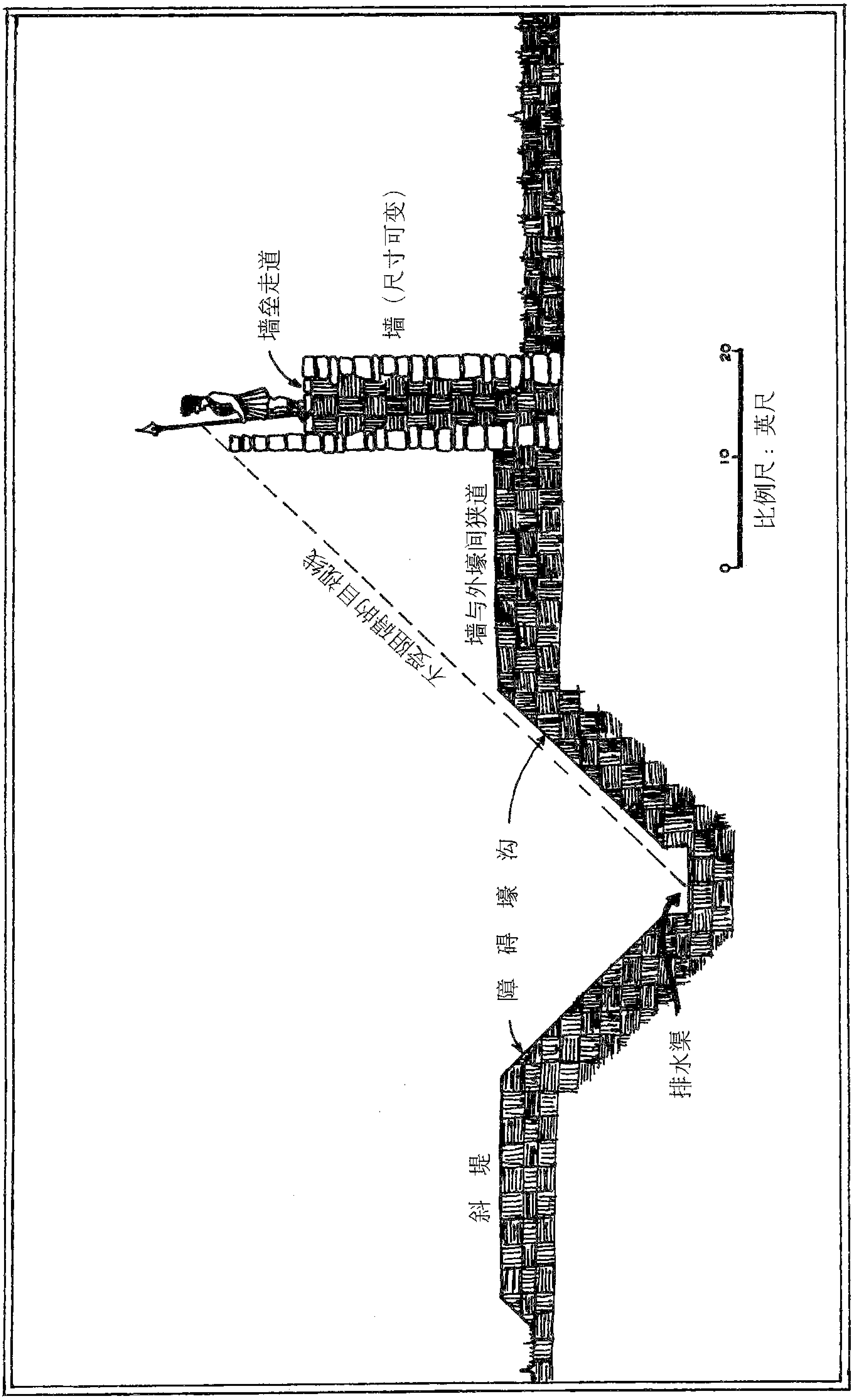
线性屏障显然不适于作为抗击大规模进攻的战斗平台，这有时导致将它们说成仅是“象征性的”。[32]如此就将它们的功能贬至单纯的边界标志。假如是那样的话，那么鉴于修建它们所需的巨大努力，其建造就会是极其非理性的。然而事实上，罗马的线性屏障——绝非古代人首次所

知[33]——至少有两项独立的战术功能。首先，它们加强了监视的可靠性，并且减少了为阻击渗透所需的人力数量。通过树立一道能被跨越，但无法很快被跨越的屏障，墙、栅栏或篱笆增加了监视效率，特别是在夜里，那时哨兵在其塔楼或瞭望塔上的目视范围会急剧减小。这些屏障还给伏击设置了一道有效的障碍，从而为小巡逻队提供了安全；这意味着巡逻队的规模可被安然地保持得很小。

线性屏障的第二项战术功能针对严重得多的威胁，例如马上袭击者的大规模侵犯，甚或直接入侵。对骑兵兵力来说，这些屏障是一种可怕的障碍。哈德良长墙前置一道 30 英尺宽、至少 9 英尺深的 V 形壕沟；越过这壕沟，并且过了一条 6 英尺至 20 英尺宽的小路[34]之后，长墙屹立，那连胸墙在内高 20 英尺。[35]上日耳曼和雷蒂亚的栅栏和篱笆一般低些（12 英尺至 13 英尺），而"阿非利加工事体系"的经重建部分显得大为参差不一：障碍壕沟的宽度 4 米至 6 米不等，深度则 2.30 米至 3.40 米不等，墙高 2 米至 2.50 米。[36]

"阿非利加工事体系"矮墙不比一名个子还算高大的人高多少，它可能显得不会给掳掠者造成多大障碍。然而，正如一位罗马沙漠边境研究 69
权威指出的那样，即使是一条相对浅浅的壕沟和一道矮墙，也能足以令马上袭击者丧气：[37]他们不能依靠突袭和突击战术任意突入定居地区，相反将被迫止步，以便破墙填沟，如此他们的坐骑才能通过。而且，一旦身处屏障之内，袭击者就无法认准一个快速出口，除非他们返回起初的入口。通过布置一个分队封闭最初的被突破口，并且派巡逻队去确定袭击者的所在之处，防御者就能围捕防线之内的袭击者，指靠屏障去阻滞其逃遁。抗击此类威胁的主要战术难题一向在于敌人的难以捉摸，[38]即使墙垒体系不能将他们挡在外面，它们也肯定能帮助将他们堵在里面。[39]

有人试图将边境体系的线性要素与同时还针对高烈度威胁的边防战术联系起来，但这些不是非常令人信服。[40]线性要素对抗击低烈度威胁最为有效；它们在与敌军的集中大兵力作战方面几乎全无用处，后者每逢可能时要远在幕墙之外予以阻截。就抗击大规模进攻而言，墙、栅栏、篱笆



图示 2.3　哈德良长墙：屏障体系

或外围道路（例如在叙利亚“设防边界”上）并非第一道防线，而是最后一道。[41]如此，它们的功能只是提供一个机动作战的跳板，连同在积极作战区后面的“后方安全”。[42]

帝国这一阶段里的罗马边境政策遭到了批评，理由是沿“设防边界”的兵力部署等于一道没有弹性的“封闭线”（“cordon”），必定会被突破。拿破仑（“东方的封闭体系更有害”）和克劳塞维茨被援引来说明这一点。[43]封闭部署的本质，在于沿阻截全线平均分布所有可得的防御兵力，以便均等地覆盖整个前线。诚然，对封闭线的攻击者拥有集中打击一种被分散了的防御的充分便利，就像一切机动纵队打击所有战术上静态的防线那样：即使进攻方在兵力上处于总的劣势，也许还处于严重劣势，它仍然能在经选择的突入点上取得压倒性的局部优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能干的战争实践家和所有进步的理论家都一向认为，在针对机动兵力的大规模战争中，被平均分布的封闭部署依其本性处于劣势。确实，在这样的战争中，只有当防御方苦于种种无法克服的劣势时，选择封闭部署才合乎理性。例如，一支仅由步兵组成的军队在遭骑兵对抗时，无论如 71
何无望成功迂回，因而唯一可行的防御可能是组成一条连续不断的阻截线。与此相似，对于在指挥和控制（或其联络手段）方面严重劣于攻击者的防御部队来说，封闭线可能是最好的兵力部署形式；再者，此类部队无论如何都会在运动战中被逼入死角，依靠采取封闭战术它们至少能够希望阻滞敌人。当不存在此等缺陷时，自愿采取封闭，连同接受由此而来的兵力分散，只能是显示了指挥失败——或这论辩如是说。

在帝国的这一阶段里，这些组织上的劣势全未影响到罗马军队。不存在总的机动水平劣势：虽然军队的核心仍为军团重装步兵，但它还拥有大量骑兵兵力。在二世纪下半叶，罗马军队包含至少 10 翼（*alae*）骑兵单位（*milliary*）和 90 个五百人团（*quingenary*），全编制总共约 55 000 名骑兵。[44]不仅如此，还有骑步兵混合单位（*cohortes equitatae*）的轻骑兵，单位人数为每个骑兵大队 240 名骑兵，每个五百人团 120 名骑兵。（关于就二世纪下半叶估计的、总共 40 个至 50 个骑兵大队和 270 个五百人团之中

有多少个骑步兵混合单位,现无精确资料,但比例可能相当大。)[45]总合起来估计,在二世纪罗马军队有各类辅助骑兵部队共 80 000 人。[46]

显然不乏总的机动性。据计算在二世纪,哈德良长墙的前线总部(在斯坦威克斯的骑兵要塞)可部署约 5 500 名"侧翼"骑兵和或许 3 000 名骑步兵混合单位的轻骑兵[47]——对一个 73½英里宽的地段来说确是一支很大的兵力。另一方面在下日耳曼,公元 104 年至 120 年这一时期该地区被辨识出来的部队包括总共 3 700 名骑兵。[48]

当然,重要的不是边境部队的绝对机动性,而是所有部队的相对机动性。在某些地段,罗马人确实主要面对马上袭击者(或就东方地段而言是骑兵部队)的威胁,然而在别处,组织松散的农人部落社会几乎全无可能支撑大量骑马人。在巴尔干,萨尔马西亚人主要骑在马上战斗,作为用一种重长矛"孔图斯"(*contus*)(即一种突击武器)武装起来的重装骑兵;[49]然而,直到进入四世纪后很久为止,所有日耳曼部落都主要徒步战斗。[50]罗马人总是面对一个能够将骑兵大军投入野战的敌人的唯一地段,
72 当然是帕提亚边境。

仅根据辅助骑兵去评价罗马武力的机动性会误入歧途;然而,拿负担其著名的重装军囊的军团部队去比轻装武备的蛮族人也同样如此。[51]无论如何,日常安全功能由辅助部队负责履行,它们不装备重盾,也不配备重军囊。不仅如此,罗马指挥官完全能够行使"负载纪律",那在当时像在现今一样,对于阻止士兵收集和保持物品的普遍倾向,以维持野战部队的机动性必不可少。(苏埃托尼乌斯叙述提比略亲自监察出发横渡莱茵河的部队的军囊,提供了一幅行动中的伟大将领的生动图画。)[52]

也不存在指挥、控制和联络方面的任何固有的劣势。罗马军队内部规矩分明的权力划分必定产生了一种比组织松散的武士伙帮远为灵活的指挥和控制体系。在涉及联络的范围内,罗马人的信号方法远非其敌人能够汇集的、无论何种经临时凑合的可用奔跑者所能攀比。

既然不存在唯一能证明采用封闭战术合理的固有劣势,那么为什么罗马人像某些权威学者断言的那样采纳这些战术?实际上,他们没有采

纳。罗马部队并非以"边境卫士"方式沿一条阻截线被平均分布；相反，它们保持了机动打击力量性质。有时被纵深部署在地段防御后面，有时被沿防线本身部署，罗马部队仍然集中在递升的等级驻地即警卫据点、辅助壁垒和军团"要塞"之内。例如，沿哈德良长墙，起初的兵力结构有如下述：

（1）在埃尔布拉库姆（约克）的维克特里克斯六军团和在德瓦（切斯特）的瓦勒里亚·维克特里克斯二十军团。[53]这些兵力远非作为静态的封闭线沿前线部署，而是集中在纵深后方（离长墙100英里至140英里）。顺便应当注意，在切斯特的军团以经典的节省兵力方式部署在铰合部：它同样可被用于支持分布在遍及威尔士的壁垒中的辅助部队（与在不列颠的第三个军团——在伊斯卡西卢兰［卡利恩］的奥古斯塔二军团），或者与维克特里克斯六军团一起支撑北方地段。[54]

（2）被部署在3个（哈德良式）前哨壁垒和16个墙垒中的辅助的"侧翼"骑兵和步兵大队，总共约5 500名骑兵和10 000名步兵。[55]这些兵力虽然驻在防线本身（不同于军团），却是作为集中的打击力量被部署，而非沿防线平均分布。（据信，所有这些辅助兵力都在驻长墙的总部单 73
位——驻在斯坦威克斯的辅助骑兵部队 *Ala Petriana* [56]——指挥之下，该部队本身的兵力就非同小可。）

（3）卫兵和监视哨，总共不足3 000人。[57]此为唯一确被单薄分布，因而在作战意义上静态的兵力因素。这些部队驻在"隔里堡"（"milecastles"）（每隔一罗马里筑入长墙的小壁垒），为在每对"隔里堡"之间两两分布的塔楼提供监视哨。（由于塔楼内部空间仅14平方英尺，因而它们必定由抽自临近"隔里堡"的卫兵轮流驻守。）[58]

以上分类叙述透露出部署的真正性质。在部署于该地段的总共差不多30 000兵员中，最多不过10%被投入静态防御，[59]而这绝不是个大比例。事实上，它可与一支机动野战军会为后方安全任务分派的人力比例相比。

在帝国周边的其他部分，有类似的兵力格局。例如，在雷蒂亚的跨多

瑙河"设防边界"上，二世纪后期的兵力结构由一递升兵力集中等级中的五个要素构成：在栅栏或篱笆处或者在其附近散布的小塔楼，每个驻扎一小帮人(小瞭望塔)(*Wachposten* 或 *Blockhäuser*)；同样在防线上、不那么稠密地分布的较大警卫据点(大瞭望塔)(*Feldwache*)；然后，更大和间隔更远的"小要塞"(*ZwischenKastelle*)；再后，部署整个骑兵翼和步兵大队的标准的辅助"城堡"(*castella*)，它们大多也位于防线上，但有时在"幕墙"后面颇远；[60]最后，例如就公元179年至180年而言，该地段得到部署在卡斯特拉里吉纳(雷根斯堡)的意大利卡三军团支持，那构成唯一的大规模打击力量。

上述兵力结构并非最初(即弗拉维王朝)在不列颠、日耳曼和雷蒂亚的边防计划的兵力结构。在该计划中，辅助部队经常被置于周边线后面远处，而周边线本身仅以瞭望塔和前哨垒标志，因为尚未有线性屏障。在这两方面，后弗拉维趋势都是将壁垒前移至周边线本身，通常遗弃该线后面的旧壁垒。这变化曾被专门与哈德良的边境政策联系起来，而且就此谈论甚多：防御据称被搞得"无弹性"了，因为丧失了辅助部队壁垒链组成的第二"防线"。然而，晚近的考古证据提示，这变化只是程度上的。[61]
74 无论如何，战术上的批评不成立，因为当时的罗马战术不包括以一种纵深防御方式允许突入防线，在那里敌人将陷入一个外线与内线之间的、周边以内的战斗区域而束手被歼。相反，该计划要求一种前沿防御：目的是在周边线以外阻截敌人。因此，"哈德良式"改组仅仅意味着辅助阻截部队已经驻扎在出击位置，而不是必须从几小时行程之外的壁垒行军前往这些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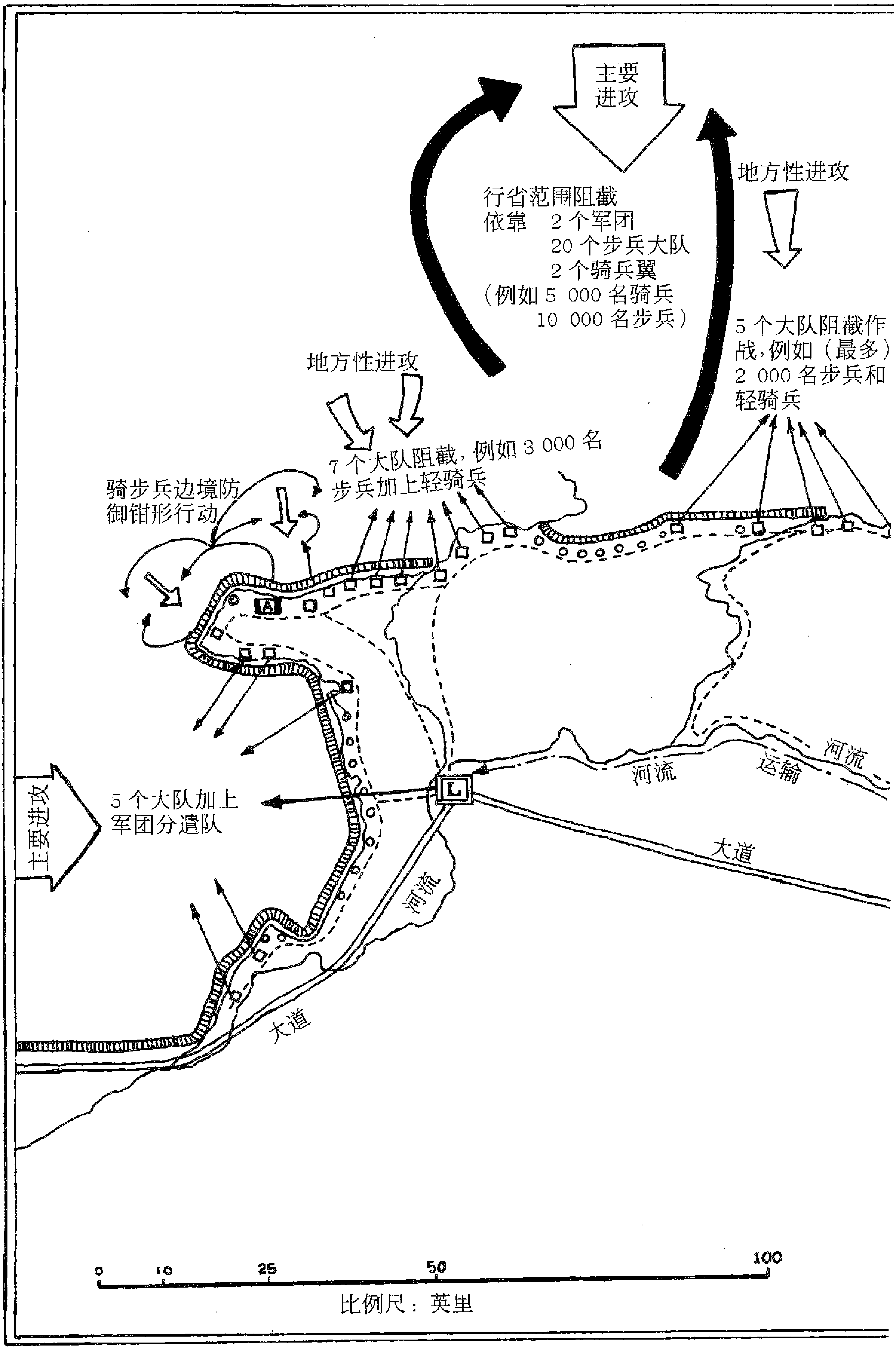
现在有可能重现边防作战方式的梗概了。部署在每个地段上的部队不是在进攻方积极有力的机动纵队面前扮演一种消极被动的"防线"角色(因而此等纵队能在选中的突破点上取得压倒性的兵力数量优势)，而是显然意在冲出其壁垒，阻截各大帮攻击者，亦即中等烈度威胁。对付低于或高于这水平的威胁，战术有所不同："小要塞"("隔里堡"或其等同者)里的卫兵将足以对付小规模侵犯或孤立的渗透企图；出现大规模入

侵时，辅助部队将出击遏制这威胁，与此同时军团部队行军前去支持其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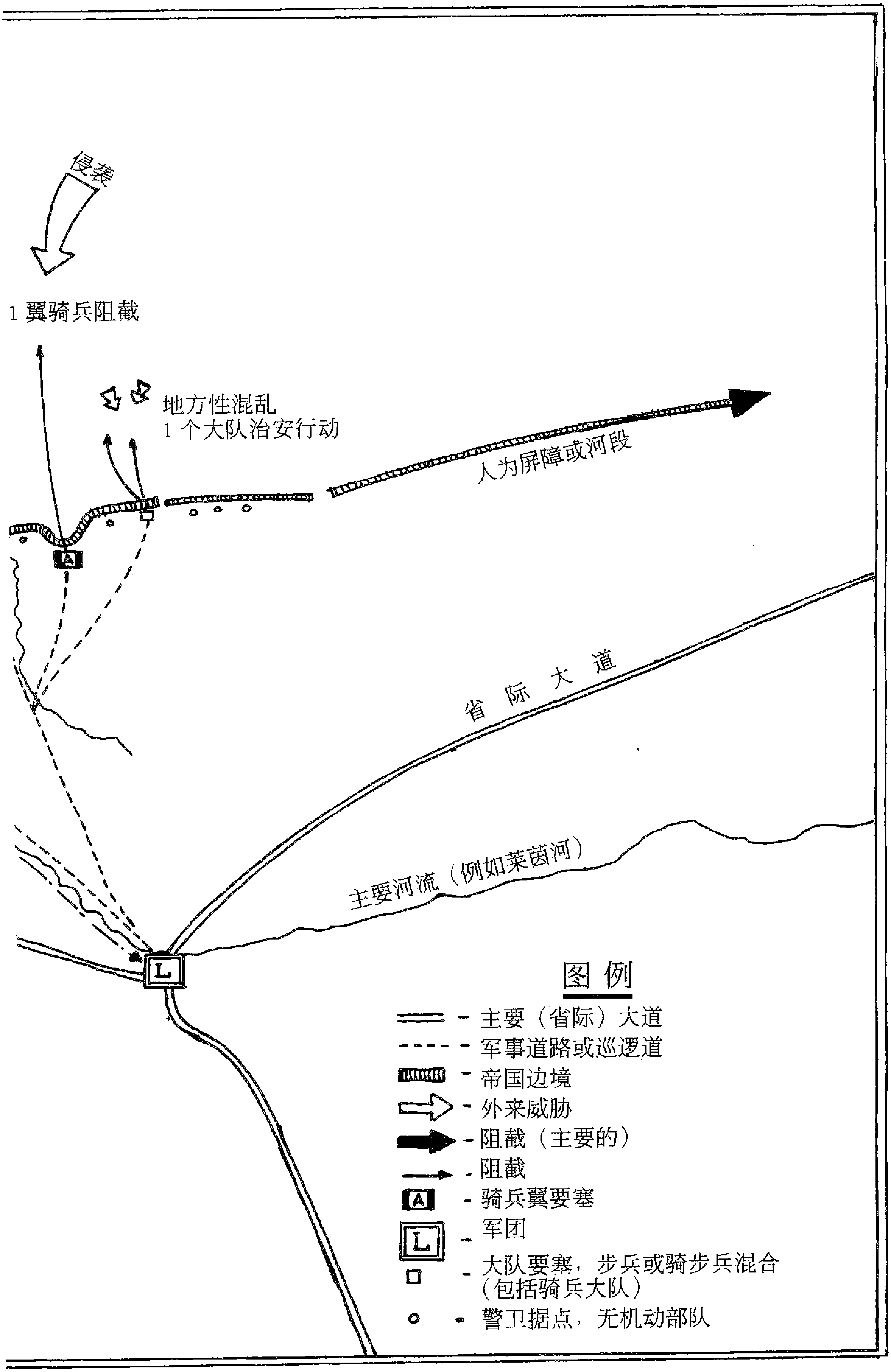
通常不供大规模机动部署的唯一部队，是那被分派在防线上执行警卫任务的一小部分兵力。这些部队提供了一种“后方安全”功能，那是野外机动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的。因而，不能说有一条“无弹性的边境封闭线”[62]——无论如何不能在战术或作战（即行省）层次上这么说。因为，封闭防御的本质在于部署线上的兵力被稀释，从而不得不靠低程度兵力集中，但在这一时期，罗马边境兵力却仍然本质上是机动的，能像任何野战军一样迅速集结。罗马人仍以军团重装步兵为其武力核心，必定系统地力求提升双方的战场兵力集中程度：在所有其他状况相同时，集中有利于罗马人，因为他们的部队在较高的战斗烈度层次上作战效率极高。[63]

后弗拉维边防体系与朱利乌斯—克劳狄时代边防体系的大区别，在于提供抗击低烈度威胁的日常安全。罗马部队充分保持了打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因为它们的机动和集中能力仍高（尽管军团不再被部署在多军团营寨之内），[64]然而它们现在有了另一类军事能力：它们能够提供一种针对低烈度威胁的“阻绝性”防御。两种兵力结构都能保证在战场上的终极优势——帝国生存的根本条件。可是，只有第二种兵力结构也能保证高程度的平民安全，即使是在边境地区。 75

安全的这两个维度无论今昔在功能上都大不相同，并且包含彼此相反的要求。孤立的渗透者和小帮袭击者不可能由越野行军或乡间驰骋的大规模打击兵力可靠地予以阻截。另一方面，一条给边境全程提供阻绝性防御的兵力分布稀疏的阻截线不可能制止大规模进攻。战场优势需要兵力集中，阻绝性安全需要线性分散：这彼此冲突的要求无法得到解决，除非有个第三要素被引入其中。那就是“设防边界”基础设施起的作用，以其系统地建于边境的道路、瞭望塔、前垒、长墙、栅栏和篱笆起的作用。通过充当高效的节省人力装置，这些基础设施解决了集中与分散之间的矛盾。它们使得军队能以其总兵力中的一小部分提供针对低烈度威胁的


主要进攻
行省范围阻截
依靠 2 个军团
20 个步兵大队
2 个骑兵翼
（例如 5 000 名骑兵
10 000 名步兵）
地方性进攻
5 个大队阻截作战，例如（最多）2 000 名步兵和轻骑兵
地方性进攻
7 个大队阻截，例如 3 000 名步兵加上轻骑兵
骑步兵边境防御钳形行动
A
L
5 个大队加上军团分遣队
主要进攻
河流
运输
河流
大道
河流
大道
0
10
25
50
100
比例尺：英里

图示 2.4　前沿防御战术



侵袭
1 翼骑兵阻截
地方性混乱
1 个大队治安行动
人为屏障或河段
省 际 大 道
主要河流（例如莱茵河）
图 例
主要（省际）大道
军事道路或巡逻道
帝国边境
外来威胁
阻截（主要的）
阻截
A
骑兵翼要塞
L
军团
大队要塞，步兵或骑步兵混合
（包括骑兵大队）
警卫据点，无机动部队

阻绝性安全,与此同时保持军队以其大部分兵力打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对于战略性生存,战场优势无论今昔皆必不可少;任何在敌对环境中生存的权势实体所以生存下去,靠的是击败它不时面对的最高烈度威胁。然而,战略优势并不自动包含阻绝性安全。一国可以保持对自身领土的控制,即使它没有逐退每一项小规模渗透。在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治下,不存在线性防御基础设施,因而不将罗马军队碎片化为数目非常大的一支支小卫队,就无法取得被暴露的边境地区的高程度日常安全。实际上,军团和辅助部队被部署为一个个密集的大群体,往往驻在多军团营寨内。在相隔遥远的军团基地之间,经常全无积极防御。相反,是边境外的附庸国家和附庸部族要去提供边境内的安全,靠它们本身在其源头压制越界渗透。鉴于这些靠军团使之保持敬畏的国家和部落内部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控制水平,充分有效的阻绝性防御全无可能。极少附庸能被期望控制其人口中间每个潜在的渗透者和武士兼袭击者。

尽管其未设防卫的边境常年不安全,但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高度有效——即就当时帝国的目的而言有效。然而到二世纪时,目的已经改
78 变。终极的战略性安全依然必不可少,但现在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要求和一项新目的,那就是为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常在不息的安全,并且使行省人完全与蛮族隔开。特别是,线性屏障的目的在于将外部蛮族与内部蛮族分开,后者正处在变为罗马人的过程中。[65]经济发展、城市化和政治整合——最终目的——全都要求有常在的日常安全,要求行省人与其附近的、生活在自由和野蛮之中的族亲隔绝。

那么,如何解释东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昔兰尼卡、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毛里塔尼亚的"敞开的"设防边界——那里既无墙亦无栅栏?为什么国民生活阻绝性安全目的在努米底亚和西方得到如此坚持不懈的追求,但在帝国的其余部分却似乎根本没有?为予以回答,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在欧洲,莱茵和多瑙两大河流边境没有得到线性屏障保护。瞭望塔和信号站系由河上巡逻舰队("日耳曼尼卡"、"潘诺尼卡"和"米西卡"三支)补充。[66]一个类似的、应因环境而调整的情况见于亚细亚和阿

非利加的沙漠边境。那里也不需要连续不断的屏障来对付低烈度威胁。当然，存在许多只要有机会就将袭击边境区的游牧部落（一直到 20 世纪里，劫掠性的袭击都是一大沙漠家庭营业）。然而，这不是说需要线性防御，因为没有要予以保护的广阔耕种区。在叙利亚、阿拉伯、巴勒斯坦和撒哈拉边境，只有一些孤立的乡镇和小块的绿洲农业，个别保护这些地点远比一概保护整个地区有效。例如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尼特扎纳、哈卢察、雷霍沃特和希夫塔之类乡镇都是沙漠之海中的设防孤岛，而沙漠之海不需要任何保护，因为它不拥有任何对罗马人来说可贵的东西和对游牧民来说的目标。[67]房屋互相邻近地建造在这些定居地周边，以此构成一条全环周线，马上袭击者不会冒险突入豁隙；因此，这些乡镇不需要长墙。旨在就即将到来的攻击发出预警的塔楼，召唤机动部队的联络，加上道路网络，足以保证沙漠乡镇安全。仅其存在本身，就证明这些乡镇是安全的，因为除非具备了可靠的防御，没有任何定居生活能在沙漠游牧民的袭击范围之内存在下去。

水源零散决定了从毛里塔尼亚到叙利亚整个沙漠地带的农业零散；
于是，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依靠被纵深列为梯队的“点状”防御体系得到 79
保护。在叙利亚“设防边界”上，这进一步意味着该体系可有效抗击高烈度的帕提亚威胁，那需要良好的道路和大量兵力，但不需要线性屏障。[68]

以色列的现代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相像的事例：在 1967 年后的时期里，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 - 西奈地段面对高烈度入侵威胁，但在与哈希姆王国邻接的约旦河边界只面对低烈度的渗透威胁。因此，两个大不相同的防御体系得到运用。以色列人将一支大规模的机动兵力驻在西奈腹地，而在运河本身只布置了一条由相隔甚远的小观察站组成的警戒线（所谓巴列夫线）；全无在这个地段上排除渗透的企图，因为在运河边境以内没有平民生活，只有无人居住的沙漠。然而在约旦边境上，针对巴勒斯坦游击队造成的小得多的威胁，以色列人被迫建造了一条不间断的屏障，由围栏、监察装置和地雷带构成，以阻止渗透者突入西岸定居区，那处在从约旦河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

既然努米底亚的南缘也面对沙漠,那么为什么要修建“阿非利加工事体系”线性屏障?罗马所有屏障中最长的这条,是见于其他沙漠边境的“点状”防御模式的一个巨大例外。在此,军事因素同样由水文因素限定:该“工事体系”与**线性的**水利规划并存,后者使得绿洲农业能够不是在零散的水源点,而是横跨那倘非如此将是沙漠的漫长地带发展起来。[69]努米底亚的线性防御与其广泛的水利基础设施都基于同一个边境定居和防御规划:那时像现在一样,在沙漠生存的两项不可或缺的需要是水和安全。由于定居地的确立与其防御的确立同时,这整个体系必定有一目的超出在边境地区本身创建一个封闭的灌溉和防御圈。这一目的要合乎理性的话,就必须外在于“工事体系”的上述**两个**方面:它肯定是给边境区**后面的**领土提供高程度安全,那处于边境与地中海之间,是个非如此就会易受季节性游牧袭击伤害的地区。

平民的生命和财产若无可靠的安全,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去产生剩余并从而支撑城镇。若无工事体系遏制游牧袭击的长期威胁,努米底亚就将保持不发达状态;既不会有广泛的城市化,也不会有它的政治伴随即
80 罗马化。在此甚于其他地方,**连续不断的**边境屏障的目的一目了然:它们不是被设计来庇护一支被马其诺防线心理萦绕的军队,而是为了使平民生活能够以种种被谋划来便利帝国长期生存的方式发展,办法是创建一种易接受罗马理想和易服从帝国权威的社会环境。

三　边防:战略层面

虽然边境安全战术是进攻性的,但无疑在全帝国的、战略的层面上,兵力部署模式是一种单薄的线性外围模式,而且罗马的军事力量**确**被碎片化为各支区域军队。到哈德良时期,这些军队已经在取得各自分立的身分(其名直接缘于日耳曼、雷蒂亚、诺利康、达尔马提亚、默西亚、达契亚、不列颠、毛里塔尼亚、卡帕多基亚和叙利亚等区域名[70])。它们当中每支都围绕其核心,即经久驻在每个区域的军团组织起来,在适当场合被配

备舰队,以便给地面部队提供水运支持(差不多全无海战),[71]其部署是相应于经中央评估的区域性威胁。鉴于事后来看二世纪下半叶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变为现实,并将在两代人之后危及帝国生存本身的集中威胁,批评者们谴责这部署,理由是它缺乏弹性,内在脆弱。然而在哈德良时期,不存在全局性的威胁,从而没有缘由牺牲阻绝性边防这一长期政治优先,以此换取一种针对子虚乌有的区域或全局威胁的较具"弹性"的兵力部署。

军队区域部署的唯一替代性选择是中央化部署,即大部队集中驻扎在交通内线的关键枢纽点上,而非部署在边境外缘。当然,没有可能采取一种全然中央化的部署战略,在边境仅用单薄的边界卫队部署,将所有其他兵力保持为单一和不被分割的战略后备。此种部署只有在运输手段快速的情况下才能是有效的。

即使当今,某些在原地的阻绝性部署仍被认为是必需的,以便对付那些如果冒头就倾向于突发的威胁。例如,即使拥有每小时600英里速度的空载机动性,美国国防部仍然认为德国和南朝鲜太远,以致不允许采取 81
一种高效办法,即配置中央驻扎但"标明专用"的部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部队必须被驻扎在战区本身,由此必有兵力的不节省,不管这些部署还履行明显的政治功能。

只有在防区小(相对于运输速度而言)的情况下,部队部署问题才不会出现,原因在于为赶超针对周边任一地段的敌军集中所需要的地段间重新部署不会造成任何困难。确实,在周边以内的重新部署其时可能实际上先于威胁的出现。例如,据守一个遭到围困的小要塞的部队通常能够依靠较短的内线运动而在各道防御土墙之间来回重新部署,甚至在进攻方能够通过围绕较长的外线完成它的兵力集中以前。然而,罗马帝国不是一个遭到围困的小要塞。它根本就不能被设想为一个要塞,不管有多大,因为任何要塞总是拥有较短的内线优势。(周边越近似一个圆环,这优势就越大;周边越近似一个内外两侧区间"长轴"距离简直相等的窄边矩形,这优势就越小。)事实上,帝国的地理形状极为不利:其中心是中



地图 2.2　罗马帝国内的战略机动性


潘蒂卡派
卡尔西登至潘蒂卡派
至少 10 天
阿奎莱亚至迪拉丘姆
陆上 10 天
迪拉丘姆
2 天
卡尔西登
罗马至安条克
陆上 124 天（加海上 2 天）
安条克
塞琉西亚
普特欧利至
亚历山大里亚
至少 9 天
一般 41 天
罗得斯
罗得斯至
亚历山大里亚
至少 4 天
普特欧利至安条克
至少 15 天
一般 55 天
阿波罗尼亚
亚历山大里亚

空的椭圆地中海,而地中海既可以是个通道,也可以在同等程度上是个障碍。

当然,海上运输能比陆上运输快得多,但它受制于种种天气变化。从11月到3月,航行实际上被中止;即使是罗马人可用的最大船只——亚历山大港谷物运输船,也等到4月才开始其首次季节航行。[72]史载奥斯蒂亚与北非最近点(邦角)之间航行用两天,西西里(墨西拿)与亚历山大港之间航行用六天,奥斯蒂亚与直布罗陀之间航行用七天;然而这些速度(分别为平均每小时6海里、5.8海里和5.6海里)皆为例外——无疑这是它们被记载下来的原因。[73]经计算,船队在顺风时正常速度为每小时2海里到3海里,逆风时慢至每小时1到1.5海里。[74]与部队陆上行军速度相比,即使这些速度也是快的:携带通常的军囊走在平地(和被铺成的道路)上,罗马部队长程行军每日约15罗马里(即13.8法定英里),[75]然而舰船可以载着它们平均24小时行27英里。不仅如此,海上距离通常短
84 于陆上距离,有时短得多。

例如,普特欧利(那不勒斯附近)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航行将在海上费时不足42天,即使是以每小时1海里的最慢速度。然而在陆上,这旅行凭不间断的行军将费时约180天,外加在海上两天;经由亚得里亚海顶端阿奎莱亚(的里雅斯特附近)的完全陆上路线将至少需要210天。然而这是一个极端的比较,用直线的海上航行去比绕过半个地中海的陆上跋涉。例如,在罗马至安条克路线上,陆上1 860英里加两天海程(布林迪西与埃格纳蒂阿陆道开端之间),海上航行以每小时1海里的速度费时约55天,外加两天陆路跋涉(塞琉西亚至安条克),而陆上行军将费时约124天,加上在海上两天,比例为1∶2.2,大有别于罗马至亚历山大港路线的陆海旅行之比1∶4.3。

这比例若有任何进一步缩小,海上航行就往往成为不那么可取的替代。古代水手无法与恶劣天气较量,即使在航行季节舰船也可能被无法预料地延宕,为扬帆启程不得不等上几周。不仅如此,长时间海上航行容易损害部队健康。[76]然而即使这样,部队常被海上运送,还有专门的运输

可供运送马匹。[77]

不像以美索不达米亚或伊朗高原为中心的古代帝国，罗马帝国没有真正的内线。从罗马到科隆大约需行军67天，到关键的帕提亚地段的门户安条克还更远，因而从边境上出现新威胁，到一个充分中央集权的体系做出回应，时间间隔会长得无法接受。假如罗马人以现代方式，将其兵力部署成单独一个中央战略后备，那么他们的敌人本将能任意入侵和蹂躏各行省，然后在增援兵力抵达现场以前撤退。因此，批评与哈德良相连的部署政策——虽然它涵盖整个弗拉维－安东尼时代——几乎毫无道理。地段间的遥远路途，连同对罗马战略机动性的严重限制，导致选择区域部署政策必不可免。因为如前所述，部队是实际位于边境还是梯次配置于纵深皆无关紧要，留下的唯一问题是被选择的兵力分布是否侥幸，以致能对付不可预料地出现了的威胁。

二世纪里的这一部署战略多少相应于目前分析下的帝国第二阶段，其梗概可以在军团的分布中被察觉出来。[78]然而，这些梗概必须审慎地予以推导，因为不能假定在军团部署与辅助部队部署之间有任何严格的彼 85
此关联——后者至少在数量上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如表2.1所示，二世纪里军团部署变动甚微，尽管有图拉真战争这大动乱，还有甚至更大的动乱，即两代人后马库斯·奥雷柳斯的几场战争。奥古斯都时期的最初数目，即瓦鲁斯之灾后的28个军团，到这时代结束时只增至30个，而且区域部署的变动更多地反映了体系的弹性，甚于反映二世纪的剧烈动荡。

在不列颠，没有任何变化，虽然边境在这一时代里从哈德良长墙前移至安东尼长墙，后者到该世纪末将再被放弃。“北方前线”始终保持四个 86
军团不变，直到马科曼尼人战争之后为止，其时在公元165年征集的意大利卡二军团和意大利卡三军团被分别调至诺利康和雷蒂亚。[79]在“中央前线”，紧随图拉真征服达契亚而来的地段防务改组（连同所有科学边境中或许最科学的边境的确立），导致多瑙河流域大军在图拉真第二次达契亚战争期间剧增之后巩固在10个军团的水平上。[80]

表 2.1　军团部署(公元 23 年至 192 年)

	23	约 106	约 138	约 161	约 192
不列颠	0	3	3	3	3
北方前线	8	4	4	4	6
下日耳曼	4	2	2	2	2
上日耳曼	4	2	2	2	2
雷蒂亚/诺利康	0	0	0	0	2
中央前线	7	12 - 13	10	10	10
上潘诺尼亚	3	3	3	3	3
下潘诺尼亚	0	1	1	1	1
达尔马提亚	2	0	0	0	0
上默西亚	0	3 - 4	2	2	2
达契亚	2	2	1	1	2
下默西亚	0	3	3	3	2
东方前线	4	6	8	8	8
卡帕多基亚	0	2	2	2	2
叙利亚	4	3	3	3	3
犹地亚	0	1	2	2	2
阿拉伯	0	0	1	1	1
驻防军	6	4	3	3	3
埃及	2	2	1	1	1
阿非利加	1	1	1	1	1
西班牙	3	1	1	1	1
其他	0	1 - 0①	0 - 1②		
总计	25	30	28 - 29	28	30

注:①拉帕克斯二十一军团(如果仍存在的话),可能驻在上默西亚。
②西班牙九军团,其驻地(如果该军团仍存在的话)不明。

在“东方前线”,军团部署方面两个单位的增加反映了公元 106 年之

兼并那巴提安阿拉伯，那作为一个行省被派驻了一支军团驻防军。（此即费拉塔六军团或加利卡三军团，在哈德良治下被常驻博斯特拉的昔兰尼卡三军团替换）。[81]另一个新添的军团（费拉塔六军团）被部署在犹地亚，紧随最后一次犹太人造反于公元135年被最终镇压下去之后，而不是在一个（或可能两个）军团被歼之前。[82]军团驻防军从而增加了一倍，因为弗雷滕西斯五军团（自尼禄时期往后驻在犹地亚）也留在那里，长驻下去。

塔西佗记述的公元23年兵力部署[83]的明显变化，在于军团从巩固了的帝国内地被转移到周边；在内地，它们的功能一直是维持内部安全，而在周边，它们面对一种主要是外部的威胁。达尔马提亚，一个那时有如现在似的困难之地，被崎岖少路的山脉分割，其驻防军在尼禄统治期间被减至一个军团；[84]而且，最后一个达尔马提亚军团——弗拉维亚·菲利克斯四军团被图密善撤出（约公元86年），以用于达契亚战争。[85]作为公元6至9年大叛乱的发生地，达尔马提亚此后看上去已被彻底平定。与此相似，在埃及和西班牙的军团系统从元首政治开始时的总共10个军团，被剧减到朱利乌斯—克劳狄时代之末的仅仅3个，直至进一步非自愿的削减为止，那由德奥塔里纳二十二军团未得替换造成，它在公元132至135年犹太人造反期间被歼或被撤除。[86]

帝国各核心行省现在已由一小批军团安然掌控，与此同时外围需要更强的兵力：如后所述，这反映了罗马安全政策工具方面的一项变化，即从倚重附庸体系变为依赖直接的武力，这依赖看似更保险，到头来却更脆弱。

由于不列颠从罗马征服伊始（公元43年）到图密善为止一直需要4个军团，此后则需要3个，因而无论是弗拉维诸帝治下实现的军团系统的四个单位增加，[87]还是出自埃及、西班牙和达尔马提亚的重新部署，都不足以 87
提供多瑙河边境要求的，也是为改组了的“东方前线”所需的追加兵力。因此，部署在莱茵河流域的大军遭大量削减。例如，就下日耳曼而言，军团数目被减去一半，只剩下两个，辅助部队如表2.2所示亦被减少。[88]

表 2.2 下日耳曼的辅助部队

	公元 70 至 83 年	公元 104 至 120 年	三世纪
骑兵翼(*Alae*)	6	6	7
骑兵大队	2	1	1
骑兵大队(骑步兵混合)	1	0	0
五百人团大队(骑步兵混合)	11	6	5
五百人团大队	8	6	7 - 8
“努梅里”	0	0	4

因此,下日耳曼的军团驻防军战斗兵员从约 22 000 人减至约 11 000 人,与此同时辅助部队系统从约 15 500 人减至约 10 000 人(三世纪时再次稍有增加,至 10 500 人)。注意:在此时期始终没有任何骑兵翼;骑兵大队有所削减;在此地段的唯一骑步兵混合大队撤出。骑兵翼大概是被分配给高威胁区的精锐部队,总是被部署在关键点上。[89] 显然,下日耳曼并非跻身于这些关键点,不像拥有骑兵弗拉维亚二翼的上日耳曼和拥有佩特里阿纳翼的不列颠。

在所有前线,军团部署模式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地事态进程,也反映了一种新的阻绝性边防战略的来临。弗拉维王朝发起的安全政策显然已经成熟,其主要特性是最佳区域周边的刻意选择,而选择的依据不仅在于它们的战术便利和地理便利,还在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战略缘由——换言之“科学”边境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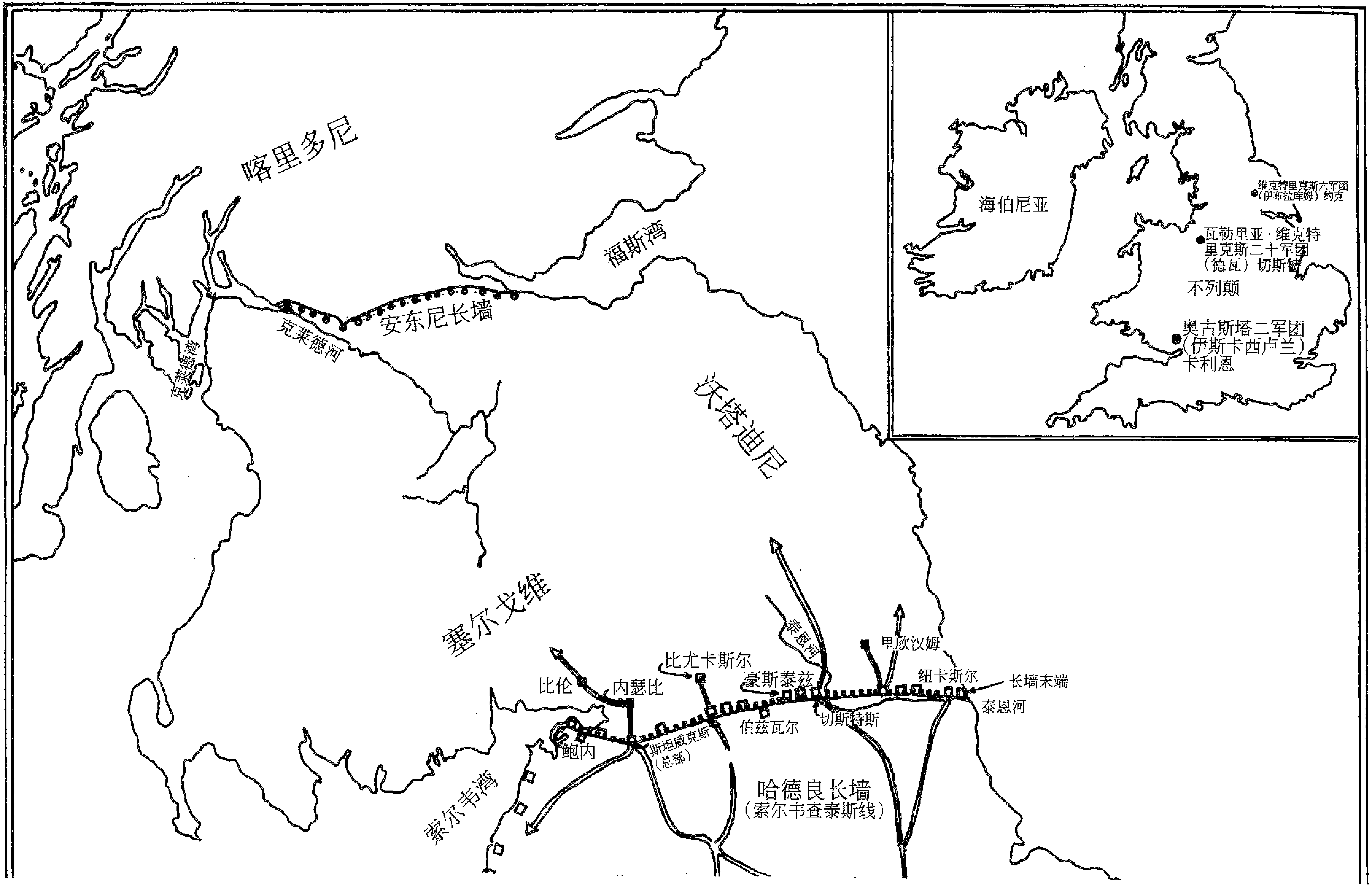
如果拿哈德良治下罗马帝国的边界去比较亚历山大大帝短命帝国的边界,或者就此去比较鼎盛时节的拿破仑帝国,那么这第一个边界就立即透露出一种理性的行政管理政策的运作,而不是一种未经指引的扩张主义。在不列颠,随任何全盘征服意念被放弃,[90] 边境被固定在索尔韦 - 泰恩线,即哈德良长墙线。早些时候,在公元 79 至 84 年的不列颠总督 Cn.
88 朱利乌斯 · 阿格里科拉麾下,罗马人已向北突进得远得多,超过了克莱德 - 福斯线。[91] 这不仅比索尔韦 - 泰恩线圈入了多得多的领土,而且比该线短得多。然而,科学边境不是意在囊括尽可能多的领土,而是要囊括最

佳数量的领土——换言之是圈入依据政治、经济或战略理由有利可图的地区。最短边线不一定是最佳边境，如果它恰巧圈入了由倔强难驯的族民居住的难以通行的地域，如克莱德－福斯线肯定圈入了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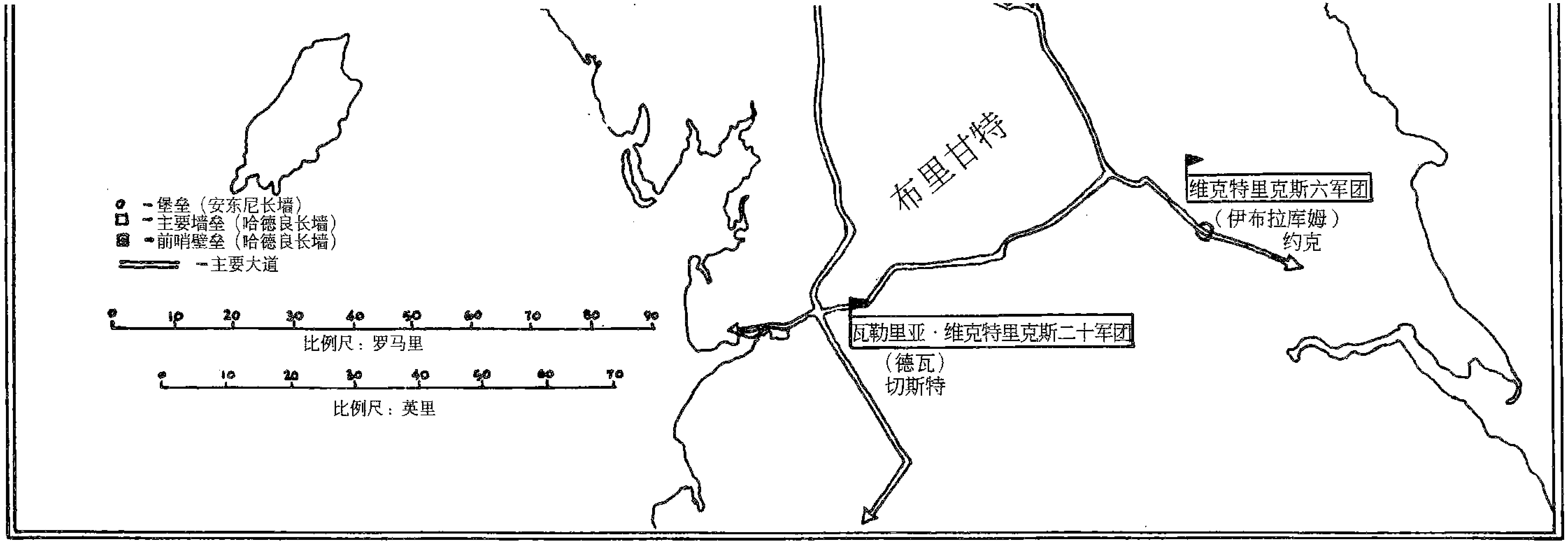
哈德良长墙及其基础设施被建后二十载，克莱德－福斯线重新被占，而且在公元142年，安东尼长墙得到修筑，以标明和确保新边境。基于零碎的可得证据，有人论辩说在这推进之前，一直构成哈德良长墙的外交缓冲的附庸部族体系已经崩解。[92]新体系简单得多，并且以某种方式更起作用：以约两英里间距设置的近邻壁垒使哈德良长墙的"隔里堡"和塔楼变得不必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简单的长墙，高约10英尺，伴有一条由胸墙掩蔽的6英尺巡逻小道。在它后方未修筑任何相当于"瓦勒姆"（*vallum*）平底堑壕的工事，但有必不可少的障碍壕沟（在此约40英尺宽，12英尺深），还有在墙后延展的周边道路。[93]

看起来像地图上的线条，特别是在不显示地形而只显示地理区划的小标度地图上，安东尼长墙似乎比哈德良长墙"科学"得多；首先它短得多，仅37英里而非73⅓英里长。然而，安东尼长墙有个非常重要的不利之处：在边境区域，罗马的平定方法要求居民和地形适于定居和发展，从而"自我罗马化"能够浮现，作为一个繁荣的人口对罗马观念和罗马造物的自愿响应。另一方面，外交要求那些住在边境之外的人易受威胁和引诱的影响，那是间接控制体系行使的。克莱德－福斯线两边的人和地形不符合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项。结果，安东尼长墙的后方从未被充分平定，它的前方则照旧未被确保，因为没有形成任何由依附性附庸构成的缓冲。到公元158年，修复哈德良长墙的工作业已开始，[94]当时克莱德－福斯线瓦解了，或者不久后在被这障碍分隔开的族民揭竿造反时崩溃。[95]在不列颠的兵力已经严重伸展过度，[96]到公元162年，帕提亚战争的爆发使 89
得增援不列颠驻防军已无可能。

尽管安东尼长墙曾被短暂地重驻和修复，但哈德良初始的边防规划到世纪末已被证明正确，当时他的长墙再次成为边境，而且将持续到底，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占领苏格兰低地的短命尝试期间除外。[97]



喀里多尼
福斯湾
安东尼长墙
克莱德河
克莱德湾
沃塔迪尼
塞尔戈维
索尔韦湾
比伦
内瑟比
比尤卡斯尔
豪斯泰兹
泰恩河
里欣汉姆
纽卡斯尔
长墙末端
泰恩河
切斯特斯
伯兹瓦尔
斯坦威克斯
（总部）
鲍内
哈德良长墙
（索尔韦查泰斯线）
海伯尼亚
不列颠
维克特里克斯六军团
（伊布拉库姆）约克
瓦勒里亚·维克特
里克斯二十军团
（德瓦）切斯特
奥古斯塔二军团
（伊斯卡西卢兰）
卡利恩



地图 2.3　罗马不列颠的长墙边境

在日耳曼，越过莱茵河征服这最初目的在瓦鲁斯之灾以后被放弃，但公元16年后的撤军并未导致撤到一条“科学”边境，因为莱茵河肯定不是这样的边境。诚然，在河岸高峭之处，莱茵河就地形而言便于监视和防御，而且莱茵河舰队（日耳曼尼卡巡逻舰队）可以给陆上兵力提供有用的水运支持，就针对低烈度威胁的边境巡逻而言特别有效。[98]可是，作为一条战略性边境，该河有一大弊端：在文多尼萨（温迪施）拐弯的L形莱茵－多瑙线构成了一个楔子，其底部（美因茨－雷根斯堡）长约180英里，到其顶点长约170英里，深深地突入帝国领土。

结果，卡斯特拉里吉纳（雷根斯堡）与莫冈蒂亚库姆（美因茨）之间的帝国周边被拉长了250英里以上，还不算这两条河流的众多曲折。日耳曼与潘诺尼亚边境之间经奥古斯塔温德利克兰（奥格斯堡）的最短路线上的战略调动所需时间由此延长了10天左右。更糟的是，内卡河谷和黑森林这深深的楔子构成了一个现成的入侵箭头，危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横向交通，并且离意大利北部边界只有一个星期的行军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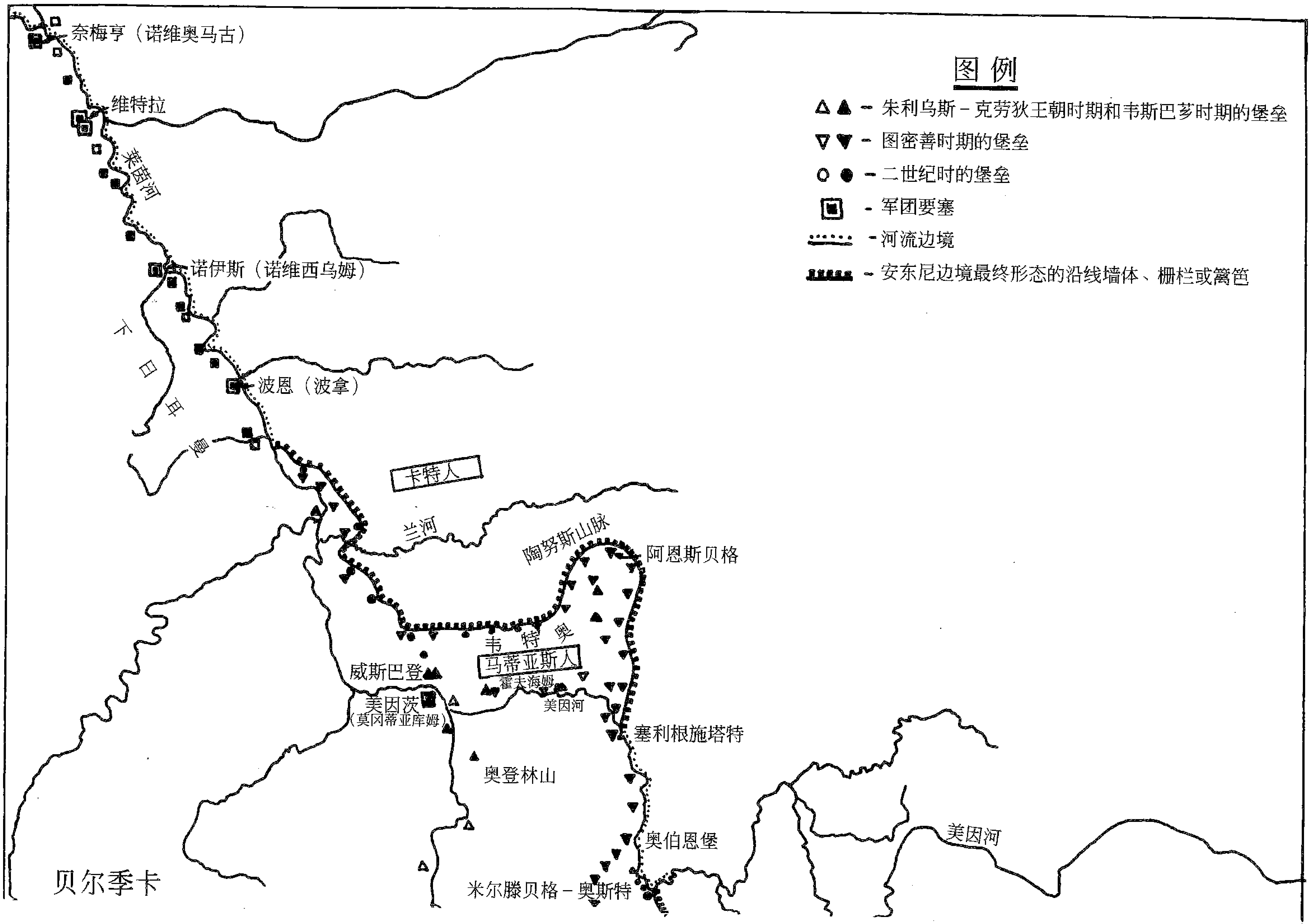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比那一长系列边境校正战役更好地例解了该时期的全局战略政策，它们逐渐转变了莱茵－多瑙周边。无论如何，在这一地段的考古调查地图相当清楚地表明，在叙事史料中被那么有力地强调的皇帝个人性情区别和倾向差异并未影响帝国政策的连续性。[99]

还有方法上的连续性。道路和要塞是一套套修筑的，以罗马风格的“工程攻势”为手段，以该区域的三个关键铰接点为基础，那就是位于下述三地的军团基地：美因茨（韦斯巴芗治下驻有阿蒂厄特里克斯一军团和吉米纳十四军团）、斯特拉斯堡（奥古斯塔八军团）和温迪施（克劳狄十一军团）。[100]首先，在韦斯巴芗治下，而且确实是紧随西维利造反（约公元70年）之后秩序在日耳曼的重新确立，位于美因茨对面莱茵河右岸韦特
92 奥桥头堡（即威斯巴登和霍夫海姆）的旧要塞得到重建和重驻。别的要塞也在莱茵河右岸被建造起来，往南直至海德堡－诺因海姆；与此同时，莱茵河左岸的旧要塞可能被撤空，像莱茵贡海姆那样。[101]至此，这些举动本将符合一种有限的桥头战略（参见哈德良长墙以外的前哨堡垒），或者

符合一个抱负更大的企图，即开辟一条跨越莱茵－多瑙突出部顶端的美因茨－奥格斯堡轴线。然而，公元74年左右，在温迪施－罗特韦尔轴线上开辟了一条新的突入线；它与该突出部顶端相交，本将使得斯特拉斯堡－图特林根轴线上经改善的（即使仍是间接的）莱茵－多瑙联结成为可能。它本来还会为一种更剧烈的改造提供侧翼安全，那就是开辟美因茨－奥格斯堡轴线（加上沿多瑙河从林茨到奥伯斯蒂姆，再进一步往西到埃默金根修筑或重建的韦斯巴芗时期诸堡垒）。[102]

公元83至85年图密善的日耳曼战役（就此弗龙蒂努斯提供了某些准确但难解的资料[103]）建立了一条在陶努斯山脊顶的边界，控扼——并且现在能保护——肥沃富庶的韦特奥地区。此即图密善对卡特人的战争，受到塔西佗嘲笑。[104]另一场"工程"进攻战役的特色是从兰河与莱茵河汇合处起，沿陶努斯山脊并向东南直至美因河，一路建造堡垒、道路和瞭望塔，表现了内在连贯的计划和系统周密的组织。它在身后留下了一条经组织了的边境，驻有巡逻部队，并由一系列小路堡、瞭望塔和辅助要塞得到安全保障。[105]

新"设防边界"的一项裨益，在于阻断进入新维德盆地和韦特奥的通道。后者是马蒂亚斯人的领土，该族已在罗马外交控制之下，但直到那时为止仍易受卡特人骚扰。[106]多瑙河畔的达契亚之乱和上日耳曼长官L. 安东尼乌斯·萨特尼努兹的篡夺图谋造成了一番间断，此后图密善的边境校正攻势约于公元90年大规模恢复。正是在这阶段，莱茵－多瑙突出部终被切断，"防御重地"（*agri decimates*）得到圈闭。在从塞利根施塔特到奥伯恩堡的美因河畔并直至内卡河，新堡垒被建造起来；沿奥登林山边缘，一连串小堡垒和瞭望塔确保了一条连接性的"设防边界"道路。在前往河流的各通道上，较大的大队要塞开始再度出现，从奥伯斯切登特尔的那个到内卡河畔的温普芬，接下去还有一系列大队要塞直至孔恩。位于孔恩的内卡河线与多瑙河"设防边界"之间的连接是何性质并不清楚；然而肯定的是，一条从潘诺尼亚到日耳曼的短得多的路线现在可用了，那就 93
是经过孔恩；一条到多瑙河的海登海姆－费明根路线看来很有可能。[107]



图例
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时期和韦斯巴芗时期的堡垒
图密善时期的堡垒
二世纪时的堡垒
军团要塞
河流边境
安东尼边境最终形态的沿线墙体、栅栏或篱笆
奈梅亨（诺维奥马古）
维特拉
莱茵河
诺伊斯（诺维西乌姆）
下日耳曼
波恩（波拿）
卡特人
兰河
陶努斯山脉
阿恩斯贝格
韦特奥
马蒂亚斯人
威斯巴登
霍夫海姆
美因河
美因茨
（莫冈蒂亚库姆）
塞利根施塔特
奥登林山
奥伯恩堡
美因河
米尔滕贝格－奥斯特
贝尔季卡



地图 2.4　在日耳曼的前沿边境

直到安东尼时代,莱茵河与多瑙河的最终周边才被建立起来,当时确立了从米尔滕贝格－奥斯特、韦尔茨海姆和希尔伦霍弗直到艾宁的防线,并且以"哈德良"方式加以工事设防,包括一条掩蔽通常的巡逻小道和将瞭望塔、小堡垒和辅助基地连接起来的栅栏。[108]由于这宏伟大业的累积性质,最终形态的新边境实际上是纵深分布,有众多堡垒和道路处于那个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以希尔伦霍弗为顶尖的"设防边界"大略三角形后面。那里,帝国周边的雷蒂亚部与上日耳曼部接合,接合点在多瑙河以北约31英里和莱茵河正东64英里。这最终的周边线在一个世纪以上时间里得到了系统的巩固,办法是增添障碍壕沟、墙和经改进的监视塔;而且,在"设防边界"的雷蒂亚部分,石墙最终取代了栅栏。[109]

从纯地理观点看,艾宁－陶努斯边境是对莱茵－多瑙老防线的大改善,但其设计逻辑在地图上完全不明显。图密善在陶努斯山上的"设防边界"绝非各点间的最短路线:相反,它构成了一个笨拙的突出部,在阿恩斯贝格达到顶端。可是,虽然当安东尼周边线(在更东面的洛尔希拐弯)被建立起来时,他的"设防边界"在美因河以下的南段最终被丢在后面,但美因河以北古怪的钩形线没有被取代,而是作为永久性边境被保持下去。

图密善在陶努斯山上的"设防边界"透露出一点:战略优先于战术,通过经济发展的罗马化显然被置于直线周边的吸引力之前。在战略层次上,陶努斯边境可阻断在一大入侵轴上的天然交通线,该轴介于易北河以西的日耳曼北部与上莱茵地区之间。[110]与此同时,作为外向的尖凸而非内向的楔子,这条线并未延长跨该地段的战略调遣路程。

在作战层次上,虽然陶努斯边境由于其稠密的堡垒、道路和瞭望塔网络,本身对人代价高昂,但是它有为整个上日耳曼简化边防问题之效,因
96 为它从莱茵河谷和韦特奥地区驱退了卡特人——帝国在这整个区域显然最危险的邻居。这反过来,使行省驻防军得以减少。美因茨的军团兵力(到公元89年为止由两个军团构成)和被分布在突出部之内的辅助兵力能集中起来打退卡特人,不管这入侵者是朝内卡河正南推进,还是朝莱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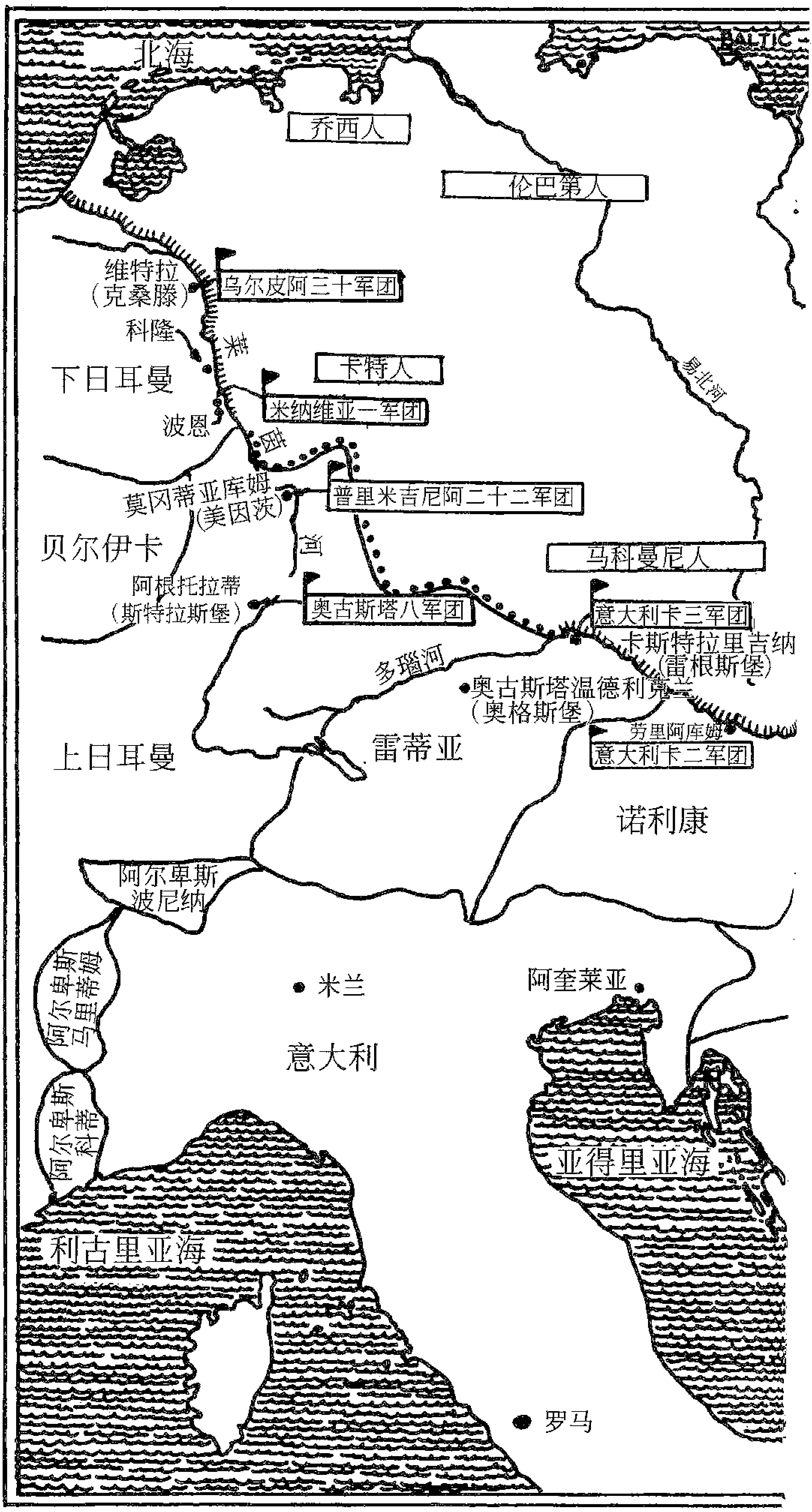
河正西推进。为了集中于合适的地方，罗马人需要有关于即将到来的进攻的早期预警，而新边境显然意在提供这样的预警，同时也意在引导大攻击和遏制小进犯。

罗马化这一政治经济目的在决定边界形状方面的作用只能通过推导去予以假设：被陶努斯—美因河边境圈入的地区即韦特奥是一片非常丰产的可耕地。（在罗马人到达以前很久，森林就被清除，土地开垦出来以供农作。）[111]在此，丰产的农业可以造就繁荣，如果免受渗透者威胁的日常安全得到提供的话。农业反过来能够提供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后者接着将促进罗马化过程。正是因为它漠视直线周边的明显的军事好处，这段特殊的“设防边界”才比大多数史例更好地证实了对罗马边境政策的“社会构建”解释。

因此，罗马边境政策中存在一个连贯的模式和一套轻重缓急次序：首先，边境必须便利帝国各陆上区域之间的战略中转；第二，它不应当包括天然难以定居、难以城市化和罗马化的地区（例如苏格兰）；第三，它应当包括适于定居的土地——会加强帝国在人和资源方面的实力的土地。最后，作为一项分明是次要的事情，边界应当尽可能短，以便减少前哨和巡逻所需的人力。（由于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将以机动的集中兵力抗击大规模威胁，在面对此类威胁的场合周边长度并不重要。）

就陶努斯—美因河边境而言，很可能重要的另一大考虑与战略中转需要相反：在罗马人面临“设防边界”对面若干特别强大的敌人的地方，依靠在这些敌人之间构成一个突出部去将他们隔开是有益的。这突出部
还将为它的基底处的道路和人口提供一个安全追加层。在此，边界的单 97
纯长度同样成了次要事项。

图密善的陶努斯山“设防边界”在战术上的得益，图拉真的达契亚“设防边界”将在战略规模上取得。到图拉真征服达契亚为止，帝国周边始终跟随多瑙河延伸，直至黑海畔的三角洲。[112]一系列军团基地从雷蒂亚延展到今保加利亚，基地之间的间隔则由一个多少更为稠密的辅助堡垒网络覆盖，它伸入位于罗马尼亚的现多布罗加。两支多瑙河舰队，即从铁



地图 2.5　欧洲二世纪时的边境



图例
意大利卡三军团
军团
乔西人
蛮族人
雷蒂亚
行省
河流边境
非河流边境
注
马其顿五军团在公元 166 年后部署
意大利卡二军团在公元 170 年后部署
意大利卡三军团在公元 170 年后部署
维斯图拉河
奥得河
德涅斯特河
喀尔巴阡山脉
夸迪人
吉米纳十军团
文多博纳
(维也纳)
卡农图姆
吉米纳十四军团
阿蒂厄特里克斯一军团
阿蒂厄特里克斯
二军团
阿昆库姆
(布达佩斯)
蒂萨河
科斯托波西人
上
潘
诺
尼
亚
亚齐基人
波泰萨
马其顿五军团
吉米纳十三军团
阿普兰
卡普人
阿普伦西斯
达契亚
下潘诺尼亚
锡尔米乌姆
弗拉维亚四军团
维米纳休姆
克劳狄七军团
马尔温西斯
罗克瑟兰人
奥尔特河
克劳狄十一军团
达尔马提亚
拉蒂亚拉
多瑙河
奥斯库斯
意大利卡一军团
黑
海
上默西亚
下默西亚
海
色雷斯
马其顿

门起上游运行的潘诺尼卡巡逻舰队和下面的米西卡巡逻舰队，补充了多瑙河左岸的瞭望塔、信号站和巡逻兵。

对这条跨越六个要省领土的漫长边界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威胁由达契亚人构成。他们的力量中心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公元前一世纪时在一位名叫布雷比斯塔的统治者麾下，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甚至更早，他们的扩张主义就驱使他们与罗马军队有暴烈的接触。[113]在该区域各族中间罕见的这一中央集权倾向，使之成为任何有领土达到多瑙河的权势实体的危险敌人：达契亚人的袭击指向从今日维也纳到黑海的整个巨大弧形区。在奥古斯都治下，达契亚问题靠惩罚性远征和报复性作战得到缓解，但未解决。[114]提比略治下尝试了外交，然而无法将达契亚人转变为可靠的附庸（或许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黄金[115]）。罗马人因而利用置身于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的萨尔马西亚族亚齐基人，据此将达契亚势力挡在多瑙河的那段之外。[116]到弗拉维王朝时，另一支萨尔马西亚族民（即有伊朗血统的）罗克瑟兰人占领了多瑙河下游沿岸平原。塔西佗记述了他们公元 69 年渡过多瑙河进入默西亚的倒霉的袭击，其间 9 000 名骑马武士被加利卡三军团阻截，并在满载劫掠品后撤时被其分割击碎。[117]

公元 85 至 86 年在图密善治下，罗马人再度不得不与达契亚人打仗，后者由戴凯巴路斯统治重新中央集权化。随其又一次侵入默西亚，罗马人将达契亚人驱回多瑙河对岸，然后追击，但遭到严重失败；公元 88 年，一次成功的战略攻势雪了这败北之恨，直至其最高潮——在塞维林堡之外的平原上赢得塔佩大捷。[118]也许图密善打算紧随这野战大捷之后进击萨尔米泽杰图萨，即戴凯巴路斯及其宫廷所在地，但上日耳曼长官安东尼
100 乌斯·萨特尼努兹的叛乱在公元 89 年 1 月插了进来。然而到那时，多瑙河流域的附庸体系已在解体，这极大地限制了罗马人可得的战略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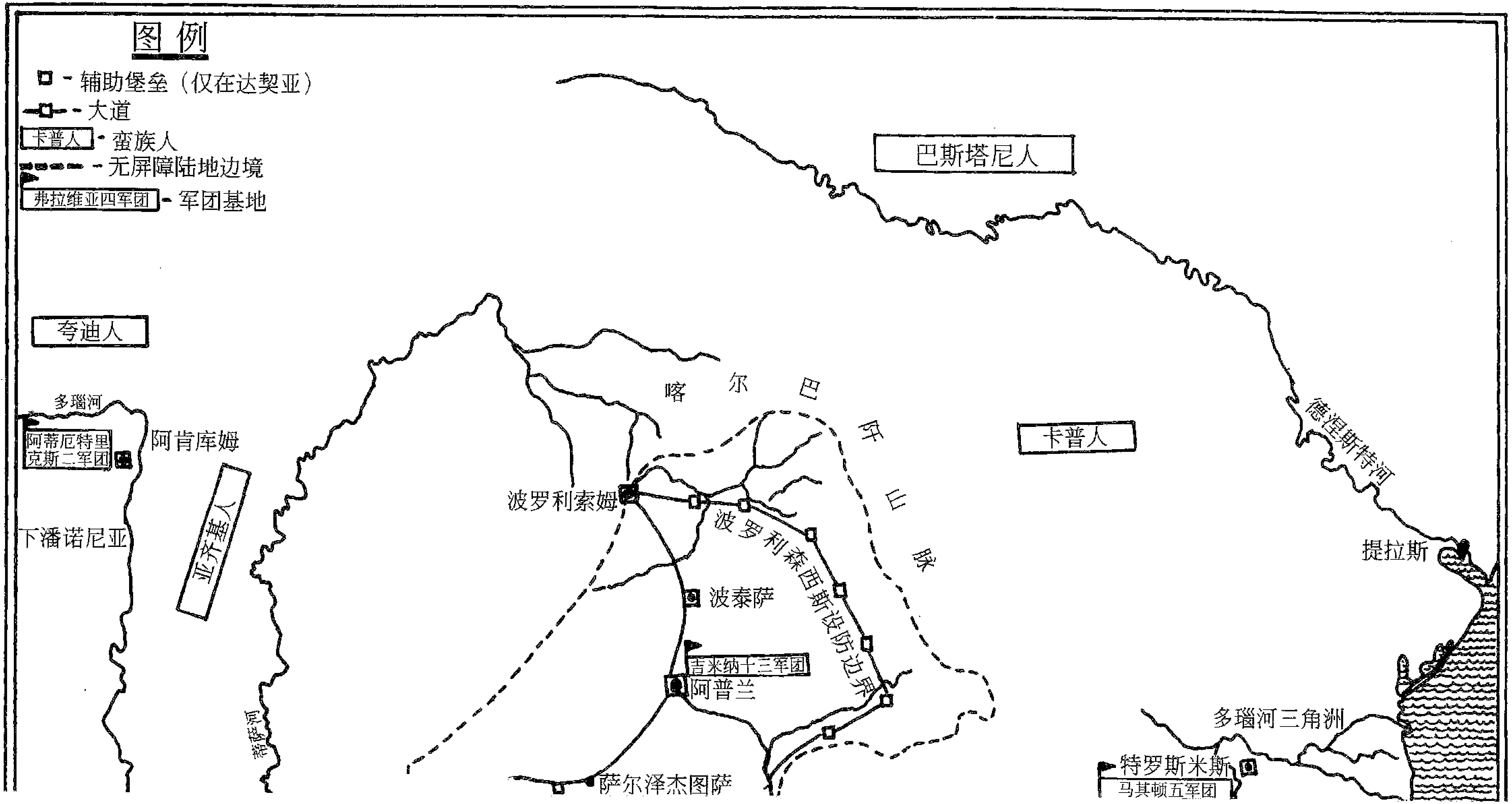
罗马人在这区域面对三大部落聚合体，它们从提比略时候起一直处于松弛但有效的外交控制之下，那就是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其中心在维也纳对面的那片地区）和亚齐基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族民在公元 85 和 89 年的战役中帮助图密善的部队打击戴凯巴路斯。然而他们也没有

阻碍之，因为罗马人本无可能跨越从达契亚到易北河以西马科曼尼人领土的600英里多瑙河边界去发动几路同时进攻。对任何打击达契亚的战略进攻而言，这些强邻的默许都必不可少，正如达契亚人的默许对任何打击马科曼尼人、夸迪人或亚齐基人的战略进攻来说都至关紧要一般。于是，当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和亚齐基人皆威胁开战时，[119]图密善被迫在恢复战前状况（和施行一项技术援助计划）的基础上与戴凯巴路斯媾和；[120]接下去若干年里有对达契亚领土上游处日耳曼人和萨尔马亚西人的胜负不决的战争，达契亚领土本身则保持和平。[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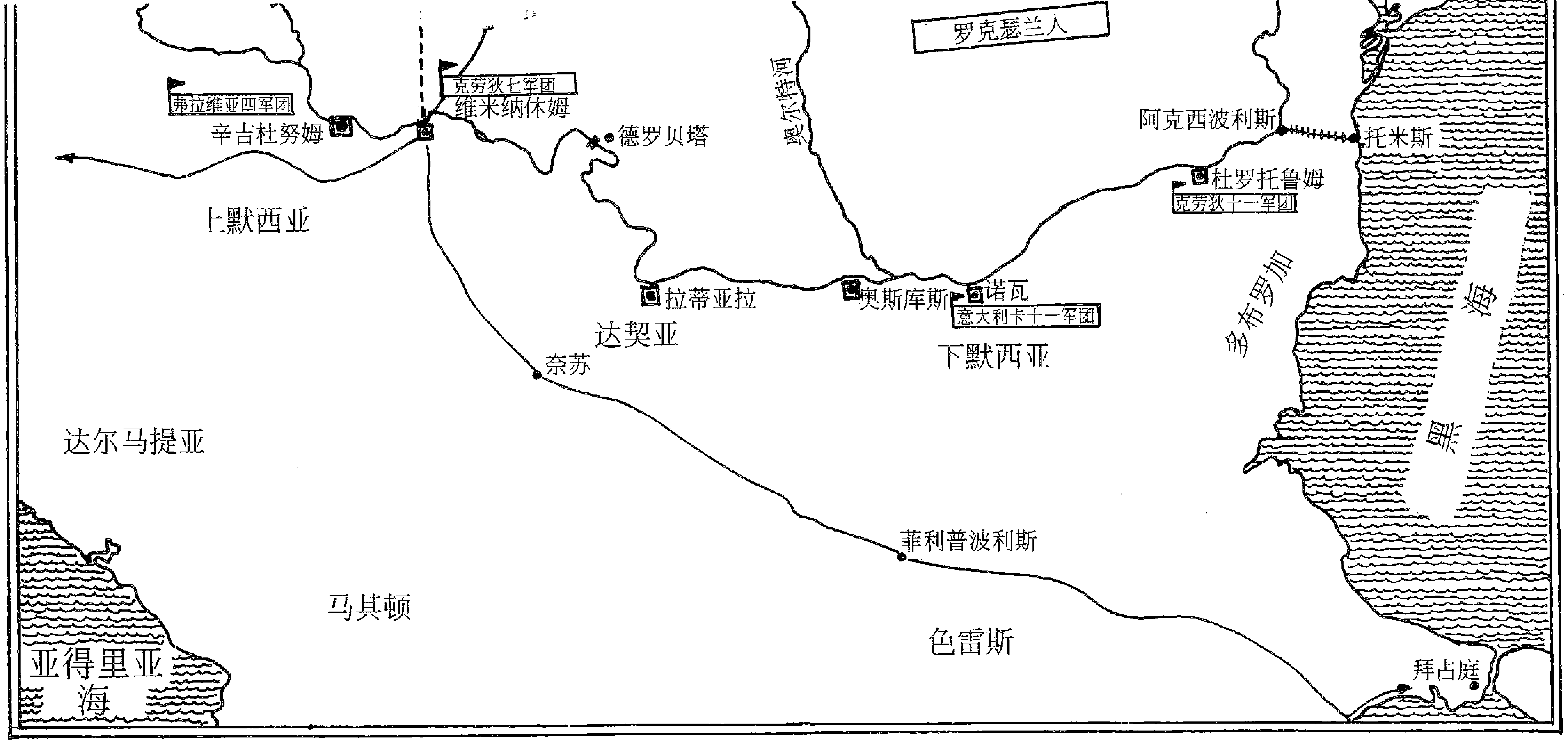
必须从这一背景看待图拉真与戴凯巴路斯的战争和他对达契亚的最终征服。将图拉真轻率莽撞的冒险主义与哈德良的和平意向相比曾是史家的必用程式。据称，在多瑙河对面，有如在幼发拉底河对面，图拉真留下了深深的突出部，它们标志了他那宏伟的征服，然而不必要地拉长了帝国周边。图拉真之兼并达契亚也一直被解释成倒退到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和无限制的扩张主义。[122]

千真万确，一旦公元106年图拉真对戴凯巴路斯的第二次战争之后达契亚被征服，新达契亚行省的边境便构成了一个深楔，中心在萨尔米泽杰图萨－阿普兰轴线上，最终将帝国周边拉长了370英里。[123]事实是，在地图上这新行省展现了一种典型的易受攻击态势。这一印象由于战役结束后即被留在当地的军事部署的性质得到了加强。突出部的重心不在基底，而是朝向箭头，因为在马罗斯河谷内阿普兰的军团基地更接近喀尔巴阡山脉北缘而非多瑙河。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达契亚“设防边界”都不是一整个由长墙体系闭合的边界；它依旧被组织为一套由诸多独立据点构成的网络，这些据点横跨主要的入侵路线，护卫交通要道。[124] 101

这一新边境依据小标尺地图所示的表面战略来看几乎毫无道理，但依据罗马政策的轻重缓急次序来看就变得高度合理：消灭达契亚的独立权势提供了必要条件，得以恢复罗马对整个区域的日耳曼人和萨尔马西亚人的外交控制。为保持马科曼尼人、亚齐基人和罗克瑟兰人不袭击多瑙河地区，就需要威慑和引诱（即资助）这两种手段；只要戴凯巴路斯照



图例
辅助堡垒（仅在达契亚）
大道
卡普人
蛮族人
无屏障陆地边境
弗拉维亚四军团
军团基地
巴斯塔尼人
卡普人
德涅斯特河
提拉斯
夸迪人
多瑙河
阿蒂厄特里克斯二军团
阿肯库姆
下潘诺尼亚
亚齐基人
喀尔巴阡山脉
波罗利索姆
波罗利森西斯设防边界
波泰萨
吉米纳十三军团
阿普兰
萨尔泽杰图萨
多瑙河三角洲
特罗斯米斯
马其顿五军团


罗克瑟兰人
克劳狄七军团
弗拉维亚四军团
维米纳休姆
辛吉杜努姆
德罗贝塔
奥尔特河
阿克西波利斯
托米斯
杜罗托鲁姆
克劳狄十一军团
上默西亚
拉蒂亚拉
奥斯库斯
诺瓦
意大利卡十一军团
达契亚
下默西亚
多布罗加
黑海
奈苏
达尔马提亚
菲利普波利斯
马其顿
色雷斯
亚得里亚海
拜占庭

地图 2.6　征服达契亚

旧处于对抗性的独立状态，政策的威慑部分就会被根本削弱。作为一个行省，达契亚不值得拥有，但作为整个这一区域的战略盾牌，它确实非常可贵。

随公元116至119年萨尔马西亚人的攻击之后，达契亚突出部的两侧变窄了，因为北面的巴纳特西部和南面的蒙泰尼亚被撤空。到公元124至126年，达契亚已被划分为三个行省（马尔温西斯、波罗利森西斯和阿普伦西斯），而且至少65个分立的前哨据点被修筑起来，以提供达契亚波罗利森西斯纵深防御。这一"波罗利森西斯设防边界"构成了整个多瑙河防御体系的外盾，由驻扎在阿普兰的吉米纳十三军团提供后方支持。达契亚突出部两边是得到资助的萨尔马西亚族占据的平原：西边为亚齐基人，东边为罗克瑟兰人。假如罗马人羸弱、萨尔马西亚人强大，那么达契亚诸省就会易受包围（跨过多瑙河流域半岛状的罗马领土的颈部）；然而，由于罗马像它当时实际的那么强大，达契亚边境就有效地将两边的萨尔马西亚人分隔开，削弱了他们的合力。尽管可能仍需要资助，但在达契亚马尔温西斯（多瑙河畔）和达契亚波罗利森西斯（喀尔巴阡山上）的强有力的辅助部队驻防军，连同在达契亚阿普伦西斯的军团，将足以用报复任何越界袭击的威胁去补充资助的引诱。[125]

消除达契亚威胁为多布罗加和直至维也纳的所有多瑙河流域土地提供了安全；有了安全，农业繁荣便接踵而来，接着还有城市化：多布罗加的各海岸希腊城镇从不安全状态中迅速复原，与此同时从色雷斯到卡农图姆（德意志查尔滕堡），整个区域兴起了诸多新城镇。由于征服了达契亚，在多瑙河下游拉蒂亚拉和奥斯库斯的军团基地便留在了纵深后方，而
104 且军团被撤出，因为该地段在军事上不再重要。然而，这两个驻地并非消亡。相反，它们成了平民定居地，拥有颇高的"殖民地"（*coloniae*）地位。[126]多瑙河谷曾是袭击和反袭击场所，在图拉真征服之后能开始为帝国的人力和物资资源作出贡献，增强它的根本力量。

在罗马边境政策的优先事项中间，达契亚边境唯一没有满足的是最低的战术优先，因为周边被拉长而非缩短了。这当然没有影响帝国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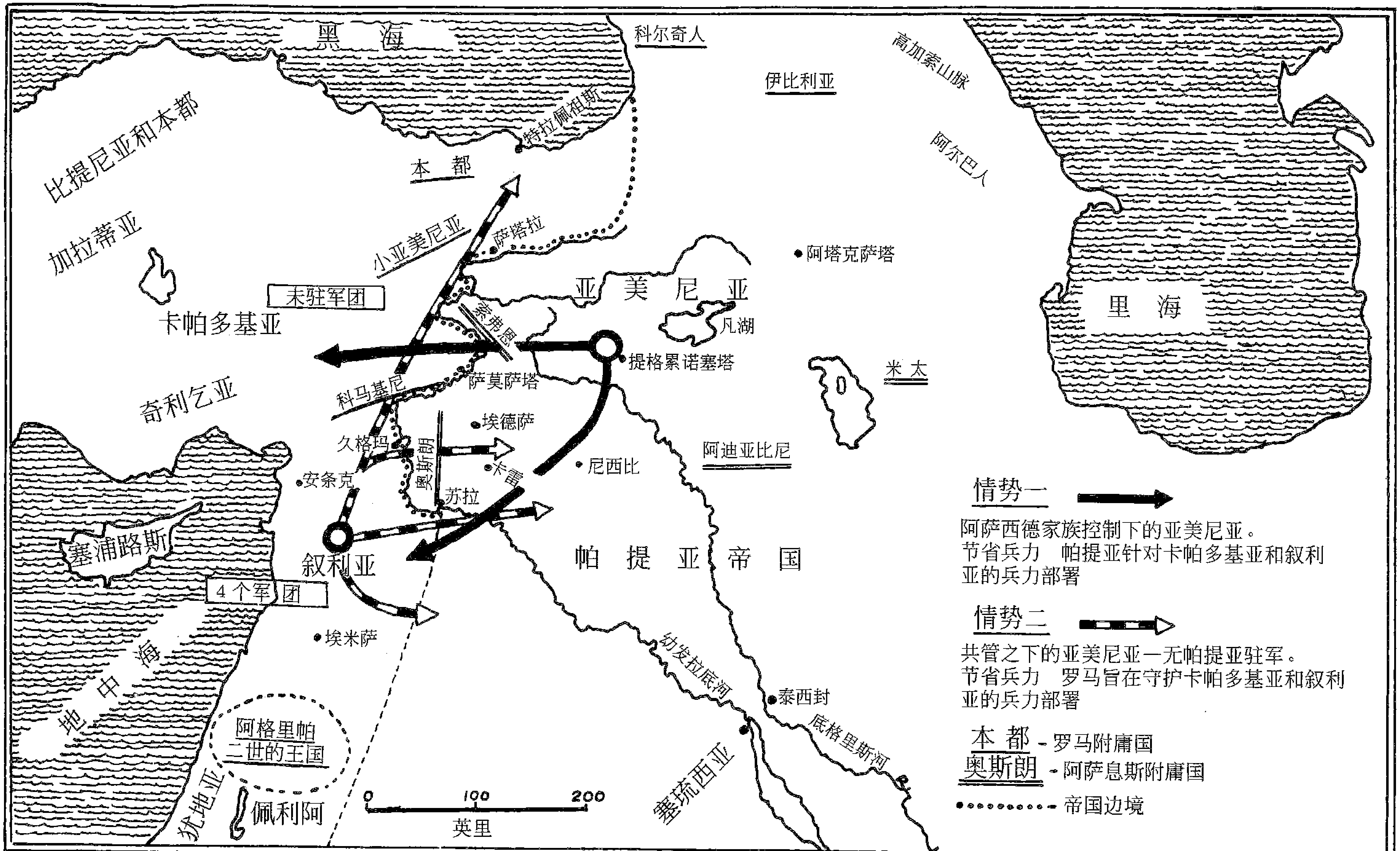
它们现在能走着同样短但更安全的路线。由达契亚边境地图给出的易受攻击的印象亦无正当理由。除了它的明显的地形优势,"波罗利森西斯设防边界"只是在纯军事意义上才是个突出部:其东西两侧并非敞开的入侵轴线,因为它们被处于罗马外交控制之下的族民占据。[127]

虽然征服达契亚如此加强了罗马对整个多瑙河边境的战略和外交控制,但是"波罗利森西斯设防边界"仍类似于前哨,或者宁可说一整系列前哨,它们以在阿普兰的吉米纳十三军团为中心,那是一旦边境组建起来便被留在当地的唯一军团。[128]正如就任何前哨而言都真确的那样,只要整个地段被安然据有,达契亚突出部就增强了这一安全。远非易受包围,这突出部本身就能被用作向西包围亚齐基人和向东包围罗克瑟兰人的基地:罗马军队能够在德罗贝塔－阿普兰大道上行进,然后转而攻击后方的萨尔马西亚人。[129]

然而前哨的军事价值衰退,最终随基线安全的减小而成为一种阻碍。如此,在三世纪的大危机中,当罗马在突出部两侧丧失对萨尔马西亚人的控制时,"波罗利森西斯设防边界"确实成了易于被切断因而易受攻击的突出部,也消耗了该地段的整体资源。它在奥勒利安在位期间(公元270至275年)(或恰在其后)终被放弃。[130]然而,直到那时为止,达契亚"设防边界"一直是与成本相比高效益的军事工具,保证了罗马对整个区域的军事和外交控制。

朱利乌斯－克劳狄时代里,在从东安纳托利亚经叙利亚到红海的"东方前线",帝国安全体系基于三个要素:附庸国之链,它承受了抗击内部动乱和低烈度外来威胁的负担;亚美尼亚缓冲区;叙利亚大军,它直到公元55年的亚美尼亚危机为止一直有四个军团之强。[131]

在这三个要素中间,只有亚美尼亚的缓冲国地位并非全在罗马掌控 105
之中。从奥古斯都解决方式时起,直到弗拉维时代为止,亚美尼亚问题需要不断的操控,因为它对罗马在该区域的安全是关键性的,对帕提亚的阿萨息斯国家的安全同样至关紧要。如果亚美尼亚处在某种形式的罗马宗主权之下,甚或处于一种例如按照尼禄式妥协("阿萨息斯被任和罗马委



地图2.7 亚美尼亚的战略重要性

任”)[132]建立的双强控制,叙利亚驻军就能抗击帕提亚攻击,守住卡帕多基亚、本都以及叙利亚本身。反之,如果阿萨息斯家族能够自由地在亚美尼亚驻军,那么上述两个地区中的每一个就都需要一支自己的边境军队,能够独自遏制帕提亚的攻击,直至战略增援抵达为止。没有一个前进基地,帕提亚部队就需经跨越亚美尼亚的艰难路线朝本都和卡帕多基亚挺进,从而无法比叙利亚诸军团行进得更快,后者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进军阻截之。因此,帕提亚人无望以发兵进攻两地区中任一地区令罗马人措手不及或败于谋略。

这就是亚美尼亚的缓冲区地位的准确含义,也正是这个因素解释了公元 55 至 66 年尼禄的外交攻势和军事攻势的合理性。帕提亚统治者沃洛吉西斯一世已将篡夺者拉达米斯图赶下亚美尼亚王位,使之转归其同一阿萨息斯家族的蒂里德泰斯。[133]这项行动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即阿萨息斯军队现将自由使用亚美尼亚领土,因而卡帕多基亚和本都若无自己的军队就不能继续保有安全。[134]公元 55 年,尼禄手下的伟大将领 Cn. 多米蒂乌斯·科布洛被任命为卡帕多基亚行政长官,并被配备强大的远征兵力。(其中包括来自叙利亚驻军的加利卡三军团和弗拉塔六军团、来自默西亚驻军的西提卡四军团以及通常的辅助部队补充。)[135]

科布洛一边从事外交,一边组织一支战斗大军,于公元 58 年成功地在亚美尼亚的困难地形中发动了一场艰难的战役,征服了该国的两大中心阿塔克萨塔和提格累诺塞塔。战前状况得到恢复,一名可靠的附庸君主提格兰被及时任命为亚美尼亚国王,并被提供了一支 2 000 人的小规模警卫部队。[136]然而,随着一次突入阿萨息斯领土的亚美尼亚袭击,沃洛吉西斯在其所提条件遭罗马拒绝后重燃战火。[137]早些时候,罗马人提出承认阿萨息斯家族的蒂里德泰斯为亚美尼亚国王,只要他接受罗马委任状,但这提议被沃洛吉西斯拒绝了。[138]科布洛取胜后,力量对比业已变更,这自然缩小了外交的范围,而且可能诱使罗马人去设想兼并。[139]恢复均势有 107
赖 L. 凯森尼乌斯·佩图斯败北,此人当科布洛离开以接管叙利亚地区时被遣去掌管卡帕多基亚。科布洛现在处于最高统帅地位,并被配备调自

潘诺尼亚的一个精锐军团（阿波利纳里斯十五军团），[140]他先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炫耀武力的入侵，然后最终达成了一项外交解决。公元66年，蒂里德泰斯在罗马加冕为亚美尼亚国王，加冕典礼奢华靡费，其花费令苏埃托尼乌斯大为愤慨。[141]

罗马在亚美尼亚解决方式上赢得的绝非大胜；确实，在五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局势可能显得只是回到了公元54年的状况，当时沃洛吉西斯最初将他的兄弟安置到亚美尼亚王位上。[142]然而，战略收益不必是宏伟辉煌的胜利的产物。名义上的双强控制足以保证本都－卡帕多基亚地区的安全，从而免却了沿幼发拉底河上游部署一支类似于叙利亚大军那样的兵力的巨大代价。[143]

如后所述，弗拉维王朝最终废除了"东方前线"的附庸体系残余，这自然首次要求在东安纳托利亚部署常设的军团驻防军。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被经久驻扎于卡帕多基亚的梅利泰内，那在亚美尼亚与卡帕多基亚之间的中央路线上，弗拉维亚·弗玛十六军团则大概在萨塔拉（一个更北边的幼发拉底河渡口附近），位于前附庸国小亚美尼亚领土。[144]

图拉真继承了的东部边境虽然比朱利乌斯－克劳狄时代那含糊不明的附庸国杂烩简洁明了，但仍然很不令人满意。[145]从那巴提安附庸国（犹地亚以东、南入阿拉伯西北）的界定不明的国界起，边境经大马士革和巴尔米拉跨越沙漠，延向幼发拉底河，大概在苏拉以上达到该河。从那里起，它顺河延向北方，途经久格玛，直至向东转入亚美尼亚，然后陆上抵达黑海，到特拉佩祖斯（特拉布宗）以东一个海岸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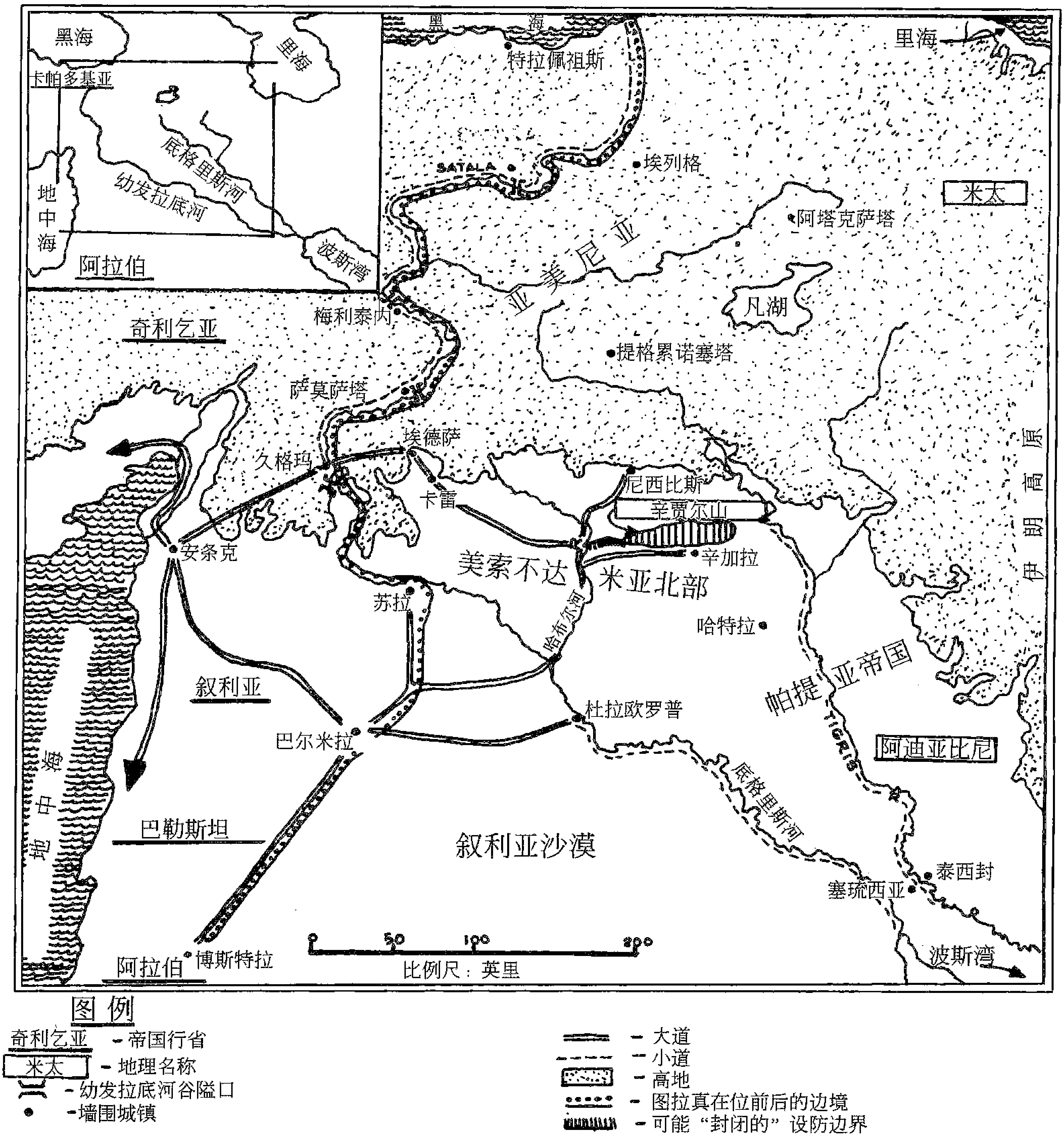
事实上，如同图拉真即位时帝国地图上画的那样，这一边境很难辨认。大多作为降雨分布的结果，罗马在黎凡特的领土就一切实际目的而言局限于一条狭长地带，差不多长500英里（从佩特拉到久格玛），很大部分宽不到60英里。这条沃土地带东面的土地虽然理论上归罗马所有，但大多为沙漠，不需要有边防安全部队去对付低烈度威胁（"点状"防御
108 就足够了）；然而，它也不可能支持为对付任何高烈度威胁所需的大量兵力。罗马人处在一个难受的位置，即据守一条西临浩瀚大海、东临脆弱侧

翼的狭长地带。在该区域最大城市安条克对面，由罗马人控制的领土纵深几乎不超过100英里：不足以在多于并优于叙利亚诸军团的部队能够从欧洲抵达以前遏制帕提亚大军。

这些地理因素是在黎凡特的每个权势实体都不得不与之较量的，它们导致幼发拉底河边境不足倚靠；图拉真的帕提亚战争（公元114至117年）一直被解释成一种越过该河建立“科学”边境的努力。将满足战略纵深、后方安全和兵力部署节省之需的唯一可能的边界线是顺着哈布尔河，直至辛贾尔山西缘，然后沿高地朝底格里斯河继续往东，并且向北再进入亚美尼亚。[146]

这边境虽然根本不直，但将具有比单纯的地理简单性大得多的好处。如果强有力地配备兵力，哈布尔河－辛贾尔山－底格里斯河线将既为西面的安条克地区、也为北面的亚美尼亚提供可靠的纵深防御，以抗击南北进攻。这条线将挡住来自帕提亚的、指向叙利亚北部和卡帕多基亚南部的主要东西向入侵轴线。不仅如此，这双L形边境还将阻截西向大军的推进，不管是在幼发拉底河上游还是在该河下游，而且它还会自动地翼侧包抄突入亚美尼亚南部的西向推进。最后，边境区会得到能够满足需要的降雨（每年200毫米或更多），因而长期部署可在经济上得到维持，同时通过发展平民定居去巩固边境也会成为可行。[147]这条线的唯一现实的替代，将是沿亚美尼亚高原边缘延伸的一条边境，但这会使罗马部队离泰西封过远，以致难以威慑其统治者。

然而，图拉真的帕提亚战争并非一场有限的边境校正攻势，它通常也不被认为是一项完全从战略考虑出发的纯理性事业。冲突的起源契合罗马－帕提亚关系的标准模式：阿萨息斯家族的奥斯罗（公元110年往后的帕提亚国王）扳倒了一名阿萨息斯家族同族人阿克西达里斯——由罗马认可的亚美尼亚国王，代之以帕塔马斯帕特，而他未像公元63年协议条款要求的那样得到罗马批准。[148]到公元113年年底，图拉真已在安条克“审视形势”。[149]从公元113至117年——外交已经失败（而且并不清楚 110
双方在多大程度上认真试图和平解决危机）[150]——图拉真大军征服了亚



地图 2.8　帕提亚帝国与罗马东方

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夺取了泰西封和帕提亚国王的黄金王座（奥斯罗本人已逃遁），访问了波斯湾，并且进军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遥远的阿迪亚比尼地区，那当时似乎已经成了短命的亚述行省。[151]

各行省在被组建，附庸国王们在被接纳，以他们对罗马的忠诚取代先前对帕提亚的忠诚，而一个管理印度贸易的财政当局也显然在被组织起来。然而正值此时，灾难猛地降临。自公元 114 年以来，图拉真比奥古斯都往后的任何罗马人都推进得更远，征服得更多，但到公元 117 年夏末，他死在奇利乞亚，他的征服几乎荡然无存。新行省揭竿造反，从昔兰尼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巨大弧形地带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在昔兰尼、埃及和塞浦路斯造成了灾难性结果。作为一个业经减小和依附性的帕提亚的罗马附庸国王，帕塔马斯帕特被安置在泰西封，现在他正失去控制，而较小的附庸国王们不是在失去自己的王位，就是在失去自己被加诸的对罗马的忠诚。[152]

哈德良，罗马的新统治者和图拉真先前在东方的副手，完成了图拉真开始的战略撤退：各新行省被放弃，到公元 117 年年底，图拉真巨大征服的全部残余已只是对亚美尼亚和奥斯朗的被肯定的宗主权宣称。[153]一项头等重要的残缺的叙事资料将图拉真帕提亚战争的动机解释为很不健全的，超不过非理性的热衷荣耀，[154]而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一直接受这种解释。[155]其他解释按照理性的但非军事的目的做出，那就是控制去印度的商路。[156]一项战略目的，即建立哈布尔河－辛贾尔山－底格里斯河边境，也已被提出来作为图拉真的支配性动机，它至少在本作者看来最令人信服。

确定无疑的是，直到他渡过底格里斯河、兵临泰西封及其以远为止，图拉真在东方的政策始终与弗拉维诸帝一致。像他们那样，他继续政治整合过程，在公元 106 年兼并了那巴提安阿拉伯。像他们那样，他部署军团兵力去确保这个新行省（驻军博斯特拉，更名为新特拉扬纳）；也像他们那样，他扩建道路基础设施，修筑一条穿过东叙利亚、并且经博斯特拉和佩特拉直下红海的新干道。[157]他建立了一个顺幼发拉底河而下、溯哈布尔河而上、跨辛贾尔山脊的设防突出部，这本不会与边境改组的既定方法 111

相左——即如果尼西比斯－久格玛轴线以北的亚美尼亚被留作附庸王国的话。

对于一个业经训练的兵力资源从奥古斯都时期往后殆无增长的帝国来说,图拉真的征服显然太广泛,无法成功地得到巩固。该区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也未给罗马长期的文化/政治一体化政策提供多少余地(虽然在那些希腊城市里有重大例外)。最重要的是,图拉真的进一步征服不可能是高效的:投入的巨量努力——那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别处的安全减小——只有依靠针对帕提亚的追加安全,或依靠当地追加资源的获取才能得到补偿。而且,帕提亚没有强到值得做如此巨大的军事努力的地步,但它具备足够的复原力,足以阻止有利可图地将新行省并入帝国。

四　附庸国体系的衰落

当韦斯巴芗在公元67年冬集中其兵力于托勒密,准备进军全面叛乱的犹地亚时,四个附庸国统治者,即科马基尼的安提奥库斯四世、M.朱利乌斯·阿格里帕二世、埃米萨的苏希穆斯和阿拉伯酋长马尔库斯,为他的大军贡献出总共15 000名兵员。[158]除去在犹太战争中将全力从事围困战和游击战的韦斯巴芗的三个军团(阿波利纳里斯十五军团、马其顿五军团和弗雷滕西斯五军团[159]),在黎凡特全境仅有四个军团。其中一个(加利卡三军团)于公元68年重新部署到默西亚,因而只有三个叙利亚军团依然涵盖从红海到黑海的整个广大东部地区,而且其中的一个军团(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还一度投入犹太战争。[160]

虽然罗马与帕提亚当时和平相处(作为尼禄公元63年妥协的一个结果),虽然在该地区驻有某些不参加犹地亚战争的辅助部队,然而只是由于护卫帝国东部边境的附庸国和附庸部族构成的缓冲体系,集中兵力打犹太人才成为可能。若无这一支持而将几乎全部可调遣的帝国军团后备投入犹太战争(28个军团中的3个)本将是极不谨慎的,因为除了3个素质平平的叙利亚军团提供的以外,漫长的被暴露的侧翼全无安全。[161]

确实，东方的附庸体系当时显露出它的最高效率状态。南面在西奈，还有在犹地亚东部边境上，阿拉伯的那巴提安王国承受并遏制了长年不 112
息的游牧民小规模侵袭，[162]而且若干较小的附庸仍留存于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畔，奥斯朗是基本亲帕提亚的附庸国，然而不大可能在与罗马敌对方面与之合作。河对岸，奥斯朗面对的不是罗马领土，而是科马基尼这关键附庸国，其忠诚尚无可置疑。再向北，靠近黑海，是阿里斯托布卢斯治下的小亚美尼亚；它也与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另一个附庸国比邻而立，那就是由苏希穆斯家族的另一成员统治的的索彭恩。[163]

实际上，这意味着与帕提亚的常年敏感的边境，连同游牧民袭击的途径，系由对帝国感恩的种种力量护卫，但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此。附庸国部署自己的兵力以遏制小规模攻击，而它们对大规模进攻的抵抗无论成败与否，都会使韦斯巴芗大军能有时间最终撤离犹地亚，脱身出来用兵别处。

到公元 69 年，尼禄已死，韦斯巴芗已被拥立为皇帝，内战在进行之中。附庸国再次顺应韦斯巴芗所需大有助益：据塔西佗记载，索彭恩的苏希穆斯、科马基尼的安提奥库斯四世（此人有巨量财富可供捐献）和其他附庸国统治者襄助了弗拉维王朝的帝业；没有任何附庸国持对立的甚或不友好中立的记录。[164]此后在公元 70 年，当提图斯开始犹太战争的最后战役时，塔西佗再次记载了附庸国统治者贡献的部队；单子里包括大量由仇恨邻人之心驱使的阿拉伯人。[165]

然而，主持了附庸体系的实质性解体的不是别人，正是该体系的直接受益者韦斯巴芗。波利摩二世统治的本都已于公元 64 年在尼禄治下被兼并；[166]尽管如此，间接控制的区域结构仍本质上一如既往。然而，在韦斯巴芗即位四年之内，小亚美尼亚、索彭恩和科马基尼俱被兼并。[167]较小的附庸国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在有任何重要性的那些中间，幸存者仅为阿格里帕二世的王国、那巴提安阿拉伯（直到分别于公元 92 年和 106 年后被兼并为止）、[168]高加索诸小王国、[169]巴尔米拉和博斯普兰国。[170]

学者们如此解释韦斯巴芗的兼并政策：那是他更广泛的集权化政策

的一个方面。[171]在他依据一个新基础重构帝国的全盘努力中,行政管理中
113 央集权化与部分地仍是霸权性的帝国的领土化互为补充。弗拉维王朝的战略目标与附庸国体系的生存实际上互相排斥。诚然,当公元 114 年图拉真开始驻跸萨塔拉时,东方确实还有一些小附庸国:亚美尼亚的阿萨息斯统治者本人没有出现,但阿尔巴人、伊比利亚人和科尔奇人的小国王们确在朝贺者之列。[172]不仅如此,紧随其帕提亚战争的撤退之后,奥斯朗作为一个新的附庸国被留在后面,由曾是图拉真中意的帕提亚王位候选人的帕塔马斯帕特统治。[173]然而,尽管术语未变,但那些未遭兼并而存活到二世纪里的附庸国面目已改。虽然难以用法律方式界定,罗马与附庸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却有重要的战略内涵。[174]

对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各主要附庸国的兼并,已取代了从黑海到红海旨在"慢悠悠的外交过程"的罗马军团存在。[175]在以前仅有关于罗马最终胜利潜力的认知的地方,现在有了直接的军力部署,于是就出现了提供新的行政和交通基础设施的需要。弗拉维王朝治下,一个干道网络在安纳托利亚被建造出来;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条从巴尔米拉到苏拉的边境划界大道也很可能得到了修筑(在未来皇帝之父马尔库斯·乌尔皮乌斯·特赖阿努斯监督下)。[176]在各大干道后面,从阿拉伯的新行省博斯特拉到黑海以南仅 70 英里处的萨塔拉,一连串军团基地跨越整个地段。

韦斯巴芗治下,加拉太、本都、卡帕多基亚和小亚美尼亚领土起初被合并入一个巨大地扩展了的加拉太行省,其面积为 112 000 平方英里。奇利乞亚阿斯珀拉,即先前安提奥库斯四世领地的一部分,与奇利乞亚坎佩斯特里斯(直到那时为止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合并,组成一个新的奇利乞亚行省。当那巴提安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拉布尔二世于公元 106 年被废黜时,阿拉伯也成了一个巨大的行省,从叙利亚南部现今的德拉延伸到汉志地区纵深处的梅代恩萨利赫,同时囊括西奈半岛。图拉真显然发觉,韦斯巴芗的大加拉太过于庞大:至迟到公元 113 年,它已被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即加拉太和卡帕多基亚。[177]

帝国东部的重组需要急剧增加军团部署:其数目从朱利乌斯-克劳

狄时代的常规即全在叙利亚的四个军团,到哈德良时代已增至最终总共八个军团。[178]如此,东部前线的需要倍增,而罗马军队的军团总数(至多)仅翻了一番。因而,以前的军团部署模式提供的内置后备实际上被耗竭: 114
当全部军团为短期重新部署而被调动时,留下兵力不敷所需。正是这一点,远甚于战术性边防改组,令帝国大军丧失了它的内在弹性。

缺乏随时可平定低烈度威胁的附庸国兵力,也缺乏易于吸收高烈度攻击的附庸国领土,因而现在是帝国本身的中央大军不得不去对付这两种威胁。韦斯巴芗自己已不得不对付卡帕多基亚(即大加拉太)的"经常性蛮族袭击",而且在公元75年不得不帮助伊比利亚(位于高加索)的国王修筑工事防守前往达里尔山口("高加索门户")的通道。[179]对附庸国外交的进程可能是"慢悠悠的",而这对一位通过其军团的实实在在的权势崛起为皇帝的军人来说,或许令人心烦地难以捉摸;然而,兼并的最终结果是以削弱力量的兵力分散,取代罗马遥远但能动的军力的实际上毫无代价的投射。[180](最终,某些罗马兵力——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的一个下属单位——甚至驻扎在遥远的高加索山区。)[181]

显然,哈德良时代的奥斯朗之类附庸国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是处于帝国之外,正如老式的附庸国曾经是的那样,即使并非在法律意义上。差别是无形的,但极为重要:那是个期望问题。老式的附庸国明白,附庸国体系是帝国控制的暂时工具。如今,它成了那控制的永久替代。最终的意图——与兼并的能力——显然一去不返,随之消失的还有意欲拖延末日到来的附庸国统治者屈膝服从的主要动机。

在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治下,一个附庸国越强,它就越能履行它多样的安全功能。一个被认为能作进一步扩展的帝国,也是一个能使甚至强大的附庸国保持驯服的帝国。在新的体系下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令人满意的附庸国只是那些足够弱的,弱得足以依靠在其紧邻处部署的兵力使之长久慑服。由于缺乏兼并这终极制裁,因而只有弱小的附庸国才是安全的附庸国。然而,它们的羸弱本身使它们作为无偿的军事服务提供者不能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强的附庸国现在已变得危险,因为依附纽带

已被削弱。

在先前的体系下，甚至达契亚统治者戴凯巴路斯，也能在图拉真打赢115 了的第一次达契亚战争（公元 101 至 102 年）之后被转变为非常有用的附庸。[182]虽败仍强，一个达契亚附庸国能够承担重任，阻止对达契亚－罗马边境的渗透和袭击，并且阻截萨尔马西亚人的进攻。在先前的帝国体系下，附庸戴凯巴路斯与罗马的关系会由权势现实决定：戴凯巴路斯由于终极威胁即战争和废黜而被保持在服从状态，能够公然顺从罗马的安全需要而无虞内部反对。面对较糟的选择即帝国直接统治，达契亚人会有一种强烈的动机，去听命于一个其自身服从罗马的统治者。在新的战略环境中，情况并非如此。面对一个在达契亚防区要集中优势兵力就必遭显著困难的帝国，[183]更重要的是面对一个显然不愿扩张的帝国（像图拉真第一次战争之后未能兼并达契亚一事向大家表明的那样），戴凯巴路斯未被足够地慑服，成不了一个令人满意的附庸。[184]而且，即使他个人愿意听命于罗马，达契亚的其他人也很可能会要求一种更为独立的政策。于是可以论辩说，达契亚必须被兼并，因为——足够自相矛盾——帝国已成为显然是防御性的，它的统治者不乐意去兼并。换言之，图拉真不得不摧毁达契亚的独立，因为帝国不再有间接统治这一选择。[185]

虽然附庸部族和附庸国并未全然消失，但在一个阻绝性防御体系中，它们要么实属多余（因其弱），要么天然不稳（因其强）。在不列颠，与卡提曼都的布里甘特人的附庸关系瓦解，这可能是阿格里科拉战役和后来确立索尔韦－泰恩边境的主要原因。[186]在下日耳曼，基于悔改了的巴达维人、弗里西人、滕克特里人和攸西派提人，某种附庸结构确实留存下来。[187]可是在那里，其关系也已变化：为守护边境不得不部署正规的辅助部队团队，以取代不费帝国任何直接成本而提供地方防御的、无偿的部族民兵。[188]

至于多瑙河下游易受攻击的地段，罗克瑟兰人已经取得了危险的邻邦地位，既完全独立，又获取资助。[189]预兆一个世纪后将发生的、附庸体系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反转，附庸国与帝国之间资助关系的性质开始改变。

从起初作为给值得酬赏的酋长们的馈赠，资助变成了一种换得良好行为 116
的短期租费，无法被中止而不削弱边境地区的安全。帝国击垮它选择资助的族民的终极能力尚不成问题，可是没有一种可信的兼并威胁，激励自然不得不加大，以便维持体系依据的威胁与激励之间的平衡。[190]

在帝国的新体系中，相邻地区不再被自动地分为征服对象或附庸国。相反，它们倾向于按照长期以来一直以亚美尼亚为其原型的"缓冲国"方式起作用。缓冲国只起一种军事作用：充当强国之间的一个实有中立区，为它们提供一种避免冲突的手段，只要它们想避免的话。缓冲国对高烈度威胁不能构成积极的屏障，一般也不会像附庸国那样承担遏制低烈度威胁的责任；缓冲国不可能遭受一方或另一方的随意惩戒而不激起与之对立的强国的干涉。

虽然由于帕提亚是毗邻罗马领土的唯一文明国家，帝国的帕提亚地区独具特色，但在作为缓冲国方面，亚美尼亚并不独特。幼发拉底河正东的奥斯朗也经过许多起伏扮演了这种角色，直到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的干涉最终摧毁了它作为一个冲突避免工具的性质，使其成为又一个冲突焦点——像通常那样以宣立和废黜互相竞争的王位候选人为特色。公元123年，哈德良用他自己指定的一个人取代帕提亚指定的帕克鲁斯二世，那就是图拉真早先留在泰西封、岌岌可危地控制一个短命的帕提亚附庸国的帕塔马斯帕特。由此，奥斯朗成了一个新式的附庸国（即缓冲国），直到帕提亚的干涉扳倒了罗马指定的人为止。公元164年，在马库斯·奥雷柳斯治下，罗马再度干涉，并在与帕提亚的争斗中继续这么做，直至公元195年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治下奥斯朗最终被兼并。[191]

由老式附庸提供的多样军事服务一直是罗马军队保持集结灵活性的一项关键因素。然而，这一体系绝非没有代价：本来能够被纳入罗马化的文化-商业进程的地区未被纳入其中；本来能够被置于帝国税收全负荷之下的一些民族未被置于其下。只要由此而来的罗马军力节省在被（不管多不经常）用于实现进一步的扩张，这些代价就值得付出。然而，一旦"科学的"边境到处以最终形式被确定下来，霸权控制与进攻性军事权势

117 的能动的结合便成为多余，与之相伴整个附庸国周边体系也是如此。

五　军队

“他们的国家没有等待战争爆发才开始教人如何使用兵器；他们并未在和平时期袖手坐等，只在急需时刻才投入行动……他们从不间断训练，从不等待有紧急事态才振作奋起。不仅如此，他们和平时的演练不比真正的战争省劲；每个士兵天天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训练，好像自己参加实战。……的确，将其演练描述为不流血的战斗与将其战斗描述为残暴的演练都不会有错。”[192]约瑟夫斯就罗马军队的战备如此写道——在理论上。到那时，他的主要听众即他的犹太同胞就此事已不需任何教导。

一旦帝国动员起来打仗，有一流的将领指挥从欧洲调来的一流的军团，它就不可战胜。其时，军团重装步兵将投入行动，辅以全套各种各样的辅助轻装步兵、骑兵和投掷部队。接着，即使敌军不能被吸引出来进行近战，或在野外行动中被迂回包抄，它仍会被无情的罗马“工程”战方法击败。为了在日耳曼的陶努斯山脉与卡特人作战，导向罗马筑防高地的袭击通道在森林中全被切断；为了与偏远的马萨达沙漠要塞内最后一批犹太武士作战，罗马人修筑了一条 675 英尺长、275 英尺高的袭击斜坡，在其上端又建筑了一座高和宽均为 75 英尺的石砌平台。[193]

能将大量人员投入战斗现场，能建造所需的基础设施，能在偏远的、有时甚至荒无人烟的地区提供稳定的食品和装备供应的能力：这一切反映了罗马军事组织的高标准。[194]然而，一旦帝国的总战略由霸权扩张转向领土防御，而且是一种阻绝性防御，罗马军队所需的素质也就改变了。帝国与其军队仍需有能力部署优秀将领指挥下的大量兵力，以便打大规模战争，然而现在仅有这“激增”能力不够了。在新体系下，军队还需要有一种在全部陆上周边（它甚至在征服达契亚之前就有 6 000 英里长）的经久的防御能力。[195]

对兵力的物质上的要求，在于既能守卫边界对付渗透，又能在战争中

行进打仗。精神上的要求则是保持边防部队的战斗技能和锐气，它们被 118
指派去年复一年地履行日常的守卫和巡逻职责，或只是驻扎在军团要塞之内。这些部队全无随时投入战争、获得战利品的希望，也极少机会得到作战将领的领导或经受战斗的天然锤炼。与其他任何军队一样，对罗马军队来说，与经久地维持充分的战备标准相比，引起一种短期的"激增"式战斗反应要容易得多。只要部队在宽松舒适的环境里长期闲散，官兵们就不再像军人了。塔西佗详细地叙述了 Cn. 多米蒂乌斯·科布洛为了将他手下两个叙利亚军团（加利卡三军团和费拉塔五军团）的官兵转变为参与尼禄的帕提亚战争的军人，在公元 55 至 58 年所用的严厉的应急措施：先剔去被保持在花名册中的年老者和不适者——从未站岗放哨、对最简单的训练一无所知、甚至缺乏头盔和胸甲的人，然后令所余者久住帐篷，在安纳托利亚山脉的寒冬中训练他们。即使如此，在翌年春季的初始交战中仍屡有失利。[196]除了继续试图达成外交解决可能导致的无论何种延宕，看来在开始在亚美尼亚的得胜战役之前科布洛的军队进行了三年训练。

科布洛随后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因而必定也对剩下的两个叙利亚军团（弗雷滕西斯十军团和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施行了他那出名的严厉管束，并且以身作则，为其树立了自律楷模。然而，当公元 66 年下一任叙利亚总督 C. 塞斯蒂乌斯·加卢斯进军突入犹地亚以镇压一场规模仍小的暴动时，他竟遭大败。远征军以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为主力，还有出自另两个叙利亚军团的2 000人分遣队，并且包括 6 支辅助步兵大队、4 支骑兵队、大约 14 000 人的附庸国部队以及大量自愿参加这场看来必定是速胜必胜之役的非正规兵员。[197]

犹太人（或更准确地说狂热犹太教分子）只能集合起用矛和弓武装起来的未经训练者。加卢斯很快抵达耶路撒冷，但未能以猛攻夺下神殿山；然后，他遭迂回包抄，被迫撤退。[198]他的军队在撤退期间遭受严重损伤。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丢失了军团鹰旗[199]——一桩在大多数场合为此有理由解散部队的足够罕见的耻辱，而且据约瑟夫斯记载，帝国军队只是

在丢弃辎重、丧失掷弹和工程器械、并且遭受了5 780人伤亡后才得以逃脱。[200]加卢斯败北导致暴动演变成一项更为严重的事态。最后打败犹太
119 人是经过了一场大规模战争,一场由包括两个欧洲军团在内的大军打的战争,它们与叙利亚军团不同,不怕打大仗恶仗。

在朱利乌斯-克劳狄时期,损害了叙利亚军团实力的种种情况是东部地区特有的:地方招募,战事不多,长期驻扎;不仅如此,叙利亚军团看来被部署在城市军营而非乡村兵寨,这是一种总是被人非难的做法。[201]在后弗拉维时期,这些情况不再局限于东部。它们在整个帝国到处可见。

危险显而易见:所有军团都可能像叙利亚军团已经历的那样变质堕落。一旦确立了“科学”边境,大规模进攻战就将无处可寻,地方招募在迅速成为常规,与此同时据称令人振作的乡村兵寨让位于石砌要塞,后者很快就有了城市氛围。[202]

必须对照这一背景以及内战来看韦斯巴芗及其后继者们的军队政策。首先,西维利叛乱之后,韦斯巴芗重建军队秩序:四个军团(日耳曼尼卡一军团、马其顿尼卡四军团、普里米吉尼阿十五军团和加利卡十六军团)被解散,因为它们投降或丢失了军团鹰旗。与此同时,从两支舰队(第一和第二阿迪乌特里克斯舰队)抽调水手,充实两个军团的兵员,而且由短命的加尔巴皇帝组建的军团(吉米纳[前加尔比阿纳]七军团)被设为常规建制,连同两个新创建的军团(弗拉维亚·菲利克斯四军团和弗拉维亚·弗玛十六军团)。[203]

韦斯巴芗的即位泄露了帝国的秘密,因而在维持常规纪律这一难题之外,现在又添上了政治安全难题。内战之后弗拉维王朝的军队政策[204]的优劣长短,皆由公元88至89年上日耳曼长官L. 安东尼乌斯·萨特尼努兹尝试的反图密善叛乱[205]得以彰显。萨特尼努兹依靠拨发其储备金库的财富,能够说服他麾下的两个军团(吉米纳十四军团和拉帕克斯二十一军团)支持他的事业,然而下日耳曼的长官和军队仍旧忠于图密善,结果叛乱崩溃。这段插曲附带表明,外交渗透可以是双向的:萨特尼努兹显然收买了莱茵河对岸日耳曼卡特人的支持。可是莱茵河提早解冻,卡特

人无法履冰过河，为个人目的操纵附庸国的图谋遂告失败。[206]

当内战之后经改造的军团被重置于莱茵河畔时，它们颇为简陋的土木冬季兵营“黑贝尔纳”让位于石砌基地；随后，军团永久性基地在不列颠和帝国全境建造起来。[207]这也许是长期战略的最清晰表现：在确立了 120
“科学”边界以后，任何进一步的移动已不在期望值中；无论如何不超越固定基地据点的所及范围。[208]

在做出努力以图禁止部队有不恰当的娱乐[209]的同时，建造了宽敞和设备良好的军团要塞，它们达到了军人们（或在这方面大多数平民）直到19世纪为止——如果是到那时为止的话——从未再度体验过的舒适和卫生水准。甚至在炎热荒芜的北非沙漠，在吉米利的奥古斯塔三军团要塞（建于公元126至133年）也被装备了设施齐全的罗马式浴室，所占面积超过6 700平方英尺。[210]要给这个浴室供应燃料（沙漠柽柳）和水，就需有精致复杂的设施和办法。

医院是军团要塞和附属堡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有一些放置五张轻便小床的房间供卧床病人用，每两间病房设有一间单独的厕所。[211]军团和某些辅助部队拥有常规编制的医生（*medici*），还有护理员和医疗专门人员（*medici chirugi*, *medici clinici*）。[212]叙事史料表明，军医在医学界声誉甚高。当局必须做出专门努力去确保固定基地里部队的健康；只要频繁改变野营场所，部队官兵就能有野外随意行为，而这些行为本会在经久驻所导致慢性病。

要对付更严重的问题，即保持部队官兵的战斗技能和热情，就需要更加精致微妙的措施，这些官兵很可能终身服役但从未目睹作战行动。（从图拉真的帕提亚战争［于公元117年］结束，到公元一世纪60年代马尔库斯·奥雷柳斯的诸场战争，存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平静，仅在遥远的不列颠北疆和毛里塔尼亚才有零星的地方性战事［公元141至152年］。）解决办法是更加重视部队的选择、[213]训练[214]和职能专业化。[215]价值独特的铭文证据让我们瞥见了哈德良治下军队的操练。哈德良对非洲驻军的讲话虽是一篇官方演说，但其中分明的专业性[216]证实这证据真确。[217]

只有不间断的训练,才能保持一支已惯于无限期和平服役的军队的战斗能力。不仅如此,像公元14年的野蛮哗变已经表明、而且内战期间对克雷莫纳的洗劫将再度表明的那样,大量军人集中到军团内,他们充分
121 意识到自己作为帝国主要作战力量的固有权势,这对市民社会而言包含严重风险。因此不足怪,军队政策的主要侧重点不是革新,而是维持纪律。即使是理念宽广和精通军事的哈德良,也不是什么革新者。[218]相反,他的主要关切,是在图拉真战争引起的动乱之后恢复常规和纪律。

哈德良治下,军团被部署在固定的基地,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从未再度离开那里;士兵们不久便在围绕军团基地自发形成的各定居地有了非正式家庭。有时,人们设想这家庭化腐蚀了军队的战斗精神,从而削弱它的战斗力。[219]假如罗马军队是凭借部队的天生勇气构建战斗能力的,那么这样的看法就有道理。然而事实上,在哈德良以前很久,对井然有条、审慎有加的战争方式的偏爱就已经是罗马军队的特征。据弗龙蒂努斯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曾如此回应对其审慎的批评,说他的母亲生下的是一位将军,而不是一个武士(“*imperatorem me mater, non bellatorem, peperit*”)。[220]哈德良及其后任的军队同样如此。一如既往,罗马军队将靠健全的战术、战略方式和优越的后勤去战斗并取胜。它不需为打败敌人而效仿蛮族武士的野蛮精神。这些士兵获得固定的饷金(由图密善增至300迪纳里厄斯)、[221]退役酬报和间或的馈赠,以替代获得战利品的不定前景,而且他们还能由下列行政管理手段保持在战斗准备状态:管理、视察和仔细执行被规定的操练。

公元二世纪期间,军团装备只有小变动,[222]仅一大例外,即引入像车子那样可移动的强力射箭器——“卡罗巴利斯塔”(*carroballista*)。[223]在图拉真的军队中已有这种武器,并且在图拉真的纪念柱上可以看到它,[224]看来它已经成为军团部队发射器中最重要的一种,与少量较重并且总的来说移动性较差的投石器并行使用。“卡罗巴利斯塔”的引入必定更进一步增强了罗马在其军团业已如此擅长的高烈度战争中的优势。

然而,维持边境安全、对付低烈度威胁——罗马军队在二世纪很大部

分时间里的主要任务——要求轻装部队,其训练和装备既是为了从事高度机动但小规模的战争,也是为了从事守卫、巡逻和护送职责。因而并不奇怪,军队内辅助部队的比例在公元二世纪似乎上升了。[225]不仅如此,还 122
有一种导致军队结构和功能更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在后弗拉维时期,骑兵翼和骑步兵混合单位不是被引入,就是在数量上大为增加(骑兵翼的首次业经证实的出现发生在公元 85 年)。[226]新建制在弥合军团与五百人团辅助部队之间的差距方面显然有用,后者在兵力上不到十分之一:鉴于将不同部队合编会引起的必然摩擦,这些军事单位导致了一种更健全的总体兵力结构。

还有相反方向上的结构革新,那就是引入了新兵种"努梅里"(*numeri*),它通常被认为与哈德良相关,但可能在图密善治下就已经存在。[227]"努梅里"远不如军团或骑兵翼和骑步兵混成部队那么为历史学家所知。它们能够主要按照名称的构成得到辨认:大多数情况下先是个部族名称,随后接上个功能名称。[228]"努梅里"很可能是小于五百人团辅助部队的单位(300 人?),而且作为新近被招募的部族单位,它们保留了显著的族裔特征,那是大多数辅助部队早已失去了的。[229]据记载,它们被允许保留了它们本族的战争呐喊,而且有时据说设置它们的动因在于需要振兴现已消沉的辅助部队的战斗精神。[230]

更重要的考虑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努梅里"的兵员现成可得,而且大概成本低廉。[231]不仅如此,与常规辅助部队的兵员不同,"努梅里"的兵员是自我更新而非自我消亡的:服完役的辅助部队士兵获得公民资格,因此他们的儿子是军团而非辅助部队的征召候选人,[232]但在"努梅里"服役的士兵不是如此,他们的儿子因而可供军团外兵役之用。[233]这很重要:虽然所有兵种都常年面临征募难题,但对饷金较优的军团来说,它必定一向不那么棘手。从结构角度看,"努梅里"是较小的单位,因而更适合于在"封闭的"边界上所需的分散部署——例如在日耳曼,那里哈德良边界的西陶努斯段和奥登林山段就由"努梅里"兵员驻扎的小堡垒守护。[234]不列颠哈德良长墙各个隔里堡配备的兵员可能属于"努梅里"。在这两个场

合,假如不使用“努梅里”,就会不可取地将骑兵翼或骑步兵混成部队分割成许多小的次级单位。不仅如此,“努梅里”还有助于罗马军队的功能
123 多样化;它们不能被简单地当作是“低级”部队。

多样化的第一个要求是有更多的骑兵和射击部队,以平衡军团步兵。在图拉真战争中,非正规北非骑兵(*Mauli gentiles*)在参战部队中间引人注目,来自东方的弓箭手也是如此;两者在当时都被视为非正规军(*Symmachiarii*),后来又显现为“努梅里”。[235]虽然罗马人似乎不大可能指望“努梅里”给部队注入蛮族精力,但骑射术确是东方人的专门技能,因而见到来自巴尔米拉和苏拉的“努梅里”骑射手与例如伊都里亚的正规辅助部队并肩行动实属自然。骑射部队显然适合作为边防力量,因为它们可以对付捉摸不定的渗透者和散兵。令人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它们在达契亚波罗利森西斯设防边界的驻军要塞里显得突出,那是在喀尔巴阡山脉上,没有延绵不断的墙体屏障。[236]

在“努梅里”之外,还有某种较为隐晦不明的专门化兵力:例如在图拉真治下,一支持长矛的重装骑兵部队(*Ala I Ulpia Contariorum*)和一支单峰驼骑兵部队(*Ala I Ulpia Dromadariorum*)被组建起来。[237]前者也许是某种试验性的突击重骑兵单位,后者分明是特定地形上兵力专门化的一个例子。显然,由于罗马军队不再是一种适合在任何地方战斗的不加区分的武力,种种区域部署模式已变得有用了:单峰驼骑兵适合沙漠;马上弓箭手适合达契亚和首先是幼发拉底河流域之类“开放性”边境,轻便矛枪投掷兵(*Raeti Gaesati*?)则适合山区,等等。

大多数边界需要固定驻防部队与机动部队即骑兵的结合,前者给堡垒、瞭望塔和哨所配备兵员,后者执行巡逻和护行任务。在行省一级,通过辅助部队步兵甚或军团步兵与骑兵翼的结合,就可轻易实现兵力混成,而在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一级,依靠部署骑步兵混合单位,能够避免兵种结合带来的矛盾。后者若是五百人团编制,便看来有 120 名骑兵加 480 名步兵,若是骑兵单位编制,则有 240 名骑兵加 800 名步兵。[238]骑步兵混合单位有时被不屑一顾地贬低为低下的马上步兵,真正骑兵的传统祸害,[239]

但看来相反，它是常规步兵与轻骑兵、即依靠（与突击相反的）骚扰战术的骑兵的有机结合。如果打大规模战争，骑兵与步兵就会各自独立作战，而非混成作战，[240]可是为了履行常规的边境安全职责，显然要有机地运用骑步兵混合单位的骑兵－步兵混成，以步兵守护边防体系的固定据点，同时以骑兵巡逻涵盖其间的各周边区域。 124

缘自部署于经久性基地的军团地方化引起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打大规模战争所需的灵活性何在？如果这些军团不再能够离开它们的基地，那么远征部队从何而来？部分答案（就烈度中等的战争而言）在于依据辅助部队的远征军团，例如像二世纪中叶安东尼·庇护治下在毛里塔尼亚的作战那样，当时在非洲仅有的一个军团（奥古斯塔三军团）得到了辅助骑兵部队的增援，后者被派入波图斯马格努斯、卡滕尼和蒂帕萨海岸前进基地。[241]（在蒂帕萨，现已发掘出一道长 2 400 米的围墙；它曾为从欧洲海运来的兵力提供了基地安全，这些兵力包括两个不同的骑兵单位、一支马上弓箭手部队和一支持长矛的重装骑兵部队。）[242]这样的部队在从事真正的战斗以前，必须先适应环境，而在登陆地点为之提供一个安全的基地显然是明智之举。

然而，罗马军队不能免却打大规模战争所需的军团部队。三个军团看来全都整个被派往东方，从事马库斯·奥雷柳斯的帕提亚战争。（它们是来自下日耳曼的波拿［波恩］的米纳维亚一军团、来自潘诺尼亚的阿昆库姆［布达佩斯］的阿蒂厄特里克斯二军团、来自下默西亚的特罗斯米斯［靠近加拉蒂］的马其顿五军团。）[243]远为经常的是使用从军团中被抽出的分遣队（*Vexillationes*），其规模从百夫长为首的很小单位到军团使节指挥的庞大阵列。[244]使用分遣队长期以来就是业经确立的惯常做法，在后图拉真时代更是远为多见。作为一个整体，军团形成了众多地方附属群，不能轻易被调遣，因为士兵们不大可能容忍与自己的（尚为非正式的）家庭无期限地分离。但是，在每个军团中仍可找到一两千人，他们身无羁绊，可供远离基地的大规模战争之用。

除了士兵们不愿离开家园外，不调动整个军团还出于一个大得多的

障碍,一个有力得多的原因。由于边境安全现在依赖军队原地驻扎(而非依赖他人对军队的遥远权势的看法),因而调动军团很可能导致地方层次上维持跨边界控制的外交结构迅即瓦解。这反过来,又很可能促发对帝国领土的攻击。诚然,边界对面的族民日常大多与驻在周边要塞的
125 辅助部队打交道,但是帝国领土完整最终由各军团的集中权势发散出的"遏阻性说服"来保障。它们的调动必然倾覆地方上的力量对比,使威慑失效,从而不得不依赖留在原地的部队的"战争搏杀"能力。

在马库斯·奥雷柳斯治下,三个军团全部(以及若干分遣队)被派去打帕提亚;其时,受影响各省的总督被要求靠"外交"去弥补军团的调离。并不足怪,没有威慑,外交控制体系便告瓦解,在帕提亚战争胜利结束后立即促发了马库斯·奥雷柳斯的北方战争。[245]在战略性规模上使用分遣队有效得多,如同公元 83 至 85 年在图密善治下已被显示出来的那样,当时在日耳曼的 C. 维利乌斯·鲁弗斯拥有一支从 9 个军团抽调出来的部队归他指挥。[246]辅助成分和军团总部因而能被留在原地,连同年长的和已婚的士兵——恰是那些不那么可能在遥远的前线有用、但在防守方面更有可能尽其全力的兵员,而所以如此出于同样的原因,即边境已成了他们的家园,成了他们家庭的居所。不仅如此,擅长与边界对面当地人打交道的军团军官和军士也会留在驻地,作为一种威慑的军团之心理"存在"也会如此。它因规模适中的分遣队离开而会受到的影响很可能较轻。无论如何,在帝国所有各大地区,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道路和供应仓库的发展会使得军团的支持要素和后勤成分就远征目的而言成为多余的:地方性的支持要素,连同已在战区的基地基础设施,无疑能被"拉伸"到容纳仅由军团战斗骨干(即步兵大队)构成的分遣队。这顺便也会减轻运输困难。

最后,还有挑选兵员这一因素。除非被他们的原来的部队挤出,而非由分遣队长官挑选,分遣队成员倾向于比一般军团士兵年轻健康。他们也很可能是没有家庭牵挂的士兵,适于从事运动战和进攻战,如同留在后面的年长有家室的士兵适于从事防守。

六　结论

各远征部队是从一支到处久驻边境固定据点的军队选拔出来的，不能伪称它们会拥有像早期元首制下的战略机动大军一样强大的战斗力。126
旨在阻绝性防御的优化战略——即使绝非“封锁线”战略——也不可能享有很高比例的纯“可调配的”军事力量，那是先前霸权控制和机动大军体系享有的。公元66年，在尼禄治下，三个军团能被调至犹地亚而不给体系造成明显的紧张，可是到公元116年，图拉真的军队显然已被拉伸到接近崩裂极限，而到公元166年，马库斯·奥雷柳斯的军队已经更加如此。最后，体系弹性的减小不得不依靠征募两个新军团（意大利卡二军团和三军团）去弥补。[247]体系安全依赖的余地已减小到了危险地步。

127

第三章　纵深防御

三世纪的大危机与新战略

由奥古斯都发明的政体装置——元首制的突出优点，在于它将共和传统与专制效率调和起来。它的突出缺陷，则在于继承方式既非王朝的亦非真正选举的。当一位宽容的皇帝选择一名能干的继承人并将其收为养子时，一切皆好。收养满足了军队和平民的王朝情感，又不冒犯元老院的反王朝偏向。然而，倘无合意的亲子又未作任何收养，那么成为皇帝的是通常靠武力能够自封为帝的人。

在幸运的二世纪里，图拉真(98－117年)被内尔瓦收养，他自己则收养了活到公元138年的哈德良。哈德良接下来收养了安托尼·庇护(138－161年)，庇护则收养了两个儿子：死于169年的卢修斯·韦鲁斯和统治帝国直至180年的马库斯·奥雷柳斯。

其后，成功收养之链不幸断裂。马库斯·奥雷柳斯没有收养儿子，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完全不适合自己继承了的帝位。192年，康茂德被谋杀。三个月后，他封立的继承者、年长的佩蒂纳克斯亦被谋杀。禁卫军作为罗马实际上最强的军事力量，是帝位继承的直接仲裁者，而禁卫军选择出卖帝位。购买者狄策乌斯·尤里安没有活过这一年。潘诺尼亚长官塞
128 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带着多瑙河边境诸军团的优势兵力，靠进军罗马登台，要求帝位。然而，倘若一个行省长官能够自立为帝，那么另一个也能。塞维鲁不得不打了五年毁坏性的内战：拥有其他军团的其他行省长官争夺帝位，正如塞维鲁本人已做的那样。

击败其对手之后，塞维鲁投身于成功的对外战争，直到211年在约克阵亡。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卡拉卡拉和盖塔共同继承皇权，像康茂德做过

的那样,并且功过相等。212 年谋杀其兄弟后,卡拉卡拉于 217 年亦遭谋杀。靠谋杀和内战继位现已成为常态。

从 211 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自然死亡到 284 年戴克里先即位,有 24 个多少合法的皇帝和更多的篡位者,亦即无法控制罗马的统治者。其中大多短命,但某些篡位者统治帝国相当大部分达若干年。事实上,这个时期里最长的一段统治由一名篡位者波图斯穆斯行使,此人控制高卢长达九年。诸"合法"皇帝的平均统治时间仅为三年。一名皇帝德西乌斯(249 – 251 年)在与哥特人打仗时阵亡;另一名皇帝瓦勒里安(253 – 260 年)被波斯人俘获并死于囚中;克劳狄二世(268 – 270 年)死于瘟疫。其余皇帝和多数篡位者或被谋杀或死于内战。

帝国体系核心处的暴烈动乱必然招引外部入侵。然而也有理由认为,外部威胁业已径自增大。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帝国的七零八碎的传统邻邦已在二世纪期间结合为大得多、也危险得多的各聚合体,甚至在帝国内乱开始以前便如此。帝国现在面对的不再是一世纪和二世纪里得到记载的众多部族——弗里西人、布鲁克特人、滕克特里人、攸西皮人、卡特人、赫曼杜里人等等,而是规模更大的法兰克和阿勒曼尼各部族联盟,它们能够集中多得多的兵力攻击边境。在那么长久地面对单独一个敌手——其单一的文化已无一例外地渗入它们各自的生活——之后,不同的蛮族找到了一个对抗帝国的共同文化基础。就罗马外交而言,对现在多有共同之处的族民图谋分而治之已困难得多。

在东方,帕提亚羸弱的阿萨息斯政权大约在 224 年被波斯萨桑尼德王朝推翻,新的敌人立即证明比旧的强大可怕得多。这一变化对帝国有灾难性后果,因为其整个遏制战略由此失衡。与他以前的任何罗马人相比,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对帕提亚作战都更成功,而且其成功已通过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布尔河 – 辛贾尔山线上确立"科学"边境得到巩固。然而,这不足以遏制一代人后波斯的进攻。 129

内部冲突与外部入侵不仅两相并行,而且恶性互动。对罗马而言幸运的是,军队地方化(大多数现代史学家喜欢非难之)已被大大促进:它

必定对急切的觊觎王位者起了刹车作用,因为士兵们不大可能被引诱离开边境去打内战,如果他们自己的家庭和田园因此会暴露在外部入侵者面前。然而,军队已过于频繁地离开已遭攻击的边境,在皇帝和篡位者们互相间的私人战争中打仗。外部攻击与内部不稳之间还有更微妙的联系:地区性篡夺部分地是一种反应,对中央政府未能给边境地区提供安全的反应。

内部混乱与外部入侵的这一互动有灾难性后果:三世纪的历史多半是一部入侵史,其中许多因内部争斗成为可能,某些入侵如此深入,以致罗马本身须筑城墙防范。奥古斯都往后所建所得有许多被无可挽回地摧毁。关于帝国的完整观念也是如此。

许多时候,即使正遭外部攻击,当时的皇帝仍不得不去注意内部威胁:保护帝位比确保遥远边境的安宁重要。有时,外部安全被直接牺牲,以利内部安全:阿拉伯的菲利普(244 至 249 年)放弃他的前任和受害者戈尔狄安三世(238 至 244 年)的波斯战役,以求迅速达成条款不利的和约,目的在于返回罗马宣告拥有皇权,抢在另一个人能够这么做以前。

关于大一统帝国的理想仍占支配地位,某种文化爱国主义变得流行,对秩序的热切渴求依然普遍:这一切都由戴克里先恢复帝国政治稳定和领土安全的努力迅速成功得到了证明。戴克里先(284 至 305 年)经军队阶梯由农夫崛起为皇帝,然而到他紫袍加身时,他已既非农夫,亦非头脑简单的军人。在半个世纪的混乱和危险中久经历练,戴克里先无情地实行一种内部管制和边境全面巩固的政策;前者的一个例证是他那著名的价格法令,后者的则是环绕整个帝国周边建造的大量坚固的堡垒。

戴克里先本人是一种全然无规则的继承体系的受益者,他创设或至少应用了一项将消除内战危险的了不起的政体独创方案。四帝联治(the tetrarchy),即四人联合统治,将以一部机器似的可靠的规则性产生帝国
130 的未来统治者。将有两位平等的共治皇帝,一位治理西方的奥古斯都和一位治理东方的奥古斯都;286 年,戴克里先立马克西米安为西方奥古斯都,他自己保留对东方的直接大权。然后来了一项精致化措施:每位奥古

斯都之下都要有一位次帝(junior emperor),称为凯撒;293 年,戴克里先立加勒里乌斯为他自己的凯撒,并选择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洛卢斯为马克西米安的凯撒。每位凯撒要与奥古斯都的女儿结婚,并且最终继承之,然后选择一位凯撒作为自己的次级伙伴。四位统治者即四帝能够同时在同样多的地段作战,帝国境内没有任何大区会在任何时候像过去那样被撇下无人照料,从而孳生篡夺者。305 年,戴克里先(与其奥古斯都同僚马克西米安)逊位,隐居到达尔马提亚的一座灿烂的宫殿,成为仅有的一位自愿引退的皇帝。到 309 年,四帝联治机制业已瓦解。此后全无可预计的自动的继承,因为有六个人争夺奥古斯都称号。尽管如此,双重控制体制延续下去,直至西罗马帝国结束,公元三世纪混乱不堪的继承争斗没有重演。

一座宏伟的宫殿毁为废墟,帝国在四帝联治下得到重建,但它被重建成一座坚固严峻的堡垒。这一转变的中介是一套被完善了的实物税制,它无情地从一个成了巨型后勤基地的帝国抽取帝国防御所需的食品、饲料、衣物、武器和金钱。在军事领域,四帝联治这一改革标志了世纪性转变——从二世纪可靠的领土防御转变为晚期衰落帝国的纵深防御——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四帝联治时代是一段严酷和痛苦的创新时期,由一位甚至最具敌意的史料也无法完全遮蔽其素质的人主持。戴克里先的严厉统治乃帝国及其文明之艰难拯救的关键,而看似欢乐祥和的君士坦丁时代却是最终灾难的开端。

一　体系概述

倘若面对足够机动足够强大、以致能在任何经选择的穿透轴心上突破防御周边的敌人,那么原则上有可供选择的两种防御方法。第一种通常被描述为“弹性防御”,它使完全放弃周边连同其防御工事和相关的基础设施成为必要。转而,防御将仅仅依靠机动部队,它们应当至少像进攻部队一样机动。然后,双方在同等条件下战斗:防御能像进攻一样集中,

因为它不需派兵据守任何固定的阵地,也不需分兵保护领土;另一方面,
131 防御由此牺牲掉它通常固有的一切战术优势(唯熟知地形除外),因为双方均不能选择场所,遑论就它预先筑防。

第二种方法是纵深防御,基于两者的结合:一是各自独立的据点,二是部署于它们之间或它们后面的机动部队。依据这种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很多变形的方法,战事不再是结构相似的军队之间对称的较量。虽然只有进攻方拥有集中兵力的充分自由之利,但防御方拥有各独立据点与野战机动部队之间互相支持之利。倘若各据点富有生力,足以在攻击下存活下去而无需机动部队的直接支援,倘若机动部队能够抵挡或规避野外集中攻击而无需各据点的掩蔽,而且倘若进攻方最终必须攻克据点才能取胜,[1]那么成功的纵深防御的条件便告齐备。进攻方迟早将面对固定据点与机动兵力协力行动的优势力量。

这些因而是应对战略性穿透挑战的两大选择,周边防御不再能可靠地遏制这挑战。两种选择都不能提供密集的周边防御的阻绝性安全,但两者都更富弹性。在战术层面,这两种方法导致大为不同的部署和作战行为模式。然而在战略层面,这两种方法之间质的差异不如它们的应用规模那么重要,因为两者都能要么在区域基础上横跨一切设防领土被应用,要么在纯粹地方性层次上被应用。随应用规模增大,体系的短期弹性也增大,但可以成为战场的领土纵深也必须增大,而这包含分明的社会代价。

由于罗马人已在二世纪里形成一套全面的周边防御体系,因而对马库斯·奥雷柳斯治下发生的对帝国周边的首次严重穿透(约 166 年),他们的反应是递增性和补救性的。弹性防御体系和纵深防御体系都未被采纳。与之相反,在周边最易遭攻击的地方,边境防御工事得到加强,驻防部队得到增加。两个新军团(意大利卡二军团和意大利卡三军团)被组建起来,分别部署于诺利康和雷蒂亚——两个至此未由军团驻防的省
132 份。[2] 甚至当战略后备兵力的首批核心在一代人之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治下)形成时,基本的周边防御战略也未遭放弃。相反,做出了进一

步的努力，去建造追加的防御工事和增加据点驻防部队，从而修补边境体系的局部不足。

迟至三世纪中叶大危机期间帝国防御的混乱的解体之后，才做出明确的行动去采用一种新战略。在边境防御被完全攻破的时候和地方，补救性战略仅能采取弹性防御形态，然而在有可能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的范围内，浮现出来的战略具有纵深防御特征，基于固定的边防兵力与机动野战大军的两相结合。然而，三世纪后期之采纳纵深防御战略既非完全彻底，亦非确定不移。**每逢这战略显示出经久成功的迹象，它就立即遭到抛弃**。一旦罗马军队能够迫使敌人复归防御，或最好复归依附性的附庸地位，就立即做出所有各种努力去恢复先前的阻绝性安全体系。这是三世纪末戴克里先军事政策的实质，并且是他的后继者中间那些较幸运的皇帝的军事政策的实质，直到瓦伦提尼安一世为止（364 至 375 年），其时做了最后的持续努力去搞帝国领土的阻绝性防御。

对纵深防御战略的长期依赖导致维持敌人入侵与防御方最终反攻之间的一种稳定的平衡成为必需。入侵必会发生，而且除非它异常虚弱，要阻止它已不再能依靠在边境线本身加以拦截，因为其驻防军分布稀疏。敌人在边境上仅仅遇到固定的防护哨和虚弱的巡逻部队，能够经常越过边境线而实际上不遭抵抗，然而在纵深防御背景下这不再意味着防御体系已被“倾覆”和攻克。相反，敌人将发觉自己处于一个纵深变动的外围战区，在其内大小据点、围以城墙的城市、筑有工事的农庄、设防的谷仓和避难所将被保留下来，每个都能经久地抵抗没有装备围攻器械的敌人。在这战区内外的是防御的机动部队，为野战而被部署，但有工事设防场所的支援。

此等支援能够采取几种分明不同的形式。[3] 第一，经工事筑防的独立据点能够用作供应仓库。帝国后期，罗马军队最重要的尚存对敌优势是其后勤优势；罗马的胜利常常是吃饱喂足的罗马军队与饥肠辘辘的入侵者之间对抗的结果，那些入侵者在它们已蹂躏的地区未能找到不加防守 133
的食物储备。[4] 在构筑了工事的据点中的食物和饲料储存是敌人得不到

的,同时却现成可供防御部队在进军收复暂时被蹂躏的领土时使用。从后勤观点看,边境线上食物储备库的位置极佳,因为由此在最需要补给的地方即部队目的地有补给可得。骑兵能够以每天 50 英里的速度穿越国土,但罗马人可得的任何后勤运输无法跟上。甚至在步兵行军于良好大道的情况下,终点站补给也会极大地优于基线供应,因为人能够以每小时 3 英里的速度行军,重载辎重车的速度却无法大大超过每小时 1 英里。[5]

构筑了工事的据点的第二项功能是更加纯战术性的。甚至在整个周边没有配备足够的人力以阻绝入侵的情况下,边境上的固定防御点也能有益地起屏障作用。帝国后期,无论是为持久抵抗而被重建成“硬”要塞的老式基地,还是全新的堡垒,都用于杜绝易入渡口和易越山口的通行便利。在一种合理的选择性纵深工事筑防谋划中,目标在于通过杜绝自由使用较便利的通行点,横跨全地区地将地形障碍的效果均等化。这就是作为帝国后期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特征的、在浅滩对面建筑沿河堡垒的基本理由。

纵深防御谋划中独立的防御工事的第三项功能,是提供后方安全和后方情报。帝国部队必须尽可能快地行进,以达到新战略要求的兵力快速集中,因此它们经不起为阻滞敌人入侵而阻断它们自己的交通。[6]为了确保愈益集结的帝国部队和供给车辆安全通过以及民用交通便利,同时不让敌方帮伙通行无阻地使用道路,沿着大道每相隔一段距离就修筑起路旁堡垒。配备小分队的路旁堡垒虽然无法有效地阻挡敌方大部队通过,但它们至少能够阻截散兵游勇和粮草征收队,或者迫使敌人费时绕路。还有,在期待会赶赴遭攻击地区的救援纵队的情况下,缓兵就是目的。三世纪入侵期间,在建筑路旁堡垒以前,相当小的蛮族帮伙已经能够
134 利用正是为了便利帝国境内行进而修建的大道,迅速渗入腹地数百英里。

独立据点的第四项功能只是当有效的机动部队留在驻防要塞时才至关重要。这些部队能够从后方出发攻击入侵之敌,一旦敌人有力回击,便返回它们的墙内安全栖所。此类行动不仅会损耗敌方,而且也会将敌人暴露在一种高得不能再高的兵力集中面前。这可能是关键性的,因为罗

马机动野战部队面临的主要战术难题是去抓获难以捉摸并且分散的入侵兵力。

独立据点的第五项功能是通过提供临时庇护所,保存处于压力下的机动部队的实力。在纯粹的弹性防御战略下,寡不敌众的防御部队面临无情的抉择:要么逃遁,要么战败。然而若有据点可用,寡不敌众或被击败了的机动部队就不一定被歼,甚或不一定四散奔逃。对帝国而言,维持难得的训练有素的兵员供给一直是根本大事,而据点就此有双重作为:将墙内驻防军的防御实力最大化;给否则会被歼灭或被逐出战场的机动兵力提供临时庇护所。

这些据点确实有一项潜在弊端:坚固的护墙和高耸的壁垒能够最终消蚀它们所容兵力的进攻动力,因为它们凸显了一个差别:野外战斗相对不安全,固定据点却安然无恙。然而,这并非不可避免。有如当今的情况,防御工事的损伤士气效应能靠适当的训练和合适的领导予以抵消。"马其诺防线"综合症是可以避免的:领导乏力的确实孬种的部队如果不被提供防御工事,也一样很可能被逐出战场。

我始终假定,只要有正常的人力配备和物资供应,有防御工事的据点一般能经久地抵御直接进攻。然而,一世纪和二世纪的罗马堡垒并非如此。军团"要塞"和辅助"堡垒"那时只是居住系统,除墙以外,没有任何筑防据点特色。这完全符合它们的作用,即用作战术性进攻行动的基地,即使它们是在领土防御的防御性战略框架内起这作用。这些"要塞"或"堡垒"仅由单薄低矮的墙垣保护其宽广的地面,且其狭窄的外围堑壕只是意在排除渗透者(或至多是挫钝突发冲击的势头),因而它们无法挡住 135
坚决的进攻者。即使最原始的敌人,[7]也能想到用简单的攻城锤击破仅约5英尺宽的墙体。[8]边境上的部队基地同样不适于战术防御;它们只是跨交通线而设,以供后勤和居住便利。归因于宽广的内部设计和周边的形状(典型的是个长方形,而非周边最短的圆形或椭圆形),围墙相对于驻防军的兵力而言是长了一些。[9]不仅如此,这些墙体一般缺乏战斗壁垒和突出的塔楼(从那里在遭攻击时可以保住其间的墙体)。如果有塔楼,那

么它们通常是装饰性的（即不突出的），有如在约克（伊布拉库姆）的图拉真堡垒，那里基底部位30平方英尺的塔楼仅从周线凸出两英尺。[10]最后，一世纪和二世纪的基地缺少宽阔的墙外小道和壕沟（将围攻器械挡在远处）、升高的内部地面（以挫败挖掘企图）、可防守的大门和突围口。所有这些设置在三世纪及其后的罗马防御工事上都成了常有的，它们被整合进多种多样将在50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保持为军事建筑典范的设计之中。

间或有人提出，罗马军事建筑的这种变迁系由罗马敌人的围攻技术的突然改进促成。[11]这似乎极少可能。技术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反映，而蛮族社会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确实，有文献提到，哥特人在267年第三次围攻菲利普波利斯（位于马其顿）和269年围攻锡德（位于吕基亚）时使用了"机器"，然而大可怀疑这些机器是简单的撞击锤或攀登塔以外的任何东西。实际上，这些证据显示，蛮族围攻技术在一至六世纪之间改进甚微。[12]另一方面，萨桑尼德家族治下的波斯人的围攻技术已明显提高。

对罗马军事建筑革命的此等"战术"解释难以置信，然而有一项清晰的战略解释，它是任何纵深防御战略内在固有的。罗马基地所以作为工事筑防据点得到重建，不是因为蛮族当时已经学会如何攻破简单的墙体——他们肯定一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敌人尚未取得重大的围攻能力。除非据点能够抵御近距包围，纵深防御会迅速瓦解为最差一类"弹性防御"。另一方面，蛮族缺乏装备去攻破兵员充足的认真的防
136 御，并且无法饿垮给养充分的防御者，因而据点能够在救援到达以前抵抗下去，然后履行它们的若干支援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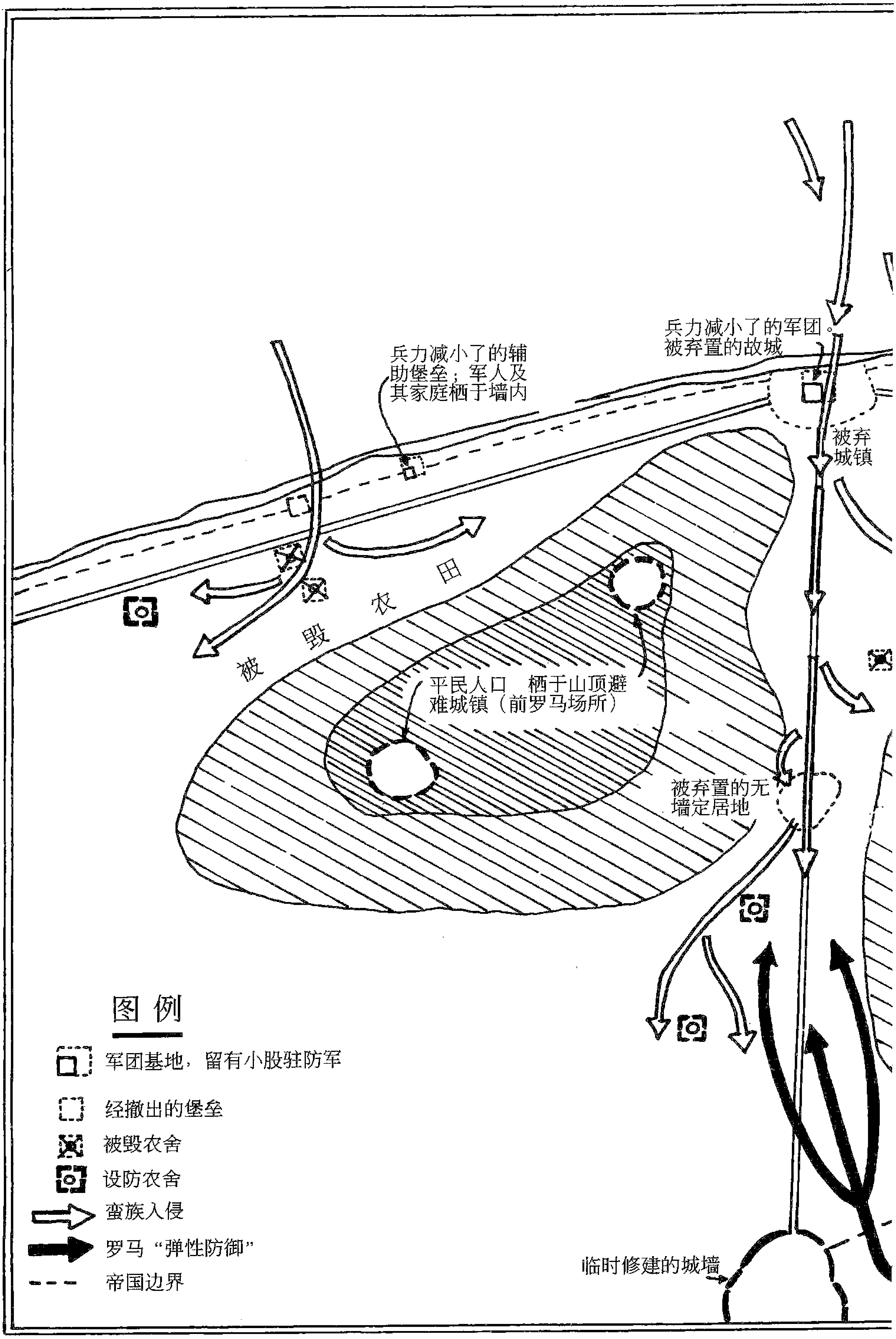
罗马纵深防御战略的总特征是一种"后方"防御，与先前边境战略的"前沿"防御特征相反。在这两种战略中，敌人都必须最终被阻截；但是，前沿防御要求在边境之前阻截住敌人，从而境内的和平生活可以不受损伤地继续下去，后方防御却规定只在帝国领土以内阻截敌人，与此同时由堡垒、乡镇、城市、甚至单个农舍的点状防御遏制敌人的劫掠。早先的阻

绝性安全体系在它对社会的裨益方面显然优越，然而面对已变得能够在任何狭窄的边境地段上集中压倒性兵力的敌人，维持这体系的代价高得承受不起。不仅如此，这体系不具弹性，因为在边境的线性防御后面一无所有。相反，纵深防御能经受得住哪怕严重和经久的渗透而不全然崩溃。并且，这弹性补充了整个帝国战略的灵活性：面对在不同地区的多种威胁，野战大军能被重新部署去逐一对付之，因为与此同时不会遭受任何不可弥补的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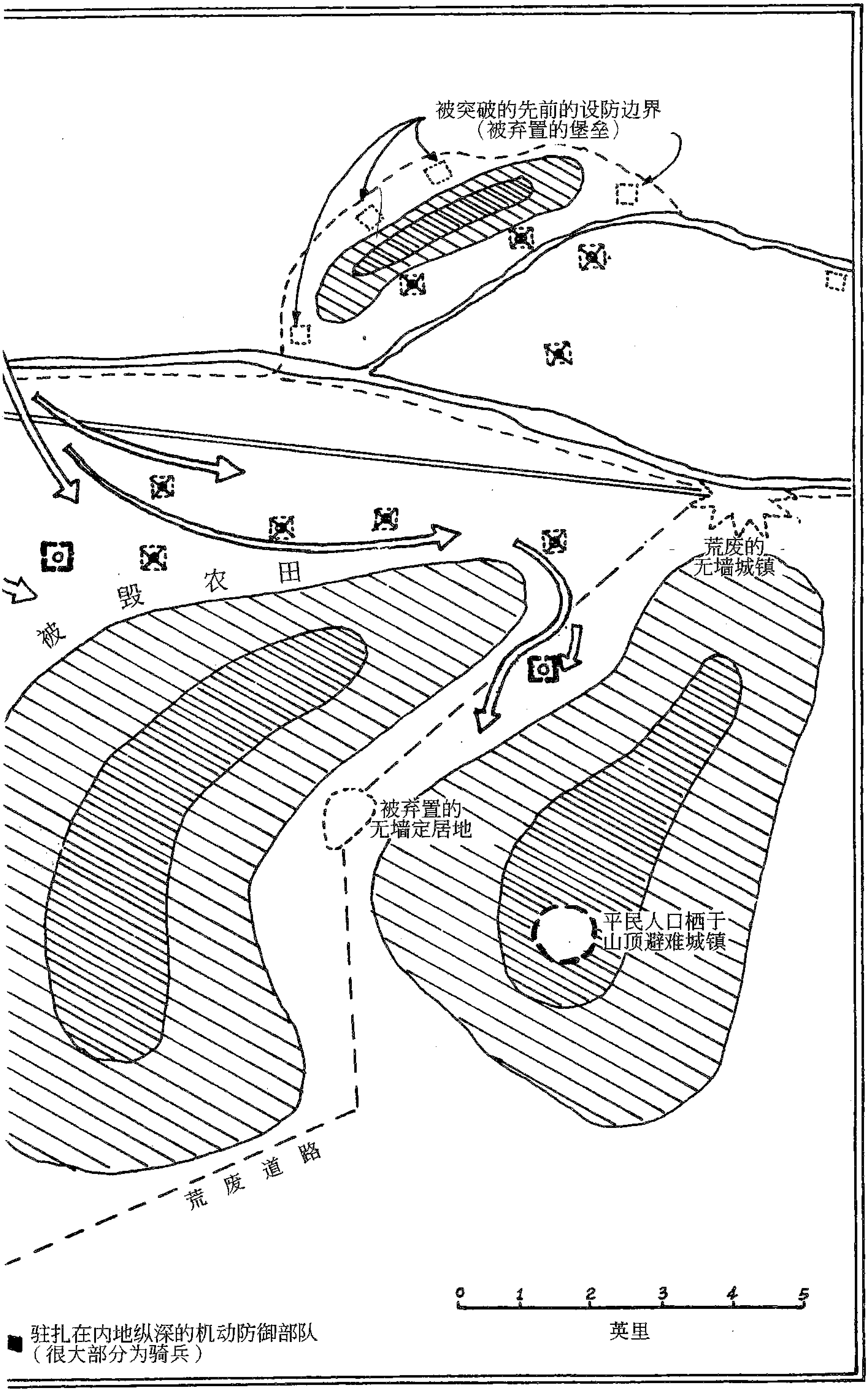
然而，帝国中央当局的战略理由与行省人的最佳利益是两桩大为不同的事情，而这不同将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三世纪的众多入侵与在不列颠、高卢、埃及、北非的众多继承直接有关。行省安全已经为了帝国整体的安全被牺牲掉了，行省人未能接受体系的逻辑这一点可予谅解。

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特有的平衡通常维持不了很久。有一种内在趋势，令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让位于暂时恢复早先的前沿防御战略；如果这战略证明不成功，它就让位于一种被迫施行的“弹性防御”。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的目的，即确保对帝国领土的终极拥有，被提升为安东尼时代的目的，即针对所有层次烈度的威胁，阻绝性地保护全部帝国领土。不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的目的必然降至最低限度，即保障常常由皇帝本人率领的野战机动部队的生存。有时，尽管有“弹性防御”（据此总能在后撤中 137
谋求安全）的一切战术灵活性，帝国军队仍然甚至不能确保这最低限度目标：因而我们看到，251 年，德西乌斯皇帝在现今多布罗加地方征战时被高卢人杀死；260 年，瓦勒里安皇帝在埃德萨城墙前被波斯的萨桑尼德统治者沙普尔一世俘获；还有一切失败中最严重的，即 378 年，瓦林斯皇帝与一整支野战大军一起，在阿德里安堡大灾难中被西哥特人全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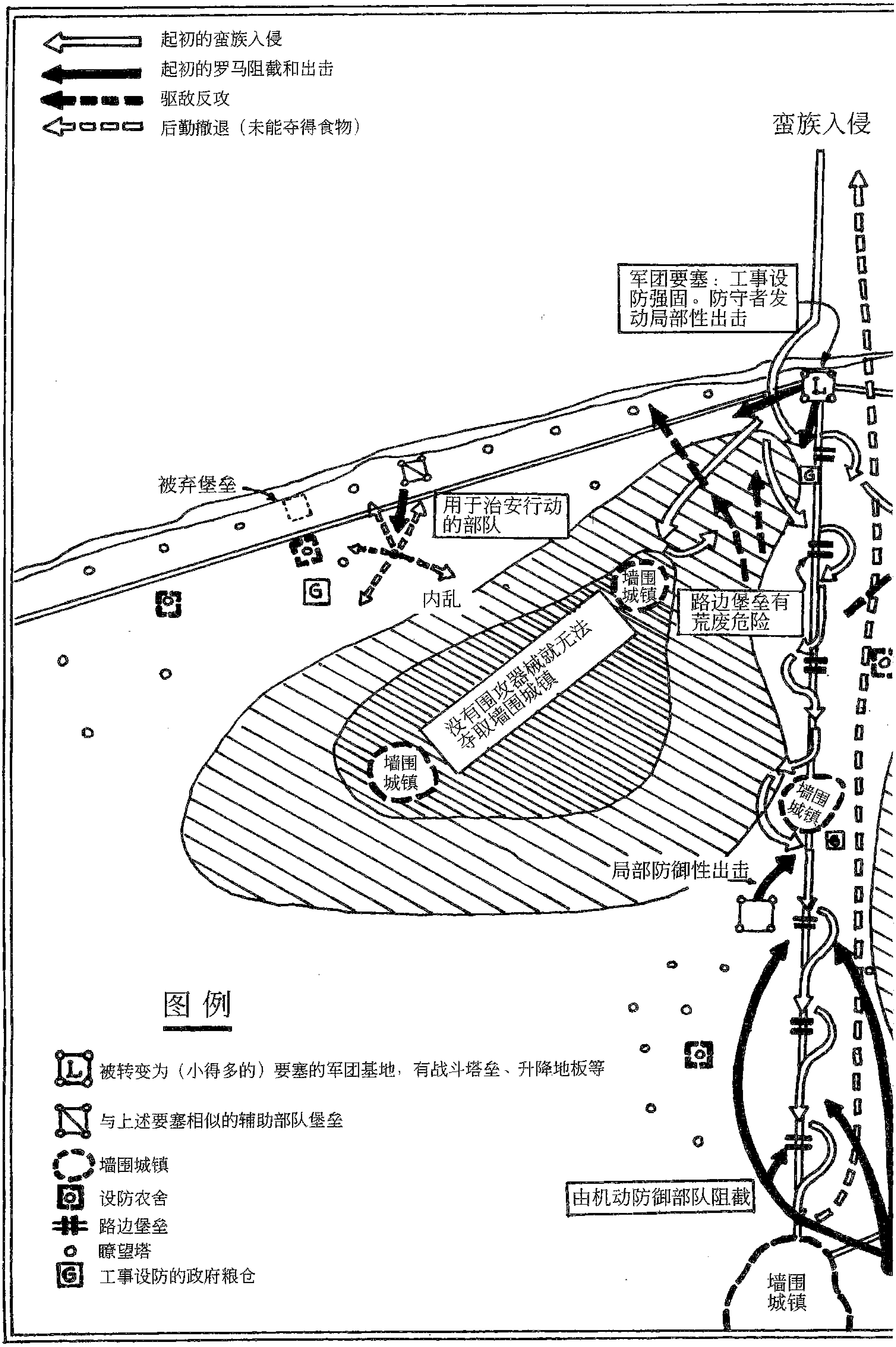
即使在既不全然回归阻绝性防御，也不降至纵深弹性防御的时候，战略动能也天然地不稳定，主要因为成了战斗区的防守区同时也是帝国范围后勤基地的一部分。罗马人并非面对单单一个敌人，甚或一群固定的敌人，其最终失败将确保永久安全。不管罗马的胜利有多丰裕，帝国边境总是会依然遭到攻击，因为它们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世纪性迁徙潮的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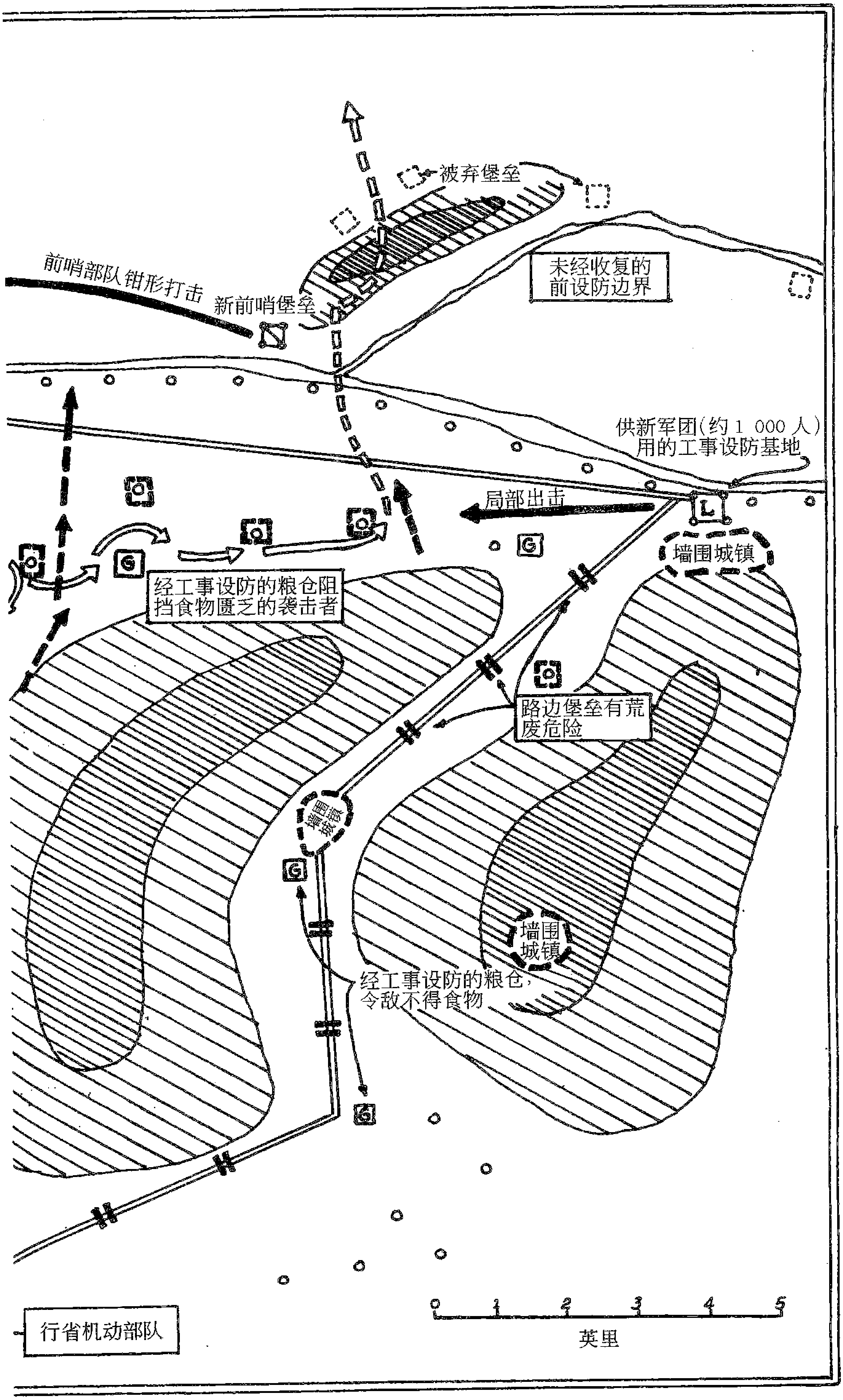
图示 3.1　边防作战方法：弹性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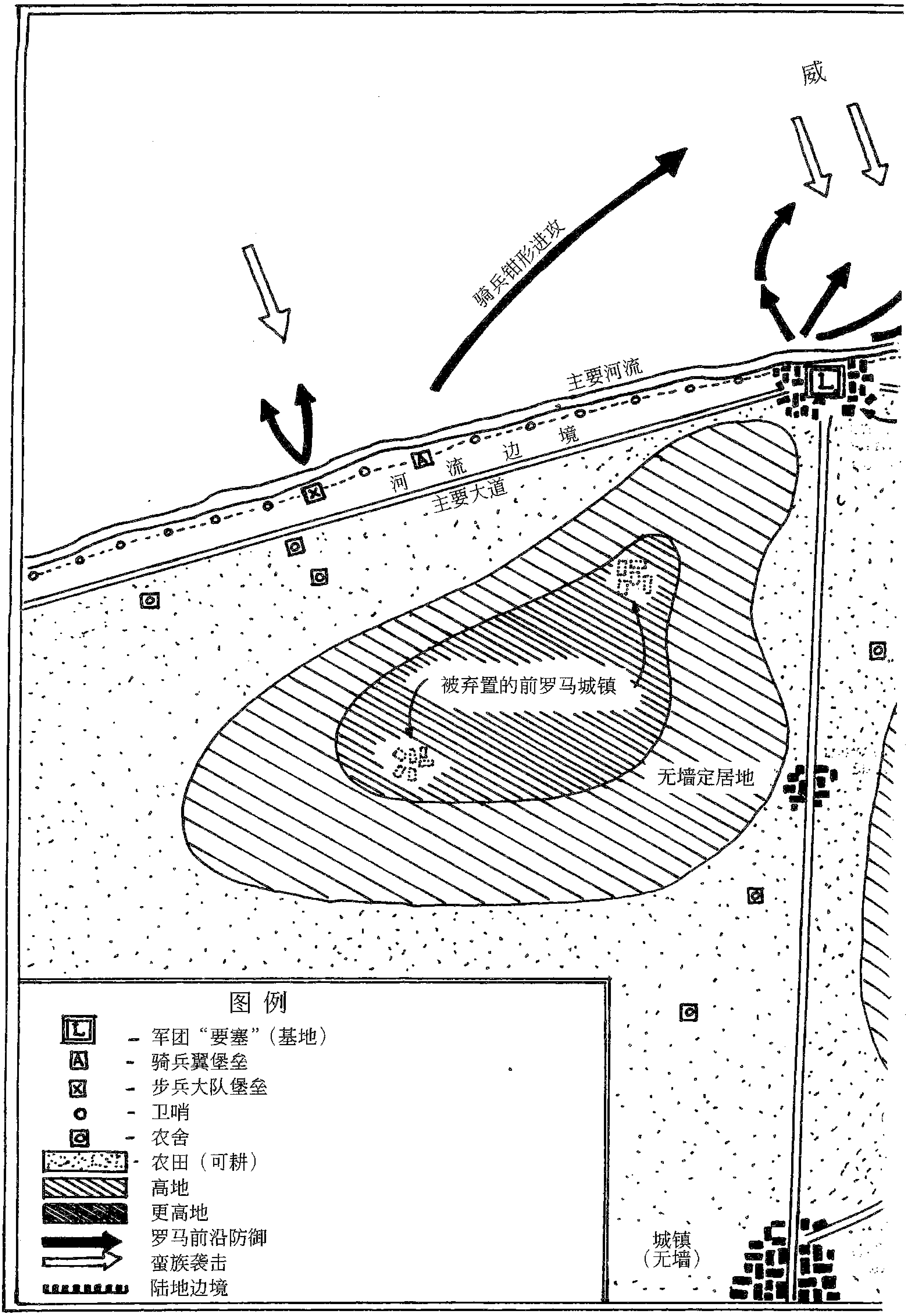
被突破的先前的设防边界
（被弃置的堡垒）
被毁农田
荒废的
无墙城镇
被弃置的
无墙定居地
平民人口栖于
山顶避难城镇
荒废道路
0 1 2 3 4 5
英里
驻扎在内地纵深的机动防御部队
（很大部分为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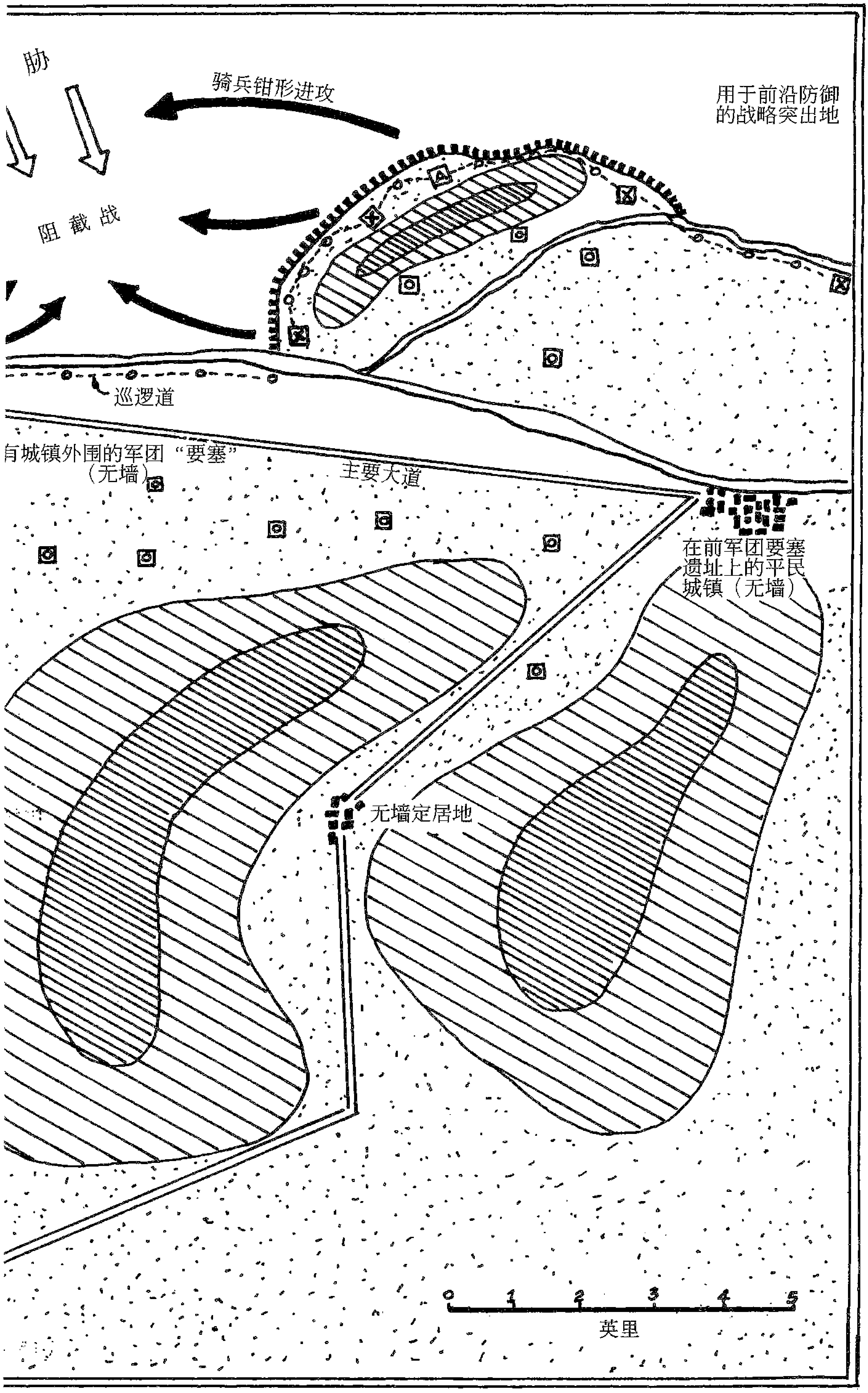
图示 3.2 边防作战方法：纵深防御



被弃堡垒
未经收复的
前设防边界
前哨部队钳形打击
新前哨堡垒
供新军团(约 1 000 人)
用的工事设防基地
局部出击
墙围城镇
经工事设防的粮仓阻
挡食物匮乏的袭击者
路边堡垒有荒
废危险
墙围城镇
墙围
城镇
经工事设防的粮仓,
令敌不得食物
行省机动部队
0 1 2 3 4 5
英里



图示 3.3　边防作战方法：前沿防御


胁
骑兵钳形进攻
用于前沿防御
的战略突出地
阻截战
巡逻道
有城镇外围的军团“要塞”
（无墙）
主要大道
在前军团要塞
遗址上的平民
城镇（无墙）
无墙定居地
0 1 2 3 4 5
英里

中障碍。由此，罗马的战略不能有效地以不惜任何代价争得彻底胜利为目标，因为威胁并非暂时，而是无休无止。唯一合理的目标，是以对社会而言最低的可行代价，维持起码程度上充足的安全。

在成功的阻绝性防御战略下，安全的总代价由两部分构成：花费在部队维持上的金钱；强制购买和强制服务的隐性代价。另一方面，纵深防御战略同样包含社会付出的额外代价，那由人民直接支付，不经过收税人或征兵官中介：它们是敌人入侵造成的损失。短期内此等社会代价对军队没有直接影响，军队将凭已在行伍中的人员作战，靠已被收获的食物供养。可是就很长期而言，这些成本的高低将决定民众和精英对大一统帝国观念本身的态度，将决定性地影响本土部队的士气，并将最终决定帝国结构对其居民的价值。但是就中期而言，在军队可得的后勤支持（也因此它的实际能力）与纵深防御的地理纵深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如果在一系列外敌入侵和成功反攻中成为战场的外围地带保持狭
144 窄，那么对军队后勤基地造成的损害将相应有限。然而，只有在防卫者反应迅速的情况下，这地带才能保持狭窄，而反应速度与为反攻而集结尽可能最强兵力所需的时间两相冲突。相反，兵力集中程度越大，（在其他事情相等的情况下）阻截之前部署兵力所需的时间就越长，敌人的渗透也就越深入。换言之，在体系的弹性与敌人被驱逐出去以前帝国后勤基地承受的损害程度之间，有一种比例关系。

一方面是延迟阻截的社会代价和后勤成本，另一方面是可行范围内最大兵力预先集中的战略好处：正是关于这两者中间哪个应当优先的这一冲突，导致了帝国战略的循环性质。如果成功，帝国军队就将制止主要威胁，接下来以延迟时间越来越短的一次次阻截，击败前后相继的入侵。在每个阶段，每次入侵对后勤基地造成的损害将越来越小，得到受侵袭地区支持的帝国军队将逐渐增强；这反过来将倾向于确保（在其他事情相等的情况下）延迟阻截的时间会更短……等等。另一方面，如果帝国军队不成功，那么入侵将变得越来越深入，对后勤基地造成的损害将越来越大，因而由该地段支持的帝国军队将相应地变弱。集结起来驱逐敌人的

机动部队将因此不得不来自越来越远的地方，从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延迟阻截，并且相应地加大对后勤基地造成的损害……等等。

能干的领导和战役中的好运气能够并确实扭转了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一个正在恶化的纵深防御的恶性循环。在西方，从三世纪到四世纪后期，有几次大扭转，每次都最后臻至暂时回归阻绝性边防。因而，在帝国东半部，公元五世纪的大危机被克服，就像以后的许多次危机一样。然而，继瓦伦提尼安在位时期（364 至 375 年）在西方开始的下旋恶性循环此后仅仅部分地被扭转。随狄奥多西一世之死（395 年），这循环成了不可逆转的。帝国西方的很大部分其时成了各蛮族军队互相争斗的战场，它们要么以愈益空洞的帝国权威的名义，要么以它们自己的名义蹂躏国土。纵深防御战略的目的，即最终恢复完全的领土安全，已经蜕化成另一目的，即维持一种变得越来越具弹性的弹性防御，它只对由此得到保护和由此变得强有力的个人才有价值。后勤基地区域的丧失现在获得了一 145
种永久性，因为帝国权威正在下移到好战的各族手里，它们不再袭击而是占领曾经一向是帝国组成部分的地方。

二 变化着的威胁

安东尼时期的阻绝性安全体系始终易受伤害，对付不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同时进攻，而且 162 年帕提亚入侵亚美尼亚引发了一整系列冲突，它们将伴有短暂间隔地一直持续到 180 年马库斯·奥雷柳斯死去为止。[13]对多瑙河和（较小程度上）莱茵河地区的威胁经久不息。另一方面，帕提亚的威胁零星少发；罗马的东方战争是与一个有组织的国家打的，有其始亦有其终。帕提亚与罗马仍是对手，但从 117 到 162 年它们之间没有战事。当东方前线于 162 年活跃起来时，从军团和辅助部队抽取的甚至整军团编成的分遣队被派往东方，欧洲边境相应薄弱。看来，甚至先前就一直有卡特人对陶努斯设防边界的侵犯，导致边境堡垒业已证明的毁坏。[14]与此同时，在多瑙河边境麻烦也是预料中事。[15]罗马人不懈地监视着野蛮

人,但野蛮人也监视着罗马人:随边境驻防军可见地耗竭,他们自然看到进行有利可图的袭击的新机会。

到 166 年,马库斯·奥雷柳斯的军队已重演图拉真的功绩:他们击败了帕提亚人,占领了泰西封,横扫了其间的领土,可是没有任何新边境被确立起来。[16]紧随在东方的胜利,西方的一场胜负不决的战争接踵而来。当远征军携带致命的瘟疫从东方返回之际,夸迪人、马科曼尼人和亚齐基人趁机在其很大部分河岸跨越多瑙河,绕过或击败了羸弱的边境驻防军,大小成群推进到帝国纵深。[17]《奥古斯塔历史手稿》(*Scriptores Historia Augustae*)谈到蛮族"阴谋",但即使没有协调,这机会也必定是人所共见,一目了然。[18]到 167 年,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已立足阿奎莱亚,那是通往意大利的东北门户。[19]这是元首政治肇始以来帝国最严重的军事危机。尽管有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20]尽管人力常年短缺,但两个新军团——意大利卡二军团和三军团——仍大约在 165 年被组建出来。[21]为找到新兵,运
146 用了种种不顾一切的权宜之计。[22]此外,从边境军团抽出的强有力的辅助部队和分遣队兵力也像野战军那般被部署,以抗击新威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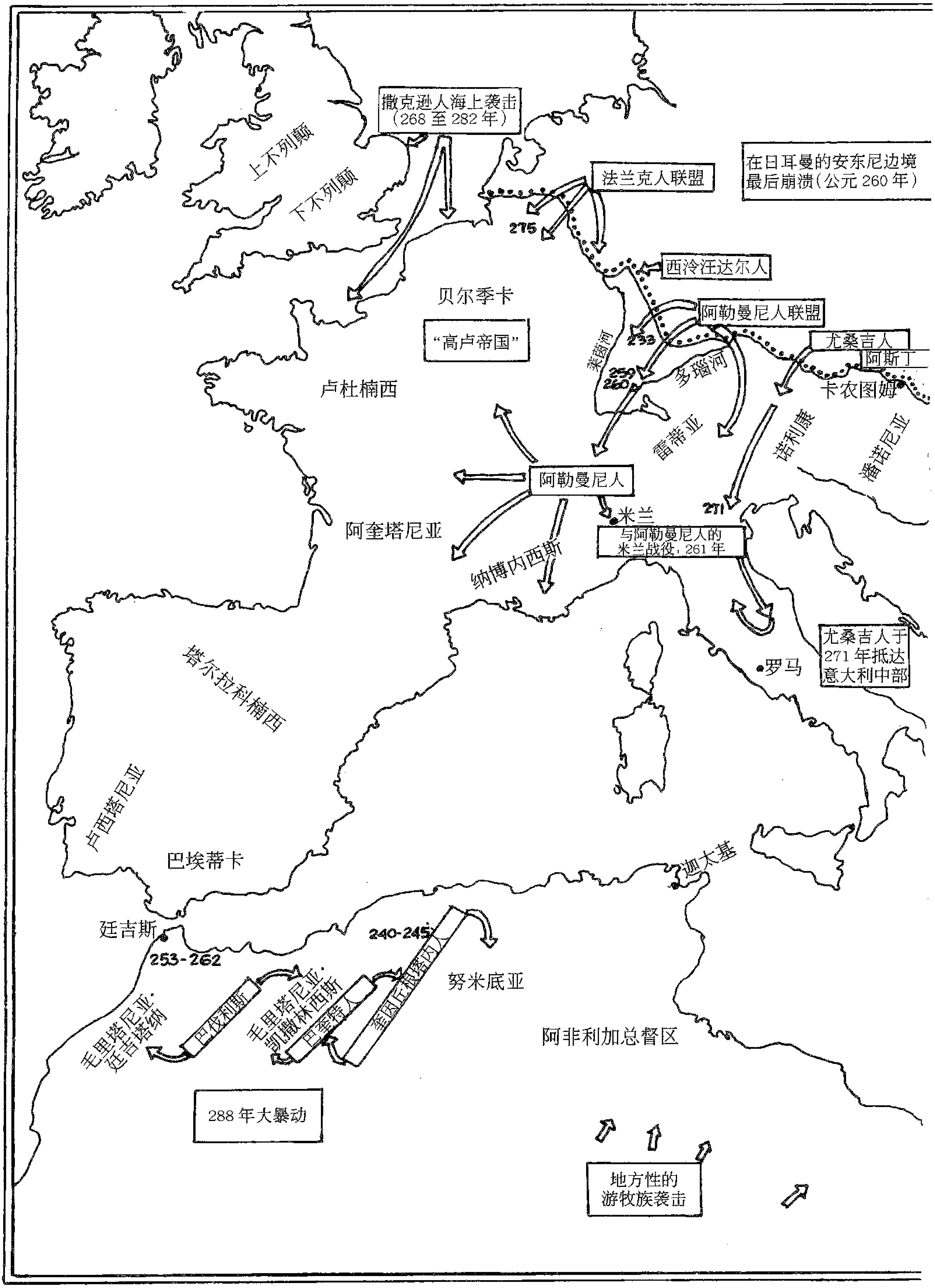
内地无防御,敌人的渗透就能够并确实延伸广远,但威胁并不特别剧烈。在大多数地方,阵风似的蛮族入侵造成的损害实属表面。阿奎莱亚虽缺兵力,且无合适的城墙环绕,却也匆忙中搞出了临时凑合的防御,因而没有陷落。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的装备和组织并非旨在围攻战;他们的进攻只是一次大规模袭击,他们的目的大概不是征服而是劫掠。他们没有严重损伤帝国的后勤基地,因而帝国的最终胜利仅是个时间问题。到 172 年,马科曼尼人已被逐出帝国,并被强加了一项和约;两年以后夸迪人被镇压,175 年则轮到萨尔马西亚人。[24]177 年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重开战事,结局是罗马人 179 年在多瑙河大胜。[25]据说马库斯·奥雷柳斯规划了一项跨越多瑙河作战,以征服马科曼尼人的故乡和那旁边的许多其他地方,然而这个方案(如果它事实上得到了认真规划)在这位皇帝 180 年去世时被他的儿子康茂德抛弃了。[26]

不可能计量 166 年后在多瑙河流域变得显著的地方威胁究竟有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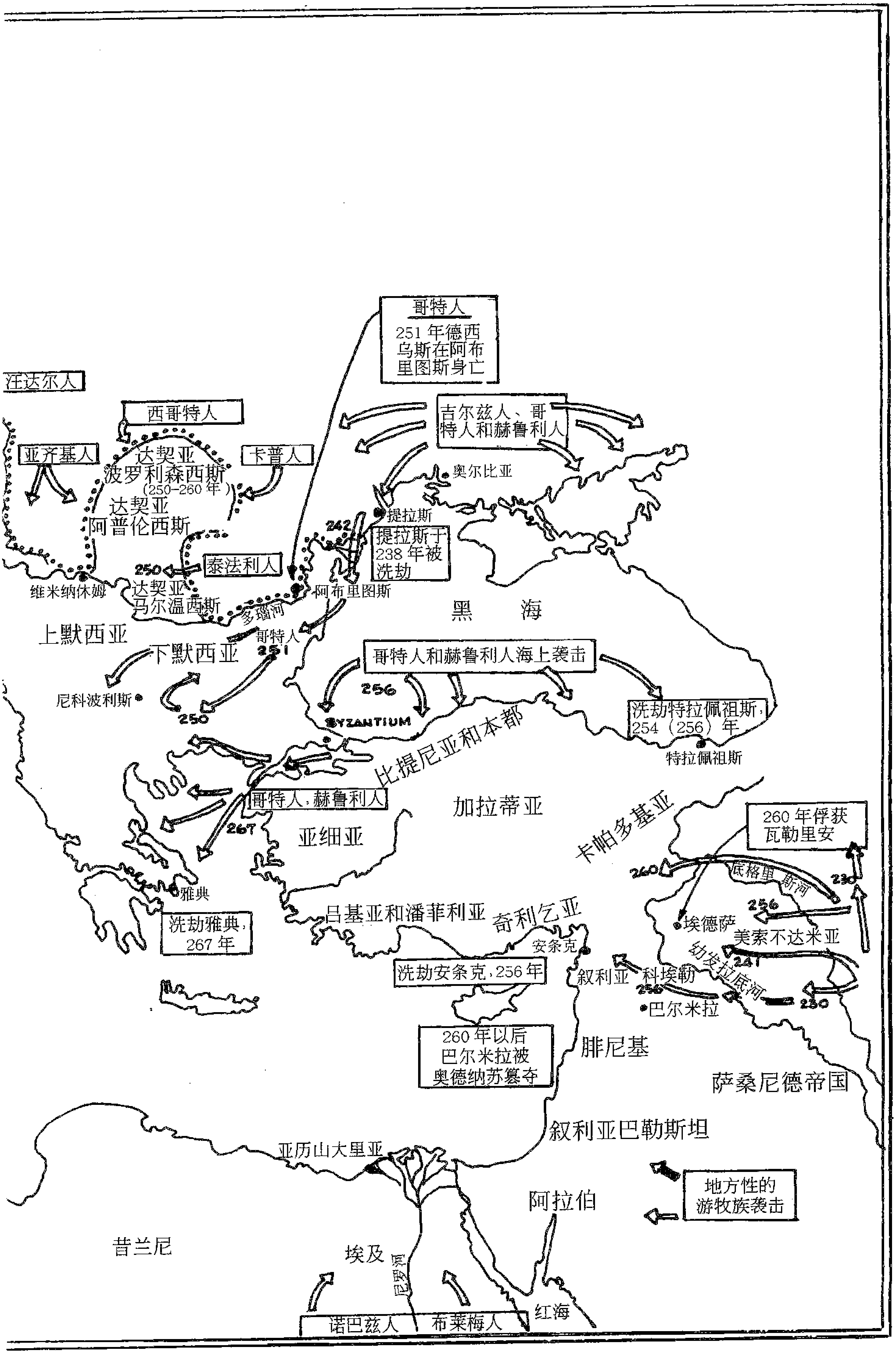
大。例如，在叙述该时期的零碎片断的史料中，有一处提及6 000名伦巴第人和奥比人，他们在攻破多瑙河设防边界后突入潘诺尼亚。[27]只要能确定敌人的位置并迫其战斗，一个带有辅助部队的军团就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么一支兵力。然而，数目的重要性不清楚：6 000人是个大数目还是一股寻常的人侵潮？

幸运的是，为了确认帝国在三世纪期间以及其后面临的总威胁远大于先前两个世纪，没有必要量化这变化。叙事史料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东日耳曼哥特人是比卡普人和萨尔马西亚人强大可怕得多的敌人，他们的西向攻击到238年已达德涅斯特河畔的提拉斯，四年后越过多瑙河三角洲，而后者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在下默西亚的主要敌人。[28]同样，阿勒曼尼人和莱茵河下游法兰克人显然比在同一些地区的他们的前辈更具威胁性：阿勒曼尼人的进攻迫使罗马人到260年已撤出莱茵河和多瑙河彼岸的安东尼设防边界，[29]法兰克人随275年"高卢帝国"崩溃而蜂拥突破边界。[30]罗马还面临新的海上威胁，即撒克逊袭击者对南英格兰和高卢 147
海岸的威胁，其劫掠依据其硬币储藏证据，看来在268至282年间已变得剧烈起来。[31]

海上袭击在一世纪和二世纪并非不为人知，但它们一直是有限的和局部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在英吉利海峡的新的海上入侵，还有哥特人、赫鲁利人和相关族民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新的海上入侵，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从大约253年直到大约269年为止，哥特人和赫鲁利人首先蹂躏了黑海沿岸，然后在大为加剧了的袭击性远征中劫掠了爱琴海地区，而且往往离开其船只渗透到内陆腹地。[32]在此过程中，多产的田地遭到破坏，许多重要的城市遭到侵袭和洗劫，有时被完全毁灭：皮蒂乌斯在253年第一波海上袭击之中，特拉佩祖斯和其他黑海城市在254年或255年，卡尔西登和尼科美底亚以及其他比提尼亚的城市在256年；它们都是袭击者经赫勒斯滂驶入爱琴海时遭遇这样的命运的。[33]266年和267年，在差不多十年较小的侵袭之后，哥特人、赫鲁利人和他们的盟友以大规模的联合海上远征，再次袭击色雷斯、马其顿、希腊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攻击也在



地图 3.1　三世纪的大危机



哥特人
251 年德西乌斯在阿布里图斯身亡
汪达尔人
西哥特人
吉尔兹人、哥特人和赫鲁利人
亚齐基人
达契亚
波罗利森西斯
(250–260 年)
卡普人
奥尔比亚
达契亚
阿普伦西斯
提拉斯
242
提拉斯于 238 年被洗劫
250
泰法利人
维米纳休姆
达契亚
马尔温西斯
阿布里图斯
多瑙河
黑 海
上默西亚
哥特人
251
下默西亚
哥特人和赫鲁利人海上袭击
尼科波利斯
256
250
BYZANTIUM
洗劫特拉佩祖斯，254（256）年
特拉佩祖斯
比提尼亚和本都
哥特人，赫鲁利人
加拉蒂亚
卡帕多基亚
260 年俘获瓦勒里安
267
亚细亚
260
底格里斯河
230
雅典
256
埃德萨
洗劫雅典，267 年
吕基亚和潘菲利亚
奇利乞亚
美索不达米亚
安条克
241
洗劫安条克，256 年
叙利亚
科埃勒
幼发拉底河
256
230
巴尔米拉
260 年以后巴尔米拉被奥德纳苏篡夺
腓尼基
萨桑尼德帝国
叙利亚巴勒斯坦
亚历山大里亚
地方性的游牧族袭击
阿拉伯
昔兰尼
埃及
尼罗河
红海
诺巴兹人
布莱梅人

陆上继续。[34]在众多大小城市中间，雅典仍然是个重要地方，但像其他城市一样实际上未予设防，结果在267年落入赫鲁利海上袭击者手中。德克西普斯集结2 000名雅典人与赫鲁利人战斗，构成历史上与历史编纂方面的著名插曲之一，[35]然而城市已经陷落；直到五世纪它才得以光复。[36]

从战略观点看，新的海上威胁提出了巨大的安全难题。提供3 000英里海岸线的陆基防御以抗海上袭击，这给帝国增加的成本与威胁的大小不成比例。[37]不仅如此，虽然在黑海或地中海罗马的海军优势能确保陆上安全，但在英吉利海峡以北的洋面上情况就不是如此。几千名海上袭击者能比两倍或多倍的陆上袭击者造成更大损伤，并且导致要采取代价更高的对策。一个全新的海岸防御组织不得不被创建出来，以护卫在不列颠和高卢西北的"撒克逊海岸"。（在《尊显录》中可见一个名为"不列颠海岸萨克森人联防团"（*Comes Litoris Saxonici per Britanniam*）的组织负责地区防御。）[38]

就哥特人及其盟友的侵袭舰队和作战部队的规模，叙事史料给出的
150 数字高得非凡。我们从中得知哥特人267年的远征动用了2 000艘船，还有320 000名在陆上行进的士兵（跨越今多布罗加）。[39]自然，现代的历史编纂不认为此类估计精确，虽然它通常承认这威胁大得非同寻常——是罗马在三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40]只有我们缺乏的统计数字才能证明威胁已变得较强，而非帝国已变得较弱。毕竟，从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死去到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严重的政治混乱显见于常年多发的篡夺，它们反复破坏了中央权力。还有着关于经济虚弱和财政拮据的无可争议的证据。然而，在东方发生了帝国外部环境的根本变化，其关键意义毫不含糊。224至226年，阿萨息斯家族的帕提亚国被萨桑尼德家族推翻，后者建立了新的波斯帝国。[41]

在某种意义上，二世纪的整个阻绝性防御体系基于一个隐含的前提假定，那就是一个本质上羸弱的帕提亚将保持为东方的唯一重要权势。帕提亚倾向于争夺罗马对亚美尼亚的控制，然而它展现的威胁是零散的：图拉真打了帕提亚战争，近乎半个世纪后马库斯·奥雷柳斯步其后尘；塞

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5年与帕提亚作战，197至199年又再度如此；像其前任们那样，他打赢了。一旦罗马远征军被集结起来并集中部署，帕提亚人就必定输掉。事实上，塞维鲁在哈布尔河、辛贾尔山和东到底格里斯河沿线组建了一条永久性设防边界，由他的新军团即帕提卡一军团和二军团驻防，以此结束他的战役。[42]

除了零散，帕提亚威胁还一直在地理范围上有限；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阿萨息斯家族有伸展至帝国核心地区叙利亚或卡帕多基亚的征服计划。帕提亚国的战略羸弱是有机的：被组织成一个在阿萨息斯宗主权之下的半自治附庸国集合体，帕提亚天然地易受罗马外交分而治之式操纵的伤害，而且它显然不能充分动员伊朗高原及其相邻地区的颇为可观的军事资源。

这一切随着萨桑尼德家族的崛起而改变了。首先，新国家比旧国家远为中央集权化，拥有阿萨息斯家族缺乏的行政管理控制手段和意识形态控制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宗教。[43]其次，差不多从一开始起，萨桑尼德扩张主义就超越了阿萨息斯家族的野心范围，那始终局限于亚 151
美尼亚。萨桑尼德诸帝中的第一位皇帝阿达希尔有如更富精力的后继者们（特别是其子沙普尔一世［241至272年］），已经在瞄准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更远的许多其他地方。直到萨桑尼德权势在七世纪最终崩溃为止，罗马人不得不防卫、使其免遭“伊朗和非伊朗众王之王”[44]（君主们仿效征服者沙普尔一世的称号如此称呼自己）侵占的，正是叙利亚本身。阿萨息斯威胁与萨桑尼德威胁之间的第三处重要差别是战术上的。显然，在萨桑尼德家族治下，阿萨息斯轻重骑兵合成战术得到了广泛改进，然而真正的区别在于，和阿萨息斯不同，萨桑尼德形成了一种合适的围攻战技术。[45]东方的战争一般在根本上等于先是骑兵小冲突和罕见的骑兵战役，然后围攻战接踵而来，鉴于这样的特征，萨桑尼德军队的新的围攻能力显然至关重要。

粗略的年表足以例示萨桑尼德威胁的连续性。230年，阿达希尔在对亚美尼亚（当时由帝国的一名阿萨息斯附庸国王统治）进行的一次不

成功的攻势后，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领土。亚历山大·塞维鲁做出反应，遣军东方，赢了某些战斗但输得更多，可是尽管如此，到233年仍成功地恢复了战前原状。[46]241年，萨桑尼德家族更加成功，横扫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包括尼西比斯和卡雷，并且征服往西远至安条克的领土。[47]罗马人在242至243年发起一场反攻（名义上在戈尔狄安三世指挥下），但未导致恢复现状。在戈尔狄安的继承者、阿拉伯的菲利普于244年缔结的和约中，埃德萨和围绕它的整个奥斯朗附庸国皆告丧失；其仆从国王阿布加尔十一世在罗马避难。波斯威胁保持静止状态，直到252年为止，其时沙普尔一世发动了他的首次大进攻；此后战争时断时续。260年，瓦勒里安在埃萨德被俘，作为波斯人的阶下囚直至身亡，罗马的国运跌到最低点。[48]

最终，三世纪里萨桑尼德欲将帝国边境往回推入叙利亚的企图失败了。到世纪末，伟大的军人皇帝——奥勒利安、卡鲁斯和后来的加勒里乌斯——进行的战役已决定性地重建了罗马在该区域的优势。298年的和平协定确认了罗马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并且将边界定在哈布尔河－辛加拉－凡湖一线。边境将无论平时亦或战时保持在那里，直到363年与沙普尔二世缔结乔温条约，据此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包括尼西比）最终被
152 割让给波斯人。[49]

然而，与这些领土变更表明的相比，萨桑尼德压力对帝国的总体影响完全更具灾难性。事实上，一旦在东方的加剧了的威胁变得一目了然，整个阻绝性防御体系就失去了平衡。由于该体系提供的可调遣的机动部队有限，因而必须在新威胁出现于别处以前，成功地对付任何既定地段所受的威胁。集中在莱茵河畔的军团分遣队和辅助部队可在几周时间内被重新部署在多瑙河中段；假定一天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行军8小时，不负辎重的步兵能以不足50天时间从英吉利海峡沿岸行进到黑海。这意味着在有组织的部族袭击最为可能的夏秋两季月份里，同一些部队可在同一个作战季节里在帝国欧洲边境的两端打仗。投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部队却非如此，不管它们的战役打得可能有多成功。由于距离更远，对波

斯战争的总体代价与参战兵力的多寡不成比例，尽管这些数目肯定大。

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畔的威胁是地方性的，但直到同样是地方性的威胁在东方出现，对帝国的可调遣兵力的总体负担才变得无法承受。从那时起，对各远方地区的同时压力不再是罕见的偶然事件而成了常态。于是，阿勒曼尼人在233年对上日耳曼－雷蒂亚边境的重大进攻（若干边境堡垒被毁得到了证明）[50]恰逢罗马对萨桑尼德家族首位皇帝阿达希尔反攻结束。同样，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陆上边境的最终瓦解发生在（到260年）[51]东方压力最大之际：沙普尔的军队已于256年占领安条克本身，而哥特人和赫鲁利人的海上袭击在小亚细亚正逢其盛。

哥特人陆海进攻的节奏与波斯在东方压力的加剧之间，有一种可觉察的双向交互作用，不管那是不是有意的。250年，德西乌斯皇帝开始重新确立下多瑙河边界，而且他的军队在将卡普人逐出达契亚马尔温西斯之后，与渗入色雷斯的哥特人交战，迫使他们解除对尼科波利斯的围攻。[52]一场战略性迂回战争紧随其后，其间哥特人最终被迫向北撤入多布罗加。看来，此后一项灾难性的战术失败令一场明显的战略胜利发生逆转：251年，德西乌斯麾下的罗马野战军在阿布里图斯（位于多布罗加中 153
部）被歼。[53]252年，沙普尔在东方发起一场大攻势。接下来的四年里，灾难如洪水般涌来：达契亚被入侵者淹没，哥特人抵达萨洛尼卡，海上袭击者蹂躏了各处海岸，沙普尔的军队征服了远至安条克的领土，与此同时在西方，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正使整个莱茵河边境和多瑙河上游地区遭受几乎无休无止的压力。西方的进攻于260年——瓦勒里安之灾年——达到顶点，其时沙普尔的推进甚至威胁到奇利乞亚和卡帕多基亚。[54]

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之类帝国老邻居的新联盟，吉皮兹人、哥特人、赫鲁利人和汪达尔人（潘诺尼亚对面的阿斯丁人和美因河畔的西泠人）之类在设防边界紧邻地区的较新到来者，还有卡普人和萨尔马西亚人之类确立已久的宿敌：所有这些可能已结合成一个比其前辈更大的威胁；是否如此，无法予以证明。然而，除了东方威胁的质的变化，帝国领导之正直性方面的质的恶化同样显而易见。虽然某些篡夺反映了安全上的

解体而未引发之——因为它们是竞争安全提供者位置的人的行为（或者是对区域安全利益的区域性肯定）——别的篡夺却分明导致边境的弱化。边境部队能被调入内部权力斗争，为争权而打仗。于是，我们见到253年特里博尼亚苏斯·加卢斯派遣部队与埃未利亚努斯打仗时，莱茵河防御被调空；见到258年加里努斯进行对因格努乌斯的战役；见到269年高卢皇帝波斯图穆斯将边防部队重新部署到意大利。[55]

归因于分遣队反复开拔，到三世纪后期，军团基地留驻人员已很可能大多是老兵和那些否则不适合野外职责的人。在三世纪的危机中被考验的，不是通过“前沿防御”实现阻绝性安全的哈德良式体系，而只是该体系的空壳，被除去了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即战术机动性，并被剥夺了它的战略弹性。到260年，与图密善曾经成功地将其逐出陶努斯山脉的卡特人相比，突破内卡河谷、横扫上日耳曼和雷蒂亚的陆上设防边界的阿勒曼尼人已大概更为强大，而他们攻击的帝国边境肯定已变得远为虚弱。

除了部队的减少及其素质的普遍下降，眼下在防御工事基础设施、战略和被留下贯彻战略的部队的性质之间，存在一种功能上的不协调。固定驻防军人因其自身的地方利益，就个人而言依恋于他们的驻在地；这样
154 的军人若被部署在一种为利用他们的特定素质而组织起来的边防体系内，本可非常有益。可是，边境仍被组织成旨在主要支持进攻性战术，从而很不适合它们的防守者。因此，三世纪期间及其后边境防御的改组是一种讲求实际的体系调整，力求使之适应资源。固定驻防的、越来越像民兵的军人不能被指望去有效地服役于机动打击部队，但若配备坚实的护墙和高耸的塔楼，他们就可被指望去坚守，像最好的机动部队坚守得一样长久。与此同时，边防部队的素质当然是战略的一个参数，而战略现在趋于将较好的战斗资材分配给机动野战大军。一旦完成战略转变，边境防御战术也必须转变：三世纪的边防部队不可能成功地执行二世纪的“前沿防御”战术，然而他们在为纵深防御的固定要素配备人力方面能完全令人满意。

三　帝国的新边界

298 年，加勒里乌斯（戴克里先的次帝，或称凯撒）的伟大胜利使戴克里先能够与波斯缔结一项将维持 30 年的和平协定。协定的条款非常有利：罗马边境推进到辛加拉以外，伸展到底格里斯河正东北方，然后再向西延伸到凡湖南端。[56]与 230 年往后一直处于萨桑尼德压力之下并在其后的麻烦岁月里反复遭蹂躏的老边境相比，这是一条更为前伸和更易防守的边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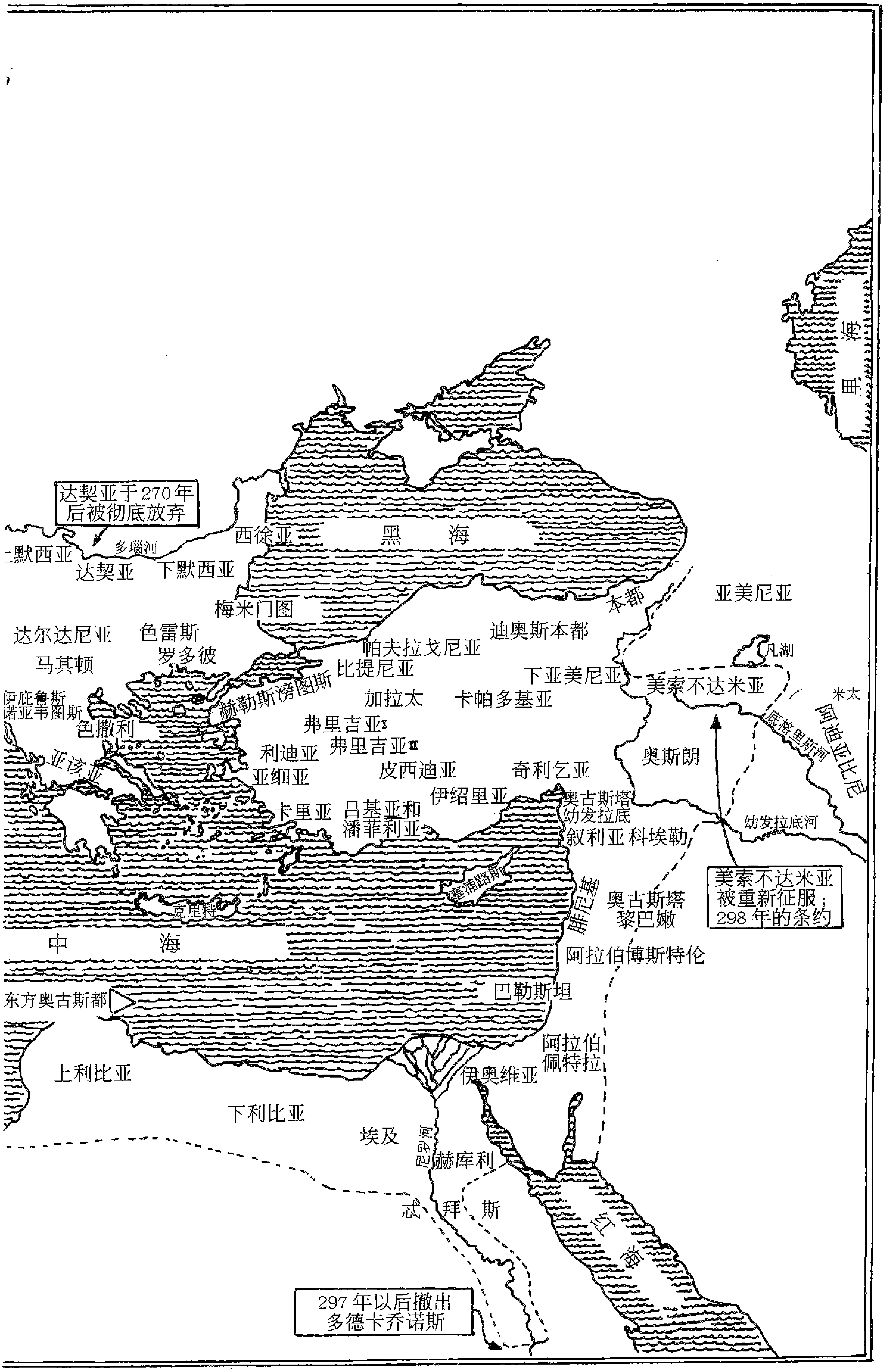
在东方，并且只是在东方，帝国从公元三世纪的大动乱中，以增强了的战略地位和甚至某种领土得益脱颖而出。从埃及延伸到安纳托利亚的整个海岸地带再度得到一块宽阔的帝国楔形领土保护，其枢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布尔河－辛贾尔山－底格里斯河一线。像以前一样，南面的叙利亚沙漠和北面的亚美尼亚高地处于边境之外：如果屯兵据守，那么仅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突出部就能保护诸东方行省免遭波斯攻击，并将确保南面稀疏分散的阿拉伯人和北面的亚美尼亚山民俯首称臣。[57]

在其他地方，戴克里先和四帝联治下帝国防御的重组是将损失而非得益正规化。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诸省已被分阶段丧失，在奥勒利安治 155
下（270 至 275 年）边境已回归到图拉真以前的多瑙河线。[58]日耳曼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到 260 年，在上日耳曼和西雷蒂亚的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土地已被放弃，边境已缩回到莱茵河－伊勒河－多瑙河一线。[59]在帝国的末端部位，类似的退却已见于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那被缩小为廷吉斯（丹吉尔）以南的一个半环形桥头堡——通过放弃南部的沃吕比利斯设防边界和正东的楔形领土。（后者历来的作用可能是将廷吉塔纳与毛里塔尼亚·凯撒林西斯以及罗马北阿非利加的其余部分连接起来。）[60]还有在埃及，位于努比亚的多德卡乔诺斯南方缓冲区被放弃，罗马边境缩回到第一个大瀑布上的埃勒凡泰尼。[61]

虽然这些领土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压力，但四帝联治之下



地图 3.2　四帝联治时期的边境和新行省



达契亚于270年
后被彻底放弃
多瑙河
上默西亚
达契亚
下默西亚
西徐亚
黑　海
梅米门图
达尔达尼亚
色雷斯
罗多彼
马其顿
伊庇鲁斯
诺亚韦图斯
色撒利
亚该亚
赫勒斯滂图斯
比提尼亚
帕夫拉戈尼亚
迪奥斯本都
本都
亚美尼亚
凡湖
下亚美尼亚
美索不达米亚
加拉太
卡帕多基亚
弗里吉亚I
弗里吉亚II
利迪亚
亚细亚
皮西迪亚
奇利乞亚
伊绍里亚
卡里亚
吕基亚和
潘菲利亚
奥古斯塔
幼发拉底
叙利亚科埃勒
奥斯朗
底格里斯河
阿迪亚比尼
米太
幼发拉底河
美索不达米亚
被重新征服；
298年的条约
塞浦路斯
腓尼基
奥古斯塔
黎巴嫩
克里特
中　海
阿拉伯博斯特伦
东方奥古斯都
巴勒斯坦
阿拉伯
佩特拉
伊奥维亚
上利比亚
下利比亚
埃及
尼罗河
赫库利
忒　拜　斯
红　海
297年以后撤出
多德卡齐诺斯
里　海

的边境重组也呈现出明白无误的迹象,显示那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和尤桑吉人很可能真是太强,以致无法将他们逐出防御重地,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实行纵深防御战略,罗马人就不再觉得据守穿越突出部地带底部的安东尼设防边界是有利的。若被牢牢守住,陶努斯山脉就能为向南进攻那压入防御重地的敌人提供一个战略基地,但若战略涉及在帝国领土以内对付重大攻击,它就将不再非常有用。

同样的状况常见于达契亚。那里,卡普人和西哥特人牢牢立足于特兰西瓦尼亚高地和瓦拉几亚,泰法利人定居于奥尔泰尼亚,萨尔马西亚人依然在巴纳特(但受到定居于今匈牙利东部的阿斯丁汪达尔人的压力),[62]因而毫无疑问,重建罗马对达契亚(即特兰西瓦尼亚和奥尔泰尼亚陆桥)的控制必将极其困难。然而,有个战略抑制因素在此起着作用:如后所述,四帝联治时的纵深防御徒有其表,它不要求有前伸的突出部。各个行省的军团和骑兵部队——在必要情况下得到远征军增援——将在行省的范围内防守行省领土。相反,早先以达契亚为枢纽的“前沿防御”体系在范围上是区域性的,由达契亚各行省构成一个设防的突出部,从那里有可能发动向西突入巴纳特、向东突入瓦拉几亚的横向反攻。不管从概
158 念观点看新战略是不是要采纳的正确战略,显然只要采纳它就会大大降低达契亚突出部的军事价值。[63]

这样的战略猜测就在廷吉塔纳的后撤而言,能得到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在北阿非利加,经毛利人的反复攻袭和巴奎特人在 240 至 245 年的攻击,事情达至顶点,那就是游牧民和山地土著民在 253 至 262 年间的大进攻,它影响到毛里塔尼亚・凯撒林西斯、斯蒂芬西斯和努米底亚,或许还有阿非利加总督区(今突尼斯)。[64]每次地方性惩罚战役都重新确立了罗马的控制,然而在 288 年又一场影响全区域的战事爆发,帝国这次终于能以大规模举措做出回应。

从西班牙径直跨越狭窄的海峡在廷吉塔纳登陆,马克西米安——戴克里先的下属奥古斯——带领一支远征军进入北阿非利加,其组成部分有禁卫军步兵大队,出自克劳狄十一军团(驻阿奎莱亚)、赫库利阿二军

团（驻下默西亚）和特赖阿纳二军团（驻埃及）的各支分遣队，连同日耳曼和高卢“努梅里”以及色雷斯新兵，或许还有被召回的退役老兵。[65]马克西米安阵势恢宏，大举行事，从廷吉斯到迦太基跨越整个北阿非利加进军。他打败了巴奎特人、巴伐利斯人和奎因丘根塔内人，追击里夫、奥雷斯和卡比利亚的柏柏尔人直至他们居住的山地，[66]并且将游牧部落民逐回撒哈拉，[67]然后于298年3月10日胜利进入迦太基。

马克西米安的平定攻势非常成功，然而正是在那时，沃吕比利斯及其设防边界被撤空。[68]在此如同在别的地区，胜利与撤退的不大可能的结合有其逻辑：胜利为全帝国范围战略考虑规定的边境重组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被打败后，蛮族无疑能被降至依附地位，一个由附庸控制的缓冲区能够在新的设防边界前面被重新确立起来。由于死了那么多部落民，罗马人可能希望余下的将会尊重罗马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至少暂时尊重之。

从埃及南端的撤退进一步证实了这猜测。在那个地区，确有证据表明新边境线（以埃勒凡泰尼为枢纽）得到一个附庸体系保护：为了遏制游牧的布莱梅人的压力，久不迁移的诺巴兹人被安置在尼罗河畔。[69]如同先前，健全的边境是强健得足以确保边境之外的强大附庸臣服的边境，这些附庸能够通过使罗马部队卸去防御低烈度威胁的日常负担来增强边境。新战略不再追求提供前沿防御，它甚至并不绝对要求一个由可靠的附庸构成的缓冲区；它肯定不再需要前进阵地和进攻性突出部。 159

用现代商业语言说，从公元三世纪的近乎解体局面中浮现出来的帝国边境已被“合理化”：地形上羸弱但战略上有效的暴露在外的突出部地块，已让位于在欧洲的较为简单的河流便捷，连同在北非的较短的沙漠边境。仅在东方，才有一条前沿防御边境被重新确立起来，再次出于显然的深思熟虑。虽然加勒里乌斯在出师不利之后以谋略制胜，于297年彻底打败了萨桑尼德军队，但戴克里先满足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建立的旧边境，除了添上底格里斯河对岸某些狭小的总督辖地（为此，以波斯为代价，亲罗马的亚美尼亚国王蒂里德泰斯三世在米太阿特罗帕滕得到了补偿）。[70]引人注目的是，戴克里先避不要求底格里斯河对岸辛加拉正东

和辛贾尔山线以南的土地，那是罗马在紧随115年后的图拉真征服而曾短暂地据有的，体现了那次致命的过度延伸。在此，边境同样得到附庸关系补充：当然，与亚美尼亚的，还有与高加索的伊比利亚王国的，那在战略上已经至关重要，并且随出自特兰斯考卡西亚的危险变得更为严重而注定会更加如此。

四　墙围市镇与硬点防御

合理化是贯彻新战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一旦戴克里先及其同僚将帝国实力恢复到了一定地步，即行省范围徒有其表的纵深防御能被三世纪后期的纵深“弹性防御”取代，边境地带的防御工事就不得不被改造。修复元首政治时代的要塞、堡垒和瞭望塔还不够；仅为进攻部队设置的基地不再充足。现在，修建能够持续抵抗的堡垒成了必需，而且这些防御工事必须建在纵深，以便保护交通内线。与在行省领土边缘上的单薄的外围线截然不同，必须创建起宽广的军事控制区，以确定平民在其中能够作为平民安然生活的领土范围。

160　此种模式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帕利斯蒂纳三世（萨鲁塔里斯）的行省，包括内盖夫和前阿拉伯行省的南半部，它本质上是作为军事区被组建的。在那里，设防边界的存在不是为了保护行省，行省的存在却是为了维持设防边界，后者起一种广泛的区域性功能，即保护黎凡特地区南部免遭游牧族袭击。在内线（加沙 - 比尔谢巴 - 阿拉瓦）与外部周线（尼特扎纳 - 佩特拉）的纵深处接合，并且向南从佩特拉延伸到红海，帕利斯蒂纳·萨鲁塔里斯的防御体系“密布防御工事”，全是以新方式建造的可防御“硬点”。[71]例如，在梅萨德博凯克，一座典型的戴克里先式“四棱堡”（*quadriburgium*）已被发现：它面积小（22米×22米），有四个魁伟的正方形塔楼向外凸出。[72]水源和信号站也在全行省范围的设防区内得到了工事筑防，少数道路也被仔细地保护起来。例如，关键的斯科平山口提供红海岸的艾拉（埃拉特）（弗雷滕西斯五军团约在公元300年间驻扎该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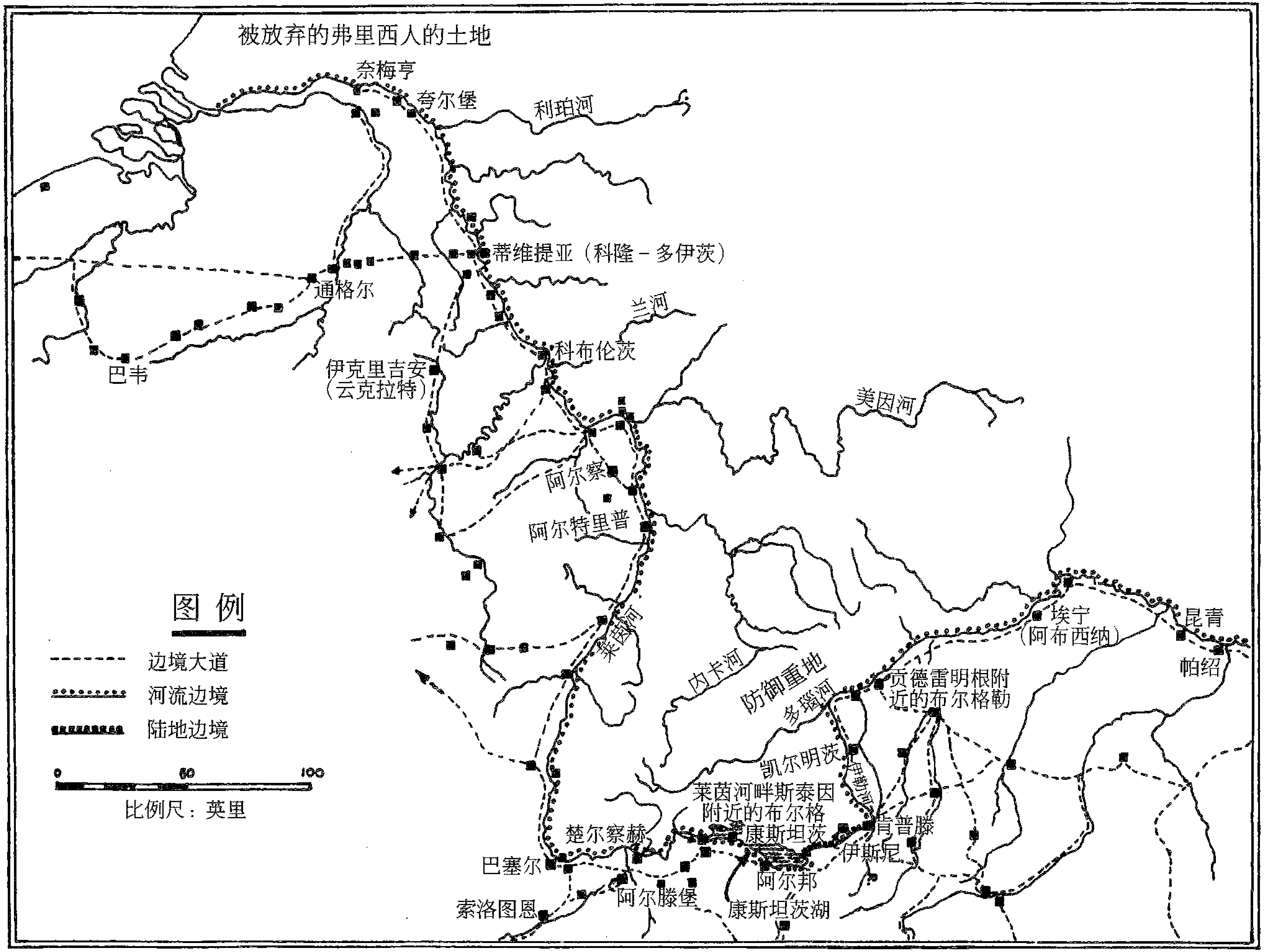
与北部之间的主要西向连接，它由一系列设施防卫，包括设在两端的路旁堡垒、中间的中途站、入径上的瞭望塔和最高处的控制点。[73]

在帝国周边的另一端，在西北欧，从边境通往内地的干道一样得到了仔细的工事筑防。元首政治下，各干道一直由各军团抽调出来负责此等治安职责的军人（大道禁卫部队）（*beneficiarii consularis*）轻兵把守。[74]然而自三世纪下半叶往后，在边境后面的大道上，开始建造正规堡垒和路旁小堡，例如在科隆－通格尔－巴韦大道上（该大道一直延至在布洛涅的英吉利海峡沿岸），[75]还有在特里尔到科隆以及兰斯到斯特拉斯堡的大道上。[76]随加里努斯皇帝最终在米兰击败的、259 至 260 年阿勒曼尼人对意大利的大入侵，连同奥勒利安皇帝在波河河谷粉碎的、尤桑吉人十年后的入侵，跨阿尔卑斯山道路的防御成了重要优先事项。其目标是树立横跨通往北意大利的入侵走廊的众多屏障。

在四帝联治下，这努力可能已经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开始，此后每逢有足够的稳定去作长期投资，它就被继续下去，迟至四世纪下半叶。[77]这些屏障都被设计成阻止很深的突入，那是三世纪进攻的特征，例如 259 年阿勒曼尼人的那些进攻，它们远达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以及北意大利。[78]一帮帮进行劫掠的阿勒曼尼人当时已远抵法国的里昂，甚至克莱蒙费朗，并且沿罗讷河谷而下跨入西班牙。（在西班牙东北发现了那个时期的硬币储 161
藏。）[79]

在最初的突破点上，蛮族人会蜂拥集中，因而强大可怕，然而在随后的劫掠中，他们必定是分散的。路旁小堡（以及小型平民避难所）的逻辑便在于此，它们面对集中的巨大蛮族人群，像 260 年在米兰附近被加里努斯打败的那种，就不可能有什么用处。[80]这些路旁小堡和避难所还提供了免遭一种新的内部威胁即匪帮（“巴高达”）（*bagaudae*）的安全，它出自一个甚至在接近崩溃状态中仍是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社会。[81]

在战术层面上，元首政治时代的堡垒和要塞与帝国后期的据点截然有别。后者远非同质，在从戴克里先到五世纪的那个时期内就样式而言有重大差异。（年代确定方法的不足导致难以按照年代顺序做出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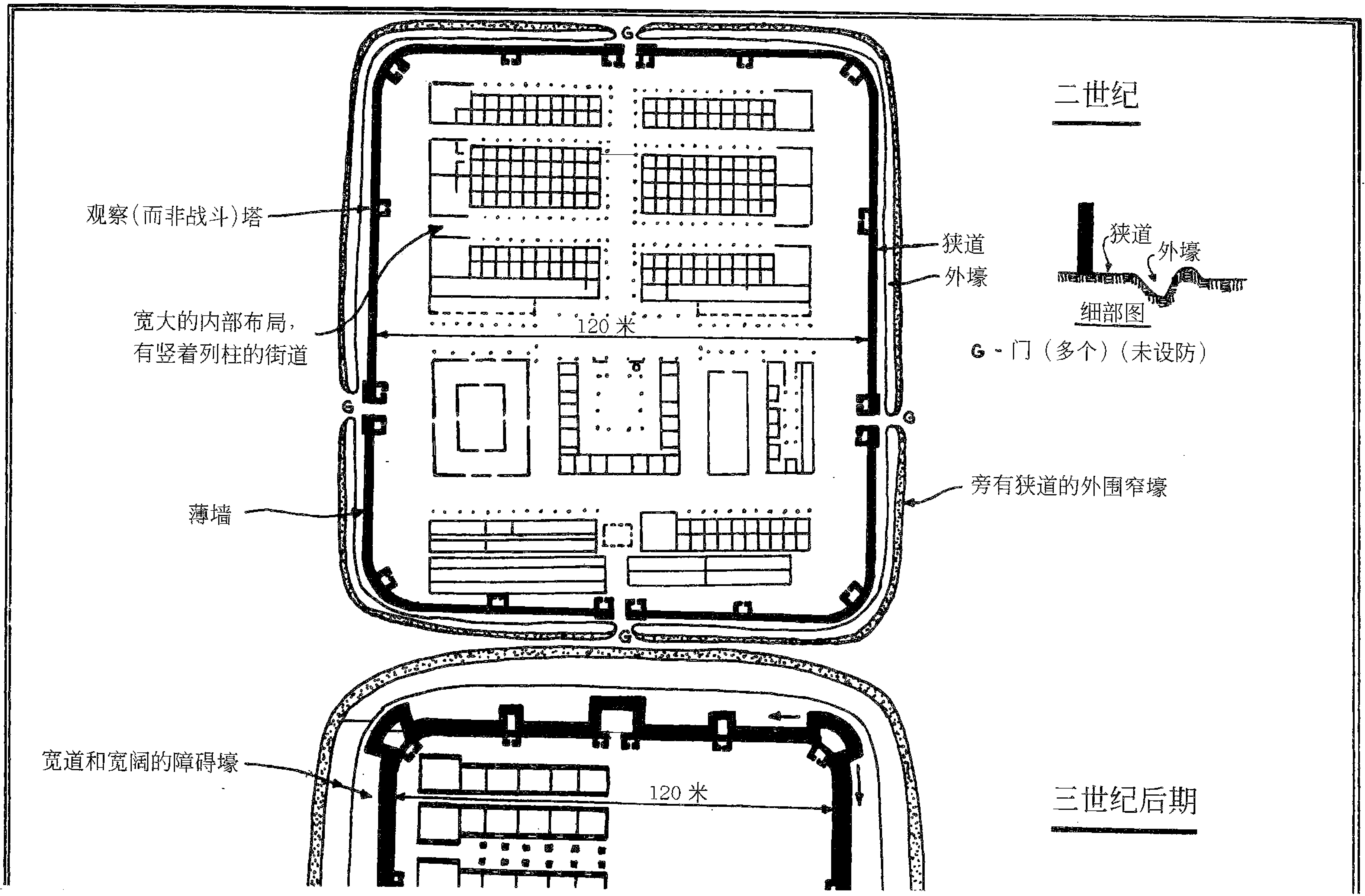
地图 3.3　日耳曼边境的纵深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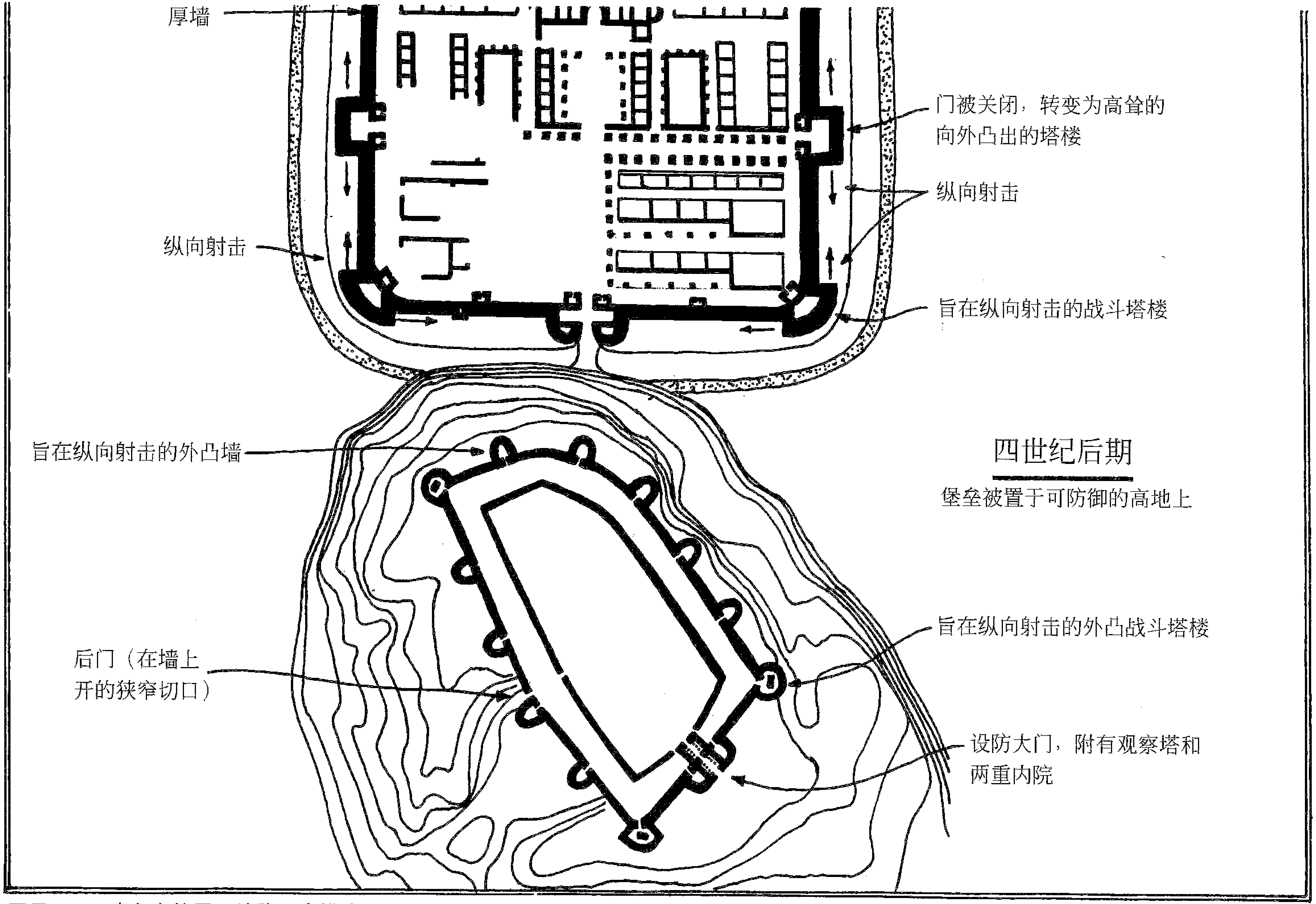
然而，为我们的目的起见，晚期罗马防御工事的全部岁月，从三世纪下半叶到一个世纪后瓦伦提尼安的最后持续努力，可被当作一个整体。

首先，选址有别。虽然某些防御工事仍为居住和后勤便利而建造，即建在紧邻大道之处和平地上，但每逢可能，就按照战术优势需要去确定大多数晚期罗马防御工事的位置。当然，变化的原因在于，元首政治时代兵力集中的大军能靠采取攻势对付敌人，但帝国后期规模较小的边境驻防部队往往不得不就地抵抗，等待行省、区域甚或帝国范围内增援的到来。因而，天然强固的位置最为重要。此类选址的例子可见于莱茵河上游和雷蒂亚的巴塞尔、楚尔察赫、莱茵河畔施泰因附近的布尔格、阿尔邦、科斯坦茨、肯普滕和伊斯尼。在莱茵河下游，那里的地面大多平坦，堡垒修建在很少数可供利用的小山上——即使这些位置在别种情况下并不合适——例如在夸尔堡和奈梅亨。[82]对易防守地形的这种关注进一步显现在叙利亚地区四帝联治时期路旁堡垒和巡逻体系的工事选址上面，它基于"戴克里先"前沿阵线，那从巴尔米拉一路向南延伸到红海埃拉特湾。[83]

第二项截然分明的差别在罗马后期防御工事的地面规划上。有圆形堑壕的老式长方形防御工事自然而然地留存下来，因为在许多场合旧防御工事依然被使用，然而正方形布局成了主导，连同不规则的四边形（伊 163
韦尔东）、粗略的圆形（云克拉特）和钟形——即较宽的一侧位于河畔或海边（科布伦茨、阿尔滕堡、索洛图恩、阿尔特里普）。[84]如前所述，近圆形和近正方形对较老的矩形模式的优势，在于只需较短的围墙去环抱任何既定的内部面积。完美的圆形——理论上最优——因其难以建造而通常不予采纳。将成为中世纪建筑特征的不规则围墙开始出现在墙体顺应地面——亦即可防守的高地（例如在多瑙河畔的韦默尼亚－伊斯尼、佩文西和皮利斯马罗特等地）——不规则起伏之处。[85]这种模式还出现在不规则的河流线被用作外围环组成部分的地方。[86]

另一项重要差别在于外部防御结构、外围堑壕和墙体外侧小道。我们见到的已不是作为一世纪和二世纪结构特征的、伴有狭窄的外侧小道的V形狭窄堑壕，而是宽得多的外侧小道，从25英尺到宽达90英尺；与


二世纪
观察(而非战斗)塔
宽大的内部布局，
有竖着列柱的街道
120 米
狭道
外壕
细部图
G - 门（多个）（未设防）
薄墙
旁有狭道的外围窄壕
宽道和宽阔的障碍壕
三世纪后期



图示 3.4　改变中的罗马筑防工事模式

此同时单一或双重的、往往平底的堑壕也宽阔得多,从25英尺到45英尺或更宽。[87]宽阔的堑壕有助于使攻击者的撞锤和攻城机械远离城墙。与阿萨息斯军队不同,萨桑尼德大军装备有攻城机械,[88]但更重要的战略变化是在罗马这边:小规模的驻防部队现在靠自己坚守,而且即使那些从未掌握精致的攻城技术的一般的蛮族人,无疑也能使用临时搞出的撞锤。因此,宽阔的堑壕意在阻止撞击设备靠近围墙。这些围墙同样筑得较厚:罗马后期的堡垒墙厚不是标准的5英尺,而是一般厚达10罗马尺或更厚。[89]在较老的堡垒仍被使用的场合,墙体干脆被加厚。[90]

另一方面,宽阔的墙体外侧小道反映出一项重要的战术变化。研究表明,在奥勒利安围绕罗马建造的防御工事中,还有在不列颠、高卢和帝国其他地方的罗马城镇之晚期罗马城墙上面,防御者的火力现在由固定射手——掷石兵和射箭(或射钉)手得到了增强。[91]到四世纪,军团已经丧失其射击部队这一有机补充,除了独立的射击军团(在《尊显录》中述及),射击手看来已只是为固定防御而被大量使用(工事防御射手)(*Tormenta muralia*)。[92]这些安置在塔楼和壁垒上的武器不能急剧转变角度,因
166 而其火力无法向下对准靠近城墙的进攻者。宽阔的墙体外侧小道旨在将进攻者挡在一个能由交叉火力覆盖的外区里。[93]

更精致的设计是堡垒内部升高了的地面;这意在抗挖掘——进攻者在自己缺乏攻城器械和防御者缺乏将其远远挡在墙外所需的火力时倾向于使用的一种办法。这种设计在巴韦、阿尔察和阿尔特里普等等要塞中被发现,[94]它提示了类似中世纪围攻的战斗状况:进攻者无法破墙,防御者同样无法打击围攻者,即使在他们紧紧包围了护墙的时候。

从三世纪到四世纪,兵力部署演化经过了几个分明不同的阶段,但显然即使在罗马军队规模增大之际,元首政治时代线性战略之典型的、数量众多和战略上集中的边境驻防军也变得愈益稀薄。部队多于先前,但它们不再完全部署于边境线本身。因此,与其一世纪和二世纪时的前身相比,晚期罗马的堡垒和要塞常常住人少得多(哈德良长墙上的前哨堡垒是个显著的例外)。无论如何,当这些防御工事开始作为可防守的硬点

而非基地其作用时，围墙长度和内部面积都被缩小到最低限度。例如，克劳狄十一军团一世纪时的基地文多尼萨大约在公元 100 年被遗弃，此后衰落为一个村庄；大约在 260 年，显然做出了一番尝试去改造空间宽广的军团要塞的围墙，但它们太长，因而这尝试被放弃。最后，大约在 300 年，一个小而坚固、由一宽阔的三重堑壕围绕的新要塞在老周边之内被修筑起来。在多瑙河畔的阿布西纳（现今埃宁），靠近安东尼人为设防边界的东方终端，一个小堡垒（37 米 ×48 米）平地而起，处于一座老步兵大队要塞的宽广的周边之内。德罗贝塔堡垒的演变则是这世纪性变化的一个更显著的例子。[95]

战斗塔楼是硬点防御的典型表现，它们被建得高高的以增强射击火力，它们并非坐落于墙线本身而是向外凸出。因此，一世纪和二世纪样式的监视和装饰性塔楼在罗马后期时代让位于种种新的塔楼，它们形状多样，但差不多都一成不变地从墙体向外凸出，以便提供横向火力场去覆盖横隔在它们中间的墙体部分。像在多瑙河畔因特西萨（杜纳彭特勒）的那些扇状塔楼，还有例如在伊布拉库姆（约克）的那些多边形凸出塔楼， 167
均得建造，但圆形和正方形的塔楼更为常见。[96]

在元首政治时代，市镇和要塞的大门只意在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可是在罗马后期环境下，大门成了需要特殊保护的软肋。由于堡垒常由少量驻军把守，也由于固定驻防兵力（它们肯定往往未能积极大力巡逻）易受奇袭伤害，因而据点易遭突如其来的攻击，尤其在那些允许蛮族人在看似和平的时期聚集起来做买卖的地方。此等考虑导致大门设计方面的创新：双套防卫塔楼（例如在科隆对面的蒂维提亚）；凹角庭院，那里进入堡垒本身的通道经由一个设防的内院（贡德雷明根附近的布尔格勒）；经伪装的大门，被圆形壁垒掩蔽（例如在凯尔明茨附近）；最后还有后门，即在塔楼底部或围墙上的狭窄切口，意在让防御者能够不被察觉地外出；由于这些切口相当狭窄，因而它们可以被很少量防御者轻而易举地封住（伊克里久姆 - 云克拉特）。[97]

比较罗马的地面规划与中世纪的防御工事，人们发现最明显的差别

在于内部建筑布局。标准的罗马惯例(似乎直到四世纪开始后许久)是以一条宽阔的道路(*via sagularis*)将生活区与外墙隔开。有如经典的行军营寨布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里面的人免受从周边堑壕以外发射的箭矢火石伤害。虽然为此宽阔道路留出空间会使堡垒变得更大,使非常重要的围墙变得更长,但这惯例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在位时为止,如果不是更久的话。(前面提到的蒂维提亚堡垒就以宽阔的道路为特征。)然而,从四世纪中叶往后,兵营开始被建在围墙内侧,以便给这两者更多保护。这导致居室采光不那么好,也不那么舒适,然而是加厚墙壁的一个经济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阿尔察的堡垒宽敞但有内建的墙壁,在阿尔特里普的瓦伦提尼安后期堡垒更加紧凑,在贡德雷明根附近布尔格勒的堡垒已有内部陈设、外部环道和作为中世纪城堡特征的小山顶布置。[98]

新建筑物的狭窄居室和不规则形状提示,不仅住在里面的士兵的战术,而且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自元首政治时代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不一定意味着战术效能下降,因为在新的防御体系内,固定驻防部队与机动部队在功能上互补。事实上,在整个体系瓦解之后很久,该体系的某些固定驻防成分仍然孤立地留存下去:圣塞韦里努斯 450 年横越雷蒂亚
168 旅行时,遇到了昆青和帕绍诸堡垒。[99]

一旦边境不再被阻绝性地防守,在地方范围以地方努力原地护卫价值资产就成了必要的。正如道路依靠建造路旁小堡得以安全,其他每个价值物也必须被确保安全,否则它在纵深防御过程的敌方渗透与成功阻截之间必不可免的间隔期间将有被攻击和摧毁之险。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没有任何志愿民兵被系统地组织起来,[100]地方防御基本上意味着当地防御工事。游窜的蛮族帮伙和本地自生的盗匪("巴高达")没有围攻战的技能和装备,因而依靠坚实的护墙,使其配备上无论什么偶遇而得现成可用的士兵,或配备上以临时搞出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公民,就能够不让他们迫近。[101]

西方有众多不加设防的城市,直到三世纪为止它们无墙环绕,此为繁荣和安全的证据;[102]然而与之并存,始终有围以城墙的城市。在东方,设

防边界是“开放的”，因而城墙防御乃为通则。甚至在西方，某些城市在任何城墙实属必要以前许久，就确实有了城墙。例如在高卢，欧坦的城墙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科隆在大约公元50年有了城墙环绕，克桑滕（维特拉）在大约110年即图拉真元首政治的安全岁月里也开始如此。[103]然而，建造这些城墙是为了装饰目的，以弘扬市民尊严，或者至多是为了治安目的；它们肯定不是出于军事原因建造的，并非意在对付坚决的进攻。[104]于是围墙很长，因而难以防守；目的既然如此，它们便自然环封了整个城市，而不只是它的较能防守的部分。墙体一般单薄，仅宽5英尺左右；塔楼主要是装饰性的；墙体外侧小道和堑壕颇为狭窄。[105]

三世纪中叶的灾难性入侵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在西北欧，随254年莱茵河防御崩溃（当时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都突破了设防边界），尤其随259至260年阿勒曼尼人大入侵，[106]日耳曼、雷蒂亚和高卢的各个城市都急忙修建了城墙。这些城墙大不同于从前的城廓。被环封的范围急剧减小，力求以可得的军事人力取得合理的兵力密度：在高卢，巴黎和佩里格的城墙环绕的面积都不足20英亩。[107]此外，城墙变成了功能性的，亦即厚实且把守森严。所有可得的石工技能都被用上：雅典紧随267年赫鲁利人的进攻修建起40英亩城廓，城墙厚度达10英尺以上，靠的是用雕 169
像碎片、铭刻石板和从先前公共建筑物上搬移过来的石块填充两个城墙贴面。[108]

建于以前繁荣和安全时代的市政建筑有时作为完整的单位被并入新墙环：博韦的一座神殿被用作环墙的一部分，巴黎的一座圆形剧场和桑斯的主要公共浴室也是如此。[109]有些场合，甚至吞噬城市基础设施也不足以保护城市核心。在已发展为一个开放性城市的奥格斯特（奥古斯塔劳里卡）——那里有“优良的公共建筑——广场、长方形会堂、朱庇特神殿、剧场、浴室、手工业区和公共水源供应”[110]——起先有一番保护整个城市的尝试；然而公元260年后，紧随阿勒曼尼人的入侵，该城很大程度上被放弃。此后再有一番尝试去防护该城建于其上的高地最高部分，办法是用堑壕将它与较低的斜坡隔开，用拆自城市公共建筑的石块建城墙于高地

台阶之上，但这尝试亦告失败。到三世纪末，奥格斯特已不再存在，仅有莱茵河上的一个河畔小堡留存下来。

在别处，重新安置较为成功，但它必须放弃大量固定投资；有时，这变化令平民人口退至其早先的野蛮状态。罗马势力抵达之前，有工事设防的山顶村庄（“奥皮达”）（*oppida*）住着蛮族人，而现在类似的建筑内住着罗马化了的行省人。在雷蒂亚的霍恩（维特瑙附近），高地狭颈对面的一座史前壁垒于三世纪后期作为避难地被重新筑防，[111]私人避难地的许多实例可见于高卢、日耳曼、雷蒂亚、诺利康、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112]如果由于缺乏时间和缺乏合适的可防御场所，甚至重新安置一种萎缩了的城市生活也成为不可能，那么在这样的地方随之而来的便是废灭。就大莱普提斯之类港口城市而言尤其如此，它显然本不可能放弃海岸，倘若有合适的避难地形可供使用。[113]

在某些场合，城市规模被如此缩小，防御变得如此精细，以致城市逐渐成了堡垒，或至少变得难与堡垒区分开来。在东方，驻防军长期以来住在城市，或更确切地说住在城市的特殊区域。现在，这模式变得更加普遍，从伦敦延伸到黑海岸的刻松，从莱茵河畔的雷根斯堡延伸到撒哈拉的提亚雷特。[114]由于某些军人正在同时成为业余的城市民兵或定居的农夫士兵，因而平民生活与军队生活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退化性质的趋
170 同：城市正成为要塞，其居民正成为间或的自然而然的士兵，而要塞正成为居住工匠士兵、商人士兵或农夫士兵的市镇。的黎波里塔努斯设防边界（今利比亚）有其“琴泰纳尼亚”（*centenaria*）——小要塞状农舍（或者是农业方面自给自足的小要塞？），在那里角色的混合臻至十足。[115]

在干旱地区，由于水供应问题，乡村生活必须集中，因而乡村居住地之转变为可防守的工事设防硬点全无真正的难处。另一方面，在供水轻而易举的地方，像在欧洲大部，乡村生活并非自然集中，而是普遍分散。因此，其当地保护是个经济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皇帝或许可以有一条被建造起来封闭220平方公里地产的围墙，[116]普通的农夫却无法指望用围墙封闭自己的田地，而且即使他能够，他也将无力防守之。私有地主的情

况居于中间。如果足够富有，他们就能经得起修筑瞭望塔，以提供袭击预警，而且他们能够筑工事防守农舍和谷仓；如果有足够的干活人手，他们甚至能够组织私人军队。[117]

帝国主要是个安全提供者。二世纪以后，环境迫使它为提供这日常需要而索取更高的价格，但如果它能继续提供水准之高有如价格之高的安全，这价格就不一定损害帝国对其臣民而言的价值。帝国后期有墙围绕的城市和得到防守的农舍例示了那种能够由纵深防御，甚至由一个成功的纵深防御提供的安全。然而，为了衡量该体系真实的社会成本，我们定当算上无数不得不被放弃的乡间小财产。城市虽然被围以城墙并被缩小，却还能生存下来，殷实人士的农庄和郊外别墅也能如此；是独立的小农和小不动产，在帝国的广大疆域被蛮族入侵一扫而空。

五　边境部队

元首政治之下，主要的边防部队是辅助骑兵翼和步兵大队，后来得到族裔性新兵种"努梅里"补充。这些部队在地位上低于军团步兵，薪饷也较差，却是边防体系的首要积极成分。军团在作为边境战事特征的前沿阻截和小型冲突中，本不能起重大作用，因为就此类任务而言它们不够机 171
动。在军团里，边境战斗要求的那类机动性会是一种最低效的属性；军团的主要功能是依靠其居高临下的存在，在政治上稳定边境，并且保障其防区的安全，对付罕见的紧急情况即敌人的大规模进攻。

直到五世纪甚至更后为止，被描述为军团的部队一直在帝国军队中效力，然而自三世纪往后，它们在整个军队内的重要性持续下降。与此同时，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以及"努梅里"要么经历了一种渐进的转化，逐渐变为固定驻防军，要么在边境遭彻底蹂躏的地方突然销声匿迹。有许多争论围绕这转化的时间和性质[118]及其结果。[119]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四世纪期间，[120]使用机动和进攻战术守卫边界的专职军队让位于兼职的农夫士兵（农民兵）(*limitanei*)，他们耕种自己分得的土地，提供纯粹地

方性的和固定的防御。

由于沿着周边的单薄稀疏的辅助“堡垒”和军团“要塞”防线已逐渐被一个宽阔得多的、由小的工事筑防硬点组成的网络取代,以便支持一种正在展开的纵深防御战略,因而机动骑兵翼和步兵大队已让位于分散的静态农民兵这一事实[121]不一定导致了部队效能的下降。因为,新战略首先需要会坚守自己阵地的士兵;只有这些阵地被守住,才能避免该体系瓦解为弹性防御,而那些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要在原地保护的士兵,当成为能干的防御者。

在现代,军事－农业殖民地已证明是在多种地方和多个时期里边境防御的有用和经济的载体:例如在18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19世纪的伏尔加河大草原以及当今以色列的内盖夫。在每个场合,自我依靠的农夫士兵都能被指望去独立地对付当地化了的渗透和低烈度威胁,同时随时准备在大规模战争中为正规专职部队的机动野战军提供作战支点。因此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在罗马帝国出现农夫士兵构成的边境兵力反映了地方退化、官府玩忽或政治上有意的纪律松弛,这松弛竟达到只要
172 求士兵宣誓效忠、而不要求他们遵守纪律或进行训练的地步。[122]

事情很大部分将取决于总的社会状况和总的安全形势。它们还将取决于对这些农夫士兵——农民兵——行使监督的质量。在四帝联治时期,行省部队(与中央野战军相对)可能开始处于一种双重控制体制下,即农民兵由行省总督(*praeses*)监督,每个边境行省的机动部队(军团和骑兵单位)则由“指挥官”(*dux*)即高级军事长官控制(尽管这两个职位有时一人担任)。这据称便利了对边境安全的当地化监督,而且使得“指挥官”能解脱监督非机动部队的负担,这些部队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运动战中扮演有用的角色。[123]鉴于证据状况,在双重指挥的整个观念上始终有争论。[124]按照演绎,将对农民兵的管理与对机动骑兵和军团的管理分开,看来是意在鼓励农民兵的本地化与其军事作用的进一步退化。为了维持小群孤立的农夫士兵的效能,本必须有一套正规且详细的视察制度,连同对基本训练的频繁监督。士兵必须经常重复战斗技能训练,不是因为他们

容易忘记这些技能，而是因为非如此他们就不会在真实的战斗中使用它们。然而，负责官员，无论是文职的行省总督还是军职的“指挥官”（甚或后君士坦丁时代专司边防的“边境指挥官”[*dux limitis*][125]）不大可能配备有充足的工作人员去经常视察分散的农民兵前哨。

农民兵的质量还很可能受驻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全职部队的素质影响。如果后者是颇受尊重的机动部队，总是倾向于被调遣去打仗，并且能富有成效地打仗，那么他们的某些作战技能，甚至他们的部分作战精神很可能会传给该地区的兼职农夫士兵。另一方面，倘若甚至名义上全职的部队也蜕化成了地区民兵，或者干脆蜕化成了一大群不适于打硬仗恶仗的坐享饷银者，那么农民兵的退化大概会加速。

无法评估不同时候在帝国不同部分的边界固定驻守部队的质量。某些农民兵可能确实“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他们的小地产上……打起仗来……如同外行……”，[126]然而被如此形容的特定的农民兵直到四世纪中叶为止，成功地确保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广阔地区的防御（那里没有 173
部署任何其他兵力）。[127]说农民兵毫无用处更加意味着由他们提供人力的固定防御必定也毫无用处；就堑壕、墙垒、塔楼和灌溉设施构成的巨大的“阿非利加工事体系”复合体而言，会尤其是如此。然而，帝国立法记载证明，迟至409年，中央当局仍非常关心这工事体系的维持，[128]而且只有对其效能的强有力的记忆才能解释一个事实：534年，紧随重新征服北阿非利加，查士丁尼命令复原其古代工事体系，并且重新招募和部署农民兵，以便为这体系配备人力。[129]

如果将四世纪的兼职农民兵与元首政治全盛时期的军团步兵作比较，前者的确可能显得很低劣，甚而无用。然而，这样的比较忽视了帝国总战略的根本变化，该战略现在要求部队静态驻防，守住固定的据点，以支持要在这些据点之间来回运动的机动部队。后者当然需要训练、纪律和机动性，而前者只需要坚毅顽强的应变能力。其耐久力显然给查士丁尼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也应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地方性防御网络的残余留存下来，直至五世纪期间，甚至在饱受蹂躏的雷蒂亚。[130]

六 行省部队

在元首政治时代,除了7 000名禁卫军和都市步兵大队,军队的所有兵力都是“行省的”,意指它们是为特定省份的防御而被部署。这些兵力仅由全职部队、军团、骑兵翼、步兵大队和骑步兵混合单位构成。既不存在兼职的农民兵边防部队,也不存在正规的机动后备,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帝国范围的。

到四世纪的君士坦丁时期,行省部队的部署模式已经改变:农民兵出现了,而辅助骑兵翼和步兵大队销声匿迹。被描述为军团的部队依然存在,但这些显然已小得多;它们不再部署在单一的巨型基地内,而是碎片化为各支常在的分队。[131]新的单位类型——骑兵营(*cunei*)和步兵辅助队(*auxilia*)——出现,两者或许俱为500人。[132]像农民兵一样,所有这些行省部队都归地区司令官即“边境指挥官”指挥,但他们仍是全职的正规军
174 人,地位居于农民兵与精锐的帝国范围野战部队(*Comitatenses*)之间。[133]
将在四世纪期间导致兵力进一步分层的这一演化,其本身始自源于三世纪的一系列变化。

直到三世纪的入侵洪水般袭来为止,军团一直是罗马军队的中坚,其部署自从哈德良时期往后几无变化。三世纪开始时,特赖阿纳二军团仍在埃及,弗雷滕西斯十军团和费拉塔六军团仍在巴勒斯坦,昔兰尼卡三军团仍在阿拉伯,老加利卡三军团在新的叙利亚行省腓尼基,西提卡四军团和弗拉维亚·弗玛十六军团留在叙利亚本部,新的塞维鲁诸军团即帕提卡一军团和三军团(可能还有意大利卡四军团)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的塞维鲁边境上。阿波利纳里斯十五军团和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在卡帕多基亚。在多瑙河畔,意大利卡一军团和克劳狄十一军团据守下默西亚,弗拉维亚四军团和克劳狄七军团立足上默西亚,马其顿五军团和吉米纳十三军团在达契亚,阿蒂厄特里克斯一军团和二军团在下潘诺尼亚,吉米纳十军团和十四军团据守上潘诺尼亚,而马库斯·奥雷柳斯组建的两个军

团据守多瑙河边境其余部分，其中意大利卡二军团在诺利康，意大利卡三军团在雷蒂亚。米纳维亚一军团和乌尔皮阿三十军团在上日耳曼，奥古斯塔八军团和普里米吉尼阿二十二军团在下日耳曼。不列颠现被分为两个行省，奥古斯塔二军团在“良省”（*superior*），瓦勒里亚·维克特里克斯二十军团和维克特里克斯六军团在“劣省”（*inferior*）；吉米纳七军团仍在西班牙，奥古斯塔三军团照旧是在北阿非利加的唯一军团，被部署于努米底亚。

因而，从哈德良时候起，军团部署显然极少变化：公元165年后，意大利卡二军团和三军团分别被派往诺利康和雷蒂亚，同时增添了三个塞维鲁军团，即帕提卡一军团、二军团和三军团。这些增添使军团部队达到33个单位——可能34个，如果算上那不确定的、据说由塞维鲁·亚历山大在231年组建意大利卡四军团。这些新军团中的一个即帕提卡二军团被部署在罗马，就此下面还要谈，其余的则被足够符合逻辑地部署在新征服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新军团守新边境。

这就是被三世纪的狂潮淹没的结构。鉴于随251年德西乌斯败北而来的众多军事灾难，我们可以假定到那时军团已丧失了它们的军团效能。[134]然而，这必须始终不过是个假定，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这威胁的规模的证据，它很可能比二世纪军团及其前身遇到的大得多。如前所述，威胁方面的**质的**变化肯定是最不利的。

在塞维鲁军队的军团中间，只有巴勒斯坦的费拉塔六军团（可能还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卡三军团）似乎在多事多难的半个世纪里完全消 175
失了，那是从235年塞维鲁·亚历山大去世到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之间的半个世纪。[135]戴克里先以后的一个多世纪，所有各种类型的188个“军团”被列于《尊显录》上，然而这个官僚政治的残存物是有欺骗性的。元首政治时代的巨大的战斗单位已不复存在。帝国晚期“军团”若是机动野战军团，便或许由1 000人构成，若是地区军团，则有3 000人左右，也可能更少。[136]不仅如此，它们的人员不是最初的军团有的那种经过挑选和训练有素的重装步兵，而且他们缺乏装备、训练或纪律去作为战斗工兵起

作用,[137]那是元首政治时代军团的最成功的作用。射击部队也不再是建制的了。[138]换言之,这些不是军团。相反,各单位基本上由轻步兵构成,装备如辅助部队一向的情形,用矛、弓、投石器和标枪,还有(最重要的)“斯帕塔”(*spatha*)——野蛮人的长刀,适于漫无规矩的散开队形战斗。[139]显然,此类兵力并非元首政治时代的军团曾是的那种优秀部队。

这衰落不是四世纪晚期突然发生的,尽管我们的大多数证据出自那时。从三世纪入侵洪潮幸存下来的军团必定更多地是在形式而非内容上幸存。经从未返回其母体军团的分遣队的连续撤退而衰竭,由于补给和指挥方面的解体而被削弱,与设防边界邻近地带一起反复遭受蹂躏(有时在此过程中全然被歼),军团到戴克里先时期必定已被急剧减小并大大削弱。此外,辅助单位即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两者中间有许多要么销声匿迹,要么仅仅作为农民兵,亦即不能胜任机动野战的纯粹地方兵力留存下来。

作为这些变迁的一个结果,直到戴克里先重组军团为止,基于前沿防御的战略不再能被贯彻(因为它要求在地方层面占有战术上的净优势),与此同时一种适当的纵深防御战略也无法得到贯彻,因为后者要求有一个由工事筑防前哨、独立据点和路旁小堡构成的深远和安全的网络。必不可免,在危机岁月里(约250年到约284年)唯一可予提供的防御种类是弹性防御。尽管它会允许敌人渗透,有时是深度渗透,但它至少将保证帝国权势(虽然不是帝国领土)的终极安全,如果足够强大的野战军能够最终集结起来击败无论业已抵达何处的敌人。这可以意味着在米兰城前
176 与阿勒曼尼人兵戎相见,在尤桑吉人已威胁到甚至罗马城后与之决一高低。包括大量骑兵在内的强大的野战军确实被集结起来,帝国权势得以幸免于难,但它只是以任由蛮族人旷日持久地蹂躏平民生命和财产为代价才幸存下来。

戴克里先不满足于此:他的目标是重建领土防御。这防御肯定不是阻绝性的,但它将至少是一种浅度的纵深防御,据此只有外部边境地带而非整个帝国领土会通常地经受战争的起落消长。在他达到这目的的努力

中，戴克里先试图削弱入侵和（在帝国领土之内）事后阻截的动能，办法是维持经工事筑防的桥头堡，它们意在支持在边境外侧早早阻截敌人攻击。[140]

如前所述，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有两项先决条件：第一，组织一个由各纵深分布的防御工事构成的富有弹性的网络；第二，部署强得足以有效对付地方性威胁的地区兵力。通过一番建筑防御工事的巨大的努力，这些先决条件得到了满足。“在整个莱茵河地区、伊斯特利亚半岛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建筑的军营和步兵营地依然随处可见”，颂词作者赞道，而六世纪时的编年史家马拉拉斯保留下了一则对戴克里先在东方大建防御工事的记忆，那是一条从“埃及”（阿拉伯？）抵达波斯边境的堡垒线。[141]现代考古学证实了古代人代表戴克里先提出的要求。[142]在三个地区，由此而来的建筑特别令人感兴趣。

建于波斯战争后293至305年间，工事筑防的“戴克里先”前沿阵线从西南取道巴尔米拉抵达幼发拉底河，提供了博斯特拉－大马士革轴线与沙漠之间的一条巡逻边境。[143]在这条道路边境上，三个步兵大队（五个之中的）和两个骑兵翼（七个之中的）的位置已被确认下来。[144]由于这条边境一向是“开放的”，没有任何连续的屏障，因而四帝联治时期的边防安排与元首政治时期的边防安排差别并非一目了然。可是，有一个基本差别，它如后所述关系到行省部队与设防边界之间的关系。在多瑙河畔，旧的堡垒和要塞一般被重建，并被改为硬点防御工事，然而随戴克里先对萨尔马西亚人（目前在该地区的主要敌人）的胜利，一连串桥头堡阵地也在该河外侧的里帕萨马提卡被建立起来，[145]以便利预想中的进攻。在埃及，约295年时一场大叛乱和约296年时一次严重篡夺图谋的所在地，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重组了的防御工事提供了有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保护的 177
仓库，储存通过四帝联治时期的实物税征收的食物和饲料。[146]

埃及保有在帝国内的一种特殊作用，而且它有特殊的地理状况（那里不可能有通常的周边线），但是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之被指派去防护食物和饲料仍然意义深远；不让敌人得到供应、同时确保机动防御部队有其

给养乃绝对必要。说到底,整个纵深防御战略基于这后勤因素。[147]

在四帝联治时期的纵深防御体系中,第二个要素是新的兵力结构。除了边防部队,边境行省由军团和被称为分遣队的骑兵单位守护,后者大概每队约500人。[148]两者都经久地部署在分派给它们的地区,但如同过去,它们也能整个或部分地被暂时调到别处,在特殊野战军中效力。

戴克里先,这位将自己的全部政策服从于帝国防御的紧迫需要,使整个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后勤基地的皇帝,[149]用了很大部分靠无情的实物税榨取来的财富,恢复和维持军团部队。一个世纪以前,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已做了许多去改善服役条件,以便增进招募和提高士气。[150]戴克里先遵循同样的政策,为通过实物支付(虽然也不乏试图维持贬值严重的货币薪饷)去供给军团而组织其财政体系。[151]

在到约231年为止部署的34个军团中,[152]多数经三世纪中叶的挣扎留存了下来。到305年戴克里先退位时,有可能已增添了多达35个新军团,军团总数因而达到67或68个。最少的估计是56个[153](33个塞维鲁军团,另外6个到284年已被确证的军团,在戴克里先治下得到确证的14个军团,还有另外3个据推测的军团[154])。军团兵力的增长因而巨大,因为戴克里先的军团肯定不是帝国后期萎缩了的1 000人部队。军团士兵是否仍是重装步兵和战斗工兵尚不清楚,虽然戴克里先治下的大量军事修筑物暗示他仍是那样。

军团对戴克里先纵深防御战略的作用是核心性的。虽然新的骑兵分遣队被主要部署在内地,位于重要道路两旁,但军团一如既往,照旧集中
178 于主要防御地点。在其前面和旁边,有骑兵翼和步兵大队,它们到现在大概已彼此难以分辨,而且都没有能力实施进攻性的前沿防御战术。因而很显然,意图是在防御区内迎击敌人,用骑兵分遣队机动阻截,用依然是机动战斗部队的军团组成阻挡性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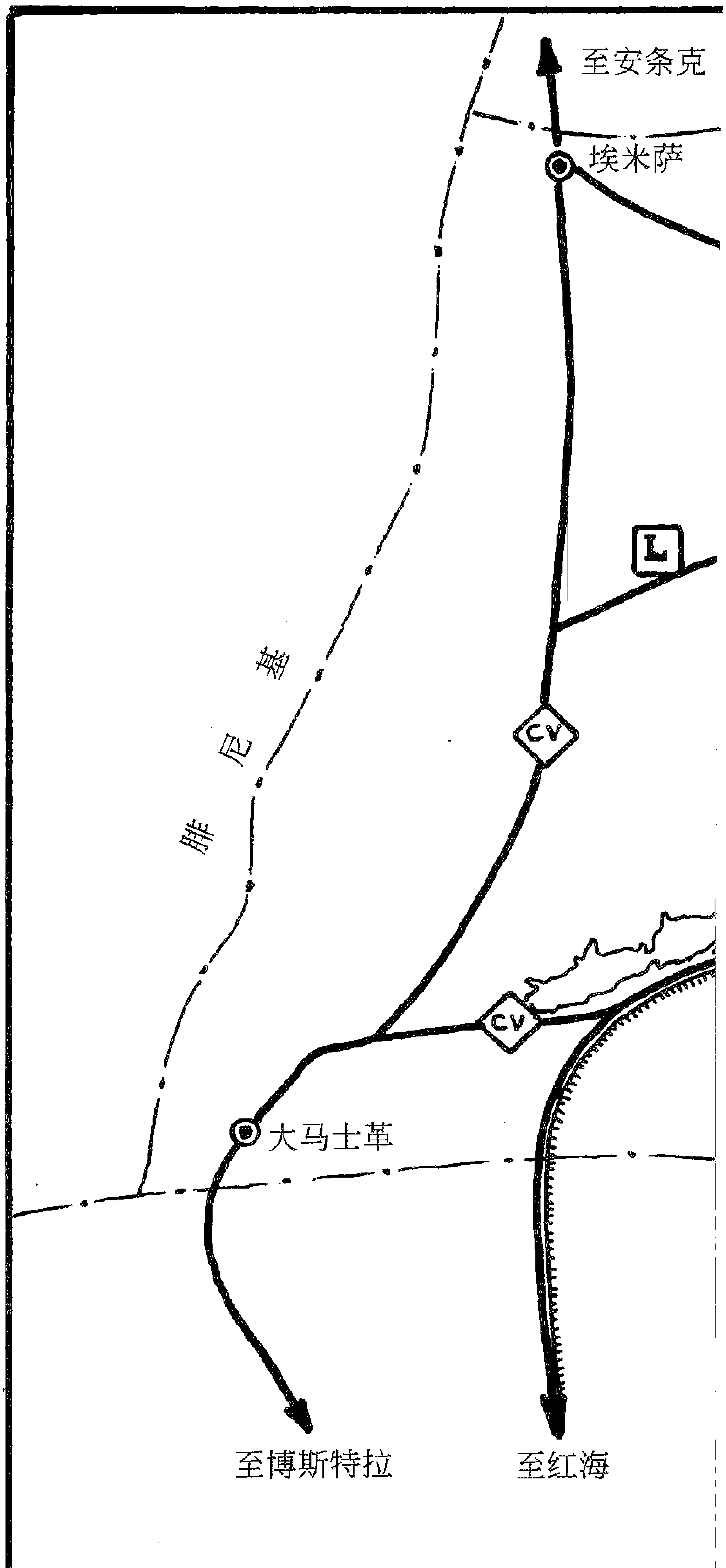
例如,在奥古斯塔里班尼西斯,除了沿大道本身的7个骑兵翼和5个步兵大队外,有"戴克里先"前沿阵线横在前面的那个地区的守卫者还包括2个军团和12个骑兵分遣队(在《尊显录》内被描述为骑兵单位 *equi-*

tes)。边境固定驻防部队据守的前方显然可被机动的敌人渗透,因而部署在重要路径上的骑兵单位将不得不在内地阻截入侵者,用(在巴尔米拉和达纳巴)的军团作为体系的枢纽和支撑点。[155]在巴勒斯坦,五个作为高级骑兵单位(*equites Illyriciani*)的分遣队和四支当地骑兵(*equites indigenae*)处于类似的地区控扼位置,显然构成一个机动部署。这里,唯一的一个军团同样据守一个枢纽位置,那在艾拉(埃拉特附近),与此同时在阿拉瓦河谷的 17 个骑兵翼和步兵大队组成一条固定设防据点之链,它横跨这个移居和游牧入侵的重大战场。[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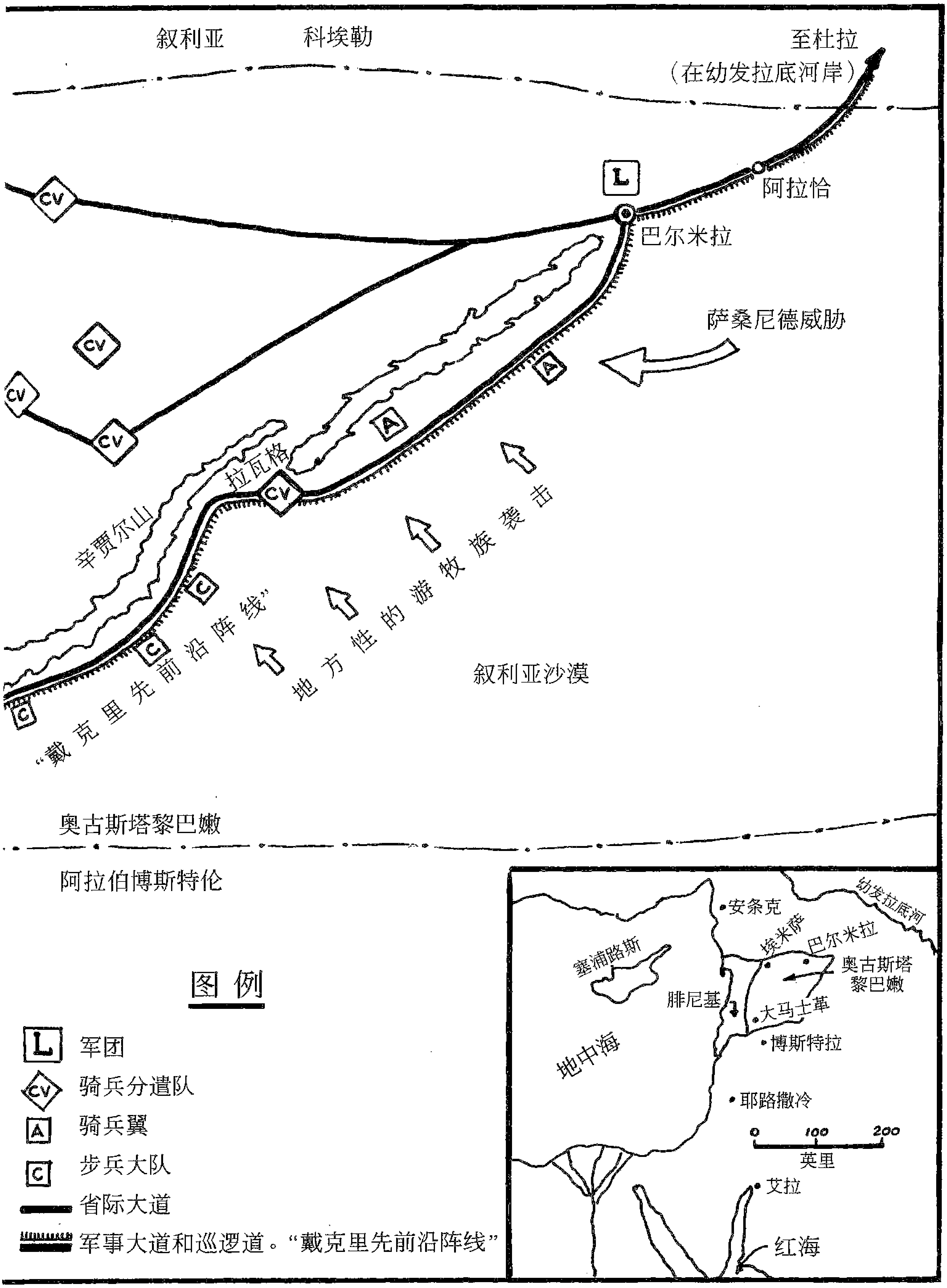
这就是可以从《尊显录》推断出来的戴克里先治下的基本防御规划。据权威认同,[157]现在并非机动的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为一连串独立据点配备了兵员;作为机动部队的骑兵单位 *equites* 可随时干预;军团仍然兵力集中,形成防御的中枢,并为防御提供终极保障。这种在行省规模上的纵深防御因而颇为肤浅:战斗将局限于边境地区单一的小地方内,渗透将由当地部队处理,因为一般得不到任何大的(帝国范围的)野战军。依靠将战斗局限在边境地区最狭窄的地带,防御者就会限制其破坏,帝国就将免于高度毁伤性的深度入侵,那是早先的(和后来的)弹性防御战略必然使之蒙受的。

似乎在君士坦丁治下(306 至 337 年),这一体系让位于另一体系,在其中强大的机动野战部队被集中起来供帝国范围之用,行省部队则相应被减少。这种君士坦丁式部署已据《尊显录》关于西徐亚下多瑙河地区、达契亚里彭西斯和两默西亚的列表被重构出来。[158]例如,在西徐亚我们发现两个军团,一个罗马人的和一个本地的河上小舰队,既未见骑兵翼亦未见步兵大队。军团现在提供部分边界防卫;它们被分成常设的分遣队,每 179
支分遣队被分派在一名当地安全官员(*praefectus ripae*)之下分管一个特定的河段。[159]靠近晚期罗马一切战略的重中之重即食物仓库,我们发现有 7 个在表上被列作 *cunei equitum* 的骑兵单位,还有 8 个被称为辅助部队(*auxilia*)的步兵单位,两者皆为新的战斗编队类型。[160]

骑兵分遣队不再存在,它们显然已经转入中央野战部队(或被重组



地图 3.4　纵深防御：奥古斯塔黎巴嫩
（仅显示已被证实的部队单位）


叙利亚
科埃勒
至杜拉
（在幼发拉底河岸）
阿拉恰
巴尔米拉
萨桑尼德威胁
拉瓦格
辛贾尔山
“戴克里先前沿阵线”
地方性的游牧族袭击
叙利亚沙漠
奥古斯塔黎巴嫩
阿拉伯博斯特伦
图例
军团
骑兵分遣队
骑兵翼
步兵大队
省际大道
军事大道和巡逻道。“戴克里先前沿阵线”
幼发拉底河
安条克
埃米萨
巴尔米拉
塞浦路斯
奥古斯塔黎巴嫩
腓尼基
大马士革
博斯特拉
地中海
耶路撒冷
0
100
200
英里
艾拉
红海

为骑兵单位 *cunei*)，而且军团不再部署为集中的打击力量。军团的地位已变得更糟：在三世纪中叶的兵力等级中，行省军团被定为“里彭塞斯”（*Ripenses*），居于地位低等的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与一流野战部队之间的中间位置。[161]地区司令官（边境指挥官）不再是帝国军队地区分支的指挥官，而仅是一名地方指挥官。[162]

由于帝国的总体资源没有任何增加，因而君士坦丁的野战军创建只能导致行省军队的弱化。质量业经证明下降（由放宽了的征兵体格标准[163]显示出来），数量极可能亦已下降。虽然君士坦丁没有撤空边境，使之丧失守卫者，[164]但显然行省部队不得不减少，如果野战部队要有食物、金钱和——这最重要——人员的话。于是就有了一个转变：从戴克里先时期肤浅的纵深防御，转变到一种较深的防御体系，它基于强大的野战军和相当羸弱的地区兵力。（在《尊显录》中，我们发现处于野战司令官控制下的被称为“仿野战军”［*Pseudocomitatenses*］的军团：这些单位已相当明显地从地方部队转变为野战部队，同时却没有取得完全的野战部队地位。）

君士坦丁之后，这一进程继续下去。在《尊显录》关于上默西亚的列表中，我们发现似乎是对后君士坦丁时代军队部署状况的叙述：3 个军团分遣队被列于表上（抽取自弗拉维亚四军团和克劳狄七军团）；但也有 5 个侦察部队单位（*milites exploratores*）（*milites* 是个像“单位”那般广泛通用的术语），俱由地方长官指挥。看来，所有这 8 个单位都是旧军团卫戍部队的残余。[165]在割断与其古老母体的一切联系之后，这些 *milites* 有如“军团”，只是侦察和搜索部队，大概担当起支持 8 个骑兵单位（*cunei*）和 8 个步兵辅助队（*auxilia*）的作用。[166]至少骑兵单位可能还将其内聚性（因而还
182 有其机动性）保持到了五世纪以内，[167]辅助部队则可能承担了军团步兵的支撑作用，尽管必然是以一种大为缩减了的方式。

在《尊显录》的列表中，还就饱受蹂躏的莱茵河中段地区记载下了解体的一个更甚的阶段，[168]那里我们发现在督军莫冈蒂亚森西斯指挥下，有 11 名提督（*praefecti*）负责下属单位，其中大多是未予区分的 *milites*。有一

个单位在名称上保留了曾与军团相连的痕迹（*Praefectus militum secundae Flaviae*）；另一个单位的名称让人想起一种极可能废了的功能（*praefectus militum balistariorum*）。在列表上，显然各部队全都需主要依据那附于称号的地名去加以辨识：这披露了曾是一支纯机动的军队的最终地方化。

七　中央野战军

倘若有可能创设完全机动的部队，即有能力从一地立即转移到另一地的部队，那就根本不必在前沿部署任何兵力。相反，整个军队可以被保持为中央后备，无须担忧现成的兵力可得性，也不必关心通道或运输问题。另一方面，倘若军队完全缺乏机动性，那么为了使每一前沿部署的功用——战术的或政治的功用——均等，部署计划就必须最佳地安排一个个单位所在地；而且，根本没有任何部队应被保持为后备，因为缺乏机动性的后备不可能有任何用途。

并不奇怪，哈德良治下臻至顶点的帝国安全战略接近这两个理论极端中的第二个。即使其重装备由成群动物或大车运载，军团也不可能移动得比人步行快；因此，就罗马步兵的日行军里程而言，帝国境内距离极其巨大。由于边境确实需要罗马部队的持续存在以遏阻或击败进攻，也由于帝国的敌人一般不可能协调其进攻，因而部署一支中央后备兵力会是一种浪费式的保险：在威胁浮现与所调兵力抵达之间会有长时间的延宕。最好将所有兵力都保持在线，通过从一个地区调取部队来增强另一个地区的防御。留为后备的部队将毫无用处，且其维持成本会像维持就地当值部队一样高，或者比那更高。完全可以说安东尼时代的部署模式是一种被拉伸得单薄的防线模式，全无机动后备兵力。[169]在战术层面，辅助单位，甚至军团一般能在几天时间里抵达一个行省边境的任何受威胁 183
地点，然而一支中央后备军极少可能“飞驰”；它将不得不以令人苦恼的慢速，行军一千英里或更多才能到达，例如从罗马之类中心部署点到莱茵河中央地区。

尽管如此,即使在一个机动性很低的环境里,仍有一个可能的理由要部署中央后备兵力,那就是保护中央权力本身。从帝国角度看可能非常低效的,对其统治者来说可以确实非常有用。在元首政治下,全无中央野战军,只有宫廷卫队、私人警卫、军官实习生扈从等等:奥古斯都有他挑选的扈从(*evocati*)和他的巴达维奴隶警卫;[170]以后,在扈从中还出现了所谓投机者(*speculatores*)(即经挑选的军士);大约在图密善时期,我们发现有特种骑兵(*equites singulars*),一支或许 1 000 人的坐骑部队。[171]到三世纪后期,扈从开始包括所谓保护者(*protectors*),那似乎是精锐卫队与军官养成所的一种结合。[172]到 330 年,我们见到"斯库拉"(*scholae*),一种精锐的骑兵部队,意味深远地由皇帝亲自指挥,而不是由控制所有其他中央兵力的高级野战军官(*magistri militum*)指挥。[173]在《尊显录》的列表中,5 个"斯库拉"单位在西方,7 个在东方,大概每个 500 人。[174]私人警卫常常演化成有官方身分的宫廷护卫,扈从中的精英军人亦有一种类似的、退化成装饰门面性质的宫廷卫士的倾向。另一种为人熟知的演化模式——宫廷护卫到精锐野战兵力再到野战军——从未在罗马形成,尽管事实上从一开始,禁卫军步兵大队就是一支比任何警卫队所能达到的大得多的兵力。

形成于公元前 27 年即元首政治肇始之际,[175]禁卫军是一支特权部队,得到两倍于军团的薪饷,即每年 450 德纳里。[176]在他对帝国军队作的概览中,塔西佗列出 9 个禁卫军步兵大队,但其数目到公元 47 年已增至 12 个;[177]维特利乌斯,公元 69 年的争夺帝位未遂者之一,进一步将禁卫军步兵大队的数目增至 16 个,但韦斯巴芗将其降回 9 个。最后到 101 年,它们的数目又一次增至 10 个,形成一支 5 000 人的部队,至少在地位上是精英。[178]除了禁卫军步兵大队,还有数目一直是 4 个、每个达 500 人的城市步兵大队,连同到二世纪末已有 3 500 人的"维吉利"(*vigiles*)。然而,后者是作为救火员和警察效力的已获自由的奴隶,不能算作军人。[179]因而,除去"维吉利",最多有 8 000 人在各个作为中央兵力可供使用的有
184 组织的单位内。这多过足以充作皇帝扈从的,但肯定不等于一支大规模的野战军。

即使二世纪的体系有不少弹性，但它不能提供可打硬仗恶仗的野战军。因此，必须为重大战争组建新军团。图密善为其公元 83 年与卡特人的战争，组建了米纳维亚一军团，图拉真为其征服，不得不组建特赖阿纳二军团和乌尔皮阿三十军团；安东尼・庇护以辅助部队构成的远征军团，将他那非同小可的战争应付了过去，但马库斯・奥雷柳斯被迫组建新军团（意大利卡二军团和三军团）去打他的北方战争。[180] 193 年开始，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打大规模的内战；差不多紧随其后，他开始打一场大规模的帕提亚战争。像先前的皇帝们那样，他用一支由军团分遣队和辅助部队构成的专用野战军去这么做；然而他也像先前的皇帝们一样发觉这不够：到 196 年，三个新军团即帕提卡一军团、二军团和三军团被组建起来。[181] 自奥古斯都往后，没有哪个皇帝组建过那么多军团。

然后来了重大创新：虽然与先前的做法相符，帕提卡一军团和三军团被及时布置在新近征服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但帕提卡二军团并非如此。反之，它被安置在罗马附近的阿尔巴努姆，成了元首政治开始以来第一个常驻意大利任何地方的军团。这加上一个事实，即所有三个塞维鲁军团被置于属于市民特权阶层（*praefecti*）而非元老阶层（*legati*）的指挥官之下，已经提示古代和现代史家，帕提卡二军团的部署动机是内部的和政治的，而非外部的和军事的。[182] 可能是如此；但同样明显，帕提卡二军团还可以充作一支中央野战军的核心。新军团本身已经是一支颇大的兵力，大于前塞维鲁时代的禁卫军步兵大队、城市步兵大队和特种骑兵的总和。然而，塞维鲁显著增强了这些部队：每支禁卫军步兵大队在规模上翻一番，增至 1 000 人，总数达 10 000 人；每支城市步兵大队规模翻两番，增至 1 500 人，总数达 6 000 人；甚至“维吉利”的数目翻一番增至 7 000 人。只有特种骑兵的数目未能增加。[183] 此外，某些部队，特别是骑兵，隶属于一个隐晦不明的机构 *Castra Peregrina*，那类似于帝国大本营。[184]

不幸的是，从不充分的史料中，凑合不出关于这些部队后来的部署状况的任何内在连贯的图景，然而从那目前在罗马随时可用、并且摆脱了边防职责的 30 000 人当中，肯定可以抽取一支可观的中央后备兵力用于实

185 际作战,或许多达 23 000 人——差不多等于四个军团。[185]这是一支大兵力:马库斯·奥雷柳斯带走三个军团与帕提亚打仗,它们不在边境这一点可能引发了他统治时期的危险的北方战争。

正是在三世纪最困难的岁月里,在加里努斯(253 至 268 年)治下,我们听说一支新的中央后备兵力,或者不如说是区域野战后备兵力:它们是部署在主要道路轴心上的骑兵部队,这些轴心诸如阿奎莱亚(控扼进入意大利的东部主大道)、多瑙河中段的锡米乌姆、德拉瓦河谷的波图维奥以及从北方进入希腊的主大道上的利奇尼杜斯。[186]基于我们持有的分散的证据,新战略的轮廓浮现出来:那么深的纵深防御,以致它实际上是一种弹性防御,其中只有意大利核心地区得到安然据守。[187]

这一战略的主要工具是全然机动的骑兵军团,那看来是由加里努斯组建或至少由他增加的。奥雷路斯作为其指挥官效力了 10 年,忠诚地对内外敌人作战,最后于 268 年倒戈反对加里努斯;这场篡夺失败,但加里努斯在围攻米兰时遭暗杀,被打败的奥雷路斯正在那里谋求避难。意味深长的是,他指定的继位人是另一名骑兵指挥官克劳狄,此人将统治两年时间(268 至 270 年),赢得数次重大胜利。接着,克劳狄由另一位更伟大的骑兵指挥官奥勒利安继承,后者一直统治到 275 年被谋杀为止。[188]显然,不附着于任何固定阵地的机动骑兵军团的存在有重大政治意义:倘若其指挥官不是皇帝本人,那么他也能变成皇帝,因为没有任何可比的武力能被拿来对抗一支中央集权化的大规模骑兵军团。

对这支骑兵的构成所知甚少。它包括"普罗莫蒂"(*Promoti*)(可能是老的有 120 匹马的军团骑兵分遣队[189]),还有本地骑兵单位(*equites Dalmatae* 和 *equites Mauri*),并且可能有某些重装骑兵(*Scutarii*)。[190]同样可能的是,在加里努斯治下,各军团被配备 726 人的新骑兵分遣队,以取代原来 120 人的骑兵分遣队。[191]正是在这个时候,术语步兵分遣队(*vexillatio*)经历了涵义变化,因为它在 269 年出现时原意为一个军团步兵分遣队,但到 293 年时它已表示一个骑兵单位。[192]这术语起初肯定意指一个典型的机动野战单位,而且容易看到随骑兵重要性的加大发生的转变。在加里

努斯统治十周年庆典上，骑兵的新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承认：在列队行进的仪式等级安排方面，它被给予像禁卫军一样的地位。[193] 186

骑兵使罗马远征军在陆上移动的战略机动性增大了一倍（每天约50英里对每天约25英里），但这战略长处包含着战术短处：当罗马士兵成为一名骑兵时，他无法保留他先前的战术优势的任何痕迹。罗马骑兵与蛮族人打仗而无内在的，甚至一名颓废的军团军人依然享有的战术优势。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怀旧的维吉蒂乌斯留下的史料对骑兵抱有敌意，争辩说步兵花费较少，用途较广，更适于作为军团传统的载体。[194]

罗马骑兵史记载了轻骑兵大部队的一贯的成功，连同重装骑兵的同样一贯的失败，前者装备投射武器，后者则装备突击武器。[195]尽管如此，在图拉真治下，一种装备重枪的骑兵单位（*Ala I Ulpia Contariorum Miliaria*）已经出现；甚至更早时候，约瑟夫斯已将韦斯巴芗的骑兵在犹地亚（约68年）使用的一种武器称为“康托斯”（*kontos*），即重长矛，重装骑兵的典型的武器。[196]这种骑兵没有护身铠甲；然而，第一个披甲骑兵单位出现在哈德良时期，称为 *Ala I Gallorum et Pannoniorum Catafractata*，一个描述给骑兵穿上很少量硬铠甲的称号。[197]重装骑兵一直是帕提亚人的首要兵力，也是萨桑尼德军队的首要兵力。然而，他们的重装骑兵完全由硬铠甲保护，马匹也部分地披甲，像人所熟知的中世纪晚期骑士模样。罗马部队给他们起绰号叫“面包烤箱”（*Clibanarii*），在炎热的叙利亚沙漠他们如此着装当然不好过。[198]

后来在271年，奥勒利安带领一支由军团分遣队、禁卫军步兵大队，以及（最重要的）摩尔人和达马提亚人血统的轻骑兵组成的大军，驶往东方去摧毁巴尔米拉的势力。[199]首先在奥龙特斯河附近，然后在埃米萨，[200]奥勒利安大败巴尔米拉人，两个场合都运用同样的战术：装备轻便、不受妨碍的本地马匹退却，敌人的“面包烤箱”追逐——直到他们精疲力竭为止。然后真正的战斗开始。此后，当波斯军队介入、在侧翼攻击围困巴尔米拉的罗马人时，他们亦被同样的战术击败。尽管这充分显示了轻骑兵在得到坚实的步兵支持情况下对披甲骑兵的优势，但“面包烤箱”式单位

187 仍开始出现在罗马军中:《尊显录》中列出了9个,包括一个被称为 *equites sagittarii clibanarii*(即披甲骑射手)的单位——极可能是轻武器与重铠甲的一个装饰性但无效的结合。[201]这披甲骑兵的战斗记载暗淡可悲。[202]

在戴克里先的肤浅的纵深防御规划中,没有独立的骑兵军团的容身之地。战略上,它是"弹性防御"的天然工具,然而在政治层面上,它的存在本身破坏稳定。不过,戴克里先无需解散这骑兵军团,因为它很可能已经消失。[203]摩尔人和达马提亚人的骑兵部队是否在奥勒利安取得对巴尔米拉的胜利之后被他解散,以便驻防紊乱的东方边境,或者是否戴克里先本人解散了它们,均仍不确定。[204]骑兵单位"普罗莫蒂"(*Promoti*)可能再次被附着于军团,虽然这一联系可能仅仅是行政管理上的。[205]

戴克里先治下的骑兵部署问题与一个更广泛、更重要和争议大得多的问题直接相联,那就是野战军本身的部署。正统的观点一直是:戴克里先及其同僚创设或扩充了皇帝野外护卫队(*Sacer comitatus*),用常备野战军取代了他们的前任们临时凑集的野战部队,并且造就了固定边防部队(*limitanei*)和野战部队(*comitatenses*)的双重结构,那构成帝国后期军队的特征。依据这一看法,君士坦丁在一代人后仅通过增添一个指挥结构而完善了这项变化。[206]如此,皇帝野外护卫队将等于一支野战军,远不止是警卫,因为(1)它规模可观,(2)它在成分上不统一,不像老的禁卫军步兵大队那样。它包括后者,但后者的数目被减少了;[207]它还包括从各军团挑选的精锐步兵(*Lanciarii*)、[208]被称为"科米泰"(*comites*)的骑兵单位、享有声望的摩尔人骑兵和精选的新军团(爱奥维阿纳军团和赫库利阿纳军团),可能还有骑兵单位"普罗莫蒂"。[209]

依照本世纪早些时候被提出而后被拒绝的、不那么传统的另一种观点,[210]有人论辩说皇帝野外护卫队不过是传统的皇帝护卫,而不是一支野战军甚或其核心。据认为,戴克里先扩充了军队,在规模上将它翻了一番,然而是君士坦丁将大量部队从边境地区调走,以组建他的中央野战部队。近来,这个观点在一项相当权威的专题研究之中被重申[211](该研究遭到了批评,[212]但也得到了权威性的认同,至少其相当大部分[213]),它现在看

来是有说服力的。关于谁是这改革的原创者的争议仍悬而未决，因为在次要但重要的问题上依旧有疑惑。[214]然而毫无疑问，是君士坦丁创立了常 188
备野战军的新司令部，即步兵指挥部（*Magister peditum*）和骑兵指挥部（*Magister equitum*）。[215]

无论如何，到四世纪头几十年，双重军队结构已经存在：在边境上的农民兵和行省部队归地区指挥官（*duces*）控制，中央野战部队则在皇帝及其指挥部的号令之下。此后双重军队结构的演化是可预料的。在《尊显录》中，有48个军团被列为仿野战军，透露出它们在作为行省部队效力之后，被转入野战军。[216]当君士坦丁组建或至少扩大他的野战军时，他确实征集了某些新的单位，包括辅助部队，[217]但他为了增加野战兵力，必定还大为削弱了行省兵力。这无疑就是五世纪史家佐西姆斯正确地批评的事情，即部队从边境转到城市，不管他由于他的反基督教情绪而多么偏颇。[218]很可能，在四世纪晚期，以牺牲相对地位和特权继续衰减的行省兵力（现在统称为农民兵）为代价，野战军规模不断增大。[219]

八　结论

显然，为加强中央野战军而对边防行省兵力所做的缩减将总是有助于为帝国权力提供政治安全，但它们必定不可避免地降低普通人民的日常安全。在帝国在西方衰落的最后各阶段里，边境地区被整个剥夺其残余驻防军以增强中央野战兵力的事并非罕见，如406年在从事着内战的斯蒂利奇奥治下发生的那样。[220]在此类场合，边境似乎被留给与蛮族人的同盟去"防守"，[221]那是一世纪附庸关系的徒有其表的翻版。这样的同盟是租来而非买来的；一旦不可或缺的威慑因素化为乌有，引诱便无法提供任何安全。

无论它们确切的年代如何，《尊显录》的各项列表给出了关于边境地区与野战部队之间兵力分布的某种概念，而且有人做出了若干尝试，试图依据对部队单位规模的估计将这分布量化。[222]（见表3.1.）

189 **表 3.1　部队分布:在东方和西方的边境部队和野战军**

	军队数量				
	(1)	(2)	(3)	(4)	(5)
西方野战军	—	111 000	113 000	123 800	94 000
东方野战军	—	94 500	104 000	96 300	79 000
野战军总数	194 500	205 500	217 000	220 100	173 000
西方农民兵	—	200 000	135 000	138 000	122 000/130 000
东方农民兵	—	332 000	248 000	165 700	201 500
农民兵总数	360 000	532 000	383 000	303 700	323 500/331 500
西方总兵力	—	311 000	248 000	261 800	226 000/224 000
东方总兵力	—	426 500	352 000	262 000	280 500
西方农民兵百分比	—	64%	54%	47%	56 –58%
东方农民兵百分比	—	78%	70%	63%	72%
东西方总兵力	554 500	737 500	600 000	523 800	496 500/504 500
农民兵占总兵力百分比	65%	72%	64%	58%	65%—

资料来源:(1) T. Mommsen,"Das römisch Miliärwesen seit Diocletian," *Hermes*24(1889):263,被援引于 Clemente, *La Notitia DigniTatum*, p. 156, note 71;(2) Nischer,"Army Reform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p.54;(3)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 table 15, pp. 379 –380;(4) Várady,"New Evidence on Some Problems of Late Rom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p. 360;(5) J. Szil ágyi,"Les Variations des centres de preponderance militaire dans les provinces frontiers de l' empire romain,"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arum Hungaricae 2 (1953):217.

这些估计在依据和论证上那么大不相同(它们至少反映了《尊显录》
190 的种种不同的记载日期),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每个场合,农民兵百分比在经公元五世纪的危机生存下来的东方高得多,显著超过在未能挺过这危机的西方。个中含意一目了然,它与在此所作的论辩的关系同样显而易见,这论辩是关于一个机动性很低的环境里后备兵力的战略价值的。帝国的敌人本不可能机动得多,但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由于外部威胁并非协调一致,因而相对机动性并不重要。要紧的是部署在后方的罗马兵力的绝对机动性,那太低,以至无法依据军事理由辩解双重体系

是合理的。

一旦成为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便指挥其军队对抗东西两方的内外敌人,尽管直到他掌权为止,他全无实际从军经验。个中含意再次一目了然:"塞维鲁之例成了一项不可能有例外的通则。皇帝必须在战场上指挥他的军队,无论他年纪多大或个人爱好如何——倘若他不成功,那么一个更好的将军将取而代之。"[223]帝国后期的野战军比元首政治时代的庞大得多,但即使在被分布于地区后备时,野战部队也无望拥有足够的战略机动去阻绝性地捍卫帝国领土:敌人能被阻截,并且常常能被打败,然而只是在他已经干了最坏的事情之后。另一方面,中央野战军能起作用去保护那控制它们的军人皇帝的权势,这是野战军直到最终完结为止一直有效履行的一项任务。

然而,对帝国领土、平民生命和私人财产造成的损害是累积性的;它无情地侵蚀了帝国的后勤基地,无情地减小了帝国结构对其臣民的价值。

191 # 结　　语

对三种体系的评价

从君士坦丁样式的、有其边防部队与中央野战部队双重结构的纵深防御开始，帝国军队的分层庶可预料地进一步演变。到四世纪后期，我们已见到被称为“帕拉蒂尼”(*Palatini*)的新部队单位，[1]作为在东西方皇帝直接指挥下的中央野战部队效力；先前的野战部队即 *Comitatenses* 已经成为地位较低的地区野战军，而农民兵在相对地位方面已降得更低。可以有把握地假设，这一演变导致可供当地和地区领土防御的人力物力在量上进一步减少，在质上进一步劣化。若其他不变，它就必定导致领土安全进一步减小，连同其所有在帝国的愈益虚弱中显现的后勤和社会后果。

三层纵深部署当然会比任何线性部署有弹性得多，然而这“弹性”只能意味中央权力因此可以存活到下一个收税季节，从现在不断面临地方战事暴力伤害、不断遭受不遇抵抗的蛮族入侵蹂躏的人口收税。最后，形势能够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五世纪帝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一位来自维米纳休姆的商人，可以宁愿选择帝国之外的生活，在阿提拉的营寨内，在一
192 个完全不比匈奴人温和文雅些的族民中间找到可取的新家。[2]

让我们接着来重新考虑帝国安全的三种体系。第一种在此被称为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但或许更适当地应被认为是共和帝国体系。在其核心地区周围，帝国是霸权性质的，有附庸国自治地负责执行罗马的必需事务，供出它们自己的资源，并且通过它们的服从去促成核心地区的领土安全。通常没有罗马部队部署在附庸国或附庸部族，但体系的稳定要求有持续不懈的外交努力，既为确保每个附庸将依旧明白罗马的全部权势(当它本身在政治上孤立的时候)，也为维持附庸结构之内部的(即王朝

的)和地区的(即附庸之间的)平衡。于是,大小附庸国由于它们自己对罗马权势的认知而保持臣服,同时这威慑力得到积极的引诱物、特别是津贴的补充。

在这体系下,武装部队被附庸们认作是一种强得无法抵抗的统一无间的力量,实际上却被分布成一个环绕罗马的巨大圆周。然而,这些部队依然集中在多军团大军之内,不被投入领土防御,因而它们固有内在的机动性,并且可任意调动。兵力结构的灵活性如此之大,以至近乎一半军队能被派往单独一个叛乱行省(公元 6 至 9 年的伊利里库姆)而不损害帝国其余部分的安全。在没有这类叛乱的情况下,这灵活性导致了巨大的"可任意使用的"军事力量,那可被用于在前线依然"开放"的地方进一步扩张,例如在公元 9 年以前的日耳曼,或在克劳狄治下的不列颠。

由于其霸权性质,帝国控制范围仅受一个因素限制,那就是别国在多大程度上将罗马权势认作迫使顺从。因此,罗马权势的延伸距离不需与其军事力量的成本成正比。以一种霸权模式,帝国的进一步扩展不要求增大所维持的军事力量。添给帝国的新附庸将对这同一个强制做出反应,如同所有那些在它们之前被纳入帝国控制范围的附庸。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之节省武力,连同其效率,便缘于此。然而,这是一个旨在加强罗马控制之安全而非帝国领土与其人口之安全的体系。

从公元 69 年后的弗拉维时期到三世纪中叶的危机,安东尼体系以诸种不同方式得到使用,它反映了帝国的领土化与其轻重缓急次序的变更。
武装部队现在被到处部署,以确保边界地区和更重要的内地的安宁,并因 193
而确保它们的繁荣。帝国的军事实力与其有效权势现在严格地成正比,因为这实力现在大多被直接使用,而不是作为政治说服的一种手段。附庸仍在,但其用处比过去小得多:维持领土安全的任务被有效地从羸弱的附庸那里转移给分布广泛的边境部队,与此同时强劲的附庸不再能被容忍,因为它们的实力现在可能危险地超过邻近的帝国部队的实力。

不过,帝国仍然强大,且其实力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政治实力。一种真正的愈益成长的繁荣,连同一种自愿的罗马化,正在消除本土主义不满

的最后痕迹,并且为大一统体制创设强有力的支撑基础。面对周边的互相分隔甚远的敌人,帝国仍能派遣压倒性的强大武力去对付之,因为行省的宁静——还有在某些地方的精致的边防基础设施——使得和平能够暂时得到维持,即使边境部队严重减损。这残余的进攻能力主要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有用,其潜在威胁有助于令帝国的邻居保持分裂,即使并非必定顺从。

尽管如此,罗马对帝国所有邻居的生活施加的文化和经济影响本身正在起反作用,亦即为反对帝国的共同行动造就文化和政治基础。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现在取得了一个文化的诸种要素,它被所有人共享,但不属于任何人。在莱茵河对面,边境各族民的联盟正开始形成,它将把他们转变成可怕的多部族聚合体。遭无情的文化转型力量作对,罗马外交在使帝国的敌人保持分裂方面变得不那么有效了。而且,周边防御体系是专门针对低烈度威胁的,它无法适当地对付其一致发难。

第三种体系兴起,以回应外交和军事难题的这一棘手的结合,其后果在三世纪的大危机中变得一目了然。戴克里先治下,一种肤浅和被构造的纵深防御取代了加里努斯和前一代人的"弹性防御",据此特别野战军在帝国境内深处与蛮族聚合体作战。

有如安东尼体系,新体系没有提供可任意使用的剩余军力用于进攻,或用于外交强制、威慑或强迫。区别在于,第三种体系还不再有一种"急冲"能力,因为帝国的敌人不再迫于前沿防御战术而久据守势;相反,他
194 们只是被遏制住。当遏制部队被弱化到要集聚特别野战军时,穿透随之发生,安东尼体系的一种能力残余无可挽回地付之东流,那就是为政治说服目的产出权势意象的能力。于是,与外部强者的外交关系现在必定反映当地的力量对比——那不可能在周边的每个地段都总是有利于帝国。

有鉴于此,该体系的投入与产出最终相等。它提供的安全水平变得直接与花费在军队和边境防御工事上的资源量成正比。使得大一统帝国成为最有效的安全提供者的武力大节省丧失净尽。从现在起,相对于替代物即独立的各地区性国家,它只享有某些适度的缘于规模效应的节省。

而且,这些规模节省并非大得足以补偿严重的行政低效或受贿。到头来,维持大一统帝国的观念和现实的不再是集体安全的逻辑,而只是帝国权力控制者的意志以及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195

附　　录

权势和武力:定义和内涵

军事权势通常依功能多少被定义为"……国家通过武装强制或威胁武装强制影响别国意愿和行为的能力。"[1]这样的定义显然未给权势与武力之间任何有意义的区分提供可能性;的确,我们援引的这位作者马上补充说:"宽广地定义,它[军事权势]等同于'武力'"[2]显然,在被考察的罗马安全体系中表现出来的"权势",如确实在几乎所有其他可想象的安全体系中的那样,是一个比武力广泛得多的现象,即使武力被"宽广地定义"。

权势本身,即纯权势(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非一个度量单位)一直是无数定义的主题,[3]包括某些如此宽泛以至几乎全未界定的定义(例如在一本流行教科书中的定义:"人对他人心灵和行为的控制"[4])。一项当代定义在其成分方面分析了权势关系,将行动中的权势当作一种能动的、操纵性的关系,纯权势就是其工具,那包括在一个从积极激励直到强制的连续系谱中的多种要素。[5]在这个较充分的定义中,自愿服从归因于"权威",与此同时,在非自愿服从方面的强制或威胁之缺乏据说透露了"影响"的作用。[6]

其他的当代定义刻意将权势观念与影响观念结合起来,将两者都看作行为者取
196 向的关系,[7]其性质可依据"如此的直觉概念,它们非常类似于力学[即牛顿力学]中力的概念依据的那些理念"。[8]并不足怪,不那么正式的定义完全模糊了权势与武力之间的任何区别,[9]它们以诸如"权势是强制……的能力"之类用语开头(有时以此结尾)。

这些定义可能适合多种分析目的,但不适合我们在此的目的。在试图评价帝国安全的三种体系的效率时,我们首先注意到在这些体系中,如同在古代和现代所有类似的安全体系中那样,作为对外行动能力的一个总和,"权势"意味着该体系的总"输出"。(这输出是权势而非安全,因为安全还取决于威胁的大小,一个外在于体系的变量。)

其次,我们观察到,此类体系的效率由所生权势(输出)与运行该体系的社会[10]承担的成本(输入)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些成本既是部署武力、修筑军事基础设施和提供补助的直接成本,又是可能被注入随机防御(即纵深和"弹性"防御)方法的隐性成本,依据此种方法,出于战略的(即全局性的)缘由,暂时不阻挡敌方行动对社会施加

的伤害。

如果所有其他因素相同,那么此类体系的效率必定与依赖武力的程度成反比,因为所生武力将需要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正比投入。事实上,这些体系的效率将反映其“武力节省程度”。

由此,尽管以静止的观点看,武力确实是权势的一个成分,但以能动的方式看,权势和武力根本不相似,反而在某种意义上颇为相反。一个是输入,另一个是输出,效率要求前者最小化和后者最大化。显然,我们不能依赖那些抹煞武力与权势之间(动态)差别的定义,必须提出我们自己的与之不同的定义。

当然,到目前为止,武力的定义较为简单。我们知道武力如何构成:它与输入的量和质成正比,无论这些输入是军团部队还是装甲师,是辅助骑兵还是直升机中队,或在一个不同的分析层次上是人和食物还是装备和燃料。我们知道武力如何“起作用”:靠直接应用于战场,或者以积极的(非战斗的)部署方式。诚然,武力还间接地(即在政治上)起作用,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如果被认识到——可以遏阻或强迫。然而,武力的间接说服[11]虽然无疑是一种政治的而非物质的现象,但它仅发生在最狭义的“战术”方面。

因此,在牢记这个保留的同时,我们可以将运作中的武力当作本质上类同于物理现象,真正可比牛顿力学中力的概念。两者都在应用中被消耗;两者都历经距离而衰 197
减,其程度取决于传达手段或传送媒介;两者都以同质单位之间的完美比例为特征。换言之,武力确实由制约其积累、使用、传送和散发的种种因素支配,类似于规定机械力的物理法则。

权势如何“起作用”? 真是大不一样。首先,它不是靠直接产生效应起作用,而是靠引发反应——倘若一切运转良好便是被想望的反应——起作用。强者发号施令,屈从其权势者俯首听命。然而在俯首听命方面,后者不是权势关系的消极对象(如武力的对象那样)。它们是行动者,因为那些服从的人自己从事被要求的行动。

仅发号施令的强者只有一个静态特征,即“权势”;是这权势的行动者对象通过其服从提供能动的“能量”。[12]由此随即可以断定,给用力(并且在此过程中耗力)的量与所得结果之间加诸一个比例关系的物质制约不适用于权势关系。一个、两个或一千个战俘回应一项他们选择服从的命令,走向关押他们的地方:这不消耗他们以服从来回应的那个权势;与此相反,与在物质意义上架走 50 000 名示威者相比,架走 50 名示威者需要的力小得多。在后一场合,力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有一种严格的比例性,而在前一场合没有这样的比例性。

这一切只是描述了权势关系而未解释之。接下来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某些人服从其他人,或者换句话说,靠什么过程能在人们的心里引发被想望的反应,使得他们按照要求于他们的方式行事。显然,权势的行动对象决定服从;倘若我们假定他们是理性的,[13]那么他们的服从或不服从必定反映一种比较,即服从的成本效益与拒不服从的成本效益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可以内化成了一种心理习惯,致使服从是反射

式的而非深思熟虑的。如此显然是本能的过程仅反映先前成本效益比较的坚实结果。）

在这一点上，似乎权势容易被定义为控制流向他人的成本和得益的能力，而武力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通过强制或摧毁施加一种特别代价的能力。倘若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的分析就会毫无成果地返回到它的起点，[14]而且在此追求着的权势与武力之间的区分将不得不被抛弃。因为，“控制成本和得益的能力”看来必须像应用武力（或简单武力）的能力那样，服从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同一限制性比例。

然而并非如此。通过行动对象的决定引发可想望的反应的能力，显然不是出自控制成本和得益的能力，而是出自被认知的这么做的能力。换言之，权势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知觉上的，权势因而起初是一种主观现象；它只能通过一个媒介即别人的知觉起作用。

如果权势首先是个知觉过程，那么距离不会减小它，除非知觉的手段历经距离而相应退化。与易北河对面的各族相比，一个遥远的东方附庸王国通常会在知觉意义
198 上远更接近罗马的现实，因为在东方，希腊化文明使人们倾向于理解帝国权势的含义，而在易北河对面找不到任何此类文化基础。诚然，反复的惩罚性行为（还有正面的引诱）能够教育甚至最原始的人懂得罗马权势的含义，然而在此情况下，被如此证实了的“权势”本身会是一种不同的现象：至关紧要的是，在输入与输出之间会有一个比例，至少在教育过程继续下去的时候。

被认知的权势不随距离减小，因为它不是一种物理（或准物理）现象。同理，被认识的权势不因使用而消耗。一个或十个附庸国王能够认知在帝国内的同一个不被分割的权势，并且能够被它影响。当获得（靠其本身对这权势的知觉而获得）再多十来个附庸国王的服从时，这权势的量也不减少。的确，知觉是很少几种不消耗、甚至不细微难察地消耗其对象的人类活动之一（请浪漫派人士容我这么说，爱情是另一种）。相反，用于一个地段以迫使一个骚动不安的部落循规蹈矩的武力，无法同时用于打击另一个，而且目标数目的任何增大无不减小可被用去打击其中每个的武力的量。由于这原因，诸种帝国安全体系的效率必定取决于它们的武力节省状况。或者换句话说，它们的效率取决于武力在多大程度作为被认知的权势的一个非活动成分得到维持，而不是被直接使用。

如果暂不考虑权势（即“静态的”被认知的权势）的所有其他成分，那么权势运作与武力运作之间的差别可能看来再次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显然，在实际上所有可设想的环境中，经部署的军事力量将是国家总体权势的中心成分。因此，安全是依靠静态部署作为被认知权势的武力去获得，还是依靠其直接使用去获得，会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并非如此。即使不考虑武力在被实际使用时必定遭到的实际磨损（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作为权势的武力也天然地比直接使用的武力节省得多，因为它不要求成正比的武力输入。

例如，一条既定的周边地带可以依靠积极防御去确保（在此场合被部署的部队

必须足以击败周边每一地段的所有威胁);或者,它可以依靠威慑去确保,为此只需部署一支惩罚性的打击力量,它能够对潜在进攻者珍视的价值施加如此大的损害,那大于后者可望通过首先进攻获取的利得。积极防御不可避免地需要有比威慑所需的更多的兵力,就后者而言有可信的报复能力就足够了——假定对手是理性的并且做出可预见的相对价值判断。[15]首先,安全需要保护每一单独的易受攻击伤害的资产;第二,安全只需被认识到的摧毁所选敌人资产以及施加大得不可接受的损害的能力。 199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在威慑提供的安全与积极防御提供的安全之间有一种质的差别。前者是说服的结果,因而受制于人类知觉和人类决定中固有的一切无常奇想;后者是物质性的,因而确定无疑。审慎者很可能为了积极防御的独立于他人决定的可靠性,宁愿支付它的较大的成本。

这就提出了整个广泛的出错问题,它超出认识上的时间滞后特例。如果权势只有通过别人的知觉这一媒介才能显明易辨,那么从一种能力到另一种能力的的转化,亦即控制成本和得益的"客观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理论上的)能力之转化为被认知的如此做的能力,便受制于多种错误:人体知觉出错,通讯媒介出错,认识过程出错,还有认知者之间沟通出错。一个盲人不会被显示枪支吓倒,一名银行职员也不会被隐藏得太好的手枪镇慑,而对火药化学完全无知的食人生番可能将步枪视作无用的棍棒,或至少未能将其致命性告知从未见过步枪的他人。在这样的一些场合,杀掉一个野蛮人、盲人或银行职员可能就足以教育其余,但说服的行使将由此变得无效,因为不得不改而使用武力。象征性武力在每个场合同样不足成事。

那么,权势是否仅为一种知觉现象?政治是否仅为一种特殊的、而且是狭窄的心理现象?肯定不是。至此,我们已含蓄地将权势关系当作双边关系对待:单独一个成本和得益控制者面对其权势的单独一个行动者对象——并被后者认知;甚至在被假设的是群体的时候,这些群体事实上也被当作全然铁板一块,从而等于是个体。然而,即使一切政治都能被当作权势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也将大多不是双边而是多边的。

回到我们的附庸国王之例,他们个别地认知罗马的权势,个别地服从帝国的主宰。我们注意到隐含的前提假设,即附庸国王们并未也将其附庸同道们的权势认知为潜在地添加性的,并将其总和与罗马的权势相比。假如做了这样的比较,那么帝国权势本将不再被视为占完全彻底的优势。

由此可以断定,帝国与单个附庸国王之间的权势关系只是程序上双边的。事实上,它取决于多种不同现象,其中大部分是多边的:附庸国对它自己力量的认知和估算;对其他附庸国力量的认识和估算;对协同行动的可能性的认知和估算;对共同拒不服从的风险、成本和得益(相对于服从的成本和得益)的认知和估算;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都由个体的知觉和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决定规定;换言之,由在其丰富多样性和固有复杂性之中的一切政治过程规定。全面的政治最终决定附庸国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决定权势对比,后者不仅受体系内个别单位的 200

被认知的权势影响,而且受附庸互相间的凝聚程度和帝国内部的凝聚程度影响。尽管这些复杂的关系至关重要,但知觉和由此而来的种种问题仍然是核心性的,我们对权势与武力的区分仍然与之相伴。

注　　释

注释中所用缩写语

ANRW　*Aufstieg u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Geschicte und Kultur Roms in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 Hildegard Temporini, ed.,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4 – .

BC　*Bellum Gallicum*

CAH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9 – 39.

CW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Antiquarian Society*

DE　*Dizionario epigrafico di natichit à Romane*. Ettore di Ruggiero, ed. Rome: L. Pasqualucci, 1895.

J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NH　*Naturalis Historia* of Pliny the Elder

REL　*Revue des Etudes Latine*

SHA　*Scriptores Historia Augustae*

第一章

1 Ronald Syme, "Some 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JRS* 23 (1933): 14 – 33. 又见 H. M. D. Parker,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pp. 72 – 92。主要参考仍然是 Riterling 的"*Legio*"一文,载于 Pauly – Wissowa, *Real – Encyclopaedie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toissenschaft*。

2 一项简短的证据概述见 A. Passerini 文,载于 *DE*, 4, fasc. 18, pp. 555 – 57, s. v. "Legio"。

3 通常设定元首政治时期的军团有成建制的 5 280 名步兵(9 个标准步兵大队,每个由各自拥有 80 人的 6 个百人队构成,加上有 6 个双百人队即 960 人的首列步兵大队)以及 120 名骑兵。(同上, p. 556.)对首要资料来源 *De Munitionbus Castrorum* 的一种修正性解读产生了一个战斗步兵总数目 5 120 人,分成 9 个标准步兵大队和一个首列步兵大队,后者由 5 个而非 6 个双百人队构成;见 R. W. Davies, "Appen-

202 dix,"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4 (1957): 110－11. 关于总部部队,见 David Breez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egion: The First Cohort and the *Equites Legionis*," JRS 39 (1960): 50－55。

4 基本著作仍为 G. L. Cheesman,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4)。我们殷切地等待一部由 J. F. 吉列姆教授撰写的当代著作。见一项晚近的概览:D. B. Saddingt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in *ANRW*, pt. 2, vol. 3, pp. 176－201。

5 *Annals*, IV, 5.

6 例如见:G. H. Stevenson 的文章,载于 *CAH*, 10: 229; Cheesman, *Auxilia*, p. 53。

7 参见 J. Szilágyi, "Les Variations des centres de préponderance militaire dans les provinces frontiers de l'empire romai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 (1953): 133, 147, 156。该文作者的按部分分析产生了一个公元 6 年的兵力水平总估计:325 000 至 356 000 人。这在公元 20 年减少到 318 000 至 348 000 人,在公元 46 年增加到 369 000 至 375 000 人。

8 *Res Gestae*, 3.

9 *N. H.*, VII, 149. 见 P.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 C. －A. D.* 14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1)。根据该书作者,在朱利乌斯·凯撒的各场战争和殖民之后,意大利的成年男性公民人口大约为 120 万人,其中 90 万是青年(*iuniores*),即主要的适龄入伍公民群体 (p. 512)。因此并不奇怪,强制征兵非常不得人心 (pp. 414－5);事实上,它被提比略废除了。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半期,军团兵员的三分之一可能是外省青年(虽然这并不排除罗马出身的和(或)有罗马公民权的);见 G. Forni, *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à Diocleziano* (Milan－Rome: Fratelli Bocca, 1953), pp. 65－76,还有其附录 B, pp. 159－68。如此的结论受制于取样很少这一点固有的不确定性;见一篇更近的文章:Forni, "Estrazione etnica e sociale dei soldati delle legioni nei primi tre secoli dell'impero," *ANRW*, pt. 2, vol. 1, p. 344。

10 军团饷金和维持费用见 G. R. 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 p. 92,退役授予(那也可以用土地给予)见上书, pp. 147－53;赠金见上书, pp. 108－14. 对辅助部队的支付见 Watson, "The Pay of the Roman Army: The Auxiliary Forces," *Historia* 8 (1959): 372－78。

11 Th. Pekáry, "Studien zur römischen Währungs und Finanzgeschichte von 161 bis 235 n. Chr.," *Historia* 8 (1959): 472－73.

12 *DE*, vol. 4, fasc. 18, p. 555, s. v. "Legio."

13 IV. 5.

14 例如 G. H. Steven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229;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19, *et multi alii*。

15 例如 H. – G. Pflaum, "Forces et faiblesses de l' armée romaine du Haut – Empire",载于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àRome*, ed. Jean – Paul Brisson (Paris and La Haye: Mouton & Co., 1969), p. 94。亦可追溯性地参见 D.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et la réforme Constantinienne*. Institut français d' archéologie de Beyrouth,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56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2), pp. 103 – 4,他对后期元首政治军队发的论辩更有理由应用于朱利乌斯 – 克劳狄时期。

16 G. H. Stevenson, *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till the Age of the Antoni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9), p. 102; F. E. Adcok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598 – 99。

17 *Tiberius*, 16.

18 C. M. Wells,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该书作者的结论被概述在第 237 至 246 页。

19 塔西佗(*Histories*, IV. 23)在叙述维特拉(桑滕)营地时表明了这一点,那是西维利造反期间(公元69 至70 年)一个军团的部分兵力和另一个军团的残部在其中遭到攻击的营地。

20 S. L. Dyson, "Native Revolts in the Roman Empire," *Historia* 20 (1971): 239 – 74,特别见 pp. 264 – 67。

21 这一定性出自 G. Webster,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y A. D.*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9), p. 52。 203

22 Wells, *German Policy*, p. 239. 又见 R. Chevallier, "Rome et la Germanie au ler siècle de notre ère: Problèmes de colonization," *Latomus* 20 (1961), p. 269。

23 见 G. M.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p. 66。

24 *limes* 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见 G. Forni 的文章,载于 *DE*, vol. 4, fasc. 34, s. v. "Limes," pp. 1076 – 83。适切于这个时期的含义见他以"*g*"打头的部分(p. 1080)。*limes* 一词含义的转变见 Henry F. Pelham, *Essays*, ed. F. Haverfiel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1), p. 168,连同下面一篇文章的讨论:A. Piganiol, "La notion de *limes*",载于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Acta et Disssertaiones Archaelogicae), *Arheološki Radovi I Rasprave*, III (Zagreb, 1963), pp. 119 – 22。

25 在法律上,作为帝国成员的附庸国处于权利恢复法(*jus postliminii*)之下,虽然就大多数目的而言,他们被当作帝国领土的事实上的延伸对待。见 P. C. Sands, *The Client Pr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under the Republic*, Cambridge Historical Essays no. 16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15。

26 Pliny, *N. H.*, V. 81 f. 被援引于 M. P. Charlesworth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616 n。

27 此语出自 Ernst Kornemann 的演讲题目"Die unsichtbaren Grenz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重刊于 *Staaten – Völker – Männer Aus d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Leipzig: Dieterich, 1934), pp. 96 – 116。

28 提比略召回日耳曼远征军的动机见 Tacitus, *Annals*, II, 26；关于阿米纽斯基于切鲁西人的联盟与马罗博杜乌斯的马科曼尼人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见上书，II, 44。关于召回日耳曼远征军的种种原因，又见 Louis Harmand, *L' Occident romain: Gaule, Espagne, Bretagne, Afrique du Nord* (31 *av. J. C. d* 235 *ap. J. C.*) (Paris: Payot, 1960), pp. 106 – 8。亦见 Josef Dobiás, "King Maroboduus as a Politician," *Klio* 38 (1960): 163。

29 提比略时期的附庸概貌见 Ronald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81 – 83; Emilienne Demougeot, *La Formation de l' 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s origins germaniques à l' avènement de Dioclétien* (Paris: Aubier, 1969), pp. 114 – 23. 罗马对日耳曼各族的外交概貌见 E. A.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pp. 72 – 108。关于马罗博杜乌斯，见 Dobiáš, "King Maroboduus," pp. 160 – 61。关于萨尔马提亚族的亚齐基人，见 John Harmatta, "The Sarmatians in Hungary," 载于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armatians*, Magyar – Görök Tanulmányok, 30 (Budapest: Pázmány Péter Tudományegyetemi Görög Filológiai Intézet, 1950), pp. 45 – 46。

30 C. E. Stevens, "Britain between the Invasions (54 B. C. – A. D. 43",载于 *Aspects of Archaeology in Britain and Beyond: Essays Presented to O. G. S. Crawford*, ed. W. F. Grimes (London: H. W. Edwards, 1951), pp. 322 – 44。

31 IV. 53.

32 E. Badian, *Foreign Clientelae* (264 – 70 *B. C.*)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特别见 pp. 1 – 14。

33 见 Alban D. Winspear and Lenore K. Geweke, *Augustu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om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no. 24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35), p. 244。

34 对罗马势力范围的一项功能研究见 Sands, *Client Princes*。该书第 77 页论述王朝政策，第 88 至 89 页论述对外政策。

35 见 David Magie,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after Christ*,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vol. I, pp. 437, 476, 553 – 61。

36 Cheesman, *Auxilia*, pp. 15 – 16; Sands, *Client Princes*, pp. 103 – 6.

37 Suetonius, *Augustus*, 23; idem, *Tiberius*, 17.

38 *Germania*, 37.

39 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39 – 40, 162 – 63。

40 例如见 Stevenson, *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pp. 47 – 50。

41 *Annals*, IV. 24.

42 *Deiotarus*, 22.

43 见 René Cagnat, *L' Armée romaine d' Afrique et l' occupation militaire de l' Afrique sous les empereurs*, 2ded. (Paris: Ernest Leroux, 1913), pp. 7 – 24。 204

44 Ronald Syme, *CAH* 10: 356.

45 看似不成比例(虽在政治上正确)的军事努力投放的最突出例子或许是围困马萨达。关于这次操控努力的重大,见 I. A. Richmond, "The Roman Siege – Works of Masàda, Israel," *JRS* 52 (1962): 142 – 55。

46 见 Sands, *Client Princes*, p. 155, n. 2; Tacitus, *Annals*, Xii. 29。

47 Mommsen (*Hist.*, III, pp. 234 – 36),被援引于 Stevenson, *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p. 37。

48 尽管有一套名不虚传的道路体系,陆上行进自然非常缓慢(当时和现在一样,行进部队每小时走 3 英里,即每天最多走 24 到 30 英里)。跨区域行进(例如从潘诺尼亚到安纳托利亚东部)将因此用去一个作战季节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海上行进能快得多,往往也直接得多。见 Lionel Casson,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该书作者告诫不要用破纪录的例子去显示通常的海上机动性。

49 Bernard W. Henderson, *Five Roman Emperors: Vespasian, Titus, Domitian, Nerva, Trajan* (*A. D.* 69 – 117)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 60.

50 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48。

51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89, 271.

52 Cheesman, *Auxilia*, p. 59.

53 Sands, *Client Princes*, p. 103.

54 *The Jewish War*, III. 4.2. 参见上书, II. 18.9。

55 Tacitus, *Germania*, 33.

56 例如见 E. Badian, *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2d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pp. 29 – 43.

57 *Annals*, V. 5.

58 摘录,取自 A. H. M. Jones, ed., *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 2 vol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vol. 2, pp. 148 – 49。

59 这区别在 Badian, *Roman Imperialism* 一书第 4 页被关注。

60 见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pp. 42 – 61。

61 W. W. Tar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113 – 15。

62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p. 46.

63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23.1, I. 27.6

64 关于攸里克利斯及其被废,见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pp. 59 –60;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26.1 –4。

65 Sands, *Client Princes*, p. 93.

66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p. 56.

67 Sands, *Client Princes*, p. 93.

68 Tacitus, *Annals*, II. 42. Ronald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39)将对安提奥库斯的指控斥为"不足信的借口"。

69 Badian, *Foreign Clientelae*, p. 12.

70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pp. 51, 53.

71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20.4.

72 Dobiáš, "King Maroboduus," p. 156.

73 关于贸易与迁徙路线之间的关系,见 R. E. M. Wheeler,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54), pp. 91 –94。

74 Tacitus, *Agricola*, 21.

75 Dobiáš, "King Maroboduus," p. 161.

76 一项对武装"说服"(即武力的政治应用)的广泛的分析见 Edward N. Luttwak, *The Political Uses of Sea Pow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ter 1。

77 一番叙事见 T. Rice Holmes,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27 *B. C. – A. D.* 14. 2 vol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 1931) vol. 2, pp. 116 –21。一项分析见 Dyson, "Native Revolts," pp. 253 –258,连同 Harmand, *L' Occident romain* 一书第 86 至 93 页的史事重构。

205 78 见 Chevallier, "Rome et la Germanie," pp. 271 –73。

79 见 Colin D. Gordon, "The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 as a Roman Policy of Imperial Defense"(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48 年)(LC microfilm AC – 1, no. 1105)。

80 见 Harmand, *L' Occident romain*, pp. 86 –93。

81 Tacitus, *Annals*, XI. 16.

82 这一外交不能依据道义理由予以指责而不考虑必需。然而见 A. Alföldi, "The Moral Barrier on the Rhine and Danube",载于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ed. E. B. Birley (Durham University, 1952), pp. 1 –16,特别见 p. 8。

83 例如见 Tacitus, *Germania*, 33。

84 见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p. 93 –99; Dobiáš, "King Maroboduus," pp. 163 –165。

85 *Germania*, 42.

86 Gordon, "Subsidization," pp. 11 – 34.

87 Tacitus, *Annals*, II. 45, 46.

88 同上, II. 46。

89 同上, II. 62。

90 同上, II. 63。

91 Gordon, "Subsidization," pp. 11 – 34.

92 Tacitus, *Annals*, XII. 29.

93 Suetonius, *Gaius*, 43 – 46.

94 Tacitus, *Annals*, XI. 19.

95 同上, XII. 27, 28。

96 J. G. C.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44 – 45。

97 伊索夫利(梅利泰内附近)——那里有一座通往尼西比斯的关键大道上的桥梁——位于卡帕多基亚,然而在萨莫萨塔的渡口——它纵跨经埃德萨和卡雷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道路——位于科马基尼。最重要的渡口在东北叙利亚的久格马(巴尔基斯),经奥龙特斯河谷与地中海相连。见 Scramuzza, *Emperor Claudius*, pp. 193 – 95; M. Cary,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otr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9), pp. 181 – 82。

98 J. G. C.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44 – 45。

99 同上, p. 750(关于安提奥库斯四世), p. 751(关于苏希穆斯和科蒂诸子);又见 M. P. Charlesworth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660 – 61。

100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9. 6; Albino Garzetti, *L'Impero de Tiberio agli Antonini*, Instituto di Studi Romani, Storia di Roma, vol. 6 (Bologna: Licinio Cappelli, 1960), pp. 98 – 100. "一位东方冒险者"("*avventuriero orinetale*")系后一著者用语。又见 Martin P. Charlesworth, *Five Men: Character Studies of the Roman Empire*,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vol. 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3 – 30。

101 参见 Duncan Fishwick, "The Annexation of Mauretania," *Historia* 20 (1971): 467 – 68。

102 J. G. C.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52; Magie, *Roman Rule*, pp. 540 – 53。

103 J. G. C.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52。

104 Scramuzza, *Emperor Claudius*, p. 185. 参见 Tacitus, *Annals*, XII. 21。

105 见 Donald Dudley and Graham Webster, *The Roman Conquest of Britain* (London: Dufour, 1965), p. 184。

106 Denis Van Berchem, "Conquêst et organization par Rome des districts Alpins," *REL* 11 (1962): 231。

107 M. P. Charlesworth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682。

108 见 Parker,*Roman Legions*, pp. 9 –20; Webster, *Roman Army*, pp. 27 –30。这两项都基于波里比阿史书第六篇。

109 Jacques Harmand,*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otre ère*) (Paris: A. et J. Picard et Cie. , 1967), p. 39.

110 见 Paul Coussin, *Les Armes romaines*: *Essai sur les originset l' evolution des armes individuelles du legionnaire romain*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6), 通篇。

206 111 关于马略之后军团骑兵的不确定的证据,见 Harmand, *L'Armée et le soldat*, p. 46。又见 Manuel Marin y Peña,*Instituciones militares romanas*, Enciclopedia Clasica, no. 2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tificas Patronato "Menendez y Pelayo,"1956), p. 74, para. 137。

112 Parker, *Roman Legions*, p. 43.

113 但"哈斯塔"未消失;见 Coussin, *Les Armes*,pp. 359 –60。

114 这个数目的唯一证据为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I. 6. 2。

115 见 Eric William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 vol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1: 183。维吉蒂乌斯的热烈言辞(*Epitoma rei militaris*, II. 11)或许应当持有某种保留来予以对待。

116 当克劳狄命令 Cn. 多米蒂乌斯·科布洛退出他对乔西人的报复性作战时,科布洛将手下人投入工程,开掘一条马斯河与莱茵河之间的运河(见 Tacitus,*Annals*, XI. 20)。在公元 69 年内战中的贝德里阿库姆战役后,维特利乌斯派遣吉米纳十三军团在克雷莫纳和博诺尼亚建造竞技场(Tacitus, *Histories*, II. 67)。所有的道路当然都是由军团修筑的,包括在其总部的勘测员(*mensores*)。

117 Fontinus, *Strategemata*, IV. 7. 2. 被援引于 Marsden,*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p. 183, n. 3。

118 Harmand,*L'Armée et le soldat*, p. 62,援引 19 世纪法国陆军的一项实验。

119 Joachim Marquardt, *De l' Organisation militaire chez les Romains*, rev. ed. A. Von Domaszewski, trans. J. Brissaud, Manuel des antiquités romaines de J. Marquardt et Th. Mommsen, II (Paris: A. fontemoing,1891), pp. 156, 192.

120 关于从对汉尼拔的各场战役开始罗马骑兵丑名远扬的糟糕表现,见 Paul Vigneron, *Le Cheval dans l' antiquité gréco – romaine*; *des guerres médiques aux grandes invasions*: *Contribution á l' histoire des techniques*. Annales de L' Est, Mémoire no. 35 (Nancy: Faculté des letterset *de Sciences humaines*, 1968), vol. 1, pp. 261 –64。

121 投石器早就失去了全部军事重要性,不过参见 J. Harmand,*L'Armée et le soldat*,p. 77。关于射程的可比性,参见 W. McLeod, "The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 *Phoenix* 19(1965): 14. R。R. W. Davies 在"The Romans at Burnswark" (*Historia* 21

(1972):105－6)中认为,投石器操作手从来不是罗马军队中的常规成分。

122 Tacitus, *Histories*, IV. 12－80, V. 14－26. 关于所涉军团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43－45。

123 *Strategemata*, II. 7.3,5.

124 *Crassus*, 27.6,7.

125 Tacitus, *Histories*, IV. 71.

126 见下面第三章。

127 Tacitus, *Annals*, I. 49.

128 Velleius Paterculus, II. 117.

129 Harmand, *L'Armée et le soldat*, p. 46, n. 136.

130 "社会战争"之后(即公元前 88 年以后),意大利人已经通通变成公民,不再作为辅助部队打仗,而是作为军团兵力作战。(同上, p. 40; n. 101。)当时骑兵的作用见 pp. 46－51。

131 R. W. Davies, "Appendix"(被援引于前面注 4)。该作者提出,在 *quingenaria* 和 *milliaria* 这两类队伍中分别有 480 和 800 名步兵。

132 它们未被见于弗拉维时期以前;它们何时被最初组织起来未经确定。

133 简短的定义见 Vigneron, *Cheval*, p. 253。

134 例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I. 5.5。约瑟夫斯记述的"康托斯"(*kontus*)(重长矛)显然是一种突击武器,装备了它的骑兵分明是正规的辅助部队骑兵,与附庸国的或非正规的部队截然不同。

135 关于这场战役的骑兵方面,见 Vigneron, *Cheval*, pp. 297－99。

136 XXII. 37. 被援引于 Cheesman, *Auxilia*, p. 8。

137 *BG* II. 7.1.

138 见前面注 118。

139 见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一书第九页注内的仔细分析。该作者 207
在他对荷马史诗文本的分析中,显示了奥德赛的弓的合成性质。

140 McLeod,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 p. 8.

141 同上。

142 Tacitus, *Annals*, I. 56, II. 20. 参见 Suetonius, *Gaius*, 46。

143 见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p. 184。该书作者只是假设之;然而,掷弹器在往往未开化的辅助部队中的出现会令人吃惊。当西维利与其辅助部队围困在维特拉的军营时,他们使用了罗马俘虏和逃兵,即军团士兵建造的攻城器械;Tacitus, *Histories*, IV. 23.

144 见被援引于 Thompson, *Early Germans* 一书第 131 至 140 页的各个例子。

145 同上, pp. 146－49。

146 Ronald Syme, *CAH II*: 146,依据 Dio, LXVII. 4.6。

147 Suetonius, *Domitian*, 7.

148 Syme, "Some Notes on the Legions," (n. 1), p. 33.

149 同上。

150 Tacitus, *Annals*, IV. 5;部署结构未改变,直至两个新军团(普里米吉尼阿十五军团和普里米吉尼阿二十二军团)被征召以及入侵不列颠的准备约在公元 42 至 43 年开始时为止;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29。

151 普林尼的一封书信(LXXIV)提出了达契亚人与帕提亚人联手的可能性;某些学者认真看待这一设想,例如见 Henderson, *Five Roman Emperors*, pp. 273 – 74。另一种观点见 A. N. Sherwin – White, *The Letters of Plin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6), p. 662。

152 卡农图姆在维也纳以东 50 公里。此为该钳形作战的南段,其另一段将从(莱茵河畔的)美因茨向东挺进,两军将会师于易北河。约 15 万兵员参加这场巨大的战役。见 Tacitus, *Annals*, II. 46, XI. 16; Velleius Paterculus, II. 109。

153 见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369 – 73; Holmes,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p. 111 – 15; Dyson, "Native Revolts," pp. 250 – 52。

154 在公元 8 年,可能有 10 万以上兵员从事镇压这场叛乱:10 个军团、70 个辅助步兵大队、10 支骑兵队以及大量非正规部队,主要是色雷斯附庸国王罗梅托西斯一世供应的色雷斯骑兵;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372。

155 接下来的论辩依据 P. A. Brunt 的文章,载于 *JRS* 53 (1963): 170 – 176 (对 Hans d. Meyer, *Die Aussenpolitik des Augustus und die Augusteische Dichtung* 一书的评论)。该训诫见 Tacitus, *Annals*, I. 11。塔西佗的反对见其 *Agricola*, 12. 当然,塔西佗是在征服与否悬而未决的一个时期里写作的;见 Ronald Syme, *Tacitus* 2 vols。(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vol. 1, pp. 10 – 29。

156 Tacitus, *Annals*, II. 46. 参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82 – 85 和通篇。

157 见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353。

158 这是 Brunt 文章的一个重要的附属论点,基于 A. Klotz 的著作。显然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人认为从莱茵河到维斯图拉河的距离——即横跨整个"日耳曼"——短于从比利牛斯山脉到莱茵河的距离(636/686 英里对 920 英里),后两者被认为是平行的。与此相似,从维斯图拉河到中国远边的大洋的距离被认为不足比利牛斯山脉与莱茵河之间距离的三倍(即 2 560/2 660 英里)。由于朱利乌斯·凯撒以一支从未超过 10 个军团的兵力 10 年里征服了高卢,因而征服整个日耳曼必定显得是个完全可行的设想。晚近对证据的一项重新检验证实了 Klotz 的结论和估计;见 J. J. Tierney, "The Map of Agripp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vol. 63, section C, no. 4 (1963), pp. 154 – 60.

第二章

1 Jacques Harmand, *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otre ère*) (Paris: A. et J. Picard et Cie., 1967), p. 132, n. 240.

2 GrahamWebster,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 D.*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69), pp. 170–71.

3 例如见下述著作中描述的营寨:I. A. Richmond, "The Romans in Redesdale," 208
History of Northumberland 15 (1940): pp. 116–29。

4 Harmand, *L'Armée*, pp. 121–28. 该作者在第 99 至 135 页对防御营寨作了全面概览。

5 例如 Webster, *Roman Imperial Army* 一书第 171 页说:"这(木栅栏)只是一道挡开游荡的本地人和野兽的篱笆。"又见 Harmand, *L'Armée* 一书第 129 至 134 页,那里援引了类似的看法。

6 罗马部队似乎从一顿"很早的早餐"(早晨 6 点?)过后即开始行军,直至日中(下午 1 点?),其余时间被用于修建营寨和休息;Frank E. Adcock, *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13.

7 这些数字取自技术手册 *Liber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 第 40 节(壕沟)和第 50 节(防御墙垒)。

8 同上。

9 引自 Albert Harkness,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Roman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7), p. xlix。

10 Adcock, *Roman Art of War*, pp. 13–15.

11 *Liber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 第 1 节。

12 Adcock, *Roman Art of War*, p. 15. 参见 Harmand, *L'Armée*, p. 129, n. 226, p. 130, n. 228,还有总的见 pp. 129–34。

13 Adcock, *Roman Art of War*, p. 14.

14 *Res Gestae*, 31.

15 C. Forni 的文章,载于 *DE*, vol. 4, fasc. 40, s. v. "*Limes*," p. 1,280。又见 Antonio Frova, "The Danubian *Limes* in Bulgaria, and Excavations at Oescus," *The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ed. E. B. Birley (Durham: Durham University, 1952), pp. 25–26。该文作者援引并赞同 D. Krandjalov 的论断,即"大土石工事"("Great Earthwork")筑于图密善时期,"小土石工事"("Small Earthwork")筑于罗马时代以前,石墙筑于君士坦丁时期。然而另参见 Em. Condurachi, Ion Barnea, and Petre Diaconu, "Nouvelle recherches sur le *Limes* Byzantin au Bas–Danube aux X^{e} –

XI^{e} siècles"载于 *Proceedings of the 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ed. J. M. Hussey, D. Obolensky, and S. Runcima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7), p. 179,它对 Krandjalov 年代学论断的其余部分提出了质疑。

16 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有一段 15 英里长的双沟墙,它弥合了西面自然屏障哈布尔河与东面辛贾尔山高地之间的缺口,从而锁住了一条否则能轻易从南面进入关键城市尼西比斯的通道。见 R. E. M. Wheeler, "The Roman Frontieer in Mesopotamia,"载于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 126 和 p. 115 所附地图。

17 见 G. Forni 的文章(载于 *DE*, vol. 4, fasc. 34, pp. 1,075 –83)内对于"设防边界"(*limes*)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的讨论。这里讨论的"水平""设防边界"与 Forni 的 *h* 型(pp. 1,081 –82)相应。

18 同上, p. 1,084。

19 例如见 A. Alföldi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2: 213; H. C. Pflaum, "Forces et faiblesses de l'armée romaine du Haut – Empire,"载于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àRome*, ed. Jean – Paul Brisson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and Co., 1969), p. 96; Erich Swoboda, "Traian und der Pannonische *Limes*,"载于 *Les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entre national de al recherché scientifique (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é scientifique, 1965), p. 197。参见 Denis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dt la réforme constantinienne*,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de Beyrouth,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vol. 56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2), p. 104。

20 例如见 Wilhelm Weber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312 –13; G. R. 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一书第 67 页评论了维吉蒂乌斯对防御的"执迷";C. M. Wells,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一书第 246 页贬斥了弗拉维诸帝的"马其诺防线心理"。事实上,看来在对罗马边境的现代分析中,照例必须提到倒霉的马其诺防线。

21 关于塔楼,见 E. B. Birley, *Research on Hadrian's Wall* (Kendal: Titus Wilson
209 and Son, 1961), pp. 103 –10。哈德良长墙研究状况的最近概览见 David T. Breeze and Brian Dobson, "Hadrian's Wall: Some Problems," *Britannia*: 3 (1973): 182 – 208。

22 Birley, *Research*, pp. 227 –33.

23 Jean Baradez, *Vue aérienne de l'organisation romaine dans le Sud – Algérien, Fossatum Africae*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1949), p. 359. 然而见 Denis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 44,那里对前哨壁垒和阿非利加工事体系本身的年代辨识的连贯性表示怀疑。

24 见 Webster, *Roman Imperial Army*, pp. 246 –48。关于这样的联络手段的缺

陷，见 R. J. Forbes,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6 (Leiden, 1967)。

25 见 Anne S. Robertson, "The Antonine Wall," 载于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 102。

26 I. A. Richmond, "Trajan's Army on Trajan's Column,"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3 (1935): 34 – 36.

27 Idem, "A Roman Arterial Signalling System in the Stainmore Pass," 载于 *Aspects of Archeology in Britain and Beyond: Essays presented to O. G. S. Crawford*, ed. W. F. Grimes (London: H. W. Edwards, 1951), pp. 293 – 302。

28 见 A. Poidebard, *La Trace de Rome dans le desert de Syrie: Le limes de Trajan à la conquête arabe, recherches aériennes* (1925 – 1934) (Paris: Libra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4); 关于其他"敞开的"设防边界，见 G. W. Bowersock, "A Report on *Arabia Provincia*," *JRS* 61: (1971): 236 – 42; Maurice Euzennat, "Le *Limes* de Volubilis", 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Vorträge des 6, Internationalen Limes – Kongresses in Süddeutschland (Cologne and Graz: Bohlau, 1967), pp. 194 – 99。

29 见 David Magie,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after Christ*,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1: 571。

30 F. A. Lepper, *Trajan's Parthian War* (London: Geoffrey Cumberledge, 1948), p. 108.

31 墙的厚度（因而防御墙垒走道——减去胸墙——的宽度）参差不一，从小至 5 英尺 6 英寸到最大 10 英尺；见 Birley, *Research*, pp. 84 – 85。

32 例如见 Denis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 126; 与此相似 Wheeler, "Roman Frontier in Mesopotamia," p. 126。

33 关于罗马以前的线性屏障及其军事功能的一番列举，见 Jacques Harmand, *La Guerre antique, de Sumer àRo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3), pp. 177 – 78。

34 Birley, *Research*, p. 79.

35 F. G. Simpson and Parker Brewis 著作所载资料，被援引于 ibid., pp. 86 – 87。

36 见 Jean Baradez, "Compléments inédits au '*Fossatum Africae*,'" 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 200。

37 S. A. M. (原文如此) Gichon, "Rom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Negev,"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Acta et Dissertaiones Archaeologicae (Zagreb), Arheoloski Radovi I Rasprave (1963): 201。该文作者注意到《可兰经》第 37 节，它暗示即使一条简单的壕沟，也能给在战术上依赖速度和突袭的沙漠袭击者造成严重障碍。

38 F. G. Simpson and R. C. Shaw, "The Purpose and Date of the Vallum and Its Crossing," *C – W*, n. s. 27 (1922): 39. 参见 E. A.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Ox-

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pp. 114 –15。

39 就哈德良长墙而言,屏障由于所谓“瓦勒姆”(Vallum)而在内面大为加强,那是一种平底堑壕,顶部宽 20 英尺,底部宽 8 英尺,深 10 英尺,设于 6 英尺高的、由上投土筑成的防御墙垒之间;与上述小路一起,这套土筑工事的宽度等于 120 英尺,即一罗马“阿克图”(*actus*);见 I. A. Richmond, “Hadrian' s Wall 1939 – 1949,” *JRS* 40 (1950): 51 –52。直到晚近为止,这讲究得独特的内向屏障有时被认为是在筑墙以前筑造的;据此,它的功能可被解释为墙的替代。然而,新的考古证据已表明,“瓦勒姆”的筑造事实上与筑墙同时,甚或晚于筑墙;见上书, pp. 51 – 52 和 Bierley, *Re-*
210 *search*, pp. 118 –25。甚至在这证据出现以前,F. G. Simpson 和 R. C. Shaw 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辩说“瓦勒姆”几乎无法被用作外向屏障的替代,虽然它作为一条简单的巡逻道是太讲究了;Simpson and Shaw, “Purpose and Date of the Vallum,” pp. 359 –60,援引 T. H. Hodgson 说,“若无火药,一群小学生就能用石块将世界上最好的部队逐出瓦勒姆。”F. Haverfield 假设,由于它作为战斗性防御墙垒的明显局限性,瓦勒姆标志了民政管辖范围的界限,而不是墙垒的军事外围;R. G. Collingwood 进一步发展了这解释,提出“瓦勒姆”是一种习俗性屏障(处于财政长官控制下),而墙垒是军事外围(处于行政长官控制下)。然而,由于“瓦勒姆”一般位于从塔楼可以被观察到的地方,而且由于如此大的修筑努力是为了一种小的管辖目的的说法缺乏可信性,因而这些解释不再被人接受;见 John Morris, “The Vallum Again,” *C – W*, n. s. 50 (1950): 43 –53。

40 R. G. Collingwood 解释说,“幕墙”可被用作一种掩蔽物,遮掩那些从旁侧临近,接着能通过出击口迅速出现以阻截敌人的兵力;见“The Purpose of the Roman Wall”,载于 *Vasculum* 8 (1920); 4 –9。这一解释已被考古证据否定,后者显示与墙内侧平行的道路是直至墙垒复合体的其余部分出现后一个世纪才被修筑的;见 Birley, Research, pp. 113 –14。第二种解释是 I. A. Richmond 的解释,不能被考古证据否定,但在军事上难以令人信服。它在下述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说明:John Collingwood Bruce, *Handbook to the Roman Wall*, 12th ed. I. A. Richmond (Newcastle: H. Hill Hindson and A. Reid, 1966), pp. 25 –26。按照 Richmond 的观点,在其进攻出击口的罗马部队会利用“幕墙”围攻敌人,后者将被挤击在(现出击于墙前的)守军与其身后的障碍壕沟之间。

41 Baradez, *Fossatum Africae*, p. 359.

42 最初被建的哈德良长墙的构造本身雄辩地证明了它们依据的战术谋划;沿墙修筑的壁垒配备有三扇双门,其中最后一扇敞开于“幕墙”远缘。显然,这些门户意在充当供进攻性机动防御用的出击口。还一目了然的是,前哨壁垒会在这些阻截性出击以前提供预警,并在出击期间提供基地安全,如果必须进行长时间追击的话。然而,对这谋划的一般适用性有一项反驳,见 Swoboda, “Traian und der Pannonische *Limes*,” pp. 195 –208。该作者否认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依靠在多瑙河外的机动前沿防

御以守护潘诺尼亚边境；特别是，他认为在多瑙河外20至90公里的一个地区被发现的罗马建筑（或宁可说包含罗马材料的建筑）并非前哨。

43 同上，p. 197。

44 Eric B. Birley, "*Alae* and *Cohortes Milliariae*"，载于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Römische Forschungen in Niederösterreich V (Graz and Cologne: Hermann Böhlaus, 1966), p. 57；单位编制约为 *milliary* 每翼1 000人，*quingenary* 每翼500人。

45 例如在不列颠，被辨识出来的7个 *milliary* 大队中有5个、46个 *quingenary* 大队中有31个是骑步兵混合单位；见 R. W. Davies, "*Cohortes Equitatae*," *Historia* 20 (1971): 751, n. 1。然而不列颠大概并非典型。在下日耳曼，公元104至120年期间有6个被辨识出来的骑步兵混合单位，还有同样多的步兵大队——都是 *quingenary*；较早，当该地区在公元70至83年更多战事时，有铭文证据表明有11个 *quingenary* 骑步兵混合单位，但只有8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 *milliary* 骑步兵混合单位和两个 *milliary* 步兵大队；Géza Alföldy, "Die Hilfstruppen der römischen Provinz Germania Inferior"，载于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6 (Düsseldorf: Rheinland Verlag, 1968), p. 151。

46 G. L. Cheesman, *The Auxil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4), p. 168.

47 Birley, *Research*, p. 272. 该作者说步兵部队近四分之一（13 000人）骑马，因而有"3 000轻骑兵"这一数字；然而见下面注55。

48 见 G. Alföldy, "Die Hilfstruppen," p. 151。 211

49 Tacitus, *Histories*, I. 79. 注意数目：9 000名骑在马上的罗克瑟兰人参与，显然是一次重大进攻。

50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 116.

51 然而见 Wastson, *Roman Soldier*, pp. 62 – 64，那里质疑了对个人军囊重量的某些估计。

52 *Tiberius*, 18.

53 H. M. D. Parker, *The Roman Legions* (1928; rpt. ed.，附有勘误和参考书目，Cambridge: W. Heffer and Sons, 1958), pp. 155, 162。

54 威尔士直到罗马统治结束为止始终需要一支忙碌的占领军，从未被完全平定。M. G. Jarrett, "The Roman Frontier in Wales"，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renzen Roms*, pp. 21 – 31。

55 Birley, Research, p. 272. 该作者认为总共有13 000名步兵，但这看来包括被分派在"隔里堡"（milecastles）中执行警卫任务的3 000人；同上，p. 271（虽然该作者还提出这些部队可能属于独立的单位"努梅里"[*numeri*]）。参见 Sheppard S. Frere,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B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p. 137。该书关于16个墙垒有兵9 500人的数字与 Birley 的数字不符。

56 Richmond, "Hadrian's Wall 1939 - 1949," p. 47.

57 Birley, *Research*, p. 271 选用了较大的数字。Ferere, *Britannia*, p. 137 援引兵力为 1 500 至 2 000 人,并且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如 Birley 所说属于"努梅里",而非正规辅助部队。

58 Birley, *Research*, pp. 106 - 9.

59 除了 Birley, *Research* 一书第 272 页给出的数字外,还有 11 000 人的军团部队被设想具备编制并可用。

60 G. Forni 的文章,载于 *DE* vol. 4, fasc. 38, s. v. "*Limes*," pp. 1212 - 13。这讲的是安东尼后期。阿伦大堡建于安东尼·庇护治下,而普芬茨和克兴在当时得到重建,它们都在周边防线后面颇远;H. Schönberger, "The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JRS* 59 (1969): 170。

61 这趋势在一代人以前显得比它在目前清楚得多;参见 Olwen Brogan, "The Roman *Limes* in Germany," *Archaeological Journal* 92 (1935): 17 - 18,连同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p. 164 - 65;又见 Émilienne Demougeot, *La Formation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s origins germaniques a l'avènement de Dioclétien* (Paris: Aubier, 1969), pp. 189 - 90。关于不列颠,见 Richmond, "Hadrian's Wall 1939 - 1949," pp. 45 - 46, 55;又见 Birley, *Research*, pp. 134 - 55,论述斯坦盖特(the Stanegate)——起初的壁垒链在其上修筑的防线。

62 像 Alfoldi 在其所撰篇章(载于 *CAH* 12: 213)内如此谈论。

63 见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p. 146 - 49。

64 Suetonius, *Domitianus*, 7.

65 Morris, "Vallum Again," p. 50. 这一论点在下述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Eric B. Birley, "Hadrianic Frontier Policy," 载于 *Carnuntina, Vorträge beim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 der Altertumsforscher, Carnuntum*, 1955, ed. E. Swoboda, *Rämische Forschungen in Niederösterreich*, 3 (Graz and Cologne, 1956), pp. 26 - 33。

66 Chester G. Starr, Jr.,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 - AD 324*, Cornell Studies in Classic Philology, vol. 2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135 - 137 (米西卡舰队); pp. 138 - 41 (潘诺尼卡舰队); pp. 144 - 52 (日耳曼尼卡舰队)。从 12 月到 2 月,多瑙河封冻,河上舰队无法运行。这是个被认识到的季节危险(同上, pp. 138 - 41),因为没有河上舰队的支持,陆基监察系统就远不那么有效。

67 Gichon, "Roman Frontier Cities," pp. 195 - 207;又见上书,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Palestinae* and the Major Phase of Its Development", 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178, 184。又见下述著作中更充分的叙述:Shimon Applebaum and Mordechai Gichon,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in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7 - 47。参见 Euzennat, "Le *Limes* de Volubilis," pp. 194 - 99,关于(在毛里塔尼亚的)一条敞开的"设防边界",它按照

非常精确的棋盘格式组建。同样就的黎波里塔尼亚“设防边界”而言，我们知道没有任何连续不断的线性屏障，但道路修筑早在公元15至16年即开始。见 R. G. Goodchild and J. B. Ward Perkins, “The *Limes Tripolitanu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JRS 39 (1949): 81－95。 212

68 道路始终是叙利亚“设防边界”的主要基础设施；见 Raymond Chevallier, *Les Voies romaines* (Paris: Librairier Armand Colin, 1972), pp. 160－165。

69 Baradez, *Fossatum Africae*, pp. 163－208，特别是 pp. 202－208，或者 idem, “Organization militaire romaine de l' Algérie antique et evolution du concept defénsif de ses frontièrs,” *Revue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militaire* 13 (1953): 25－42。

70 Albino Garzetti, *L' I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Storia di Roma, vol. 6 (Bologna: Licinio Capelli, 1960), p. 437.

71 只是在黑海，默西亚舰队和本都舰队才不得不对付任何海上对手——出自海盗的小规模对手。Starr, *Roman Imperial Navy*, pp. 127－28.

72 见 Lionel Casson,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70。参见 Moché Amit, “L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et la défense de l' empire romain”，载于 *La Parola del Passato*, vol. 20, fasc. 102 (1965), p. 218。Casson 援引维吉蒂乌斯(IV. 39)具体记述的航行季节即5月27日至9月14日，带有外限3月10日至4月13日。参见 E. de Saint－Denis, “Mare Clausum,”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25 (1947): pp. 200－203，那里指出有某种冬航，但航程短，风险比通常大得多。

73 Casson, *Ships and Seamanship*, p. 285.

74 同上, 293.

75 这相当于长途行军(*magnum iter*)(无休息日)，而非10 000步的常规行军(*justum iter*)；见 Chevallier, Voies romaines, pp. 224－25. Amit, “Moyens de communication”通篇，该文基于维吉蒂乌斯(I. 9)就“古人”声称的每日20至24罗马里计算罗马的战略机动性，那被 Amit 转换为30至36公里。这速度似乎太快，适合于一场轻快的演习而非长程行军。参见 Watson, *Roman Soldier*, p. 55。

76 例如见 Tacitus, *Histories*, I. 31，关于被派往亚历山大港和被召回的日耳曼部队。这损害性影响不足为怪：航行能被延长到50或70天；Casson, *Ships and Seamanship*, p. 289, n. 82.

77 Starr, *Roman Imperial Navy*, pp. 186－87. 60艘平底帆船足以运输一整个军团。关于马匹，见 Albert Marin, *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ès gregues et romaines*, ed. Charles Daremberg et Edm. Saglio, 9 vol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77－1919), vol. 3, pt. 2, s. v. “*Hippagogi.*”

78 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19, 158, 168——加上小的调整。公元161年的情况见 Watson, *Roman Soldier*, pp. 15－16，依据 ILS 2288 (= CIL VI 3492)，重现

于 p. 160。参见 J. Scilágy, "Les Variations des centres de prépondréance militaire dans les provinces frontiers de l'empore romai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 (1953), fasc. 1-2, pp. 119-219,一项估计实际兵力水平的尝试,那是从公元6年到《尊显录》问世期间九个点上的,连同涵盖整个周边的八个地段之间的。实际上,该文作者通过将公认的军团部队数目增加一倍,笼统计算了辅助部队的数量,虽然他恰当地注意到在没有军团的地方——例如在雷蒂亚、诺利康和毛里塔尼亚诸行省——辅助部队的部署。

79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67.

80 同上, pp. 156-58。据 Parker,第一和第二次达契亚战争前夜,图拉真在多瑙河流域分别有 12 和 13 个军团。

81 Bowersock, "Report on *Arabia Provincia*," pp. 232-33.

82 一般设想德奥塔里纳二十二军团在公元 132 至 135 年的犹太人造反中惨败或被歼,但不一定在犹地亚。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62-163。此外,西班牙九军团可能也丧失于犹太人造反。

83 *Annals*, IV. 5.

84 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35,那里猜测说克劳狄七军团于公元 58 年被
213 调至默西亚,留下克劳狄九军团独自驻扎达尔马提亚。肯定的是,克劳狄七军团在公元 42 至 66 年期间被调至维米纳休姆;见 J. J. Wiles, *Dalmatia: History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B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 96。

85 同上。

86 直到公元 6 年为止,最初四个军团之中的三个留驻埃及;见 Ronald Syme, "Some 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JRS* 23 (1933): 25。在西班牙,军团数目从公元前 27 年时的估计 6 个减至公元前 13 年时的 4 个,到公元 9 年更减至 3 个;同上, p. 22。此后,一个军团在克劳狄治下被调离,内战期间第二个又被调离;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31, 144。

87 在盖乌斯在位(公元 37 至 41 年)和韦斯巴芗在位(公元 69 至 79 年)的整个时期里,总共有 8 个新军团被征集和组成,但 4 个在公元 70 年被解散;见 Gastone M. Bersanetti, *Vespasiano* (Rome: Edizioni Roma, 1941), pp. 75-79。这导致在韦斯巴芗治下 29 个军团构成的总体系统。图密善于公元 83 年创建弗拉维亚·米内尔瓦一军团(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50),但当阿劳迪五军团被丧失于图密善的达契亚战争时,总数再次降到 29 个。只是由于图拉真组建乌尔皮阿·维克特里克斯三十军团,总数才又增加到 30 个;同上, p. 156。

88 G. Alföldy, *Die Hilfstruppen*, p. 151,还有(三世纪),p. 161。

89 Birley, "*Alae* and *Cohortes Milliariae*," p. 60.

90 见 Michael G. Jarrett and John C. Mann,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 *Bonner Jahraücher* 170 (1970): 179-81。在《阿格里科拉传》(*Agricola*)第 24 节,塔

西佗记述了他的英雄友善地拘留了一名反对可能征服爱尔兰的流亡爱尔兰酋长，这征服将有助于用罗马大军完全包围不列颠：此事确实提示了一种全盘征服图谋。然而关于阿格里科拉的任何图谋的意义，见 B. Birley, "Britain under the Flavians: Agricola and His Predecessors"，载于上书，*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Collected Papers*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1953), pp. 10－19。

91 Jarrett and Mann,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 p. 180.

92 Kenneth A. Steer, "The Antonine Wall: A Reconsideration"，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 36。

93 构造描述见 Anne S. Robertson, "The Antonine Wall," 特别是 pp. 100－103。

94 Jarrett and Mann,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 p. 189.

95 Steer, "Antonine Wall: A Reconsideration," p. 38.

96 见下述论文中的概要计算：Grace Simpson, "The Roman Forts in Wales: A Reassessment,"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 33，在那里，得到辨识的哈德良时期驻不列颠的辅助部队单位被估计为 64 个，与之相比有 79 个驻兵要塞，除去小堡垒、信号站等等。该文作者提出(p. 34)，边境前推至安东尼长墙(当时驻兵要塞增至 114 个)导致的增加了的人力需求靠若干权宜之计得到满足：某些要塞(例如在威尔士)被撤空，某些由数目不足的兵员驻扎，某些由"努梅里"部队充当守兵(见下面 pp. 122－23)，某些依靠军团分遣队(*vexillationes*)据守，还有些依靠在轮换基础上迅速重新部署的部队去填充。更详细的同类论辩见 Grace Simpson, *Britons and the Roman Army: A Study of Wales and the Southern Pennines in the 1st－3rd Centuries* (London: The Gregg Press, 1964), pp. 119－21。参见 Frere, *Britannia*, pp. 160－61。

97 帕特夏－法夫郡边界(在苏格兰)上的卡尔波筑有塞维鲁时期的堡垒，其意在于永久性占领，证据见 A. R. Birley, "Excavations at Carpow," 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örgrenzen Roms*, p. 4。塞维鲁在不列颠的战役和对他政策的一番讨论见 Anthony R.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The African Emperor*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71), pp. 258－61。

98 Starr, *Roman Imperial Navy*, pp. 144－52.

99 具体的例子见 Schön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p. 157－58, 164－65，虽然有如被援引的那样，当然存在侧重点与轻重缓急次序的不同。

100 同上，p. 155。战略概述又见 Ronald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60－61; Louis Harmand, *L'Occident romain: Gaule, Espagne, Bretagne, Afrique du Nord (31 av. J. C. à 235 ap. J. C.)* (Paris: Payot, 1960), pp. 226－27。

101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p. 155－56. 214

102 同上，pp. 156－57。

103 *Strategemata*, I. 3. 10. 就此见 G. Forni 的文章，载于 *DE*, vol. 4, fasc. 34, s. v. "*Limes*," p. 1,080；弗龙蒂努斯写了突入卡特人领土 120 罗马里的若干道路，但不

清楚这涉及的究竟是一片前方地域,还是一种线性穿透,或是一套分头并进的突入箭头。

104 *Agricola*, 39. 在 *CAH* 11: 162 - 163, Ronald Syme 不同意这否定性观点,Harmand, *L' Occident romain* 一书第 228 至 229 页也是如此。然而参见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p. 158,该文作者说战役结果甚微,认为陶努斯"设防边界"的设立出自一番追求更大目的但流产了的努力;这与他的如下解释相联:公元 89 至 90 年是该边境上的大转折点,标志大规模征服的最后企图被放弃。包括整整两个军团在内的部队肯定被调至多瑙河前方;见上书。即使如此,塔西佗重提制造假俘虏以假装胜利的谴责仍有一个特殊的"战术"原因,那就是在一场缓慢推进(如不松懈)的工程攻势中,很少有俘虏会被抓,而塔西佗分明不懂罗马军队作为一种战斗工程兵力能够极为有效地打仗;参见 Frontinus, *Strategemata*, Ⅳ, 7.2,那里记述了科布洛所言:战争靠"多拉布拉"(*dolabra*)即军团多用途鹤嘴镐赢得。

105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pp. 158 - 59。

106 Tacitus, *Germania*, 29; Ronald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65;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 151。

107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p. 161 - 62.

108 同上, pp. 168 - 70. 从东米尔滕伯格到韦尔泽姆的笔直的"设防边界"线被认为属安东尼时代,但希伦霍弗—伯明线可能是哈德良时期的。

109 同上, pp. 174 - 75。

110 这是 Syme 所撰篇章的论点,载于 *CAH* 11: 165。

111 K. Stad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528 - 29。

112 唯跨越多布罗加的周边短捷径除外——如果它是图密善时确立的。无论如何,图拉真边境肯定达到多瑙河三角洲边缘;见 R. P. Longde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233(位于特罗斯米斯的军团基地在多瑙河曲折处南面不到 10 英里)。

113 Constantin Daicoviciu, *La Transilovania nell' antichitá* (Bucharest: n. p., 1943), pp. 41 - 64; Emilienne Demougeot, *La Formation de l' 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s origins germaniques à l' avènement de Dioclètien* (Paris: Anbier, 1969), pp. 156 - 60.

114 A. Alföldi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84 - 84。

115 Daicoviciu, *La Transilvania*, pp. 52 - 54.

116 见 John Harmatta, "The Sarmatians in Hungary,"载于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armatians*, Magyar - Görög Tanulmányok, 30 (Budapest: Pázmány Péter Tudományegyetemi Görög Filológiai Intézet, 1950), pp. 45 - 46。

117 *Histories*, I. 79.

118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68 - 72;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162 - 64。

119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75 –76,依据零碎的信息(Dio LXVII. 7.1)。

120 同上, p. 176.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162 –64。

121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76 –77.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162 –64。

122 Jérôme Carcopino 持这一论点,其文题为"Un retour à l' impérialisme de conquête: L' Or des Daces"(1934),载于 *Les Etapes de l' imperialisme romain* (Paris: Hachette, 1961), pp. 106 –17。相反的观点见 Lepper, *Trajan' s Parthian War*, p. 107,在那里,该作者将图拉真的达契亚政策描述成"图密善式的"。图拉真在这两场战争中的兵力(12 至 13 个军团)表明,戴凯巴路斯组织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在此地段,一种节省的边境战略不符合一个如此强大的邻邦之生存。还有普林尼《颂词》这一证据,它未激起任何大征服想象("*non times bella nec provocas*")。Albino Garzetti, *Problemi dell' Eta Traianea: Sommario e testi* (Genova: Fratelli Bozzi, 1971)一书第 51 至 52 页简短地陈述了下列论辩:图拉真另有企图地结束了他的第一次达契亚战争(公元 101 至 102 年)而不予征服,那就是将达契亚转变为一个附庸国;戴凯巴路斯本人以毁坏公元 102 年条约条款而挑起了第二次战争(公元 105 至 106 年);这第二次战争未继之以全盘征服,因为只有特兰西瓦尼亚被行省化,与此同时那两边的领 215
土都被留给了萨尔马西亚人。见下述文章内对这辩论的晚近概览:Kenneth Hugh Waters, "The Riegn of Trajan and Its Place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ANRW*, pt. 2, vol. 2, pp. 417 –22。

123 Szilágy, "Les Variations,"p. 205,那里将包括达契亚在内的帝国周边估计为 10 200 公里,若不包括达契亚则为 9 600 公里。

124 对此"设防边界"的叙述见 Daivociciu, *La Transilvania*, pp. 89 –99;一项对图拉真时期达契亚定居地的无日期记述见 idem, "Dacica",载于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ed. Marcel Renard, 3 vols., Collection Latomus, vol. 58 (Brussels: Latomus, 1962), vol. 1, pp. 462 –71。

125 关于达契亚在总的多瑙河战略中的作用,见 Vasile Christescu, *Istoria Militară a Daciei Romane* (Bucharest: Fundaţia Regele Carol I, 1937), pp. 36 –42。对证据的一项概览见 Donald W. Wade, "The Roman Auxiliary Units and Camps in Dacia"(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9 年)。

126 Frova, "The Danubian *Limes*,"pp. 28 –29.

127 Lepper, *Trajan' s Parthian War*, pp. 109 –10. 对萨尔马西亚人的资助见 Colin D. Gordon, "The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 as a Roman Policy of Imperial Defense"(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48 年),p. 44。

128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57. 关于辅助部队单位(包括"努梅里"),见 Giovanni Forni,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Dacia Romana," *Athenaeum*, n. s., vol. 36 (1958 –59): 3 –29 (fasc. 1 –2), 193 –218 (fasc. 3),特别是206。又见 Christescu,

Istoria Militarā, pp. 42 -46(关于部队),47 -52(关于防御工事)。

129 公元 89 年前后,C. 维利乌斯·鲁弗斯的军队在挺进多瑙河北岸和向西跨越蒂萨河之后作出要攻击滞留在后方的敌军的姿态,当时就是这样利用该突出部的;R. P. Longden,CAH 11:pp. 176。

130 古钱币证据证明,直到那时,罗马权力仍成功地在达契亚马尔温西斯(即奥尔特河以西的特兰西瓦尼亚)得到维持;Eugenio Manni, *L' Impero di Gallien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 III secolo* (Rome: Angelo Signorelli, 1949), p. 29。

131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33 -35.

132 这一说法见 Garzetti, *Prolbemi dell' Etá Traianea*, p. 53。

133 J. G. C.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56 -57。又见 Magie, *Roman Rule*, pp. 551 -53。

134 直到那时为止,卡帕多基亚由一位仅靠辅助部队支持的财政长官治理;Parker, *Roman Legions*, p. 134.

135 同上, pp. 134 -36;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59 -60。

136 塔西佗《年代记》内(XIII - XV)载有对冲突第一阶段的详细记述;见 Kristine Gilmarin, "Corbulo's Campaigns in the East," *Historia* 22 (1973): 583 -626。

137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65 -66。

138 Tacitus, *Annals*, XIII, 37 -39.

139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68; Magie, *Roman Rule*, p. 558。

140 Magie, *Roman Rule*, pp. 558 -60. 关于阿波利纳里斯十五军团,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37。

141 *Nero*, 13. 关于这项外交解决,见 Tacitus, *Annals*, XV, 27 -30。

142 例如见 Webster, *Roman Imperial Army*, p. 63:"无数努力、损失和羞辱全都白费。"

143 参见 Henderson, *Five Roman Emperors*, p. 60,那里将东安纳托利亚边界缺乏罗马军事部署称作一个"严重缺陷"。为此所需的军团要从哪里来?

144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48 -49; Syme, *CAH* 11: 141.

145 Lepper, *Trajan's Parthian War*, pp. 110 -12. 有一项著作支持该作者,那就是 David Oates, *Studi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1968),依据的是对气候和地形的概览(pp. 1 -5)和战略考虑(pp. 67 -69)。参见 Wsters, "The Reign of Trajan," pp. 422 -28。

146 这是 Lepper, *Trajan's Parthian War* 一书的主要论点,被表述于 pp. 112 -22。该作者意识到此项论点遭到的反对;见 pp. 126 -36;又见 M. I. Henderson 的书评,载于 JRS 39 (1949): 125 -26。

147 哈布尔河 - 辛贾尔山边境的战略裨益见 Wheeler, "Mesopotamia," p. 127。
216 降雨量见 Oates, *Studi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 pp. 1 -4(连同第 2 页的

地图)。

148 战争的背景和原因见 R. P. Longde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240; Magie, *Roman Rule*, p. 606(荣耀动机); Julien Guey, *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de Trajan* (114 - 117), Bibliothèque D "Istros", no. 2 (Bucharest: S. Lambrino, 1937), pp. 32 - 35; Lepper, *Trajan's Parthian War*, pp. 205 - 6(概述), pp. 158 - 63(拒绝商路动机说), pp. 191 - 204(批评荣耀动机说)。

149 R. P. Longde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241。换言之,该作者觉得不管图拉真后来有何心理失常,他东行时并非已经满脑子热衷于亚历山大式的梦想。

150 同上。奥斯罗派遣一名大使去雅典,以会晤东行途中的图拉真;然而,图拉真也似乎主动打开了一扇和平解决之门,即让自己可在萨塔拉参加高加索附庸国王们的一次应邀集会。帕塔马斯帕特本可参加这次会议,但没有;同上, p. 242。参见 Guey, *Es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pp. 140 - 141,该作者论辩说图拉真对外交解决没有兴趣。

151 关于图拉真帕提亚战争的史料来源异常糟糕,甚至基本的编年记述也被怀疑。R. P. Longden 所作大事年表(载于 *CAH* 11: 858 - 859)如下:公元 114 年,亚美尼亚被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即辛贾尔山线以北地区)被兼并;115 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阿迪亚比尼被兼并;115 年冬,泰西封陷落;116 年,前往波斯湾,造反爆发(见注 152);117 年,镇压造反,撤退,图拉真去世(有确实日期)。Lepper 在其书第 31 至 96 页的年代叙事与上面不同:公元 114 年,在亚美尼亚作战;115 年,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立缓冲性的哈布尔河 - 辛贾尔山边境;116 年,征服阿迪亚比尼,泰西封陷落;117 年,渡过底格里斯河(梅塞内)进一步征服,造反爆发。Lepper 在仔细的详述中暴露了他自己的年代叙事的局限性。参见 Henderson 的书评,载于 *JRS* 39 (1949): 121 - 25。Guey 在其 *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一书第 107 页开列了他自己的大事年表:公元 114 年,征服亚美尼亚;114 年 9 月至 115 年冬,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116 年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阿迪亚比尼和泰西封被征服,访问波斯湾;116 年冬,跨底格里斯河征服,征服巴比伦;117 年,造反爆发,撤退,图拉真去世。关于在非常零碎的史料基础上对战役情况的尝试性重现,见 Longde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243 - 51; Guey, *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pp. 51 - 58, 66 - 77, 110 - 20, 122 - 25; Lepper, *Trajan's Parthian War*, pp. 206 - 10。Lepper 在该书第 129 至 131 页将公元 116 年的战役当作抢劫性进攻,意在加强罗马的外交杠杆,而非永久性征服企图,公元 117 年的战役则被当作心理失常。

152 R. P. Longden(见其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248)认为,一支帕提亚军队在米太的出现触发了造反;参见 Henderson 的文章,载于 *JRS* 39 (1949): 127 - 28,他强调帕提亚的反攻仅由马拉拉斯——16 世纪一个成问题的史料来源——提到。Lepper, *Trajan's Parthian War* 一书第 151 至 153 页未排除这一可能性,Guey, *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一书第 123 至 125 页接受之。关于造反本身,按照各自不同的编年所

作的叙述分别见 Longde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248－50；Lepper，*Trajan's Parthian War*，pp. 88－91；Guey，*Es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pp. 123－25。犹太人造反的作用和时间不清楚，其范围亦如此；见上书，pp. 126－28。（Guey 相信，犹太人造反与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迪亚比尼当地人造反同时）；Longde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249－51。

153 Weber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301－2，那里遵循传统，将图拉真的扩张主义与哈德良的和平主义截然区分开来；据此，哈德良被描述成以造就撤退（同时还考虑撤出达契亚）实现了政策的大转弯。Magie，*Asia Minor* 一书第 609 至 611 页同样如此。Lepper，*Trajan's Parthian War* 一书第 212 至 213 页认为，图拉真开始了一种有限的战略撤退，哈德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将它变成了全盘撤退。Guey，*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一书第 133 和 145 至 146 页将附庸国的形成（公元 116 至 117 年）视为图拉真的撤退方式（参见 Henderson 的文章，载于 *JRS* 39［1949］：126－27）。关于
217 哈德良在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和他自己的立场，见 Louis Perret，"Esssai su la carrière d'Hadrian jusqùa son avènement a l'empire（76－117），"载于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ries de France*，vol. 80，ser. 8，bk. 9（Paris：G. Klincksieck，1937）。

154 作为原因要素的图拉真之热衷荣耀见 Dio，LXVIII，17. 1；他对自己未能模仿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感到的沮丧见 LXVIII，29. 1。被援引和翻译于 Garzetti，*Problemi dell" Etá Traianea*，pp. 59，62。

155 Magie，*Asia Minor*，pp. 606，608；Wheeler，*Mesopotamia*，p. 116.

156 Guey，*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一书拒绝荣耀动机说（p. 19）而强调商路动机（pp. 20－22）。

157 关于兼并那巴提安阿拉伯，见 Bowersock，"*Arabia Provincia*，" p. 229。该文作者指出了与"*capta*" 截然有别的"*Arabia adquisita*"这一官方用语的意义；换言之，这行为是一项行政管理措施，而不是征服。关于安全安排，见上书，pp. 232－40。韦斯巴芗筑路见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130. 参见 Henderson 的文章，载于 *JRS* 39（1949）：128，该文作者拒不同意图拉真的政策与弗拉维诸帝的相似。

158 Josephus，*The Jewish War*，III. 4. 2.

159 Parker，*Roman Legions*，p. 138.

160 同上，p. 139. 有了新的意大利卡一军团，尼禄的军队此时由 28 个军团组成；如此，将叙利亚的四个军团计算在内，已有不少于四分之一的罗马军团总兵力投身于该地区。可疑的是，能否有任何追加的军团兵力能被重新部署于该地区（即抵抗帕提亚的压力）而不造成以下结果：别处的军团与辅助部队之间的比例危险地失衡，冒在不那么巩固的地区发生内部社会混乱的风险，或者导致边境暴露于攻击之下。体系仍然富有弹性，但由于为犹太战争提供三个军团，这弹性必定严重减小。

161 Tacitus，*Annals*，XIII. 35. 这一评价不适用从默西亚抽调的西提卡四军团，见 Parker，*Roman Legions*，pp. 135，138。

162 Bowersock, "*Arabia Provincia*," pp. 219 – 29. 关于其效用的局限性，见 Applebaum and Gichon,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pp. 36 – 37。

163 Tacitus, *Annals*, XIII. 7.

164 *Histories*, II. 81.

165 同上, V. I。

166 Suetonius, *Nero*, 13; Magie, *Roman Rule*, p. 561.

167 Suetonius, *Vespasianus*, 8;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VII. 7.; Magie, *Roman Rule*, pp. 573 – 74. 关于索彭恩，见 Anderso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0: 758, note 3。

168 关于阿格里帕二世，见 Thérèse Frankfort, "Le Royaume d'Agrippa II et son annexion par Domitien"，载于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vol. 2, pp. 665 – 66。关于那巴提安国，见 Bowersock, "*Arabia Provincia*," pp. 230 – 31。较小的叙利亚诸国见 M. P. Charlesworth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40。

169 Magie, *Roman Rule*, p. 607, n. 32.

170 见 I. A. Richmond, "Palmyra under the Aegis of Rome," *JRS* 53 (1963): 42 – 43。关于博斯普兰国，见 Anderson, CAH 10: 265 – 66。

171 Magie, *Asia Minor*, pp. 269 – 70. 苏托尼乌斯在其《韦斯巴芗传》第 8 节中，提到兼并科马基尼和奇利乞亚特拉基亚，连同对亚该亚、吕基亚、罗德斯、拜占庭和萨摩斯的行省改组。

172 George H. Stevenson, *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till the Age of the Antoni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9), pp. 50 – 51.

173 Guey, *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pp. 145 – 46; M. Rostovtzeff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19。

174 见 Maxime Lemosse, *Le Régim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dans le haut – empire romain*,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e de droit romain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vol. 23 (Paris: Librairie Sirey, 1967), pp. 116 – 23。

175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41。

176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39。关于安纳托利亚，见 Magie, *Asia Minor*, pp. 570 – 73。整个完成了的体系亦见 Chevallier, *Voies romaines*, p. 161。

177 见 Magie, *Asia Minor*, p. 574, 576; 关于阿拉伯，见 Bowersock, "*Arabia Provincia*," p. 230。

178 参见 Tacitus, *Annals*, IV. 5, 连同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63: 卡帕多基亚有两个军团，叙利亚三个，犹地亚两个，阿拉伯一个。亦见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40 – 41。

179 Suetonius, *Vesp.* 8; Magie, *Asia Minor*, p. 575 (又见 note 24); 同上, p. 575 218
和 note 24, p. 1438 (vol. II)。

180 然而，就业已放弃的财政攫取而言，这"投射"并非不需代价。公元 17 年卡

帕多基亚被兼并时,其岁入使提比略能将拍卖税降至 50 %。Tacitus, *Annals*, II. 42. 参见上书, I. 78。

181 Lemosse, *Relationes internationals*, p. 117, n. 250.

182 同上, p. 119。

183 公元 87 年,图密善集结九个军团的兵力打击达契亚人(Parker, *Roman Legions*, p. 158),其中的阿劳迪五军团可能在战斗中被歼;对这个问题的一番简短的讨论见 Watson,*Roman Soldier*, p. 23, note 43。在其首次达契亚战争中,图拉真在多瑙河畔有 12 个军团的兵力(Parker, *Roman Legions*, p. 156),而为其第二次达契亚战争,他可能拥有总共 13 个军团的兵力(同上, p. 157)。参见 Longde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231。

184 同上;又见 Gordon,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p. 41。

185 Lemosse, *Relationes internationals*, p. 119.

186 I. A. Richmond, "Queen Cartimandua," *JRS* 44 (1954): 43 – 52; Jarett and Mann,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pp. 179 – 83; Eric B. Birley, "The Brigantian Problem and the First Roman Contact with Scotland",载于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pp. 31 – 47。参见 Steer, "The Antonine Wall: A Reconsideration,"p. 36。

187 关于巴达维人见 Tacitus, *Germania*, 29;弗里西人见上书, 34; 滕克特里人和攸西派提人见上书, 32。又见 Harmand, *L' Occident romain*, pp. 224 – 25;Demougeot, *Formation*, p. 143。

188 Tacitus, *Histories*, 1.67,那里说到赫尔维西亚人。

189 正如 *SHA*, V. 6. 8 所载 *Vita Hadriani* 暗示的; Gorden,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p. 44。

190 参见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86。

191 S. N. Miller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2:9。又见 M. Rostovtzeff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19;Magie, *Roman Rule*, pp. 685 – 86。

192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translated by H. St. J. Thackeray, Leob Classical Library, 3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William Heinemann and G. P. Putnam, 1927 – 1929), III. 5.

193 L. A. Richmond, "The Roman Seige – Works of Masada, Israel," *JRS* 52 (1962): 154.

194 相反的观点见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 150,关于后勤。

195 没有达契亚,周边长 9 600 公里(5 962 英里);有了达契亚,则长 10 200 公里(6 334 英里);它还有 4 500 公里(2 794 英里)海岸线;Szilágyi, "Variations,"p. 205。

196 Tacitus, *Annals*, XIII. 35, 36.

197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18. 9.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38 将约瑟夫斯《犹太战争》的这一段解释为意指西提卡四军团和费拉塔六军团的分遣队随塞斯

蒂乌斯·加卢斯出征。

198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19.7. 约瑟夫斯暗示,塞斯蒂乌斯·加卢斯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便撤退。这不大可能:加卢斯既不胆小(同上, II. 19.5),亦不愚蠢。可以猜测,由于军团部队已证明不坚毅,辅助部队便受到了影响,非常规兵员则溃不成军,作鸟兽散。

199 Sueuonius, *Vespasianus*, 4.

200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I. 19.9. 约瑟夫斯开列了步兵和骑兵伤亡数,但未记述非常规兵员伤亡数。

201 Ramsay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rvard Historical Monographs 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77 –78.

202 G. Forni, "Estrazione etnica e sociale dei soldati delle legioni..." *ANWR*, part II, vol. 1, pp. 386 –90.

203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45; Bersanetti, *Vespasiano*, pp. 75 –79. 又见 Eric B. Birley, "A Note on the Title 'Gemina'," *JRS* 18 (1928): 58。

204 G. E. F. Chilver, "The Army in Politics, A. D. 68 –70," *JRS* 47 (1957): 35. 该作者指出,韦斯巴芗并未感到不得不购买军队的忠诚:他赏赐甚微,也未提增军饷。

205 Suetonius, *Domitianus*, 6, 7. 219

206 同上。

207 关于用石块重建军团基地,见 Schö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89 (notes 38, 51, 21, 32)。

208 当不列颠边界先被前推至哈德良线,然后被推进到更遥远的克莱德–福思线时,军团仍留在纵深后方的约克和切斯特。军团还留驻斯特拉斯堡,在安东尼设防边界上的最近点韦尔茨海姆后面差不多 87 英里。然而,当下日耳曼驻防军约于公元 101 年被削减时,在温迪施的要塞即被撤空;Schö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65。

209 R. W. Davies, "The Daily Life of the Roman Soldier under the Principate," *ANWR*, part II, vol. 1, p. 332.

210 Jean Baradez, "Les Thermes légionnaires de Gemellae," 载于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p. 16。

211 医院及其布局见 Webster, *Roman Imperial Army*, pp. 195 –96, 251, 254。

212 R. W. Davies, "The Medici of the Roman Armed Forces," 载于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8 (1969): 83 –99;关于标准,见 p. 86。

213 R. W. Davies, "Joing the Roman Army," *Bonner Jahrbücher* 169 (1969): 208 –13.

214 关于基本训练,见上书, pp. 209 –10; Wastson, *Roman Soldier*, pp. 54 –72。

精致复杂的训练方法得到了使用，例如构建演练营地。其中之一看来被用作掷弹场；见 R. W. Davies, "The Romans at Brunswark," *Historia* 21 (1972): 107 - 8, 110。

215 David Breez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egion: The First Cohort and the *Equites Legionis*," JRS 59 (1969): 50, note 7，其中说在军团建制中被数出有 154 种不同类型职位，不包括几个世纪里的各种军士(N. C. O. s)。

216 参见 Ronald Syme, "Hadrian the Intellectual," *Empereurs romains d' Espagne*, pp. 243 - 53。

217 ILS, 2487, translated by Arnold H. M. Jones，载于其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vol. 2, *The Empire*, pp. 154 - 55。

218 然而，他在 *SHA* 所载 *The Vita Hadriani* 之中，被形容为 *armorum peritissimus et rei militaris scientissimus*；被援引于 Bernard W. Henderson, *The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Hadrian* (London: Methuen & Co., 1923), pp. 171。见该书 171 至 177 页的讨论，那与 Marguardt 等人的观点相左。

219 例如 Wilhel Weber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312 - 13。

220 *Strategemata*, IV, 7.4.

221 关于从奥古斯都到塞维鲁的军团饷金，见 Watson, Roman Soldier, pp. 89 - 92。又见 pp. 97 - 99 谈其他公民部队的饷金，军饷中断则见 pp. 102 - 4。

222 P. Coussin, *Les Armes romaines: Essai sur les originset l' évolution des armes individuaelles du legionnaire romain*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6). 趋势是朝向更重更短的"派勒姆"投枪(pp. 363 - 69)，还有以总是由辅助部队使用的"斯帕塔"长刀取代军团的卓越武器——较短的"格雷底厄"双刃短剑(p. 371)，并且以较小较平的盾牌取代重型圆柱面盾牌(p. 390 - 95)。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在塞维鲁王朝治下，这些趋势已成为普遍的。Coussin 否定性地看待所有这些变化，但未作争辩。

223 Eric William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p. 190.

224 Richmond, "Trajan' s Army on Trajan' s Column," p. 14.

225 这是个总的前提假设；例如见 C. L. Cheesman,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4), p. 168，该处将辅助部队(包括"努梅里")的总兵力估计为 22 万人，与军团部队约 17. 4 万人相对。

226 Birley, "*Alae* and *Cohortes Milliariae*," pp. 55, 60.

227 第一种看法是一般观点；第二种看法是 Forni 的见解，见其"Contributo alla
220 storia della Dacia Romana," p. 25。然而这问题可能没有实际意义；有人主张"努梅里"这一概念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误导性的。见 Michael P. Speidel, "The Rise of Ethnic Units in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ANRW*, part 2, vol. 3, pp. 202 - 31。

228 J. C. Mann, "A Note on the Numeri," *Hermes* 82 (1954): 502.

229 换言之,这些人是蛮族:同上, pp. 505 - 6。关于"努梅里"的概说,见 Chessman, *Auxilia of Roman Imperial Army*, pp. 85 - 90; Watson, *Roman Soldier*, p. 16; Webster, *Roman Imperial Army*, pp. 149 - 150;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32。关于在不列颠的单位,见 Simpson, *Britons and the Roman Army*, pp. 131 - 35。参见前面注 227。

230 例如 Watson, *Roman Soldier*, p. 16;锐气据想出自战争呐喊,阿里安讲述过这一点(Arrian, *Tacita*, 44)。

231 Watson, *Roman Soldier*, pp. 99 - 101. 关于"努梅里"的饷金似乎无资料可得,然而请注意下列等级模式:军团饷金 224 迪纳里厄斯,骑兵队饷金 200 迪纳里厄斯,骑步兵混成单位内骑兵饷金 150 迪纳里厄斯,辅助部队步兵饷金 100 迪纳里厄斯。

232 辅助部队士兵在服完役后被给予公民资格,克劳狄时期往后一直如此;他们的儿子因此能盼望军团生涯; A. N. Sherwin - 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39), pp. 191 - 92. 然而,在安东尼・庇护治下,辅助部队士兵在被授予公民资格以前生的儿子不再与父亲一起得到这资格,因而他们为了有这资格,自己必须在辅助部队服役;同上, p. 215。

233 Mann, "A Note on the Numeri," p. 505.

234 见下述著作第 216 页对面的地图(第 40 幅): Wilhelm Schleeiermacher, *Der Römische Limes in Deutschland: Limesführer*, 3d ed. (Berlin: Gebr. Mann Verleg, 1967)。

235 Garzetti, *L' l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p. 439.

236 Forni, "Contributo," p. 214.

237 Birley, "*Alae* and Cohortes *Milliariae*," p. 55.

238 Davies, "*Cohortes Equitatae*," p. 752.

239 例如 Cheesman,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p. 29。

240 Davies, "*Cohortes Equitatae*," 754 - 63 *passim*. 该文作者论辩说,骑步兵混合单位内的骑兵是真正的骑兵,而不是马上步兵,肯定不是低级的马上兵员。然而,他未能在轻骑兵与重骑兵之间划出必要的区分,前者适于侦察、"掩蔽式"巡逻等等,后者则为高烈度战争而被训练和装备,其任务为群起冲锋,猛攻敌方骑兵或步兵集群。罗马骑兵翼内的骑兵事实上是两重功能的,被训练为既用投射兵器、也用重长矛("孔图斯")作战;骑步兵混合单位内的骑兵则仅为近身接触和投射攻击而骑马和装备;如此,他们是功能有限的轻骑兵。

241 Marguerite Rachet, *Rome et les Berberes: Un problème militaire d' Auguste à Dioclétien*, Collection Latomus, vol. 110 (Brussels: Latomus, 1970), pp. 196 - 200.

242 Jean Baradez, "L' Enciente de Tipasa: Base d' operations de troupes venues de Pannonie sous Antonin Le Pieux", 载于 *Quintus Co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Zagreb: Arheoloski Radorii Rasprave III, 1963), pp. 75 –77。

243 对有关的证据的审视见 Anthony R. Birley, *Marcus Aurelius*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6), p. 165。

244 Lucas de Regibus, *La Monarchia Militare di Gallieno* (Recco: Nicoloso da Recco, 1939), p. 108. 关于分遣队有一项专题研究,即 Robert Saxer, *Untersuchungen zu den vexillationen des römischen Kaiserheeres von Augustus bis Diokletian*, *Epigraphische Studien* Beihefte der Bonner Jahrbüchen, no. 18 (Cologne and Fraz: Böhlau, 1967)。

245 Birley, Marcus Aurelius, p. 165. 公元 166 和 167 年之交的冬季期间,北方边境由机动的分遣队守卫,同时预料先前派往东方的部队行将返回。尽管如此,重大渗透仍然发生;见 JenöFitz, "Reorganisation militaire au début des guerres marcomanes," *Hommages á Marcel Renard*, edited by Jacqueline Bibaw, 3 vols., Collection Latomus, vol. 102. (Brussels: Latomus, 1969), vol. 1, pp. 262 –74。

246 ILS 9200,被援引于 Syme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163.

247 J. C. Mann, "The Raising of New Legions During the Principate," *Hermes* 91 (1963): 485.

221 **第三章**

1 进攻方通常必须实现这攻克,因为它为了后勤支持,需要使用由防御据点掌控的道路。

2 H. M. D. Parker,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8), p. 167. 关于意大利卡三军团在雷根斯堡的部署,见 H. Schönberger, "The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An Archaelogical Survey," *JRS* 59 (1969): 172。

3 见 Lieut. –Col. Hamilton Tovey, *Elements of Strategy*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887), pp. 133 –34。

4 塔西佗将卡特人当作日耳曼人中间的一个例外,因为他们在配备供应的情况下投入战争;*Germania*, 33。见 E. A.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pp. 140 –49。

5 当然,骡子、马匹和骆驼能够行进得和人一样快,或者比人还快,然而后勤负载沉重,因而经济支承考虑要求使用牛拉载的大车。牛一天需要 16 个小时歇息和消化,而且行进很慢。据计算,一个全建制军团每月需要小麦 170 公吨,一个五百人团为喂养其马匹所需的大麦仅略少于 53 吨;R. W. Davies, "The Daily Life of the Roman Soldier under the Principate,"载于 *ANRW*, part II, vol. 1, p. 318。

6 在东南欧,直到相当晚近为止,通往国际边界的大道的最终地段常常未加铺砌,作为一项防入侵措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这种情况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久。)

7 关于野蛮人的技能,见 E. A. Thompson,*A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 Being a new text of the treatise De Rebus Bellicis*…(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2), pp. 45 - 46。

8 例如,在伊布拉库姆的军团要塞(建于约 107 至 108 年图拉真治下,并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治下得到重建),其墙仅 18 英尺高,5¾英尺宽;R. M. Butler, "The Defences of the Fourth Century Fortress at York", 载于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Rome Yorkshire*, edited by R. M. Butler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97。另一方面,三世纪后的要塞的墙一般有 10 英尺厚;见 Harold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Centuries A. D.," *JRS* 61 (1971): 197。

9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p. 194 - 95.

10 Butler, " Defenses of the Fourth Century Fortress at York," p. 97.

11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一文(见 p. 193)将据称的高卢人围攻技术的一项改进归因于夺取希腊和小亚细亚城镇。然而,这些城镇处于和平状态已有几个世纪,而且没有理由相信它们容有围攻战器械或业经围攻战训练的人。该文作者补充说(p. 193),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极少尝试围攻战"。

12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p. 133 - 34.

13 关于这个主题的史料极其贫乏;晚近的概述见 Anthony R. Birley, *Marcus Aurelius*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6), pp. 223 - 45, 283 - 86, 连同下面注 24。

14 例如 Altenstadt; Schönberger, "The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p. 171 - 72。

15 Birley, *Marcus Aurelius*, p. 165,基于 *SHA*, *Vita Marci*, XII. 13。

16 David Oates, *Studi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1968), pp. 72 - 73. David Magie,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after Christ*,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vol. 1, pp. 660 - 63.

17 Émilienne Demougeot, *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s Origines germaniques à l'avènement de Dioclètien* (Paris: Aubier, 1969), pp. 215 - 29; J. Fitz, "A Military History of Pannonia from the Marcomann War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Severus (180 - 235),"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4 (1962): 32 - 36; Pavel Oliva, *Pannonia and the Crisis in the Roman Empire* (Prague: Ceskoskovenské Akademie Věd, 1962), pp. 260 - 78.

18 *SHA*, *Vita Marci*, XXII. 1. 222

19 Giovanni Brusin, "Le Difese della Romana Aquileia e la loro cronologia,"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Römische Forschungen in Niederösterreich, 5 (Graz and Cologne: Hermann Bölaus Nachf., 1966), p. 87. Attilio Degrassi, *Il Confine nord* -

orientale dell'Italia romana: *Ricerche storico – topografiche*, Dissertationes Bernenses ser. I. faci. 6 (Bern: A. Grancke, 1954), p. 113.

20 Oliva, *Pannon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risis*, 96 – 113; *Vita Marci*, XXI. 6 – 8.

21 Parker, *Roman legions*, pp. 116 – 17. 又见 J. C. Mann, "The Rising of New Legions during the Principate," *Hermes* 91(1963): 486 – 89.

22 关于当时分遣队与整军团相比占的优势,见 P. Romanelli, "L' esercito Romano nella rappresentazione della colonna",载于 *La Colonna di Marco Aurelio* (Rome: L' "Erma" di Bretschneider, 1955), p. 65; 参见 Parker, *Roman Legions*, p. 168。

23 同上, p. 114。

24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220 – 24; Birley, *Marcus Aurelius*, pp. 133 – 45.

25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224 – 27; Birley, *Marcus Aurelius*, pp. 272 – 86 各处。

26 见 Oliva, *Pannon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risis*, pp. 299 – 304。这与被援引的史料相矛盾,包括 *SHA*, *Vita Marci*, XXIV. 5; 参见 Wilhelm Weber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 355, 362。

27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 216,引用 Dio, XLLII. 3. 1; Weber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1:352)将此改读为起初一支更大兵力的 6 000 名生还者。

28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 395. 对哥特人进攻的概述,见上书, pp. 393 – 433; John B. Bury,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1928); 重印本 (New York: Russel and Russel, 1963), pp. 3 – 22。

29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p. 176 – 77.

30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521 – 32;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p. 177 – 79.

31 Shappard S. Frere,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pp. 188 – 89.

32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419 – 28; Alföldi 所撰篇章, 载于 *CAH* 11: pp. 147 – 50; Chester G. Starr, Jr.,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 C. – A. D.* 324, Cornell Studin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2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194 – 96。

33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 419.

34 A. Alföldi 所撰篇章, 载于 *CAH* 11: 148 – 49。

35 Fergus Millar, "P. Herennius Dexippus: The Greek World and the Third – century Invasion" *JRS* 59 (1969): 26 – 27.

36 Homer A. Thompson, "Athenian Twilight: A. D. 267 – 600," *JRS* 49 (1959): 61 – 65.

37 这个数字不包括海岛和半岛的海岸线。

38 Frere, *Britannia*, pp. 188 – 89, 338 及各处。关于这 *comes* 及其命令，见上书，pp. 212, 229。

39 *SHA*, *Vita Claudii*, VIII. 1, VI. 4.

40 A. Alföldi 所撰篇章，*CAH* 12: 149. Bury, *The Invasions of Europe*, p. 22 仅说这些数字很夸张。

41 见 Arthur Christensen, *L' 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2d ed.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1944), pp. 84 – 96。

42 Oates, *Studid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 p. 93; S. N. Miller 所撰篇章，*CAH* 12: 16 – 17; Maurice Besnier, *L' Empire romain de l' avénement des Sévères au concile de Nicée*, Histoire ancienne, part 3; Histoire romaine, vol. 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37), pp. 24 – 25。

43 Christensen, *L' 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pp. 97 – 98.

44 同上，p. 220。

45 同上，pp. 207 – 12。

46 Margie, *Roman Rule in Asia Monor*, pp. 695 – 96. Oates, *Studi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 p. 74; Besnier, *L' Empire romain de l' 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pp. 105 – 7.

47 W. Esslin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2: 86 – 68; Christensen, *L' 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pp. 130 – 31。

48 Besnier, *L' Empire romain de l' 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pp. 151, 153, 177 – 78.

49 见 William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Guerres et Réformes*, Bibliothèque 223
des écoles francaises d' Athènes et de Rome, fasc. 162 (Paris: E. de Boccard, 1946), pp. 159 – 72。关于公元 298 年的条约，见上书，pp. 172 – 74。参见 Ernst Stein, *Historie du Bas – Empire: De l' étatromain à l' état byzanti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ean – Remy Palanque, 2 vols. (Paris and The Hague: Desclée de Brouwer, 1959), vol. 1, part 1, pp. 79 – 80，此处给出的时间是公元 297 年。关于公元 363 年的条约，见上书，p. 171。

50 Schŏ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75 将这些进攻形容为"上日耳曼和雷蒂亚历史的决定关头。"

51 同上，p. 176。

52 关于卡普人，见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437 – 39。关于哥特人的总的状况，见一则晚近的概述：Lucien Musset, *les invasions: Les vagues germaniques*, Nouvelle Clio no. 12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rires de France, 1965), pp. 80 – 82。随后的事件见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409 – 11。

53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 412.

54 关于达契亚，见上书，pp. 434 – 42；哥特人在 250 年后的胜利和侵袭见上书，

pp. 416 – 25；关于法兰克人联盟的浮现及其到大约 260 年为止的进攻，见上书，pp. 465 – 89 各处；沙普尔对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威胁见 Besnier, L' Empire romain de l' 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p. 178。

55 Demougeot, *La Formantion*, p. 466.

56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pp. 173 – 74. 参见一幅 309 年地图，载于 Stein, *Histoire du Bas – Empire*, vol. 1 book. 2。

57 参见 John C. Mann, "*The Frontiers of the Principate*," *ANWR* 2, vol. 1, pp. 524 – 25；他的论点在此（本书第二章）遭到详尽的争辩。

58 达契亚的丧失是累进性的，包括早先放弃塞维鲁的特兰萨卢塔努设防边界（*Limes Transalutanus*）。见 Demougeot, *La Formantion*, pp. 434 – 42, 452 – 57；C. Daicoviciu, *La Transylvanie dans l' antiquité* (Bucharest: n. p., 1945), pp. 165 – 87。丧失达契亚的责任问题见 Eugenio Manni, *L' Impero di Gallieno: Contributo ala storia del III Secolo* (Rome: Angelo Signorelli, 1949), pp. 26 – 31，在此每个阶段都被区分辨识出来。

59 Schŏ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p. 176 – 77。

60 Mann, "Frontiers of the Principate," p. 529.

61 Jean Lesquier, *L'Armée romaine d'Egypt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Cario: Institut franc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18), pp. 474 – 77.

62 E. A. Thompson, *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6), pp. 3 – 6.

63 君士坦丁恢复了大力进取的前沿防御战略，在他治下一座跨越多瑙河的桥梁于 328 年被建造出来，以提供进入奥尔特河谷的通道。有如整个达契亚一直被使用的那样，跨多瑙河桥头堡被用作横向进击基地。332 年，西哥特人（当时在进攻巴纳特境内的附庸萨尔马西亚人）在侧翼受到一支来自奥尔特河谷的罗马部队攻击，惨遭粉碎性失败；见 Thompson, *Visigoths*, pp. 10 – 12；关于该战略，见 Stein, *Histoire du Bas – Empire*, pp. 128 – 29。

64 Marguerite Rachet, *Rome et les Berbères: Un problème militaire d' Augusteà Dioclètien*, Collection Latomus, vol. 110 (Brusseles: Latomus, 1970), pp. 238 – 50, 252 – 54.

65 Seston, *Dioclétien*, p. 119, note 1.

66 同上，pp. 117 – 20；Rachet, *Rome et les Berbères*, pp. 254 – 256。

67 一则简短的概览见 Brian H. Warmington,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Cambrida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8；背景见 Seston, *Dioclètien*, pp. 116 – 17。

68 见 Rachet, *Rome et les Berbères*, p. 258；Maurice Euzennat, "Le limes de Volubilis"，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Voträge des 6 Internationalen Limes Kon-*

gress in Süddeutsch – land (Cologne – Graz: Böhlau Verlag, 1967), pp. 198 –99。

69 Lesquier, *L' Armée romaine d' Egypte*, pp. 474 –77; Seston, *Dioclétien*, p. 158.

70 Seston, *Dioclétien*, pp. 168 –74; Stein, *Histoire du Bas – Empire*, p. 80.

71 Mordechai Gichon, "The Negev Frontier", 载于 Shimon Applebaum and Mordechai Gichon,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in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9 –50。

72 同上, p. 52。 224

73 同上, pp. 53 –54。

74 Davies, "Daily Life of the Roman Solider," p. 326;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88.

75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78; J. Mertens and C. Leva, "Le Fortin de Braives et le Limes Belgicus", 载于 R. Chevallier, ed., *Mélanges d' archéologie et d' histoire offerts à André Piganiol*,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VI^{e} Selection Center de Recherces Historiques, 3 vols. (Paris: S. E. V. P. E. N., 1966), vol. 2, pp. 1063 –74。科隆 – 巴韦大道当然不是设防边界本身，因为边界仍然在下莱茵河。

76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88.

77 同上, p. 189。

78 Demougeot, *La Formantion*, p. 497. 然而还有海上袭击。

79 同上, p. 498。

80 史料中给出的数字，即 100 000 名阿勒曼尼人对 10 000 名罗马人，差不多肯定是非常夸张的，但这些袭击的动机——搜集食物和寻求劫掠——自然会导致在乡村的分散和在目标城市周围的集中。见 Besnier, *L' Empire romain de l' 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pp. 180 –81, note 234。

81 Clifford E. Minor, "Brigand, Insurrectionist and Separatist Movement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71 年), pp. 118 –22。

82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93.

83 Seston, Dioclétien, pp. 178 – 79; 连同 374 页对面的地图；但参见另一幅地图，载于下书第 130 页对面：Denis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et la réforme Constantinienne*, Institut français d' archéologie de Beyrouth, Bibliothèque et historique 56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2)。

84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p. 193 – 95.

85 同上, pp. 195 –96。

86 在西徐亚的 Dinogetia – Gavăn 地方，情况便是如此；见 Emil Condurachi, "Neue probleme und Ergebnisse der Limes – forschung in Schthia Minor," Studient zu den Militărgrenzen Roms, pp. 165 –66。

87 Von Petrikovits,"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97.

88 阿米亚诺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XX. 6. 5)写了公元 359 年围攻辛加拉时使用的一种器械 *aries robustissimus*;较早时候,铁甲塔楼即射手的火攻平台由沙普尔二世的部队在围攻阿米达时使用,但不成功。无论如何,即使北方的蛮族,也不乏技术发明能力;见 Thompson,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 pp. 44 – 50。然而,系统的围攻技术是另一回事。

89 Von Petrikovits,"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97. 这实属寻常;例如见斯特拉斯堡的军团要塞和科隆对面蒂维提亚(多伊茨)的君士坦丁要塞;Franz Oelmann, "The Rhine Limes in Late Roman Times," 载于[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edited by Eric Birley (Durham: Durham University Registrar, 1952), pp. 87, 95。然而在不列颠和其他地方,薄墙结构仍在使用(Frere, *Britannia*, pp. 342 – 59)。就此,一个具体实例见 Butler, "Defences of the Fourth Century Fortress at York,"p. 97。

90 例如在雷马根的莱茵辅助部队堡垒,那里始于元首政治时代的现存结构于公元 275 年被改造;Von Petrikovits,"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97。在下述论文中有个图表,说明设计方面的前后相继变化过程:Radu Florescu, "Le Phases de construction du castrum Drobeta (Turnu Severin)", 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ägrenzen Roms*, pp. 144 – 51。

91 I. A. Richmond, *The City – Wall of Imperial Rome*…(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30), p. 243;该书作者计算,射击部队的全定额装备将达 762 件(为 381 个
225 塔楼配备);PhilipCord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Defences of Romano – British Tow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12 (1955): 34 – 35。

92 E. W.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 vol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195 – 96.

93 Richmond, *The City – Wall of Imperial Rome*, pp. 79 – 80; Corder: "Reorganization", pp. 34 – 36 (图表)。在有利条件下射击部队能够弥补人力不足,这是一项重要考虑。有一篇文章提倡作者自己设计的一种节省劳力的武器,它被称为 *ballista fulminalis*;关于该作者,见 Thompson,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 p. 49。

94 Von Petrikovits,"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97. 同样的技术被用于 20 世纪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和印度修建的警察要塞。

95 R. Laur – Belart, "The Late Limes from Basel to the Lake of Constance,"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 57; Florescu, "le Phases de construction du castrum Drobeta,"pp. 144 – 51; Oelmann, "The Rhine Limes,"p. 87.

96 Von Petrikovits,"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pp. 198 – 99. 戴克里先式"四棱堡"(*quadriburgium*)有四个正方形塔楼,其样式从行省到行省极少变动;Gichon, "The Negev Frontier,"p. 52。

97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p. 199 – 201.

98 同上, pp. 201 – 3; Schŏ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82; Laur – Belart, "The Late Limes from Basel to the Lake of Constance," p. 58。参见 Gichon, "The Origins of the *Limes Palestinae* and the Major Phases of Its Development", 载于 *Studien zu den Milităgrenzen Roms*, pp. 180 – 81。

99 Schŏ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87, note 346.

100 某些部队可能已经退化为兼职的民兵,但那大不同于一种全国范围的体系。存在例外:例如 *Collegia Iuventutis* 可能提供了路旁小堡驻守兵员;见 Schŏ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78。帝国当局不乐意授权组建志愿民兵(甚或燃火队)。见迪奥的三世纪观点,反映在马塞纳(Maecenas)演讲中,译文载于 A. H. M. Jones, ed., *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 2 vol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vol. 2, p. 58。

101 马尔恰诺波利斯和菲利普波利斯成功地抵御了克尼瓦(Cniva);萨洛尼卡在公元 256 年和其他许多城市在以后也是如此。

102 例如,阿奎莱亚的古代城墙到二世纪后期已被拆除,以适应该城的成长; Brusin, "Le Difese della Romana Aquileia," p. 87。

103 R. M. Butler, "Late Roman Town Walls in Gaul,"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16 (1959): 26;见该作者就三世纪前有墙围绕的市镇开列的目录。

104 同上,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89。

105 Butler, "Late Roman Town Walls in Gaul," p. 26.

106 关于公元 254 年阿勒曼尼人的进攻见 Demougeot, *La Formation*, pp. 485 – 88;法兰克人的进攻见 pp. 488 – 90;公元 259 至 260 年的入侵见 pp. 496 – 98。

107 Butler, "Late Roman Town Walls in Gaul," p. 40. 然而,某些相当大的城市依然如故,例如图卢兹,其 3 000 米城廓环封了 90 公顷土地;Michel Labrousse, "Recherches et hypotheses sur l' enceinte romaine de Toulouse",载于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edited by Marcel Renard, vol. I, p. 925。

108 Homer A. Thompson, "Athenian Twilight," p. 63.

109 Butler, "Late Roman Town Walls in Gaul," p. 40.

110 Laur – Belart, "The Late Limes from Basel to the Lake of Constance," p. 56.

111 Schŏ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78, note 286.

112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n. 30, p. 192.

113 Renato Bartolucci, "Il porto di Leptis Magna nella sua vita economica e sociale", 载于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edited by Michel Renard, vol. 1, pp. 241 – 43。

114 参见 Ramsay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r-

vard Historical Monographs 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79-80。

226 115 R. G. Goodchild and J. B. Ward-Perkins, "*The Limes Tripolitanu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JRS* 39(1949): 84.

116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Roman Empire," p. 191. 其目的不相干,相干的是这能被做到。

117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pp. 138-51.

118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19-24 争辩说,农民兵一般是以一种新的、更为地方化的外观出现的前骑兵翼和步兵大队,并且将《奥古斯塔历史手稿》(*SHA*)内《塞维鲁·亚历山大》58.4 的证据斥之为四世纪观念的犯了时代错误的调换。如此,他反映了一种传统的观点,那由 Stein, *Histoire du Bas-Empire*(p. 62)等论著所主张。W. Seston, "Du *comitatus* de Dioclétien aux *comitatenses* de Constantine," *Historia* 4 (1955)一文(p. 289)认为,农夫士兵不是转变了的骑兵翼和步兵大队,而是招募来从事地方性非全时兵役的蛮族人("异教徒")(*gentiles*);另一方面,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一书质疑拒绝将《奥古斯塔历史手稿》(*SHA*)内《塞维鲁·亚历山大》58.4 视为证据的做法(p. 13, note 34)。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3vo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一书第二卷(p. 649)赞同 Van Berchem 否定早先的时间记载,但强调来自北阿非利加的证据,那里的民兵是"异教徒",而固定驻防部队即农民兵本身(前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仍为全时驻防军(pp. 650, 652-53)。又见 Guido Clemente, La "*Notitia Dignitatum*," Sagg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no. 4 (Cagliari: Editrice Sarda Fossataro, 1968), pp. 319-42。

119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 649 坚持认为农民兵本身有军事地位(与蛮族人的农夫士兵相反),并因而坚持认为他们很可能有效,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该书作者和其他人指出,直到公元 364 年为止,一直全年向他们供应全额实物配给,此后每年又如此供应 9 个月,那表明——他说(p. 651)——他们并非自产口粮(而是全时操练?)。早先,Santo Mazzarino, *Aspetti Sociali del Quarto Secolo: Richerche di storia tardo-romana*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1951)一书(pp. 314-30 及各处)已论辩只有在阿非利加的农民兵才是农民。关于更广泛的观点,即农民兵无论其来源都是一种退化了的农民民兵,见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pp. 1-22, 151-53。

120《奥古斯塔历史手稿》内《塞维鲁·亚历山大》不能被接受为证据。"它完全没有价值,而且在我们得自塞维鲁时期的大量证据中得不到任何支持。"[J. F. G.]。

121 农民兵是前线防御者,即使这两个群体并存,就像它们看来至少在北阿非利加那样;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 643。参见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37-49。

122 参见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pp. 155 –56。下列两篇论文都驳斥叙事史料的传统说法，那是某些现代史学家坚持的：Eric B.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Roman Army,"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8 (1969): 63 – 82; R. E. Smith, "The Army Reforms of Septimius Severus," *Historia* 12 (1972): 489 –500。按照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增加薪金、允许士兵耕种军团土地和给予其他所有特权（金戒指、联谊会等等），都意在改善征募，提高士气，并非贿赂军队去支持王朝。

123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21 –24，其论述部分地由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p. 608 效法，并由 Roger Rémondon, *La Crise de l'empire romaine de Marc – Auréle à Anastase*, Nouvelle Clio, no. 1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一书形式化，见该书图表，第 126 页。

124 Seston, "Du Comitatus de Dioclétien," pp. 285 –88. 无论如何，Van Berchem 将边境指挥官看作君士坦丁改革之后的纯粹的地区指挥官，负责设防边界和农民兵；见其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100 –1。

125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100 –2.

126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p. 153.

127 同上；但反过来解释。依据 Goodchild and Ward – Perkins, "The limes Tripolitanus," pp. 94 –95。他们至少抵抗到 363 年为止，而且只靠他们自己。

128 同上, p. 43，引用狄奥多西法典 [Cod. Theod. VII, 15, 1]。

129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274; vol. 2, p. 663. 依据 *Cod. Just* I. xxvii. 2 (vol. 3, p. 205, note 130)。

130 Schönberger,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p. 187。 227

131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91 –92. 例如，在达契亚的里彭西斯和上默西亚，沿多瑙河的马其顿五军团和吉米纳十三军团分别被分成 5 个和 4 个分团，而且这划分具有经久性，每个分团均由一位单独的"军团提督"（*praefectus legionis*）指挥（同上, p. 93）。证据的时间出自文献 *Notitia Dignitatum*，但依 Van Berchem 的"地层学"分析，它被定为君士坦丁时期的。

132 这些是一般接受的数字；见 Clemente, *La "Notitia Dignitatum,"* pp. 146 –51，那里陈述了权威的观点。然而也有人提出，步兵辅助队较小（300 人），而骑兵营大得多（1 200 人）；L. Várady, "New Evidence on some problems of Late Rom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9 (1961): 360，亦被援引于 Clemente, La "Notitia Dignitatum," p. 151, note 58。

133 Van Berchem, *L'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85, 89, 101. 该作者将农民兵本身与"里彭塞斯"（*ripenses*）即行省军团分别开来，后者是个现在包括行省部队的范畴。

134 "前线的各军团采取了历来逃兵的恶劣态度……他们身处敌人近旁却不去打击敌人，逃避战斗，游手好闲，玩弄政客手腕……"这是谈论加里努斯改革以前的三世纪的军团。Luca de Regibus, *La Monarchia Militare di Gallieno* (Recco: Nicoloso

da Recco, 1939), p. 63.

135 塞维鲁军队名录见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 table 9, pp. 368 - 74。最后提及费拉塔六军团之处为迪奥(Dio)史书第五十五篇第 23 段;被援引于 Léon P. Homo, *Essai sur le régne de l' empereur Aurélien* (270 - 275),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 d' Athènes et de Rome, fasc. 89 (Paris: Albert Fontemoing, 1904), p. 201, note 9;帕提卡三军团没有被列入《尊显录》,然而内在证据表明这可能归因于誊写错误;同上, note 2。《尊显录》上的莱茵河驻军目录业已佚失,但莱茵河流域诸军团中只有一个,即普里米吉尼阿二十二军团,完全未在野战部队的种种事件中得到证实,如同米纳维亚一军团(*Minervii or.* ix. 37)、乌尔皮阿三十军团(*Truncensimani occi.* vii. 108)和奥古斯塔八军团(*Octaviani occi.* vii. 28),而普里米吉尼阿二十二军团在四帝联治时期的卡劳西乌斯硬币上被提及;同上, p. 202, note 1。仅有的另一个未被载于《尊显录》的军团,即瓦勒里亚·维克特里克斯二十军团,也是在卡劳西乌斯硬币上被最后提及;同上, p. 203, note 2。关于在公元 238 年以后被解散、253 年得到重建的奥古斯塔三军团,见 RenéCagnat, *L' Armée romaine d' Afrique et l' occupation militaire de l' Afrique sous les empereurs* (Paris: Ernest Lerous, 1913), pp. 159 - 61。44 个军团作为农民兵(意为地区部队)列入《尊显录》,其中 29 个在东方(利比亚 - 达契亚环带上),15 个在西方;这不包括也列于别处的 4 个军团分遣队以及两次被列入的埃及军团 4 个分遣队。在东方野战军中间,有 13 个较高级别的宫廷军团和 38 个常规野战军团,连同 20 个转移了的边境军团(仿野战军);在西方野战军中间,有 12 个宫廷军团和 33 个常规军团,还有 28 支仿野战军。总数洋洋大观达到 188 个军团,那按照老的军团单位人员标准将等于 1 128 000 人,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数字;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 table 15, pp. 379 - 80。

136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pp. 681 - 82. 单位数目问题见 Clemente, "Notitia Dignitatum," pp. 146 - 56。有一些间接的考古学证据,显示四帝联治时期的百人队人数减少到了 60 人;E. B. Birley, "Hadrian' s Wall and Its Neighbourhood",载于 *Studient zu den militărgrenzen roms*, p. 7。

137 Vegetius, I. 20, 21. 见 Francois Paschoud, *Roma Aeterna: Etudes sur le patriotisme dans l' occident latent à l' époque des grandes invasions*, Bibliotheca Hevetica Romana, no. 7 (Rome: Institut Suisse de Rome, 1967), pp. 110 - 18。

138 Marsden,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p. 195. 相反,看来有独立的射击军团; p. 196。阿米亚诺斯·马尔塞利努所著第十九篇第 5 节第 2 段的内在含意,是正规的军团不再训练射击或修筑要塞。

139 Paul Coussin, *Les Armes romaines: Essai sur les originset l´volution des armes individulles du legionnaire romain* (Paris: Librarie Ancienne Honor Champion, 1926), pp. 480 - 92.

228

140 Van Berchem, *L'Arm e de diocl tien*, p. 52; Von Petrikovits, "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 – western Roman Empire," p. 181. 君士坦丁继续这政策；见上书, p. 182; Thompson,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a*, pp. 10 – 12。

141 Paneg. Lat. IX, 18, 4, 被援引于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 89。关于马拉拉斯,见上书, p. 17。

142 拉克坦修(Lactantius)自然喜欢谴责他的"建筑狂热";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7。戴克里先的个人作用见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pp. 297 – 98。

143 同上, pp. 177 – 78;参见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3 – 6。

144 同上, pp. 26 – 27,连同紧接第 130 页的地图。

145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pp. 131 – 32.

146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69 – 71.

147 除了在雷蒂亚的一个单独的"巴尔卡里奥卢姆 – 努梅里"(*numerus barcariorum*),在《尊显录》中幸存的唯一"努梅里"部队是驻守哈德良长墙的十个单位和"撒克逊海岸防御组织"之下的另四个单位,后者负责不列颠海岸防御;"努梅里"这一术语最终变成广泛的统称,但在四帝联治时期它仍分明表示一个族裔单位。

148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56.

149 这一转变是个大主题。见以下各项概述: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pp. 61 – 68 ;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pp. 261 – 94;Denis Van Berchem, "*L' Annone militaire dans l' empire romain au IIIème siècl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ries de france*, vol. 80, series 8, book 10 (Paris: G. Klincksieck, 1937)。

150 他授予士兵结婚权利,肯定是事后承认,将薪饷(在图密善之后首次)从 300 迪纳里厄斯提高到 450 迪纳里厄斯,允许组成社交联谊会,便利晋升(为此赏赐金戒指); Smith, "Army Reforms of Septimius Severus," pp. 492 – 96;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Roman Army," pp. 63 – 65。

151 见著名的价格法令的前言,译文见于 Jones, *History of Rome*, vol. 2, pp. 308 – 12。"有时,一个士兵单次的购买就花完了他的奖金和薪饷。"

152 这个数字包括据称由亚历山大·塞维鲁组建的不确定的意大利卡四军团。Mann, "The Raising of New Legions during the Principate," p. 484.

153 有一篇论文相当图示性地估计军团兵力增长了 100 %,从 34 个增加到 68 个,此即 E. Nischer, "The Army Reforms of Diocletion and Constantine and Their Modifications up to the Time of *Notitia Dignitatum*," *JRS* 13 (1923): 1 – 15;为此,它受到下文的详细批评:H. M. D. Parker, "The Legions of Diocletion and Constantine," *JRS* 23, part 2 (1933): 177 – 80。然而,Besnier, *L' Empire romain de l' avènement des Severesyizu* 一书第 304 页和注 160 及 164 认可上述第一篇论文的数字,而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一书第 1 卷第 59 – 60 页得出同样的结论。

154 Parker, "The Legion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p. 80.

155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15 – 17,连同 130 页反面的地图。

156 同上,pp. 24 – 26。

157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57.

158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90 – 93,得到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99 赞同。

159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90 – 91.

160 关于君士坦丁时期的这两种战斗编队,见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99 – 100。

161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 85.

162 同上, pp. 101 – 2。

163 如果可以从 372 年的一项基本法规(Cod. Theod. VII, 22, 8 [372])得出一个推论的话;同上, p. 102, note 1。

164 佐西姆斯谴责他这么做;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p. 609。

165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 93.

166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 table 12, p. 378.

167 L. Várady,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Late – Roman Dalmatian Cunei,"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arum Hungaricae* 11 (1963): 391 – 406.

168 Clemente, "Notitia Dignitatum," p. 299 复制了这份目录。

229 169 "*prête à voler au secours des points menaces*",见 André Alföldi, "La Grande Crise du monde romain au IIe siècle," *L' Antiquité Classique* 7 (1938): 7。

170 Richard I. Frank, *Scholae Palatinae: The Palace Guard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罗马美国学院论文和专著第 23 卷(Rom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969), pp. 17 – 26。

171 M. Speidel, *Die Equites Singularges Augusti* (Bonn, 1965).

172 Stein, *Histoire du Bas – Empire*, vol. 1, pp. 57 – 58.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p. 53 – 54; vol. 2, pp. 636 – 40. Frank, *Scholae Palatinae*, pp. 33 – 41.

173 Frank, *Scholae Palatinae*, pp. 47 – 49. 参见 Jones*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p. 613。"斯库拉"实际上由官厅总管(Master of Offices)指挥,但后者大概是行政管理监督者,而非作战指挥官,同上。

174 同上, pp. 52 – 53。

175 关于这开端,见 Marcel Durry, *Les Cohortes Prétoriennes*. Bibliothèque desécoles francaises d' Athènes et de Rome, fasc. 146 (Paris: E. de Boccard, 1938);起源和早期历史见 Al Fredo Passerini, *Le Coorti Pretorie* (1939); reprinted edition (Rome: Centro Editoriale Internazionale, 1969), pp. 1 – 53。

176 同上, p. 44。

177 *Annals*, IV. 5; Psserini, *Coorti Pretorie*, p. 53.

178 同上, pp. 54 – 55, 61。

179 关于“维吉利”，见 P. K. B. Reynolds, *The Vigiles of Ancient Rom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180 Mann, “Raising of New Legiond”(note 27); Birley, *Marcus Aurelius*, p. 217.

181 Smith, “Army Reforms of Septimius Severus,” p. 486, note 28.

182 古代史家的详细引用见上书，注 1，某些现代史家的见注 33 (p. 487)。

183 这些数字上的比较被概述于 Durry, *Les Cohortes Prétoriennes*, pp. 81 – 87，连同表格，载于 p. 89，注 4。

184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Roman Army,” p. 65.

185 Maurice Platnauer,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Emperor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London and Bombay: Humphrey Milford, 1918)一书将这称作发展到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野战大军的“中间站”。

186 A. Alföldi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2: 213。

187 Manni, *L'Impero di Gallieno*, pp. 58 – 59，连同注释；De Regibus, *La Monarchia Militare di Gallieno*, pp. 78 – 79; Alföldi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2:216 – 18; Besnier, “L'Empire romain de l'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p. 190。

188 同上，p. 185, 225, 232。

189 Parker, “Legions of Diocletion and Constantine,” p. 188.

190 Besnier, *L'Empire romain de l'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p. 190.

191 Stein, *Histoire du Bas – Empire*, p. 55，连同注 216 (vol. 2, p. 430)，依据维吉蒂乌斯史书第二篇第 6 节内的数字，并且依据 Stein 的史料年代确定，即公元 260 至 290 年期间。关于年代，参见 H. M. D. Parker, “The *Antiqua Legio* of Vegetius,” *Classical Quarterly* 26 (1932): 137 – 49 各处。

192 Alföldi 所撰篇章，载于 *CAH* 12: 217。

193 同上，p. 216。

194 被援引于 Paschoud, *Études sur le partriotisme romain*, p. 117。

195 此为下述论文的结论：John W. Eadi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Mailed Cavalry,” *JRS* 57 (1967): 161 – 73。

196 同上，pp. 166 (Josephus, B. J. III. 5. 5), 167。在维吉蒂乌斯史书中，“孔图斯”(*contus*)(重长矛)是标准的骑兵武器；Coussin, *Armes romaines*, p. 479。

197 同上，p. 167。

198 同上，pp. 169 – 70。

199 Homo, *Essai sur le règne de l'empereur Aurélien*, p. 88.

200 同上，pp. 94, 99。

201 Eadi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Mailed Cavalry,” p. 170. 列于《尊显录》上的是在东方的一个“斯库拉”、一个“库内”(*cunei*) 和五个“面包烤箱”骑兵单位，连同在西方的一个骑兵单位和骑射手(*sagittarii*)。

230 202 某些例子见上书, p. 172。

203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pp. 52 – 53. 该书内 298 年这一年代系印刷错误。应为 285 年。参见 Besnier,“*L' Empire romain de l' 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pp. 277 –78。

204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55;在《尊显录》中的确有许多用于巴勒斯坦的骑兵单位。骑兵单位驻防分布如下:巴勒斯坦驻扎 12 个,阿拉伯 8 个,腓尼基 12 个,叙利亚 10 个,奥斯朗 9 个,美索不达米亚 9 个;同上, vol. 3, table 10, p. 376。

205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p. 299. 然而请注意,在《尊显录》就东部边境开列的名录上(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 table 10, p. 376),军团数目与“普罗莫蒂”数目之间没有数量相关性。参见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53。

206 这是一个由莫姆森、泽克和格罗塞所持的观点,并被 Stein, *Histoire du Bas – Empire*, vol. 1(pp. 72 –73)等著作重复。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一书(pp. 302 –7)提出一项经修改的传统观点,断定“帝国南部诸省的军队产生自加里努斯的一个战略思想,即帝国的政治风险已被戴克里先消除,省督们改善了技术组织”。

207 Passerni, *Coorti Pretorie*, p. 57. 例如,某些禁卫军人员在 296 年随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一起前往毛里塔尼亚;被援引于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p. 119, note 1。

208 关于精锐步兵(*lanciarii*)作为野战部队,见 Parker,“Legion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p. 186。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55 提出,在戴克里先治下精锐步兵大概被分派到边境地区,他们不是野战部队的一部分。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 107 提出,无论如何他们为数甚少。然而,在《尊显录》中列有几个精锐步兵军团;见 S. Mazzarino, *DE*, vol. 4 s. v. “*Lanciarii*”; Seston, “Du Comitatus de Dioclétien aux Comitatenses de Constantine,”pp. 293 –94. 这两处都重申了精锐步兵在野战部队中的作用。

209 它们作为野战部队成员(因而变得规模较大),见上书;作为曾暂时隶属于皇帝扈从、但并非永久如此的正规骑兵,见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p. 107 –8。与之对照,见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52, 53。然而,Jones 的著作(vol. 2, p. 608)将野战部队描述为规模“小的”。

210 依据 Nischer, “Army Reform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参见 N. H. Baynes, “Three Notes on the Reform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JRS* 15 (1925)一文(201 –8)的驳斥和 Parker,“Legion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一文的详细反驳。

211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其结论陈述于第 113 至 118 页。在其结论中,van Berchem 认为叙事史料《苏达》(*Suda*)、奥雷利乌斯·维克多史书(被援引于第 115 页注 3 和注 4)和特别是佐西姆斯史书第二篇第 34 节证实了他的论辩,虽然

这论辩是独立于它们的;Nischer 也在叙事史料中找到了证据支持,但 Parker 认为它们没有价值。Seston 在对 Van Berchem 著作的评论(注 246)之中,坚持认为佐西姆斯怀抱偏见地弄虚作假。有趣的是注意到,无论如何,有争议的段落即第二篇第 34 节例示了佐西姆斯——无疑还有与他一起的许多人——理解不了深度纵深防御战略的军事逻辑。

212 Seston, "Du Comitatus de Dioclétien aux Comitatenses de Constantine," (note 246). Seston 称赞 van Berchem 的方法,但不接受他的结论。Várady, "New Evidence on Some Problems of Late Roman Military Organization"一文(note 158)也拒绝这方法,因为该文作者不相信《尊显录》具备井然有序的层次。

213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p. 54 – 55, 97; vol. 2, p. 608.

214 Denis Van Berchem, "On Some Chapter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Relating to the Defense of Gaul and Northern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6 (1955): 147.

215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 97.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一书第 307 页将它们描述为"技术性的"。

216 总数取自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 table 15, p. 379。

217 同上, vol. 1, p. 98。参见 Stein, *Historie du Bas – Empire*, vol. 1, p. 73,那里将辅助部队的组建归功于戴克里先。

218 Zosmius, *Historia Nova*, translated by James J. Buchanan and Harold T. Davis 231
(San Antonio: Trinity University Press, 1967), II. 34.

219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pp. 649 – 54. 据 Van Berchem, *L' Armée de dioclétien*, p. 85,从 325 年开始,地区部队(行省军团)所予的地位低于野战部队,尽管高于骑兵翼和步兵大队。

220 Emilienne Demougeot, *De L' 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 empire romain* 395 – 410: *Essai sur le governmentimperial* (Paris: Libraire d' Amerique et d' Orient, 1951), p. 511.

221 Santo Mazzarino Stilicone: *La crisi imperiale dopo Teodosio* (Rome: Angelo Signorelli, 1942), pp. 128 – 29.

222 表 3.1 中的数字可与 Arthur E. R. Boak, *Manpow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Jermoe Lectores, 3d s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5)一书第 91 页援引的资料对照,那是下列学者分别对四世纪军队数量作的估计:Piaganiol (不足 40 万人), Seeck (40 万至 60 万人), Lot (45 万至 47.1 万人),Cary, Grosse, Stein 和 Segrè(约 50 万人),还有 J. B. Bury (60 万至 65 万人);在所有这些当中,野战军被估计为约 20 万人。

223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Roman Army," p. 78.

结语

1 新军事单位 *palatini* 首次被载于365 年的一项基本法规,即 *C. Th.* VIII. i. 10;被援引于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 note 28, pp. 21 -22。

2 由普利斯库(Priscus)叙述,被附有评论地援引于 E. A. Thompson,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8), pp. 113, 185 -86。然而其他人持别种想法,例如见 Adrian N. Sherwin - 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2d e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3), pp. 425 -68 各处。

附录

1 Robert E. Osgood 语,载于 Robert E. Osgood and Robert W. Tucker,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 3。

2 同上。

3 例如见 Roderick Bell, David V. Edward, and R. Harrison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该书为一部纲要,概论当代美国政治科学中的逐项定义。还有一项从历史视角出发的现象学研究,见 Bertrand de Jouvenel, *Power: Its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Growth*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一项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见 Dorothy Emmet, *Function, Purpose and Power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8)。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论著见 Eugene V. Walter, *Terror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f political Vio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那是一项对于国王治下祖鲁人政治生活的研究。

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3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p. 26.

5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Power and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7 -38.

6 同上。

7 例如:Robert A. Dahl,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Inc., 1963), pp. 39 -54; J. David Singer, "Inter - Nation Influence: A Formal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1963): 420 -30;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Inc., 1972), pp. 154 -58,连同其他许多著作。

8 Dahl,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p. 41.

9 一个著名的例外见 P. Bachrach and M. S. Baratz, "Decision and Nondecis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1963): 632 -42,那里作了明确的区别,并且指出给强者加诸使用武力之代价的正是对强者命令的不服从。

10 安全手段的“所有权”(和提供输入的负担)属于谁或哪些群体无关紧要。如果有完全的内部控制,那么社会的一切资源都可供统治权力据有,因而不由后者直接 232
承担的社会成本仍然是它的成本,至少在被放弃的可能的索取方面。

11 “说服”系形容那种出自武力的存在、展示或象征性应用的过程;关于“说服”概念的发展,见 Edward N. Luttwak, *The Political Uses of Sea Power* (Bali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27)。背景是海军,但该理论普遍通用。

12 Peter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一书将权势比作地位,然而接着就将它当作资本——可消耗的资本。参见 Talcott 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载于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arch*, pp. 256-57,权势在该文内被按照可比做货币的方式定义,这同样表明它因使用而耗竭。

13 我说“理性的”,是在不涉及价值取向的意义上意指将目的与手段联系起来的一种能力,其联系方式意在最大程度地实现目的,不管它们可能是什么目的。

14 即返回到 Bachrach 和 Baratz 的定义;见上面注 12。

15 这诚然是将下列情况排除在考虑之外:对手追求否定性价值例如光荣殉难;还有,对手全无易受攻击损伤的价值物,或者至少没有值得攻击的价值物。

本书所引著作目录

一　论文

Alföldi, Andrés. "La Grande Crise du monde romain au IIIe siècle." *L'Antiquite classique* 7 (1938): 5–18.

——. "The Moral Barrier on Rhine and Danube." In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p. 1–16.

Alföldy, Géza. "Die Hilfstruppen der römischen Provinz Germania Inferior."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6.

Amit, Moché. "L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et la défense de l'empire romain." *La Parola del Passato*, vol. 20, fasc. 102 (1965), pp. 207–22.

Bachrach, Peter, and Baratz, Morton S.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December 1962): 947–52.

——.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September 1963): 632–43.

Baradez, Jean L. "Organisation militaire romaine de l'Algérie antique et l'evolution du concept défensif de ses frontièr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ilitaire*, no. 13 (1953), pp. 24–42.

——. "L'Enceinte de Tipasa: Base d'opérations des troupes venues de Pannonie sous Antonin Le Pieux." In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pp. 75–82.

——. "Les Thermes légionnaires de Gemellae." In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pp. 14–22.

——. "L'Enceinte de Tipasa et ses portes." In *Mélanges Piganiol* [ed. Chevallier], vol. 2, pp. 1133–52.

——. "Compléments inédits au '*Fossatum Africae*.'" In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200–10.

Bartoccini, Renato. "Il Porto di Leptis Magna nella sua vita economica e sociale." In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ed. Renard], vol. 1, pp. 228–42.
Baynes, N.H. "Three Notes on the Reform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5 (1925): 195–208.
Berchem, Denis van. "L'Annone militaire dans l'empire romain au IIIème siècle." I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vol. 80, ser. 8, bk. 10, pp. 117–202. Paris: G. Klincksieck, 1937.
——. "Aspects de la domination romaine en Suisse."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5 (1955): 145–75.
——. "On Some Chapter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Relating to the Defense of Gaul and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6, no. 302 (1955), pp. 138–47.
——."Conquête et organisation par Rome des districts alpins."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11 (1962):228–35.
Betz, A. "Zur Dislokation der Legionen in der Zeit vom Tode des Augustus bis zum Ende der Prinzipatsepoche." In *Carnuntina* [ed. Swoboda], pp. 17–24.
Birley, Anthony R. "Excavations at Carpow."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1–5.
Birley, Eric B. "A Note on the title '*Gemin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8 (1928): 56–60.
——. "The Brigantian Problem and the First Roman Contact with Scotland." In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pp. 31–47.
——. "Britain after Agricola and the End of the Ninth Legion." In idem,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pp. 25–28.
——. "Britain under the Flavians: Agricola and His Predecessors." In idem,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pp. 10–19.
——. "Hadrianic Frontier Policy." In *Carnuntina* [ed. Swoboda], pp. 26–33.
——. "*Alae* and *Cohortes Milliariae*." In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pp. 54–67.
——. "Hadrian's Wall and Its Neighbourhood."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6–14.
——. "Septimius Severus and the Roman Army."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8 (1969), pp. 63–82.
——. "The Fate of the Ninth Legion." In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Roman Yorkshire* [ed. Butler], pp. 71–80.
Bowersock, G. W. "A Report on *Arabia Provinc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1 (1971): 219–42.
Breeze, D. J.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egion: The First Cohort and the *Equites Legioni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9 (1969): 50–55.
Breeze, D. J., and Dobson, Brian. "Hadrian's Wall: Some Problems." *Britannia* 3 (1972): 182–208.
Brogan, Olwen. "The Roman *Limes* in Germany." *Archaeological Journal* 92 (1935): 1–41.
Brunt, P. A. Review of *Die Aussenpolitik des Augustus und die augusteische Dichtung*, by Hans D. Meyer.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3 (1963): 170–76.
Brusin, Giovanni. "Le Difese della romana Aquileia e la loro cronologia." In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pp. 84–94.
Burns, T. S.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A Reconsideration." *Historia* 23 (1973): 336–45.
Butler, R. M. "The Roman Walls of Le Man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8 (1958): 33–39.
——. "Late Roman Town Walls in Gaul."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16 (1959): 25–50.
——. "The Defences of the Fourth-Century Fortress at York." In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Roman Yorkshire* [ed. Butler], pp. 97–106.
Cagnat, R. "Les Frontières militaires de l'empire romain." *Journal des savants*, January 1901, pp. 29–40.
Cavaignac, E. "Les Effectifs de l'armée d'Auguste."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30 (1952): 285–96.
Chevallier, Raymond. "Rome et la Germanie au 1[er] siècle: Problèmes de colonisation." *Latomus* 20 (1961), fasc. i, pp. 33–51, fasc. ii, pp. 266–80.
Chilver, G. E. F. "The Army in Politics A.D. 68-70."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7 (1957): 29–35.
Collingwood, R. G. "The Purpose of the Roman Wall." *Vasculum* 8 (1920): 4–9.
Condurachi, E. "Neue Probleme und Ergebnisse der Limes-forschung in Scythia Minor."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162–74.

Corder, Philip.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Defences of Romano-British Tow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12 (1955): 20–42.

Crump, G. A. "Ammianus and the Late Roman Army." *Historia* 23 (1973): 91–103.

Daicoviciu, Constantin. "Dacica." In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ed. Renard], vol. 1, pp. 462–73.

Davies, R. W. "The 'Abortive Invasion' of Britain by Gaius." *Historia* 15 (1966): 124–28.

——. "A Note on a Recent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 in Carrawburgh. Appendix."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4 (1967), pp. 108–11.

——. "Joining the Roman Army." *Bonner Jahrbücher* 169 (1969): 208–32.

——. "The Medici of the Roman Armed Forces."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8 (1969), pp. 83–99.

——. "*Cohortes Equitatae*." *Historia* 20 (1971): 751–63.

——. "The Romans at Burnswark." *Historia* 21 (1972): 98–113.

——. "The Daily Life of the Roman Soldier under the Principate."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ed. Temporini], pt. 2, Vol. 1, pp. 299–338.

Dobiáš, J. "King Maroboduus as a Politician." *Klio* 38 (1960): 155–66.

Dobson, Brian, and Breeze, D. J. "Hadrian's Wall: Some Problems." *Britannia* 3 (1972): 182–208.

Doise, J. "Le Commandement de l'armée romaine sous Theodose et les débuts des règnes d'Arcadius et d'Honorius."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vol. 61 (1949), pp. 183–94.

Dyson, L. "Native Revolts in the Roman Empire." *Historia* 20 (1971): 239–74.

Eadie, John W.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Mailed Cavalr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7 (1967): 161–73.

Euzennat, Maurice. "Le *Limes* de Volubilis." In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194–99.

Finley, M. I. Review of *Manpower Shortage*, by A. E. R. Boak.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8 (1958): 156–64.

Fishwick, D. "The Annexation of Mauretania." *Historia* 20 (1971): 467–87.

Fitz, J. "A Military History of Pannonia from the Marcomann War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Severus (180-235)."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4 (1962): 25–112.

——. "Réorganization militaire au début des guerres marcomannes." *Hommages à Marcel Renard* [ed. Bibaw], vol. I, pp. 262–74.

Florescu, Radu. "Les Phases de construction du *castrum* Drobeta (Turnu Severin)."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144–51.

Forni, Giovanni.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Dacia romana." *Athenaeum* n.s., vol. 36 (1958-59): 3–29 (fasc. 1-2), 193–218 (fasc. 3).

——. "*Limes*," in *Dizionario Epigrafico*," vol. 4, fasc. 34–40, pp. 1,074–280.

——. "Estrazione etnica e sociale dei soldati delle legioni nei primi tre secoli dell'impero."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ed. Temporini] pt. 2, vol. 1, pp. 339–91.

Frankfort, Thérèse. "Le Royaume d'Agrippa II et son annexion par Domitien." In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ed. Renard], vol. 2, pp. 659–72.

Frova, Antonio. "The Danubian *Limes* in Bulgaria and Excavations at Oescus,"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p. 23–30.

Gichon, M. [S.A.M.] "Rom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Negev."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pp. 195–207.

——.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Palestinae* and the Major Phases of Its Development."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175–93.

——. "The Negev Frontier." In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in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ed. Applebaum], pp. 35–61.

Gigli, G. "Forme di reclutamento militare durante il basso impero." *Rendiconti della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dell'Accademia dei Lincei*, vol. 8, ser. 2 (1947), pp. 268–89.

Gilmartin, Kristine. "Corbulo's Campaigns in the East." *Historia* 23 (1973): 583–626.

Goodchild, R. G. "The *Limes Tripolitanus* II."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0 (1950): 30–38.

——.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Limes* in Cyrenaic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3 (1953): 65–76.

Goodchild, R. G., and Ward-Perkins, J. B. "The *Limes Tripolitanu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39 (1949): 81–95.

Gray, W. D. "A Politcal Ideal of the Emperor Hadria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14*, vol. 1, pp. 113–24.

Hardy, E. G. "Augustus and his Legionaires." *Classical Quarterly* 14 (1921): 187–194.

Harmand, Jaques. "Les Origines de l'armée impériale: Un Témoignage sur la réalité du pseudo-principat et sur l'évolution militaire de l'Occident."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ed. Temporini], part 2, vol. 1, pp. 263–98.

Haverfield, F. "Some Roman Conceptions of Empire." Occasional Publications of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Cambridge , no. 4 (ca. 1916).

Henderson, M. I. Review of *Trajan's Persian War*, by F. A. Lepper.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39 (1949): 121–32.

Jarrett, Michael G. "The Roman Frontier in Wales."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21–31.

Jarrett, Michael G., and Mann, John C.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 *Bonner Jahrbücher* 170 (1970): 178–210

Kornemann, E. "Die unsichtbaren Grenz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 In *Staaten-Männer-Völker; Aus d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Leipzig: Deiterich, 1934. Pp. 96–116.

Laet, S. J. de. "Claude et la romanisation de la Gaule septentrionale." *Mélanges Piganiol* [Chevallier], vol. 2, pp. 951–62.

Laur-Belart, R. "The Late *Limes* from Basel to the Lake of Constance."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p. 55–67.

Leva, C., and Mertens, J. "Le fortin de Braives et le *limes belgicus.*" *Mélanges Piganiol* [Chevallier], vol. 2, pp. 1,063–74.

McLeod, W. "The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 *Phoenix* 19, no. 1 (1965): 1–14.

Mann, John C. "A Note on the *Numeri.*" *Hermes* 82 (1954): 501–6.

——. "The Raising of New Legions during the Principate." *Hermes* 91 (1963): 483–89.

——.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Zone in Army Recruitment."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pp. 145–50.

Mann, John C., and Jarrett, M. G. "Britain from Agricola to Gallienus." *Bonner Jahrbücher* 170 (1970): 178–210.

——. "The Frontiers of the Principate."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ed. Temporini], part 2, vol. 1, pp. 508–33.

Marin, A. "*Hippagogi.*" In *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greques et romaines* [Daremberg-Saglio], vol. 4, pp. 183–86.

Mertens, J. "Oudenburg, camp du Litus Saxonicum en Belgique?" In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pp. 123–31.

Mertens, J., and Leva, C. "Le Fortin de Braives et le *Limes Belgicus.*" *Mélanges Piganiol* [Chevallier], vol. 2, pp. 1,063–74.

Millar, Fergus. "P. Herennius Dexippus: The Greek World and the Third-Century Invasion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9 (1969): 12–29.

Morris, John. "The Vallum Again."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n.s. 50 (1951): 43–53.

Moss, J. R. "The Effects of the Policies of Aetiu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Historia* 23 (1973): 711–31.

Nischer, E. "The Army Reform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and Their Modifications up to the Time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3 (1923): 1–55.

Nock, A. D. "The Roman Army and the Roman Religious Yea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45 (1952): 187–252.

Oelmann, F. "The Rhine *Limes* in Late Roman Times."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p. 81–99.

O'Neill, R. J. "Doctrine and Training in the German Army 1919–193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ed. Howard], pp. 145–65.

Parker, H. M. D. "The *Antiqua Legio* of Vegetius." *Classical Quarterly* 26 (1932): 137–49.

——. "The Legion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3 (1933): 175–89.

Parsons, T.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In *Political Power* [Bell et al.], pp. 251–84.

Passerini, A. "Gli Aumenti del soldo militare da Commodo a Massimino." *Athenaeum* 24 (1946): 145–59.

——. "*Legio*." In *Dizionario Epigrafico*, vol. 4, fasc. 18–20, pp. 549–627.

Pekáry, Th. "Studien zur römischen Währungs und Finanzgeschichte von 161 bis 235 n. Ch." *Historia* 8 (1959): 443–89.

Perret, Louis. "Essai sur la carrière d'Hadrien jusqu'a son avènement a l'empire (76–117)."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vol. 80, ser. 8, bk. 9. Paris: G. Klincksieck, 1937.

Petrikovits, Harald von.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Centuries A.D."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1 (1971): 178–218.

Pflaum, H-C. "Forces et faiblesses de l'armée romaine du Haut-Empire."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à Rome* [Brisson], pp. 85–98.

Piganiol, A. "La Notion de *Limes*."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pp. 119–22.

Ramsay, A. M. "The Speed of the Roman Imperial Post."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5 (1925): 60–74.

Rémondon, Roger. "Problèmes militaires en Egypte et dans l'empire à la fin du IV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213 (1955): 21–38.

Richmond, Sir Ian A. "Trajan's Army on Trajan's Column."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3 (1935): 1–40.

——. "The Romans in Redesdale." *History of Northumberland* 15 (1940): 116–29.

——. "Hadrian's Wall 1939–1949."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0 (1950): 43–56.

——. "A Roman Arterial Signalling System in the Stainmore Pass." *Aspects of Archaeology* [ed. Grimes], pp. 293–302.

——. "Queen Cartimandu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4 (1954): 43–52.

——. "The Roman Frontier Land." *History* [U.K.], vol. 44, no. 150 (February 1959), pp. 1–15.

——. "The Roman Siege-Works of Masàda, Israel."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2 (1962): 142–55.

——. "Palmyra under the Aegis of Rom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3 (1963): 43–54.

Robertson, Anne S. "The Antonine Wal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pp. 99–111.

Robinson, H. R. "Problems in Reconstructing Roman Armour." *Bonner Jahrbücher* 172 (1972): 24–35.

Rowell, H. T. "The *Honesta Missio* from the *Numeri*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Yale Classical Studies* 6 (1939): 73–108.

Saddington, D. B. "Roman Attitudes to the *Externae Gentes* of the North." *Acta Classica* [S.A.] 4 (1961): 90–102.

——.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ed. Temporini], pt. 2, vol. 3, pp. 176–201.

Salama, Pierre. "Occupation de la Maurétanie césarienne occidentale sous les Bas-Empire romain." *Mélanges Piganiol* [Chevallier], vol. 3, pp. 1,291–311.

Salmon, E. T. "The Roman Army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3d series, vol. 52 (1958), sect. 2, pp. 43–60.

Saint-Denis, E. de. "*Mare Clausum*."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25 (1947): 200–203.

Schönberger, H. "The Roman Frontier in German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9 (1969): pp. 144–97.

Seston, William. "Du *Comitatus* de Dioclétien aux *comitatenses* de Constantin." *Historia* 4 (1955): 284–96.

Shaw, R. C., and Simpson, F. G. "The Purpose and Date of the Vallum and Its Crossings."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n.s. 27 (1922): 40–100.

Sherwin-White, A. N.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Roman Alger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34 (1944): 1–10.

Simpson, F. G., and Shaw, R. C. "The Purpose and Date of the Vallum and Its Crossings."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n.s. 27 (1922): 40–100.

Simpson, Grace. "The Roman Forts in Wales: A Reassessment."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32–34.

Smallwood, E. Mary. "Palestine c. A.D. 115–118." *Historia* 11 (1962): 502–5.

Smith, R. E. "The Army Reforms of Septimius Severus." *Historia* 12 (1972): 481–500.

Steer, Kenneth A. "The Antonine Wall: A Reconsideration."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35–41.

Stevens, C. E. "The British Sections of the *Notitia Dignitatum*." *Archaeological Journal* 97 (1940): 125–54.

——. "Britain between the Invasions (54 B.C.-A.D. 43): A Study of Ancient Diplomacy." In *Aspects of Archaeology* [ed. Grimes], pp. 332–44.

Swoboda, E. "Traian und der Pannonische *Limes*."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p. 195–208.

Syme, R. "Rhine and Danube Legions under Domitia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8 (1928): 41–55.

——. "Some 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3 (1933): 14–33.

——. "The Lower Danube under Traja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9 (1959): 26–33.

——. "Hadrian the Intellectual."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p. 243–53.

Szilágyi, J. "Roman Garrisons Stationed at the Northern Pannonia-Quad Frontier-Sectors of the Empire."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 (1952): 189–220.

——. "Les Variations des centres de prépondérance militaire dans les provinces frontières de l'empire romai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1953): fasc. 1–2, pp. 119–219.

Thompson, E. A.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odosius II and Marcian." *Hermathena*, no. 76 (1950), pp. 58–75.

——. "The Settlement of the Barbarians in Southern Gaul."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6 (1956): 65–75.

Thompson, Homer A. "Athenian Twilight: A.D. 267–600."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9 (1959): 61–72.

Tierney, J. J. "The Map of Agripp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vol. 63, sect. C, no. 4 (1963), pp. 151–66.

Vannérus, Jules. "Le *Limes* et le fortifications gallo-romaines de Belgique: Enquête toponymique."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Mémoires*, coll. 4, 2^e^ ser., vol 9, fasc. 2.

Várady, L. "New Evidences on Some Problems of Late Rom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9 (1961): 333–96.

——.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Late-Roman Dalmatian *Cunei*."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1 (1963): 333–96.

Vita, A. Di. "Il *Limes* romano di Tripolitania nella sua concretezza archeologica e nella sua realtá storica." *Libya Antiqua* 1 (1964): 65–98.

Ward-Perkins, J. B., and Goodchild, R. G. "The *Limes Tripolitanu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39 (1949): 81–95.

Waters, Kenneth Hugh. "The Reign of Trajan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ANRW*, pt. 2, vol. 2, pp. 381–430.

Watson, G. R. "The Pay of the Roman Army: The Auxiliary Forces." *Historia* 8 (1959): 372–78.

Webster, G. "The Legionary Fortress at Linco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39 (1949): 57–78.

——. "The Claudian Frontier in Britain."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pp. 42–53.

Wells, C. M. "The Augustan Penetration of Germany, Dates and Destinations."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67*, pp. 1–6.

Wheeler, [Sir] R. E. M. "The Roman Frontier in Mesopotamia." *Congress of Roman Studies, 1949*, pp. 112–29.

Wilkes, J. J. "A Note on the Mutiny of the Pannonian Lègions in A.D. 14." *Classical Quarterly*, n.s., vol. 13, no. 2 (November 1963), pp. 268–71.

Will, E. "Les Enceintes du bas-empire à Bavay."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pp. 99–110.

二 图书和专著

Adcock, Frank Ezra. *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vol. 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Alföldi, Andreas. *A Conflict of Ideas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 The Clash between the Senate and Valentinian I.*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2.
Andreotti, R. *Il Regno dell'imperatore Giuliano.* Bologna: N. Zanichelli, 1936.
Applebaum, Shimon, and Gichon, Mordechai.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in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967.
Arias, Paolo E. *Domiziano: Saggi e ricerche.* No. 9. Catania (Sicily): G. Crisafulli, 1945.
Aussaresses, F. *L'Armée byzantine à la fin du VI^e^ siècle: d'après le strategicon de l'empereur Maurice.* Bibliothèque des universités du midi. Fasc. 14. Bordeaux: Feret and fils, 1909.
Badian, Ernst. *Foreign Clientelae (264–70 B.C.).*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 *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1965. Repri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8.
——. *Publicans and Sinners: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Service of the Roman Republi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Balsdon, J. P. V. D. *The Emperor Gaius (Caligul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34.
Baradez, Jean Lucien. *Vue-Aerienne de l'organisation romaine dans le Sud-Algérien, fossatum Africae.*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1949.
Bell, Roderick; Edwards, David V.; Wagner, R. Harrison, eds.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Berchem, Denis van. *L'Armée de Dioclétien et la réforme constantinienne.*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de Beyrouth,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56.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2.
Bersanetti, Gastone M. *Vespasiano.* Rome: Edizioni Roma, 1941.
Besnier, Maurice. *L'Empire romain de l'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au concile de Nicée.* Histoire générale I; Histoire ancienne, pt. 3; Histoire romaine, vol. 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37.
Birley, Anthony R. *Hadrian's Wall: An Illustrated Guide.* Ministry of Public Building and Works.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63.
——. *Marcus Aurelius.*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6.
——. *Septimius Severus: The African Emperor.*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71.
Birley, Eric B. *Roman Britain and the Roman Army: Collected Papers.*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1953.
——. *Research on Hadrian's Wall.* Kendal: Titus Wilson and Son, 1961.
Blau, Peter.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Boak, Arthur Edward Romilly. *The Master of Offices in the 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Empir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tudies. Humanistic Series, vol. 14.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9.
——. *Manpow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The Jerome Lectures, third ser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5.
Bowersock, Glen W.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Braithwaite, A. W. C. *Suetoni Tranquilli Divus Vespasianu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7.
Brand, Clarence Eugene. *Roman Military Law.*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Bréhier, Louis. *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vol. 32, bis.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49.
Bruce, John Collingwood. *Handbook to the Roman Wall.* 12th ed. by [Sir] Ian A. Richmond. Newcastle: H. Hill Hindson and A. Reid, 1966.
Brunt, P. A.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1.
Bury, John Bagnell.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395 A.D. to 800 A.D.).* Reprint. 2 vols. 1889. Amsterdam: Adolf M. Hakkert, 1966.
——.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 1928. Reprin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Inc., 1963.
Cagnat, René. *L'Armée romaine d'Afrique et l'occupation militaire de l'Afrique sous les empereurs.*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2d ed. Paris: Ernest Leroux, 1913.

Calderini, Aristide. *I Severi: La crisi dell'impero nel III secolo.*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Storia di Roma, no. 7. Bologna: Licinio Cappelli Editore, 1940.

Carcopino, Jérôme. *Les étapes de l'impérialisme romain.* 1934. Reprint. Paris: Hachette, 1961.

Cary, Max.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9.

Casson, Lionel.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apot, Victor. *La Frontière de l'Euphrate: De Pompée à la conquête arabe.* Paris: A. Fontemoing, 1907.

Charlesworth, Martin Percival. *Trade Routes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2d rev. ed.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6.

——. *Five Men: Character Studies from the Roman Empire.*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no. 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The Lost Province, or the Worth of Britai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49.

Chastagnol, André. *Les Bas Empire.* Text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69.

Cheesman, George Leonard.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1914. Reprint. Hildesheim: George Olms, 1971.

Chevallier, Raymond. *Les Voies romaine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72.

Chilver, Guy Edward F. *Cisalpine Gau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49 B.C. to the Death of Traja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1.

Christensen, Arthur. *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2d ed.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1944.

Christescu, Vasile. *Istoria militară a Daciei Romane.* Bucharest: Fundatia Regele Carol I, 1937.

Clemente, Guido. *La "Notitia Dignitatum."* Sagg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no. 4. Cagliari, Sardinia: Editrice Sarda Fossataro, 1968.

Courcelle, Pierre Paul.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grand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3d ed. Paris: Etudes Augustinnienes, 1964.

Coussin, Paul. *Les Armes romaines: Essai sur les origines et l'evolution des armes individuelles du légionnaire romain.*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6.

Curzon, George Nathan, Lord Kedleston. *Frontiers.* Romanes Lecture Serie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07.

Dahl, Robert A.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Daicoviciu, Constantin. *La Transilvania nell'antichità.* Rev. ed. of 1938 essay. Bucharest: n.p., 1943.

——. *La Transylvanie dans l'antiquité.* Bucharest: n.p., 1945.

Daicoviciu, Constantin, and Daicoviciu, Hadrain. *Columna lui Traian.* Bucharest: Editura Meridiane, 1968.

Degrassi, Attilio. *Il Confine nord-orientale dell'Italia romana: Ricerche storico-topografiche.* Dissertationes Bernenses, ser. I, fasc. 6. Bern: A. Francke, 1954.

Demougeot, Émilienne. *De l'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in 395–410: Essai sur le gouvernement imperial.* Paris: Librairie d'Amerique et d'Orient, 1951.

——. *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s origines germaniques à l'avènement de Dioclétien.* Paris: Aubier, 1969.

Dudley, Donald Reynolds, and Webster, Graham. *The Roman Conquest of Britain A.D. 43–57.* London: Dufour Éditions, 1965.

Durry, Marcel. *Les Cohortes Prétoriennes.*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fasc. 146. Paris: E. de Boccard, 1938.

Emmet, Dorothy. *Function, Purpose and Power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8.

Fink, Robert O. *Roman Military Records on Papyrus.* Texts, Varia. Philological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no. 26. Cleveland: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71.

Forni, Giovanni. *Il Reclutamento delle legioni da Augusto a Diocleziano.* Pubblicazioni della facolta di filosofia e lettere della Università di Pavia, 5. Milan and Rome: Fratelli Bocca, 1953.

Frank, Richard Ira. *Scholae Palatinae: The Palace Guard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vol. 23. Rom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969.

Frere, Sheppard S.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Garbsch, Jochen G. *Der Spätrömische Donau-Iller Rhein Limes*. Stuttgart: A. W. Gentner, 1970.

Garzetti, Albino. *L'Impero da Tiberio agli Antonini*. Instituto di studi romani, Storia di Roma, vol. 6. Bologna: Licinio Cappelli, 1960.

——. *Problemi dell'eta traianea: Sommario e testi*. Genova: Fratelli Bozzi, 1971.

Geweke, Lenore K., and Winspear, Alban D. *Augustu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om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no. 2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35.

Ghirshman, R. *Les Chionites-Hephtalites*. Mémoire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vol. 53.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vol. 13.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8.

Gianelli, Giulio. *Trattato di storia romana*. 2 vols. Rev. ed. by Santo Mazzarino. Rome: Tumminelli, 1953-1956.

Gitti, A. *Ricerche sui rapporti tra i vandali e l'impero romano*. Bari: Laterza, 1953.

Gonella, Guido. *Pace romana e pace cartaginese*. Quaderni di studi romani, serie seconda, no. 1. Rome: Istituto di studi romani, 1947.

Goodyear, Francis Richard D. *The Annals of Tacitus*. Vol. 1, Annals I.1-54.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2.

Guey, Julien. *Essai sur la guerre parthique de Trajan (114-117)*. Bibliothèque d'Istros, no. 2. Bucharest: S. Lambrino, 1937.

Hammond, Mason. *The Antonine Monarchy*.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Papers and Monographs, no. 19. Rom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959.

——. *The Augustan Princip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Julio-Claudian Perio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Russel and Russel, 1968.

Hardy, Ernest George.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2d ser. London: S. Sonnenschein and Co., 1909.

Harkness, Albert.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Roman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7.

Harmand, Jacques. *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otre ère)*. Paris: Ed. A. et J. Picard et Cie., 1967

——. *La Guerre antique, de Sumer á Ro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3.

Harmand, Louis. *L'Occident romain: Gaule, Espagne, Bretagne, Afrique du Nord (31 av. J. C. à 235 ap. J. C.)*. Paris: Payot, 1960.

Harmatta, Joh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armatians*. Magyar-Görög Tanulmányok, 30. Budapest: Pázamány Péter Tumányegyetemi Görög Filológiai Intézet, 1950.

Hatt, Jean-Jacques. *Histoire de la Gaule romaine (120 avant J-C 451 après J-C): Colonisation ou colonialisme*. Paris: Payot, 1966.

Henderson, Bernard W. *The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Hadrian A.D. 76-138*. London: Methuen and Co., 1923.

——. *Five Roman Emperors: Vespasian, Titus, Domitian, Nerva, Trajan (69-117)*. 1927. Reprint.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9.

Holmes, T. Rice.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27 B.C.-A.D. 14*. 2 vol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1931.

Holsti, K.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2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Homo, Léon P. *Essai sur le règne de l'empereur Aurélien (270-275)*.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fasc. 89. Paris: A. Fontemoing, 1904.

——. *Le Siècle d'or de l'empire romain*. Paris: A. Fayard, 1947.

——. *Vespasien l'empereur du bon sens (69-79 ap. J-C)*. Paris: Albin Michel, 1949.

Jones, Arnold Hugh Mart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3 vo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3 vols. in 2: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ed. Texts, varia *A History of Rome Through the Fifth Century*.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 *Augustu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0;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
Jouvenel, Bertrand de. *Power: Its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Growth*.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Kaegi, Walter Emil, Jr. *Byzantium and the Decline of Ro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Katz, Solomon. *The Decline of Rome and the Rise of Mediaeval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La Penna, Antonio. *Orazio e l'ideologia del principato*. Saggi no. 332. Turin: Giulio Einaudi, 1963.
Lemosse, Maxime. *Le Régime des relatione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 haut-empire romain*.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droit romain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vol. 23. Paris: Librairie Sirey, 1967.
Lepper, F. A. *Trajan's Parthian War*. London: Geoffrey Cumberlege, 1948.
Lesquier, Jean. *L'Armée romaine d'Égypt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18.
Levi, M. A. [Canavesi, M.] *La Politica estera di Roma antica*. Manual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34. 2 vols. Milan: In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1942.
Levick, Barbara Mary. *Roman Colonies in Southern Asia Minor*.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7.
Lot, Ferdinand. *L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La pénétration mutuelle du monde barbare et du monde romain*. Paris: Payot, 1935.
——. *L'Art militaire et les armées au Moyen Age en Europe et dans le Proche Orient*. 2 vols. Paris: Payot, 1946.
——. *Nouvelle recherches sur l'impot foncier et la capitation personelle sous le Bas-Empire*.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fasc. 304.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55.
MacMullen, Ramsay.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rvard Historical Monographs, vol. 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Magie, David.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after Christ*.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Manni, Eugenio. *L'Impero di Gallien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 III secolo*. Rome: Angelo Signorelli, 1949.
Marichal, Robert. *L'Occupation romaine de la Basse Égypte: Le statut des auxilia*. Paris: E. Droz, 1945.
Marin y Peña, Manuel. *Instituciones militares romanas*. Enciclopedia Clasica no. 2.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 Patronato "Menendez y Pelayo," 1956.
Marquardt, Joachim. *De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chez les Romains*. Rev. ed. A. Von Domaszewski. Trans. J. Brissaud. Manuel des antiquités romaines de Joachim Marquardt et Théodore Mommsen, vol. 11. Paris: A Fontemoing, 1891.
Marsden, Eric William.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 vol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Marsh, Frank Burr, *The Reign of Tiberiu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Maspero, Jean. *Organisation militaire de l'Égypte Byzantine*.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fasc. 201.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12.
Mazzarino, Santo. *Stilicone: La crisi imperiale dopo Teodosio*. Studi pubblicati dal R.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 storia antica, fasc. 3. Rome: Angelo Signorelli, 1942.
——. *Aspetti sociali del quarto secolo: Ricerche di storia tardo-romana*.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1951.
Mazzarino, Santo, and Gianelli, Giulio. *Trattato di storia romana*. Rev. ed. 2 vols. Rome: Tumminelli, 1953–1956.
Momigliano, Arnald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55.
——. *Terz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6.
——. *Ricerche sull'organizzazione della Giudea sotto il dominio romano (63 a.C-70 d.C)*. Amsterdam: A. M. Hakkert, 1967.

——. *Quar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9.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3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Murphy, Gerard James.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L. Septimius Severus from the Evidence of the Inscriptions*. Philadelphia: n.p., 1945.
Musset, Lucien. *Les Invasions: Les vagues germaniques*. Nouvelle Clio, no. 12.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
Oates, David. *Studi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1968.
Oliva, Pavel. *Pannon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risis in the Roman Empire*. Prague: Ĉeskoslovenské Akademie Věd, 1962.
Oman, Charles W. C.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2d rev. ed. 2 vols. London: Methuen and Co., 1924.
Ondrouch, Vojtěch. *Limes Romanus na Slovensku (il limes romano in Slovacchia)*. Bratislava: Práce Učene Společnosti Ŝafarikovy v Bratislavě, 1938.
Orgeval, Bernard d'. *L'empereur Hadrien: Oeuvre législative et administrative*. Paris: Editions Domat Montchrestien, 1950.
Osgood, Robert E., and Tucker, Robert W.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arker, Henry Michael Denne. *The Roman Legions*. 1928.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s and bibliography. Cambridge: W. Heffer and Sons, 1958.
Paschoud, François. *Roma aeterna: Études sur le patriotisme romain dans l'occident latin á l'époque des grandes invasions*. Bibliotheca Helvetica Romana, no. 7. Rome: Institut Suisse de Rome, 1967.
Passerini, Alfredo. *Le Coorti Pretorie*. 1939. Reprint. Rome: Centro Editoriale Internazionale, 1969.
——. *Linee di storia romana in etá imperiale*. 2d ed. Revised by Nicola Criniti. Milan: Celuc, 1972.
Pelham, Henry Francis. *Essays*. Edited by F. Haverfiel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1.
Piganiol, André. *L'Empire Chrétien 325–395*. 2d ed. Revised by A. Chastagnol. 1948. Reprin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 *Scripta Varia*. Edited by R. Bloch. et al. 3 vols. Collection Latomus, nos. 131–33. Brussels: Latomus, 1973.
Platnauer, Maurice.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Emperor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London and Bombay: Humphrey Milford, 1918.
Poidebard, A. *La Trace de Rome dans le désert de Syrie: Le limes de Trajan à la conquête arabe, recherches aériennes, (1925–1934)*.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4.
Pugliese, Carratelli. *L'età di Valeriano e Gallieno: Appunti di storia romana*. Pisa: Libreria Goliardica, 1950.
Rachet, Marguerite. *Rome et les Berbères: Un Problème militaire d'Auguste à Dioclétien*. Collection Latomus, vol. 110. Brussels: Latomus, 1970.
Regibus, Luca de. *La Monarchia militare di Gallieno*. Recco, Italy: Editrice Nicoloso da Recco, 1939.
Rémondon, Roger. *La Crise de l'empire romain de Marc Aurèle à Anastase*. Nouvelle Clio, no. 1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Reynolds, P. K. B. *The Vigiles of Ancient Rom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Richmond, Sir Ian A. *The City Wall of Imperial Rome: An Account of its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from Aurelian to Narse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30.
Romanelli, Pietro. *La Cirenaica Romana 96 A.C.-642 D.C.* Verbania: A. Airoldi, 1943.
Rossi, Lino.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 M. C. Toynbe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Rougé, Jean. *Les Institutions romaines: De la Rome royale à la Rome chrétienn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69.
Rowell, Henry T. *Ammianus Marcellinus, Soldier-Historian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Press, 1964.
Salway, Peter. *The Frontier People of Roman Britain*.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5.

Sands, P.C. *The Client Pr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under the Republic*. Cambridge Historical Essays, no. 16.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08.
Saxer, Robert. *Untersuchungen zu den vexillation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 von Augustus bis Diokletian*. Epigraphische Studien, no. 1. Beihefte der Bonner Jahrbücher, no. 18. Cologne and Graz: Böhlau, 1967.
Schleiermacher, Wilhelm. *Der römische Limes in Deutschland. Limesführer*. 3d ed. Berlin: Gebr. Mann, 1967.
Scramuzza, Vincent M. *The Emperor Claudi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Seager, Robin, *Tiberius*. London: Eyre Methuen, 1972.
Seston, William.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vol. 1. *Guerres et réformes (284–300)*.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fasc. 162. Paris: E. de Boccard, 1946.
Sherwin-White, Adrian N. *The Roman Citizenship*. 2d e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3.
——. *The Letters of Pliny: A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mmentar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6.
Simpson, Grace. *Britons and the Roman Army: A Study of Wales and the Southern Pennines in the 1st-3d Centuries*. London: The Gregg Press, 1964.
Sirago, Vito Antonio. *Galla Placidia e la trasformazione politica dell'occidente*. Université de Louvain. Recueil des travaux d'histoire et de philologie. 4e série, fasc. 25.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1961.
Smith, Richard Edwin. *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Solari, Arturo. *La Crisi dell'impero romano*. 2 vols. Milan: Soc. Ed. Dante Alighieri, 1933.
——. *Il Rinnovamento dell'impero romano*. Milan: Soc. Ed. Dante Alighieri, 1938.
Starr, Chester G., Jr.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A.D. 324*. Cornell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2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1.
Stein, Ernst. *Histoire du Bas-Empire: De l'état romain à l'état byzantin (284–476)*. Vol. I [two part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ean-Remy Palanque.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59.
——. *Opera Minora Selecta*. Amsterdam: A. M. Hakkert, 1968.
Stevenson, George Hope. *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Till the Age of the Sever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0.
Syme, Ronald.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39.
Syme, Sir Ronald. *Tacitus*. 2 vol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Thompson, E. A. *The Historical Work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47.
——.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48.
——. *A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 Being a New Text of the Treatise De Rebus Bellicis with a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2.
——.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 *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a*.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6.
Tovey, Lieut.-Col. Hamilton. *Elements of Strategy*.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887.
Vigneron, Paul. *Le Cheval dans l'antiquité gréco-romaine, de guerres médiques aux grandes invasion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techniques*. Annales de l'Est, mémoires no. 35. Nancy: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de sciences humaines, 1968.
Walter, Eugene Victor. *Terror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f Political Vio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Warmington, Brian H.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Watson, G. R. *The Roman Soldi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
Webster, Graham.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D.*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69.
Wells, Colin Michael.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Wheeler, Sir R. E. Mortimer.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54.

White, Donald A. *Litus Saxonicum: The British Saxon Shore in Scholarship and 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White, Lynn Townsend,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Gibbon's Problems after Two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Wilkes, J. J. *Dalmatia: History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Winspear, Alban D., and Geweke, Lenore K. *Augustu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om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no. 2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5.

Zancan, Paola. *La Crisi del Principato nell'anno 69 D.C.* R. Universita di Padova. Pubblicazioni della Facultà di Lettere e Filosofia, vol. 16. Padova: Dott. Antonio Milani, 1939.

三 未发表的著作

Gordon, Colin D. "The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 as a Roman Policy of Imperial Defens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48. (LC microfilm AC-1, no. 1105.)

Kaltenbach, Philip E. "Non-Citizen Troops in the 'Roman Army.' " Ph.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48.

Minor, Clifford E. "Brigand, Insurrectionist and Separatist Movement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1.

Moscovich, Maurice James. "The Role of Hostages in Roman Foreign Policy." Ph.D. diss.,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1972.

Petersen, Hans E. "Governorship and Military Command in the Roman Empire."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3.

Wade, Donald W. "The Roman Auxiliary Units and Camps in Dac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69.

Uspensky, Th. I.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ypescript. Translated by J. Krenov, from Bulletin of the Russi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at Constantinople, vol. 6. Sophia [Bulgaria], 1900. W.P.A. No. 3888, 1941. O.P. 165-1-93-11. [L. of C.].

四 论文集

1. 古罗马边境问题研讨会（按时间顺序排列）

[Third]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Edited by Eric B. Birley. Durham: Durham University Registrar, 1952.

Carnuntina: Ergebnisse der Forschung über die Grenzprovinzen des römischen Reiches, Vorträge beim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 der Altertumsforscher Carnuntum, 1955. Edited by Erich Swoboda. Römische Forschungen in Niederösterreich, vol. 3. Graz and Cologne: Hermann Böhlaus Nachf., 1956.

Limes Romanus Konferenz, Nitra. Slovenskej Akadémie vied Bratislava. Bratislava: Slovenskej Akadémie, 1959.

Quintus Congressus Internationalis Limitis Romani Studiosorum [Fifth Congress]. Acta et Dissertationes Archaeologicae. Zagreb: Arheološki Radovi i Rasprave III, 1963.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Römische Forschungen in Niederösterreich, vol. 5. Graz and Cologne: Hermann Böhlaus Nachf., 1966.

Studien zu den Militärgrenzen Roms: Vorträge des 6. Internationalen Limes Kongresses in Süddeutschland. Beihefte der Bonner Jahrbücher, vol. 19. Cologne and Graz: Böhlau, 1967.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67 [7th Congress]. Tel Aviv: Students' Organization, 1971.

2. 其他

Applebaum, Shimon, and Gichon, Mordechai. *Israel and Her Vicinity in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967.

Bell, Roderick; Edwards, David V.; Wagner, Harrison.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Bibaw, Jacqueline, ed. *Hommages à Marcel Renard*. 3 vols. Collection Latomus, vol. 102. Brussels: Latomus, 1969.

Brisson, Jean-Paul, ed.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à Rom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Sorbonne 6 section: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12.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and Co., 1969.

Butler, Ronald M., ed.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Roman Yorkshire: Essays to Commemorate the Nineteenth Centen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York*.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1.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Gen. ed. John B. Bury. Vols. 10, 11, 12.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4–1939.

Caprino, C.; Colini, A. M.; Gatti, G.; Pallottino, M.; Romanelli, P. *La Colonna di Marco Aurelio*.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1955.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Les Empereurs romains d'Espagne*.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65.

Chevallier, Raymond, ed.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offerts à André Piganiol*.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VIe Section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3 vols. Paris: S.E.V.P.E.N., 1966.

Grimes, W. F., ed. *Aspects of Archaeology in Britain and Beyond: Essays Presented to O. G. S. Crawford*. London: H. W. Edwards, 1951.

Howard, M.,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Essays Presented to Captain B. H. Liddel Hart*. London: Cassell, 1965.

Proceedings of the 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Edited by J. M. Hussey, D. Obolensky, and S. Runcima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7.

Mélanges Marcel Durry: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Vol. 47 bis. Paris: Soc.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1969.

Millar, Fergus; Berciu, D.; Frye, Richard N.; Kossack, Georg; Talbot, Rice Tamara.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Neighbour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7.

Renard, Marcel, ed. *Hommages à Albert Grenier*. 3 vols. Collection Latomus, vol. 58. Brussels: Latomus, 1962.

Temporini, Hildegard, ed.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n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 [A.N.R.W.]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4.

索　　引

（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gar XI　阿布加尔十一世 151
Abilene　阿比林 20，39
Abrittus　阿布里图斯 153
Abusina 阿布西纳 166
Achea　亚该亚 31
Actium　亚克兴 30
Adiabene　阿迪亚比尼 110
Adrianople（battle）阿德里安堡（战役）137
Adriatic　亚德里亚 84
Aemilianus 埃米利亚努斯 153
Aerarium militare　罗马军事财库 27
Africa　阿非利加 17
Africa Proconsularis　阿非利加总督区 158
Agricola，Cn. Julius　阿格里科拉，Cn. 朱利乌斯 88，115
Agri decumates　防御重地 155
Agrippa I，C. Julius　阿格里帕一世，C. 朱利乌斯 38 – 39
Agrippa II，C. Julius　阿格里帕二世，C. 朱利乌斯 27，39 111，112
Aila　艾拉 160，178
Alamanni　阿勒曼尼人 146，155；其袭击，152，153，160 – 161，168，169，176
Albani　阿尔巴人 113
Albanians　阿尔巴尼亚人 30
Alexander（son of Herod）亚历山大（赫罗德之子）31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87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81，84
Alexandrine grain ships　亚历山大运粮船 81
Alpes Cottiae　阿尔卑斯科蒂 50
Alps　阿尔卑斯山脉 89
Altenburg　阿尔滕堡 163
Altrip　阿尔特里普 163，166，167
Alzey　阿尔察 166，167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104，154；在该地区的附庸，20，113；在该地区的兵力，19，26；在该地区的设防边界 67，113
Anthony　安东尼 32
Antioch　安条克 84，110，152
Antiochus III　安提奥库斯三世 38
Antiochus IV　安提奥库斯四世 27，32，38，39，111，112，113
Antipas　安提帕斯 20
Antonine Wall　安东尼长墙 67，86，88 – 89
Apulensis　阿普伦西斯 101
Apulum　阿普兰 100，101，104
Aquileia　阿奎莱亚 84，145，158，185
Aquincum　阿昆库姆 124
Arabia　阿拉伯 113

Arabs 阿拉伯人 112,154
Arava 阿拉瓦 160, 178
Arbon 阿尔邦 161
Archelaus (son of Herod) 阿基劳斯(希律之子) 39
Archelaus (of Cappadocia) 阿基劳斯(卡帕多基亚的)31, 32, 38
Archelaus II 阿基劳斯二世 38
Ardashir 阿达希尔 151, 152
Aristobolus 阿里斯托布卢斯 112
Armenia 亚美尼亚 20, 26, 111;作为缓冲国 24, 26, 47, 104 - 105, 107, 116;作为附庸国, 24, 154, 159;帕提亚与, 18, 38, 108, 110, 113, 145, 150, 151
Arminius 阿米尼乌斯 21, 33, 37, 42
Arnsburg 阿恩斯贝格 93
Arsacids 阿萨息斯家族 24, 46, 105, 150, 151, 163
Artaxata 阿塔克萨塔 105
Artillery 射击部队 45, 163 - 166; 和射击军团的组成 163; 和强力射箭器之引入 121; 被军团使用 41, 45, 175; 在围困战中使用 44 - 45
Asdings 阿斯丁人 153, 155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147, 152
Assyria 亚述 110
Athens 雅典 147, 168 - 169
Attila 阿提拉 192
Augsburg 奥格斯堡 89, 92
Augst 奥格斯特 169
Augusta Raurica 奥古斯塔劳里卡 169
Augusta Vindelicorum 奥古斯塔温德利克兰 89, 178
Augustus 奥古斯都 19, 26, 85, 97;和附庸国, 31, 32; 其扩张主义, 49, 60
Aurelian 奥勒利安 104, 151, 155, 160, 185;防御工事与 163;和巴尔迈拉 186, 187
Aureolus 奥雷路斯 185
Aures 欧雷斯 158
Autun 欧坦 168
Auxilia 辅助部队 16, 122, 124, 146;作为骑兵, 43;军团与 27, 41, 42, 45, 47, 56;其薪饷 27;其使用 17, 87, 111, 115, 170
Auxilia(as type of infantry unit) 辅助部队(作为步兵单位种类) 173, 179
Axidares 阿克西达里斯 108
Axiopolis 阿克西波利斯 60

Bagaudae "巴高达"(匪帮)161
Balearic slingers 巴利里克投石手 44
Balkans 巴尔干半岛各国 20
Ballistae "巴利斯塔"(投石器) 41, 44, 45
Banat 巴纳特 101, 155
Baquates 巴奎特人 158
Bar - Kobha's revolt 巴克布哈叛乱 25
Basel 巴塞尔 161
Batavi 巴达维人 作为罗马附庸 21, 115; 作为警卫奴隶 183; 提供辅助部队 30, 42
Bavares 巴伐利斯 158
Bavay 巴韦 160, 166
Beauvais 博韦 169
Beersheba 比尔谢巴 160
Beneficiarii consularis 大道警卫部队 160
Berbers 柏柏尔人 158
Bessi 培西人 25
Bewcastle 比尤卡斯尔 66
Birrens 比伦 66

Black Forest 黑森林 89
Black Sea 黑海 20, 152, 169
Blemmyes 布莱梅人 158
Blockhäuser 小警卫塔 73
Bohemia 波希米亚 马科曼尼人逃往该地区 32; 对该地区的被规划的入侵 37, 49, 50
Bonn 波恩 124
Bonna 波拿 124
Bosporan state 博斯普兰国 32, 38;作为附庸国 20, 39; 被兼并, 112
Bostra 博斯特拉 86, 110, 111, 113, 176
Boulogne 布洛涅 160
Brigands 盗匪 161
Brigantians (of Cartimandua) 布里甘特人(卡提曼都的) 115
Brindisi 布林迪西 84
Britain 不列颠 在该地区的附庸 21, 115; 其防卫 60, 67, 72 - 73, 86, 87 - 89, 147, 163, 174;对该地区的威胁 47, 120, 136
Budapest 布达佩斯 124
Buffer states 缓冲国 112, 116. 又见亚美尼亚;奥斯朗
Burebista 布雷比斯塔 97
Burg 布尔格 161
burgi 路旁小堡 160
Bürgle 布尔格勒 167
Burgundi 勃艮第人 155

Caerleon 卡利恩 72
Caesar, Julius 凯撒,朱利乌斯 19, 21, 44
Canninefates 坎宁法特人 38
Cape Bon 邦角 81
Cappadocia 卡帕多基亚 107;作为附庸 20, 26, 31, 32, 38;在该地区的兵力部署 27, 174; 帕提亚人与 32, 105, 150; 作为行省 27, 38, 113, 114, 153
Carlisle 卡莱尔 67
Carnuntum 卡农图姆 49, 101
Carpi 卡普人 147, 152, 153, 155
Carrhae (battle) 卡雷(战役)42, 43
Carroballista “卡罗巴利斯塔”(强力射箭器) 121
Cartennae 卡滕尼 124
Carthage 迦太基 158
Cartimandua 卡蒂曼杜亚 115
Carus 卡鲁斯 151
Castra Peregrina 机构名(类似于帝国大本营) 184
Castra Regina 卡斯特拉里吉纳 73, 89
Catualda 卡图尔达 37
Caucasus 高加索山脉 114, 159
Caucasus Kindoms 高加索诸王国 30, 112
Cavalry 骑兵 176, 185, 186, 187; 缺少马镫 43; 罗马的 40, 41, 43, 71, 123, 124, 186;其战术 43 - 44, 56, 186
Centenaria “琴泰纳尼亚”(小要塞状农舍) 170
Cerialis, Q. Petilius 瑟里亚利斯,Q. 佩蒂利乌斯 42
Chalcedon 卡尔西登 147
Chatti 卡特人 96, 153;作为附庸 119; 和多密提安 92, 184; 作为威胁 38, 117, 145
Chauci 乔西人 38
Chersonesus 刻松 169
Cherusci 切鲁西人 对其使用掷弹兵

45；作为附属 36；作为威胁 21，33
Chester 切斯特 67，72
Cicero 西塞罗 25
Cilicia 奇利乞亚 30，110；波斯人与 153；和波利摩二世，39；作为行省 113
Cilicia Aspera 奇利乞亚阿斯珀拉 113
Cilicia Campestris 奇利乞亚坎佩斯特里斯 113
Cilicia Tracheia 奇利乞亚特拉基亚 38
Civilis（revolt of） 西维利（叛乱）42，92，111
Classis Germanica 日耳曼尼卡巡逻舰队 78，89
Classis Moesica 米西卡巡逻舰队 78，97
Classis Pannonica 潘诺尼卡巡逻舰队 78，97
Claudius 克劳狄 185；和附庸国 36，38，39，40；他的军事政策 37，50
Clausewitz 克劳塞维茨 61，69
clibanarii 面包烤箱 186
Client states 附庸国 20－40，88，112；安东尼与 30；附庸国体系的耗费 27，116；附庸国体系的衰落 86，100，107，113，114－117；在东方的 31，111－112；其管理 30－31，33，36－37，105－115；屋大维与 30；和帕提亚 32；对它们的酬赏 32，33，36－37，115－16；其价值 24，25－26，27，30，47，115；在西方的 20，32，33，36，47，88
Cogidubnus 克吉达布努斯 39
Cohortes equitatae 骑步兵混合单位 16，43，71，123－124，173
Colchi 科尔奇人 113
Cologne 科隆 34，168
Coloniae 殖民地 101，104
Colonies 殖民地 19
Comana 科马纳 20
Comitatenses 野战部队 174，179，187，188，190，191
Comites “科米泰”（骑兵单位）187
Commagene 科马基尼：被兼并 38；作为附庸 20，26，27，38，39，111，112；帕提亚与 32
Commodus 康茂德 146
Composite bow 合成弓 44
Constanta 康斯坦察 60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167；军队与 187，188，190；其军事政策 178－182
Contus “孔图斯”（重长矛）71
Corbulo，Cn. Domitius 科布洛，Cn. 多米蒂乌斯 41；在东方 105，107；训练与 188；在西方 37－38
Cottian Alps 科蒂安阿尔卑斯 20，40
Cottius 科提乌斯 39－40
Cotys 科蒂 38
Cotys II 科蒂二世 38
Cotys III 科蒂三世 38
Crassus 克拉苏 42，43
Cremona 克雷莫纳 120
Cretan archers 克里特弓手 44
Ctesiphon 泰西封 108，110，116，145；被劫掠 46
Cunei equitum 骑兵单位 173，179
Cyprus 塞浦路斯 110
Cyrene 昔兰尼 110

Dacia 达契亚 47；作为附庸国，115；其征服 86，97；该地区边境 100，104，123，155；作为行省 100－101，104，155，174；作为威胁 18，46，48，49，

92, 97, 101
Dacia Malvensis 达契亚马尔温西斯 152
Dacia Ripensis 达契亚里彭西斯 178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在该地区部署的兵力 17, 86; 从该地区派遣的兵力 186, 187; 在该地区的避难地 169
Damascus 大马士革 107, 176
Danube 多瑙河:其上的边境舰队 78, 97; 沿岸兵力 17, 87, 93, 152, 174; 沿岸防御工事 133, 176; 沿岸边境 67, 73, 89, 92, 97, 155; 沿岸威胁 101, 145, 146
Dariel Pass 达里尔山口 144
Decebalus 戴凯巴路斯 97, 100, 101, 115
Deiotarus 狄奥塔鲁斯 25, 27
Der'a 德拉 113
Deutschaltenburg 德意志查尔滕堡 101
Deva 德瓦 67, 72
Dexippus 德克西普斯 147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150, 153, 154, 158, 159; 要塞与 161, 176; 军团与 174, 187; 其军事政策 132, 176, 177–178, 193
Dneister 德涅斯特河 146
Dobruja 多布罗加 137, 153; 达契亚的威胁与多布罗加 101; 边界与多布罗加 60; 该地区的哥特人 150, 152
Dodecachoinos 多德卡乔诺斯 155
Dolabra 多拉布拉 41
Domitian 图密善 军队与 46, 86, 121, 122, 125, 183, 184; 其战役 46, 92, 97, 100, 153; 边境与 60, 93
Donnus 唐纳斯 40
Drava valley 德拉瓦河谷 185
Drobeta 德罗贝塔 104, 166
Eburacum 伊布拉库姆 67, 72, 135, 167
Edessa 埃德萨 137, 151
Egypt 埃及 110, 154; 该地区的兵力 17–18, 47, 86, 158, 174, 178; 其边境 155, 158; 对该地区的入侵 136
Eining 艾宁 93, 166
Elat 埃拉特 161, 178,
Elbe 易北河 93
Elephantine 埃勒凡泰尼 155, 158
Emerkingen 埃默金根 92
Emesa (battle) 埃米萨(战役)186
Emesa (kingdom) 埃米萨(王国) 20, 27, 111
England 英格兰 147
Equites Illyriciani 高等级骑兵 178
Equites indigenae 当地骑兵 178
Eqiutes Singulares 特种骑兵 184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107, 108, 111, 112, 116, 123, 176
Eurycles 攸里克利斯 31, 39

Faimingen 费明根 93
Feldwache 大瞭望塔 73
Flavus 弗拉乌斯 33, 36
Florus and Sacrovir (revolt) 弗洛鲁斯和萨克罗弗(叛乱)18
Fortifications 防御工事 160–169
Fossatum Africae "阿非利加工事体系" 60; 作为屏障 66, 68, 69, 79–80; 农民兵与 173
France 法兰西 161
Franks 法兰克人 146, 153, 168
Frisii 弗里西人 21, 115
Frontiers 边境:安托林 93; 其分界 57,

60；弗拉维王朝与 73，87；哈德良与 73－75；朱里奥－克劳迪王朝与 74；其政治经济作用 96－97；部队与 170－173. 又见边境防御线
Frontinus 弗龙蒂努斯 42，92，121

Gaius 盖乌斯 13，37，38，39
Galati 加拉蒂 124
Galatia 加拉太：作为附庸国 25，27；作为行省 113，114
Galba 加尔巴 119
Galerius 加勒里乌斯 151，153，159
Galilee 加利利 39
Gallic Empire "高卢帝国" 147，153
Gallienus 加里努斯 160，161，185，193
Gallus，C. Cestius 加卢斯，C. 塞斯蒂乌斯 118－119
Gallus，Treboniasus 加卢斯，特里博尼亚苏斯 153
Gaul 高卢 168；其防御 147，158，163，168；其入侵 24，136
Gaza 加沙 160
Gemellae 吉米利 120
Gepids 吉皮兹人 153
Germanicus 日耳曼尼库斯 36，42，45
Germans 日耳曼人 47；作为附庸 36－37；"努梅里"（新兵种）与 158；其战术 71；作为威胁 18，24，36－37，45，48，100
Germany 日耳曼 93；在该地区的危机 50；其边境 60，89，92，93，155；"努梅里"（新兵种）与 122；对该地区的被规划的入侵 37，38，125
Gibraltar 直布罗陀 81
gladius "格雷底厄"（双刃短剑）40
Glaphyra 格拉菲拉 31
Gordian III 戈尔狄安三世 151
Goths 哥特人：入侵罗马领土 147，150，152，153；杀死皇帝 137；其海上袭击 152；使用围城机械 135
Greece 希腊 147，185
Gundremmingen 贡德雷明根 167

Hadrian 哈德良：军队与 80，84，120，121，174；和东方 110，113，116；其边境政策 61，73－74，87；其军事政策 57，60，182；"努梅里"（新兵种）与 122
Hadrian's Wall 哈德良长墙 60，86，88－89；骑兵与 71；关于该长墙的叙述 72－73；作为边境 60；作为线性屏障 66，67，68，92；"努梅里"（新兵种）与 122
Haluza 哈卢察 78
Hannibal 汉尼拔 43
Hastati "哈斯塔蒂"（一类重步兵）40
Hasta velitaris "哈斯塔"标枪 40
Hauran 豪兰 见伊都里亚
Heidelberg 海德堡 92
Heidenheim 海登海姆 93
Hejaz 汉志 113
Hermunduri 赫曼杜里人 21，37
Herod 希律 24，31，32
Heruli 赫鲁利人 147，152，153，169
Hiberna "黑贝尔纳"（冬季兵营）18，119－120
Hierapolis－Castabala 赫拉波利斯－卡斯塔巴拉 30，38
Hofheim 霍夫海姆 92
Horn 霍恩 169
Huns 匈奴人 192

Iazyges 亚齐基人:作为附庸, 97, 100; 作为威胁 101, 104, 145
Iberi 伊比利亚人 30, 113, 114, 159
Icorigium 伊克里久姆 167
Illyricum 伊利里库姆:军团与 47, 49; 在该地区的麻烦 18, 50
India trade 印度贸易 110
Ingenuus 因格努乌斯 153
Iranians 伊朗人 45
Iron Gates 铁门 97
Isca Silurum 伊斯卡西卢兰 72
Isny 伊斯尼 161, 163
Italicus 意大利库斯 36
Italy 意大利 89; 侵入的路线 17, 185; 受入侵威胁 24, 145, 160
Ituraea 伊都里亚 32, 38, 123
Iuthungi 尤桑吉人 155, 160, 176

Jebel Sinjar 辛贾尔山 108, 110, 111, 150, 154, 159
Jewish War 犹太战争 18, 111
Jews 犹太人 24 - 25, 67 - 70, 86, 110, 118 - 119
Josephus 约瑟夫斯 27, 117, 118, 186
Jovian 乔温人 152
Juba II 朱巴二世 20, 25, 30
Judea 犹地亚 60, 112, 186; 被兼并 39, 50; 作为附庸 31, 39; 军团与 24 - 25, 86, 126; 作为行省 20; 反叛中的 111, 118
Jünkerath 云克拉特 163, 167
Justinian 查士丁尼 173

Kabylie 卡比利亚 158
Kempten 肯普滕 161
Khabur River 哈布尔河 108, 110, 111, 150, 151, 154
Koblenz 科布伦茨 163
Köngen 孔恩 93
Kontos "康托斯"(重长矛) 186
Kostanz 科斯坦茨 161
Künzing 昆青 168

Lahn 兰河 92
Lake Van 凡湖 151, 154
Lanciarii 精锐步兵 187
Langobardi 伦巴第人 146
Legion 军团: 掷弹兵与 41, 45, 163, 175; 其营地 18, 55 - 57, 120; 其工程能力 40 - 41; 其医疗人员 120; 其机动性 72; 其组织 16, 40, 171, 175; 其战略性使用 124 - 125; 其战术性使用 41, 42, 117, 124; 其领土化 124
Leptis Magna 大莱普提斯 169
Lesser Armenia 小亚美尼亚: 被兼并 112; 作为附庸国 107, 112; 和科蒂三世 38; 作为加拉提亚的一部分 113; 和波利摩一世 32
Levant 黎凡特 107 - 8, 111
Limes 设防边界 60, 68, 93, 96; 安托林 93; 通讯与 66 - 67; 警戒线防御与 69, 71; 多瑙河与 93; 戴克里先与 176 - 177; 其基础设施 61, 67, 72, 75, 89, 123; 线性屏障与 78 - 79, 88; 作为开放式防御 78 - 79; 大道与 19, 67, 79, 89, 92; 战略机动性与 96 - 97; 瞭望塔与 66, 78
Limes Porolissensis 波罗利森西斯设防边界 101, 104, 123
Limes Tripolitanus 特里波利塔努斯设防边界 170
Limitanei 农民兵 171 - 175, 188, 190,

191
Linear barriers 线性屏障 68, 69。参见 *limes*
Linz 林茨 92
Livy 李维 44
London 伦敦 169
Lorch 洛尔希 93
Lower Germany 下日耳曼：附庸与 115；在该地区的兵力 71, 87, 124, 174。参见 Germany
Lychnidus 利奇尼杜斯 185
Lycia 吕基亚 20

Macedonia 马其顿 135, 147
Magister equitum 常备野战骑兵指挥部 188
Magister peditum 常备野战步兵指挥部 188
Main 美因河 92, 93, 96
Mainz 美因茨 46, 89, 92, 96
Malalas 马拉拉斯 176
Malchus 马库斯 27, 111
Malvensis 马尔温西斯 101
Marcommani 马科曼尼人 32；作为附庸 21, 37, 100；作为威胁 86, 101, 145, 146
Marcus Aurelius 马库斯·奥雷柳斯：军队与 126, 184；其战役 116, 146, 150；边境与 131, 145；军团与 85, 124, 125, 174, 185
Maritimae 马里蒂姆 50
Marius, Gaius 马略,盖乌斯 40
Maroboduus 马罗博杜乌斯 21, 32, 37, 49
Maros valley 马罗斯河谷 100
Masada 马萨达 117
Mattiaci 马蒂亚斯人 92
Mauretania 毛里塔尼亚 60；被兼并 39；作为附庸 20, 25, 30；在该地区的冲突 120, 124
Mauretania Caesariensis 毛里塔尼亚·凯撒林西斯 155, 158
Mauretania Tingitana 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 155
Mauri 毛利人 158
Maximian 马克西米安 158
Medain Salih 梅代恩萨利赫 113
Media Atropatene 米太阿特罗帕滕 159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81, 84
Melitene 梅利泰内 107
Mesad Boqeq 梅萨德博凯克 160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边境与 154；军团与 174, 175, 184；波斯人与 151, 152；图拉真与 110
Messina 墨西拿 81
Milan 米兰 160, 161, 176, 185
Milites exploratores 侦察部队 179
Milliary units 骑兵单位 43, 71, 87, 122, 123
Miltenberg 米尔滕贝格 93
Mithridates 米特拉达梯 38, 39
Moesia 默西亚 50；在该地区部署的兵力 17, 47, 111, 115, 124, 158, 174, 178, 179 – 182；对该地区的威胁 49, 97, 146
Mogontiacensis, Dux 莫冈蒂亚森西斯督军 182
Mogontiacum 莫冈蒂亚库姆 47, 89
Mommsen, T. 莫姆森, T. 26
Moors 摩尔人 186
Muntenia 蒙泰尼亚 101

Nabatean Arabia 那巴提安阿拉伯 113;被兼并 110, 112;作为附庸国, 20, 107, 112;在该地区部署的兵力, 86;被希洛德人侵 31
Naples 那不勒斯 84
Napoleon 拿破仑 69, 87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44
Nasamones 纳萨莫尼人 46
Neckar 内卡河 92, 93, 96, 153
Negev Desert 内盖夫沙漠 78, 160
Nero 尼禄 86;兼并本都 39, 112;日耳曼与 38;犹地亚与 126;帕提亚与 105
Netherby 内瑟比 66
Neuenheim 诺因海姆 92
Neuwied 新维德 92
Nicomedia 尼科美底亚 147
Nicopolis 尼科波利斯 152
Nijmegan 奈梅亨 161
Nile 尼罗河 177
Nisibis 尼西比斯 111, 152
Nitzana 尼特扎纳 78, 160
Nobades 诺巴兹人 158
Noricum 诺利康:军团被派往该地区 86, 131, 174;作为行省, 50;在该地区的避难所 169
North Africa 北非 81;边境与 60, 155;入侵该地区 136, 158;在该地区的军团部署, 47, 174;马克西米安与 158
Notitia Dignitatum 《尊显录》(罗马古文献) 147, 163, 175, 178, 179, 182, 187, 188, 190
Nova Traiana 新特拉扬纳 110
Nubia 努比亚 155
Numeri "努梅里"(新兵种) 122, 123, 158, 170 - 71
Numidians 努米底亚人 43, 44
Numidia 努米底亚 68, 79 - 80, 158, 174

Obernburg 奥伯恩堡 92
Oberscheidental 奥伯斯切登特尔 92
Oberstimm 奥伯斯蒂姆 92
Obii 奥比人 146
Odenwald 奥登林山 92, 122
Oescus 奥斯库斯 101
Oltenia 奥尔泰尼亚 155
Oppida "奥皮达"(山顶设防村庄) 169
Oppidum Obiorum 奥皮杜姆·奥比欧鲁姆 47
Orontes River 奥龙特斯河 186
Osrhoëne 奥斯朗 被兼并 116;作为缓冲国, 112, 116;作为附庸国 110, 113, 114;萨桑尼德人征服 151
Osroes 奥斯罗 108, 110
Ost 奥斯特 93
Ostia 奥斯蒂亚 81

Pacorus II 帕克鲁斯二世 116
Paetus, L. Caesennius 佩图斯, L. 凯森尼乌斯 107
Palaestina III 帕利斯蒂纳三世 160
Palatini "帕拉蒂尼"(新军事单位) 191
Palestine 巴勒斯坦 174, 175, 178
Palmyra 巴尔米拉 107, 178;兼并 112;边境与 113, 161, 176;作为独立国 186, 187;"努梅里"(新兵种)与 123
Pannonia 潘诺尼亚 93;边境与 89;军团与 17, 107, 174;作为行省 50;避难所与 169
Pannonian revolt 潘诺尼亚叛乱 17, 37, 49
Paris 巴黎 168, 169

Parthamaspates 帕塔马斯帕特 108, 110, 113, 116
Parthia 帕提亚：其骑兵战术 43 – 44, 71 – 72, 186；作为罗马附庸, 113, 116；罗马附庸国与 32, 38；罗马兵力部署与 84, 124, 125；罗马战争技术, 45 – 46；作为对罗马的威胁 18, 19, 24, 47, 48, 105, 108, 111, 112, 116, 145, 150；图拉真与 113；与罗马的战争 108, 110, 184。参见 Arsacids；Sassanids
Passau 帕绍 168
Peraea 佩利阿 39
Perigueux 佩里格 168
Persia 波斯 137, 150, 152；巴尔迈拉与 186；罗马与 154, 174；其围困战技术 135
Petra 佩特拉 107, 111, 160
Pevensey 佩文西 163
Philip 菲利普 20
Philippopoplis 菲利普波利斯 135
Philip the Arab 阿拉伯的菲利普 151
Philopator 菲罗巴托 30, 38
Phoenice 腓尼基 174
Pilismarót 皮利斯马罗特 163
Pilum “派勒姆”(重投枪) 40, 41, 44
Pityus 皮蒂乌斯 147
Pius, Antoninus 庇护,安东尼 124, 184
Pliny 普林尼 16, 20
Plutarch 普鲁塔克 42
Poetovio 波图维奥 185
Polemo I 波利摩一世 32, 39
Polemo II 波利摩二世 38, 39, 112
Pontus 本都：兼并 39, 112, 113；作为附庸国 20, 26, 36；帕提亚对它的威胁 105
Porolissensis 波罗利森西斯 101
Portus Magnus 波图斯·马格努斯 124
Postumus 波斯图穆斯 153
Po valley 波河河谷 160
Praetorians 普里托林人 17, 158, 173, 183 – 184, 186, 187
Principes “普林西皮”(一类重步兵) 40
Promoti “普罗莫蒂”(骑兵单位) 185, 187
Pseudocomitatenses 仿野战军 179, 188
Ptolemais 托勒密 111
Ptolemy (of Mauretania) 托勒密(毛里塔尼亚的) 39
Puteoli 普特欧利 84

Quadi 夸迪人：作为附庸 21, 37, 100；越过多瑙河 145；围城战与 146
Qualburg 夸尔堡 161
Qiungenary units 五百人团单位 71, 122
Quinquegentanei 奎因丘根塔内人 158

Rabble II 拉布尔二世 113
Radamistus 拉达米斯图 105
Raetia 雷蒂亚：边境与 67, 68, 73, 93, 155, 161；军团与 47, 86, 97, 131, 174；农民兵与 173；作为行省, 50；避难所与 169；圣塞夫里努斯与 168；对该地区的威胁 152, 153
Raşova 拉索瓦 60
Ratiara 拉蒂亚拉 101
Regensburg 雷根斯堡 73, 89, 169
Rehovot 雷霍沃特 78
Rheingönheim 莱茵贡海姆 92
Rhescuporis 莱斯库波瑞斯 38
Rhine 莱茵 93, 96, 119；沿其部署的兵力 17, 47, 152；边境与 78, 89, 92,

133, 146 - 147
Rhoemetalces (son of Cotys II) 罗梅托西斯(科蒂二世之子) 38
Rhoemetalces (son of Rhescuporis) 罗梅托西斯(莱斯库波瑞斯之子) 38
Rhoemetalces (king of Thrace) 罗梅托西斯(色雷斯国王) 25
Rif 里夫 158
Ripenses "里彭塞斯"(行省军团) 179
Roman army 罗马军队 40 - 41, 72, 117, 123, 173 - 88;其维持成本 16;其部署, 17 - 18, 47, 80, 84, 85;其工程能力, 80 - 81, 84;人力与 16;薪饷与 16, 121;其规模 13, 16, 17, 177;其使用 18, 45 - 46, 117, 121, 190. 又见罗马军事财库; 掷弹兵; 骑兵; 骑步兵混合单位; 军团; 分遣队
Roman military units (legions) 罗马军事单位(军团):
I Adiutrix 阿蒂厄特里克斯一军团 89, 119, 174; *II Adiutrix* 阿蒂厄特里克斯二军团 119, 124, 174; *V Alaudae* 阿劳迪五军团 42; *XV Apollinaris* 阿波利纳里斯十五军团 25, 107, 111, 174; II *Augusta* 奥古斯塔二军团 72, 174; *III Augusta* 奥古斯塔三军团 25, 120, 124, 174; *VIII Augusta* 奥古斯塔八军团 89, 174; *VII Claudia* 克劳狄七军团 174, 179; *XI Claudia* 克劳狄十一军团 89, 158, 166, 174; *III Cyrenaica* 昔兰尼卡三军团 86, 174; *XXII Deiotariana* 德奥塔里纳二十二军团 27, 86, 132 - 135; *VI Ferrata* 弗拉塔六军团 25, 86, 105, 118, 174, 175; *IV Flavia* 弗拉维亚四军团 179; *IV Flavia Felix* 弗拉维亚·菲利克斯四军团 86, 119, 174; *XVI Flavia Firma* 弗拉维亚·弗玛十六军团 107, 119, 174; *X Fretensis* 弗雷滕西斯五军团 24, 25, 86, 111, 118, 160, 174; *XII Fulminata* 富尔米纳塔十二军团 107, 111, 118; *III Gallica* 加利卡三军团 86, 97, 105, 111, 118, 174; *XVI Gallica* 加利卡十六军团 42, 119; *X Gemina* 吉米纳十军团 174; *XIII Gemina* 吉米纳十三军团 104, 174; *XIV Gemina* 吉米纳十四军团 89, 119, 174; *VII Gemina*(*ex Galbiana*)吉米纳(前加尔比阿纳)七军团 119, 174; *I Germanica* 日耳曼尼卡一军团 42, 119; *II Herculia* 赫库利阿二军团 158; *Herculiana* 赫库利阿纳军团 187; *IX Hispana* 西班牙九军团 25, 85n; *Ioviana* 爱奥维阿纳军团 187; *I Italica* 意大利卡一军团 174; *II Italica* 意大利卡二军团 86, 131, 146, 174, 184; *III Italica* 意大利卡三军团 73, 86, 131, 146, 174, 184; *IV Italica* 意大利卡四军团 174; *IV Macedonica* 马其顿四军团 42, 119; *V Macedonica* 马其顿五军团 24 - 25, 111, 124, 174; *I Minervia* 米纳维亚一军团 124, 174, 184; *I Parthica* 帕提卡一军团 150, 174, 184; *II Parthica* 帕提卡二军团 174, 184; *III Parthica* 帕提卡三军团 150, 174, 175, 184; *XV Primigenia* 普里米吉尼阿十五军团 42, 119; *XXII Primigenia* 普里米吉尼阿二十二军团 174; *XXI Rapax* 拉帕克斯二十一军团 85n, 119; IV *Scythica* 西提卡四军团 105, 184; *II Traiana* 特赖阿纳二军团 158, 174, 184; *XXX Ulpia* 乌尔皮阿三十军团 174, 184; *XX Valeria Victrix*

瓦勒里亚·维克特里克斯二十军团 72, 174; *VI Victrix* 维克特里克斯六军团 67, 72, 174
Roman military units (non – legionary) 罗马军事单位(非军团):
Ala I Cananefatium 骑兵单位 124; *Ala II Flavia* 设在上日耳曼的军事单位 87; *Ala Flavia Brittanica* 军事骑兵单位 124; *Ala I Gallorum et Pannoniorum Catafracta* 装备少量硬盔甲的骑兵 186; *Ala I Ituraeorum Sagitarriorum* 马上弓箭手 124; *Ala Petriana* 设在不列颠的骑兵单位 73, 87; *Ala Ulpia Contariorum Miliaria* 持长矛的重装骑兵单位 124, 186; *Ala I Ulpia Dromadariorum* 驼队中的一支 123; *Comes Litoris Saxonici Breitannian* 设在萨克森海岸的防御组织 147; *equites Dalmatae* 当地骑兵单位 185; *equites Mauri* 当地骑兵单位 185; *equites sagittarii clibanarii* 着盔甲的马上弓箭手 187; *Mauri gentiles* 非正规的阿非利加骑士 123; *Praefectus militum balistariorum* 一个徒有"军团联盟"之名的军事单位 182; *Praefectus militum secundae Flaviae* 一个从名称上看与军团有依稀的历史联系的军事单位 182; *Raeti Gaesati* 掷轻便矛枪者 123. 又见骑步兵混合单位;野战部队;军事单位;普里托林人;仿野战军;五百人团单位;市镇大队;分遣队;维吉利人
Rome 罗马 84, 174, 175
Rottweil 罗特韦尔 92
Roxolani 罗克瑟兰人 97, 101, 104, 115
Rufus, C. Velius 鲁弗斯, C. 维利乌斯 125
Sacer comitatus 皇帝野外护卫队 187
Sahara desert 撒哈拉沙漠 158, 169
Salassi 萨拉西人 50
Salonika 萨洛尼卡 153
Samaria 撒马利亚 39
Sarmatians 萨尔马西亚人 100, 115, 146; 作为附庸 21, 97; 其战术, 71; 作为威胁, 18, 46, 97, 101, 104, 174
Sarmizegethusa 萨尔米泽杰图萨 100
Sassanids 萨桑尼德人 45, 137, 150, 158; 其骑兵 186; 其扩张倾向, 150 – 151, 152, 154; 其围困战技术 135, 163
Satala 萨塔拉 107, 113
Saturninus, L. Antonius 萨特尼努兹, L. 安东尼乌斯 92
Saultaris 苏塔里斯 160
Saxons 撒克逊人 147
Schirenhof 希尔伦霍弗 93
Scipio Africanus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 121
Scorpion Pass 斯科平山口 160
Scotland 苏格兰 89, 96
Scutarii "斯库塔里"(重装骑兵) 185
Scythia 西徐亚 178 – 179
Segestes 塞吉斯特 33, 36
Seleuceia 塞琉西亚 84
Seligenstadt 塞利根施塔特 92
Senate 元老院 46
Sens 桑斯 169
Seuvi 瑟弗人 37
Severinus, St. 塞韦里努斯, 圣 168
Severus, Alexander 塞维鲁, 亚历山大 150, 151, 174, 175

Severus, C. Caecina 塞维鲁,C. 凯基纳 49

Severus, Septimius 塞维鲁,塞普蒂米乌斯 89, 116;其军队, 177, 184, 190;边境与 159;帕提亚与 147

Shapur I 沙普尔一世 137, 151

Shapur II 沙普尔二世 151, 153

Shivta 希夫塔 78

Sisily 西西里 81

Siege warfare 围困战 44, 135 – 136。又参见 Artillery;Fortifications

Silings 西泠人 153

Sinai 西奈人 112, 113

Singara 辛加拉 151, 154, 159

Sirmium 锡尔米乌姆 185

Siscia 锡斯西阿 49

Sitifensis 锡蒂芬西斯 158

Sohemus (of Emesa) 苏希穆斯(埃米萨的)27, 38, 111, 112

Solothurn 索洛图恩 163

Solway – Tyne 索尔韦 – 泰恩 115

Sophene 索彭恩 112

Spain 西班牙 17, 47, 56, 158, 174

Sparta 斯巴达 31

Spatha "斯帕塔"(野蛮人的长刀)175

Stanwix 斯坦威克斯 71, 73

Stein am Rhein 莱茵河畔斯泰因 161

Stilicho 斯蒂利奇奥 188

Strabo 斯特拉博 21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89, 92, 160

Strata Diocletiana "戴克里先"前沿阵线 161, 176, 178

Suetonius 苏埃托尼乌斯 17, 37, 72, 107

Sulla 苏拉 42

Sura 苏拉 107, 113, 123

Symmachiarii 非正规军 123

Syracuse 叙拉古 44

Syria 叙利亚 113, 118; 阿萨西德与 150; 在该地区的附庸 20, 112, 113; 边境与 67, 69, 110; 军团与 17, 47, 113 – 114, 118, 119, 174; 罗马军事力量与 47, 104 – 105, 107, 111

Tacfarinas 塔克法里纳人 18, 25, 42

Tacitus 塔西佗 16, 17, 24, 30, 37, 39, 42, 86, 92, 97, 118, 183

Tangier 丹吉尔 155

Tapae 塔佩 97

Tarcondimotid 塔康迪莫蒂德 20, 30

Taifali 泰法利人 155

Taunus Mountains 陶努斯山脉 92, 93, 96, 117, 122, 145, 153

Temple Mount 坦普尔山 118

Tencteri 滕克特里人 115

Teucrid principality 蒂尤克里德公国 20

Theiss 蒂萨河 97

Theodosius 狄奥多西 144

Thrace 色雷斯: 被兼并 39;作为附庸国 20, 25, 30, 38;从该地区征募新兵, 158; 对该地区的威胁, 101, 147, 152

Tiaret 提亚雷特 169

Tiberius 提比略 17, 20, 72, 97; 附庸国与 37, 38;日耳曼与 21, 36, 38;巴诺尼亚叛乱与 49

Tigranes 提格兰 105

Tigranocerta 提格累诺塞塔 105

Tigris 底格里斯河 108, 110, 150, 154, 158

Tingis 廷吉斯 155, 158

Tingitana 廷吉塔纳 158

Tipasa 蒂帕萨 124

Tiridates 蒂里德泰斯 105, 107
Tiridates III 蒂里德泰斯三世 159
Tisza 蒂萨河 97
Titus 提图斯 112
Tomis 托米斯 60
Tongres 通格尔 160
Tormenta "托尔门塔"(燃火箭)45
Tormenta muralia 工事防御射手 163
Trabzon 特拉布宗 107
Traianus, Marcus Ulpius 特赖阿努斯, 马尔库斯·乌尔皮乌斯 113
Trajan 图拉真 145; 军队与 85, 126, 184, 186; 达西亚与 86, 97, 101, 104, 115; 在东方 110, 113; 防御工事与 168; 其军事政策的无效 111; 设防边界与 107 - 108, 159; 帕提亚与 46, 108, 110, 116, 150
Trajan's column 图拉真柱 67, 121
Transcaucasia 特兰斯考卡西亚 159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155
Trapezus 特拉佩祖斯 107, 147
Triarii 特里阿里人 40
Trier 特里尔 160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84
Tripolitania 的黎波里塔尼亚 173
Troesmis 特罗斯米斯 124
Tsiza 齐扎 21
Tunisia 突尼斯 158
Turnu Severin 塞维林堡 97
Tuttlingen 图特林根 92
Tyras 提拉斯 146

Upper Germany 上日耳曼; 和阿拉曼人的攻击 152, 153; 其边境 68, 73, 93, 96, 155; 军团与 174。参见 Germany
Urban cohorts 市镇步兵大队 17, 173, 183 - 184
Usipetes 攸西派提人 115

Valens 瓦林斯 137
Valentinian I 瓦伦提尼安一世 132, 144, 161
Valerian 瓦勒里安 137, 151, 153
Vandals 汪达尔人 153, 155
Vannius 万尼乌斯 37
Varus, P. Quinctilius 瓦鲁斯, P. 昆蒂利乌斯 18, 21, 24, 33, 36, 42, 85
Vegetius 维吉蒂乌斯 186
Velites 维利特人 40
Vemania 韦默尼亚 163
Vespasian 韦斯巴芗 89, 111, 186; 军队与 13 - 14; 附庸国与 26, 112 - 113; 加拉提亚与 113; 战略政策与 57; 威胁与 27, 114
Vetera 维特拉 168
Vexillatio 步兵分遣队(后演化为骑兵分遣队)185
Vexillationes 分遣队 124 - 125, 145, 146, 152, 153; 在北非 158; 塞普蒂米乌斯·塞夫鲁斯与 184; 其单位 177, 178, 179; 削弱军队 175
Via Egnatia 埃格纳蒂阿陆道 84
Vigiles 维吉利人 183, 184
Viminacium 维米纳休姆 191
Vindonissa 文多尼萨 89, 166
Visigoths 西哥特人 137, 155
Vologaeses 沃洛吉西斯 105, 107
Volubilis 沃吕比利斯 155, 156
Vonones 沃诺尼斯 38

Wachposten 小瞭望塔 73
Wales 威尔士 72

Wallachia 瓦拉几亚 155
Welzheim 韦尔茨海姆 93
Wetterau 韦特奥 92,96
Wiesbaden 威斯巴登 92
Wimpfen 温普芬 92
Windisch 温迪施 89, 92
Wittnau 维特瑙 169

Xanten 克桑滕 47, 168

York 约克 67, 72, 135, 167
Yverdon 伊韦尔东 163

Zealots 狂热犹太教分子 118
Zenodorus 芝诺多鲁斯 32
Zeugma 久格玛 26, 107, 111
Zosimus 佐西姆斯 188
Zurzach 楚尔察赫 161
Zwischenkastelle 小要塞 73